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问 董建华 周小川 陈 元 张 平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炳华	王洛林	宁吉喆	毕井泉	江小涓	刘元春
刘世锦	刘 伟	刘遵义	许宪春	朱之鑫	朱 民	朱光耀
杜 鹰	谷源洋	李 扬	李毅中	杨伟民	张大卫	张卓元
张 勇	张晓强	林兆木	林毅夫	郑新立	姜增伟	高培勇
海 闻	钱颖一	郭树清	常振明	黄奇帆	隆国强	程永华
韩永文	谢伏瞻	解振华	楼继伟	蔡 昉	樊 纲	薛 澜
戴相龙	魏礼群	魏建国				

国际专家

康睿哲/Richard Constant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马克·乌赞/Marc Uzan

傅强恩/John Frisbie

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

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

郑永年

编委会

主 任 王一鸣

副主任 王晓红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晓河	王昌林	王 战	叶辅靖	陈文玲	迟福林	陈宗胜
李 平	李向阳	张宇燕	张 琦	张燕生	张蕴岭	范恒山
冼国明	郑京平	施子海	姚 洋	顾学明	贾 康	徐 林
黄志凌	黄群慧	曹文炼	裴长洪	霍建国		

主 编 王一鸣

编辑部主任 李 蕊

· 本刊专论 ·

- 2025 年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的形势分析及前景展望 霍建国 (005)
- 多措并举 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 (010)

· 国际经济 ·

- 以“走出去”引领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战略 陈长缨 (021)
- 世界经济温和增长复苏前景不确定性上升
——2024 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及 2025 年展望
余秋梅 李婧婧 郝悦 朱祎 赵宇欣 (033)
- 2023—2024 年世界贸易组织重要谈判进展及其趋势
东 艳 张 琳 郭若楠 (044)
-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服务业扩张
——基于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分析 闫冰倩 (055)
- 全球产业链重构：回岸、近岸与友岸的趋势特点分析
李元琨 苏庆义 (068)
- 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模式”形成、发展和延展
——基于民航基建的视角 孙慧娟 (080)

· 宏观经济 ·

新质生产力与农业现代化	张秀青 (088)
要素保障赋能经济大省挑大梁：为何与何为	林炜炜 徐致远 (099)
数字经济赋能产业融合催生新质生产力的机理、问题及对策	姜惠宸 (111)

· 产业发展 ·

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形势及相关建议	蔡 杨 任荣荣 (120)
------------------	---------------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129)
----------	---------------------

CONTENTS

Analysis of the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in 2025 *Huo Jianguo* (005)

Take multiple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ilver economy
Research Group of 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010)

“Going out” leads China’s opening – up strategy in the new era *Chen Changying* (021)

Uncertainty about the outlook for a modest recovery in the world economy has risen
——Analysis of the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in 2024 and outlook for 2025
Yu Qiumei, Li Jingjing, Hao Yue, Zhu Yi, Zhao Yuxin (033)

Progress and trends in important WTO negotiations in 2023 –2024
Dong Yan, Zhang lin, Guo Ruonan (044)

Expansion of services from a global value chain perspective——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industries *Yan Bingqian* (055)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analysis of the trend characteristics of “backshore”,
“nearshore” and “friendly shore” *Li Yuankun, Su Qingyi* (068)

The “China model” of glob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has been formed, developed
and extended——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 aviation infrastructure *Sun Huijuan* (080)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Zhang Xiuqing* (088)

Factor guarantee empowers major economic provinces to be the mainstay: why and what
Lin Weiwei, Xu Zhiyuan (099)

The mechanism,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digital economy enabling industrial
integration to generat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Jiang Huichen* (111)

The investment situation of China’s high – tech industry and related suggestions
Cai Yang, Ren Rongrong (120)

Main Indicators of World Economy (129)

2025 年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的形势分析及前景展望

霍建国

摘要：本文从市场结构、产品结构、市场开拓等方面分析了 2024 年我国外部市场环境呈现的新特征。本文认为，2025 年我国外部市场环境将呈现复杂多变的局面。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难以根本缓解，贸易摩擦面临新的矛盾；中美高科技产品贸易持续承压，我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短期仍受困；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困难加剧，南部市场增长潜力受限；产业链供应链调整转移态势下的跨国公司投资难以根本反转等因素，将使外部市场环境继续承压。另一方面，美欧经济或将进入弱复苏阶段，市场需求订单将略有增长；中美关系进入战略对峙阶段，双边关系将出现阶段性缓解；新能源产品出口仍面临机遇，出口结构升级将持续发力；随着高水平开放的推进，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将趋于稳定；国内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外资出口将止跌回稳等因素，将利好外部市场环境。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对 2025 年我国宏观政策层面稳外贸工作以及企业的应对措施，分别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对外贸易 外部市场环境 高科技产品 劳动密集型产品 营商环境

作者简介：霍建国，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2024 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为 43.85 万亿元，同比增长 5%。其中，出口为 25.45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进口为 18.39 万亿元，同比增长 2.3%。在 2024 年外部市场环境发生复杂变化的情况下，我国能够实现外贸基本盘的稳定增长，实属不易。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外贸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的强大韧性。从全球范围看，我国的市场份额基本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但是如果从市场结构、产品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分析，有些变化还是应引起高度重视。2025 年我国外贸将面临新的复杂竞争局面。要实现 202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稳外贸、稳外资、稳就业的总体要求，做好 2025 年的外贸工作，关键是要把握好国际竞争环境的变化特点与美国特朗普上台后一系列政策的影响与冲击，其中与美国竞争的策略和节奏也将成为影响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企业来说，一定要适应市场变化的新特征和产品结构变化的新趋势，有针对性地采取积极的调整策略，扬长避短，才能确保在新的一年里变被动为主动，实现外贸的稳定增长。

一、2024 年我国外部市场环境变化的主要特征

2024 年，我国外贸面对的市场环境存在众多不利因素。比如，乌克兰危机导致国际能源供给出现剧烈波动，全球石油和天然气市场跌宕起伏。巴以冲突引发的红海危机进一步升级，导致正常的商船

通行受阻，有些商船不得不绕行非洲好望角，时间要增加半个月左右，运输成本大幅增加。此外，中美博弈和美国对高科技产品的限制，全球安全泛化，以及不断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全球贸易造成破坏性影响。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2024 年 10 月发布的《全球贸易展望与统计报告》，2024 年国际货物贸易量预估仅增长 2.7%，低于过去 10 年全球平均 4.9% 的增长率。比较之下，我国外贸表现略好于预期。从外部市场环境分析，我国外贸面临的主要变化特征有以下几方面。

（一）主要出口市场分化明显，美欧市场份额呈收缩趋势

尽管 2024 年我国出口基本保持了稳定增长，但是对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市场的出口增长困难。其重要原因是美欧经济增长乏力，需求订单不足。美国加息导致长期国债利率大幅上升，欧美加息打压通胀的同时也抑制了经济增长。欧洲经济 2024 年预计仅增长 0.7%，且在能源方面长期面临较大压力，德国甚至出现经济负增长。上述这些因素导致美欧市场需求收缩，为我国出口带来了新压力。尽管我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以及南方国家市场取得了较好进展，但是从长期趋势看，美欧市场份额的稳定和增长仍关系到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美欧市场的这种变化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二）机电产品需求出现分化，劳动密集型产品承受更大压力

机电产品需求出现分化。2024 年年初，机电产品出口一度承压，出现明显负增长。但随着部分优势产品出口的扩大，下半年以来，机电产品回归正增长。除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在出口增长中继续发挥了明显的拉动作用外，芯片、船舶和重型机械也加入到了出口的主力军之中。但要注意的是，“新三样”产品拉动出口的比例有限。如果不能有更多的出口优势产品加入到出口行业，真正实现出口结构的整体优化升级、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仍将面临艰难增长的局面。与此同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明显比机电产品承受着更大压力，包括纺织、服装、鞋帽、玩具及部分小五金工具等在内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整体下降幅度较大。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正面临两头挤压，一方面是来自美欧市场需求结构变化导致的订单数量减少，美欧市场需求升级导致部分传统产品出口较为困难；另一方面是来自东南亚国家和印度的竞争，其较低的生产成本对我国构成一定的竞争压力。虽然部分企业具有一定的压力承受能力，可以通过提升产品竞争力，保持一定的出口市场份额，但是面临的压力在短期内难以缓解。

（三）贸易保护主义持续上升，企业开拓市场难度进一步加大

2024 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继续呈上升趋势，没有出现明显改善。美国对我国外部经济的打压有增无减，欧盟对我国出口优势产品频繁发动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我国的国际贸易市场环境进一步恶化。WTO 曾警告全球贸易环境处于二战以来最恶劣的时期，如不努力改变贸易环境，全球贸易有可能进入负增长阶段。历史上经济衰退时，贸易可能出现负增长，比如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贸易曾出现过 15% 的负增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5 年 1 月发布的数据，2024 年全球经济增速可达 3.2%，比 2024 年年初预测的 3.1% 略有改善。为什么贸易表现比经济还弱？因为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对正常贸易的破坏性较大，加上中美贸易冲突的外溢影响，美国不仅没有取消对我国一些出口产品加征的额外关税，反而在高科技产品贸易方面采取了更严厉的限制措施，从而导致国际贸易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我国出口企业开拓市场的难度进一步上升。

（四）产业链供应链波动加剧、跨国公司订单出现转移迹象

我国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是产业链供应链的调整变化，即产业链供应链波动加剧。主要是跨国公

司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开始倾向于短链，进行总体收缩，不把外包加工放到我国和东南亚国家。比如美国企业倾向于向墨西哥甚至其他拉美国家收缩，欧洲企业会转移到印度和中东地区的国家，这样的趋势是客观存在的。我国国内部分跨国公司也有调整迹象，特别是信息技术产业向印度的转移，已给我们造成新的压力。针对跨国公司订单转移迹象，我国高度重视并多次强调做好稳外贸、稳外资工作，持续改善营商环境，留住跨国公司。从目前情况看，产业链供应链调整的冲击波已有所收敛。

二、2025 年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不利因素与有利因素

综合分析，2025 年我国外贸面临的形势将呈现复杂多变的局面，最大的不确定性仍是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对华贸易政策的调整 and 变化，从其竞选时期的言论和近期组阁的动向看，形势仍比较严峻。但也要注意，特朗普作为交易型的政客，其政策主张的落地将永远伴随着不确定性，似乎一切都将取决于客观环境的变化和沟通谈判的结果。这就造成了 2025 年中美贸易发展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依旧认为，我国外贸 2025 年既存在不利因素的影响，也有可能出现稳定因素，需要深刻把握好形势发展的变化，抓住有利时机做好出口工作。

（一）不利因素

1. 美国面临结束加息政策选项，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减缓。2024 年，美国基本进入降息阶段。但特朗普上台会不会导致通胀再次回头，迫使美联储暂缓或停止降息，目前还是个不确定因素，这要根据美国经济指标的变化来看。巴以冲突对能源价格有一定影响，美国降息会导致原材料价格上升，增加通胀下降难度。还有美国降息时，全球其他国家是否与其同步，对经济的影响也不一样。美国的货币政策变化势必影响人民币汇率。如果美联储加息，人民币会相应贬值。如果美联储停止加息，人民币汇率会相对稳定。若我国经济复苏势头较强，就会驱使人民币升值；若国内经济持续承压，人民币将继续面临贬值压力。人民币汇率波动虽主要受美元指数影响，但也与国内的经济表现密切相关。从某种角度看，人民币升值和贬值更多是受到国际游资冲击，资金的流进和流出是驱动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主要因素。当然如果国内经济环境好，外商投资踊跃，外资流入增加，也将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支撑。

2. 贸易保护主义难以根本缓解，贸易摩擦将面临新的矛盾。从当前复杂国际局势判断，贸易保护主义不会得到根本缓解，我们要做好应对复杂外部环境的准备。还有一个潜在风险是贸易摩擦会不会加剧。现在的贸易摩擦仍集中反映在中美之间，特朗普上任后，必会动用关税手段，寻求构建一个于美国有利的国际贸易环境，但其关税政策也面临众多挑战与制约。首先是美国经济的表现，特别是通货膨胀的变化；其次是特朗普团队内部的一致性和执行力也存在一定变数；此外，国际主要贸易伙伴的反对和抵制力度也存在着不确定性。总的来看，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肯定会发生，但其激烈程度和冲击波仍取决于双方的沟通及谈判，不排除双方达成一种过渡性安排，以避免发生两败俱伤的贸易战。对此我们应做好两手准备。

3. 中美高科技产品贸易将持续承压，我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短期仍将受困。中美之间的高科技竞争不会终止，将长期存在。美国打压中国，其关键是打压高科技产业。尽管有分析认为，之前美国在芯片限制上是失败的，因为美国企业也承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我国又通过自立自强突破了一些技术。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在高技术领域将持续面临一定的压力。因为高科技限制不仅是芯片和半导体领域，还涉及精密仪器、高科技中间产品等诸多领域。

4. 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困难加剧，南部市场增长潜力受限。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困难加剧，现在之所以还能维持，是因为对东南亚、中东、拉美、非洲等地区的出口态势较好，至少保持了增长，

特别是对俄罗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幅较大。但总体分析，这些南方市场潜在需求能力有限。比如，东南亚国家大多未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人均收入不变时，其潜在需求增长将受到约束。所以整个南方市场需求订单难以维持高增长，我们还是要关注欧美市场，因为欧美市场的人均收入较高，经济一旦好转，市场需求恢复，订单会大幅上升。这个需求一旦释放，全球贸易将摆脱收缩的局面。

5. 产业链供应链调整转移仍在继续演变，跨国公司投资难以根本反转。产业链供应链还在持续演变，目前还看不到有利的变化，最明显的变化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仍较艰难，加工贸易长期处于负增长状态。虽然服务领域的投资有所增长，但跨国公司在制造领域的投资短期仍难以反转，难以再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这是个最大的变数，也是一个不利因素。

在上述这些不利因素作用下，总体上看，2025 年我国外贸仍将面临艰难增长局面，继续面临一定挑战和增长压力。但我们既要看到不利因素，也要看到有利因素。

（二）有利因素

1. 欧美经济或将进入弱复苏阶段，市场需求订单将略有增长。2024 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呈现缓慢回升态势，通胀、消费、就业等指标有所好转，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经济没有进入危机或衰退阶段。按目前经济指标分析，2025 年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特朗普上台后也面临稳经济的重任。2024 年欧洲经济比较困难，基本上可实现 0.7% 的增长。2025 年欧洲经济会不会有一个修复回升的过程？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实现停火，对欧盟经济恢复有利；如果欧盟就业和通胀问题有所缓解，其经济增长就会达到百分之一点儿。这样欧美经济有可能同时进入弱复苏阶段，会释放一定的需求，市场订单数量会有所增加。这对我国扩大出口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2. 中美关系进入战略对峙阶段，双边关系将出现阶段性缓解。中美关系已进入战略对峙阶段。这个对峙阶段的大背景主要是中美作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两个国家，都在尽力避免冲突升级。尽管特朗普上台会给中美关系增加新的不确定性，但中美战略对峙的基本特征仍未发生根本改变。特朗普大选期间的政治主张和煽动性言论，在落地过程中无论时间和内容都存在巨大不确定性，需要我们密切关注并保持积极的沟通和谈判姿态，当然也不排除一些部门政策出现变化。总的来看，中美贸易将面临新的矛盾和摩擦，但不至于突发更激烈的正面冲突和对抗。

3. 我国新能源产品出口仍面临机遇，出口结构升级将持续发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将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占比将持续上升，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带动下，新能源产品出口虽然面临一定挑战，但总体看仍面临新的发展机遇。我国在新能源产品上已具备了较强的竞争力，可以在此基础上不断加强出口市场开拓力度，形成新的增长点。在全球气候变化协定推进背景下，绿色低碳转型是一个正面因素。因为不仅要改变能源结构，还要更新现有设备，促进节能减排，那么设备更新带动产业投资就会推动经济增长。所以出口结构升级会继续发挥影响力，困难时没有别的选择，只有通过转型升级，实现新的突破。

4. 随着我国高水平开放的推进，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将逐步趋于稳定。我国正在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大同国际高标准规则的对接，积极扩大市场准入开放。制造业该开放的都开放了，服务业开放正在提速，现在来华投资的外资更多是投向服务业，制造业投资已经有点收缩了。只要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竞争环境公平，外商来华投资觉得不受歧视，他们就愿意来。因为我国的市场具有巨大增长潜能，比印度、越南的市场需求和拉动作用大得多。

5. 国内营商环境将出现积极变化，外资出口将止跌回稳。2024 年我国国内营商环境已出现一些积极变化。目前，中央强调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把高水平开放作为中国经济制胜的关键一招。通过积极对标国际规则规制，国内营商环境就会发生根本变化。营商环境和经济投资环境是联系在一起

的，要想保经济增长，就必须搞好营商环境。这不仅仅是自贸试验区的任务，估计很快还会在全国推动规则规制的对标进程。营商环境一旦改观，外资流出就会减弱甚至出现回流，外资出口就会止跌回稳。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出口份额较大，合计占到出口份额的 80% 以上。这是出口的基本盘，大盘子稳住了，外贸只有向上发展的空间而不可能向下。

三、2025 年我国稳外贸的政策措施建议

从宏观政策层面看，稳外贸、稳外资在 2025 年的经济工作中已被置于突出位置。笔者认为，在稳外贸、稳外资方面，关键要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坚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把对标高水平国际标准的工作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抓出成效，这对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将发挥积极的保障作用。二是继续抓好营商环境的治理，努力实现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国内市场竞争环境，这是确保外资投资中国的制度型建设。只要外资看好中国市场，外资的流入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助推器。三是鉴于民营企业已承担了 60% 以上的出口份额，只要为民营企业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为其排忧解难，相信民营企业就一定可以发挥出竞争的韧性，确保出口规模的稳定增长，这是稳外贸的基础工作。

从企业层面分析，笔者建议出口企业更要关注以下几方面技能的提升。一是加强市场研究。国际市场正处于调整变化之中，谁最先掌握这一变化，谁就将处于竞争的主动。所以，企业一定要认真研究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市场战略。总的要求是，不要主动撤离欧美市场，但一定要注意同时开发新兴市场，以求得出口市场份额的相对稳定。二是保持自己经营产品的竞争优势，不断提高软实力竞争力。目前我国的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十分明显，保持产品质量的稳定性永远是重点，但也要注意我国企业的差距并不在产品质量方面，而是在软实力竞争力方面。例如，如何保持同客户的良好关系，形成默契的配合，通过与客户合作，实现规模的扩大和份额的增长。这是目前我国大多数出口企业需要掌握的技能。三是逐步提高全产业链竞争能力。现代竞争模式已由传统的制造销售模式快速向全产业链竞争模式转化，即一个优势的企业集团将全面或部分掌控从产品研发制造到销售的全链条竞争能力，这种竞争能力可以给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很多中等规模的企业也正在向全产业链竞争模式转化。四是不断探讨海外投资的发展模式。贸易与投资历来都是交织发展的，中国的出口企业正面临来自国际市场主要贸易伙伴频繁的贸易摩擦，规避贸易摩擦的主要方式就是将贸易和投资融合发展，出口企业要关注可能的市场投资机会，学会将出口产品转换为本地化生产和销售，这也是跨国公司普遍的发展经验。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到今天，无论是制造业，还是出口规模，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都相当高，所以必须考虑强化多元平衡的发展模式。这对我国的经济繁荣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出口企业应熟悉并加强对这种发展模式的开发利用。五是企业应全面掌握电子商务平台的开发利用，提高网络平台的开发利用能力。出口企业无论规模大小，都需要学会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宣传推销自己，这已成为企业竞争的基本手段。一个有魅力的宣传广告胜过多次拜访客户的效果，还可以借用网络平台实现签约成交，关键取决于销售员的沟通交际能力。这些方式更适合于中小企业的发展扩张过程，也是保障出口竞争力的手段之一。

参考文献：

- 1. 霍建国：《发挥好外贸出口竞争优势 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全球化》，2022 年第 4 期。
- 2. 霍建国：《以高水平开放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物流与采购》，2024 年第 1 期。

责任编辑：郭 霞

多措并举 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

摘要：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快速演进，养老需求急剧扩大，银发经济兼具养老事业和产业特性，拥有巨大的产业发展潜力。发展银发经济，是事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本文综合国内外情况，探讨银发经济的内涵和边界，提出银发经济发展存在需求受到制约、养老保障服务体系建设滞后、市场供给不足、产业链缺乏整合等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产业分类，本文分析了养老金融、养老服务、老年用品、老年旅游、老年人力资源和老年医疗卫生六大领域发展现状，研判发展趋势，采用组合预测方法对银发经济的潜在规模进行测算。在定性和定量测算基础上，提出银发经济未来的发展任务、发展目标，以及加快完成配套政策体系、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和有效供给、拓展升级产业链、激发人力资源红利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银发经济 养老产业

一、研究背景

2024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这是我国首个以“银发经济”命名的政策文件，首次明确界定了银发经济的内涵，提出了发展银发经济的总体要求以及4个方面26条具体措施。发展银发经济，是事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环节，特别是在中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的当下，发展银发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发展银发经济意义重大

1. 有利于推动产业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银发经济细分行业多、涉及面广、产业链长、业态多元，既可以为传统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推动传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也可以为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拓展新的应用场景。发展银发经济能够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出更多适合老年人使用的产品，如智能家居、健康监测设备、适老化交通工具等，从而扩大市场的有效供给，满足老年人群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优化养老产品和服务供给，挖掘养老消费潜力，还可以有效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银发经济作为新兴经济领域，具

^{*} 本文为国家高端智库交办课题“发展银发经济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执笔人为窦勇、梁云凤、邬琼、张乃欣、崔璨、李达、马晓玲。

有巨大的产业发展潜力和市场需求，通过政策支持、创新驱动、产业赋能以及社会参与共建等方式，银发经济将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引擎，有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2. 有利于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增进人民福祉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年人群体规模迅速扩大，同时养老需求也急剧增加，迫切需要社会化服务为老年人养老提供有力支撑。银发经济兼具养老事业和产业特性，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高度关注老年人的“急难愁盼”，包括老年助餐服务、社区便民服务、居家助老服务、养老照护服务、老年健康服务等。解决这些民生痛点，不仅实实在在地增进老年人福祉，而且能消除家人的后顾之忧。我国改革开放后经过 40 多年经济高速发展，老年人的需求结构从原先的生存型逐步转向发展型，对生活品质有更高的需求与期待。发展银发经济，能够更好满足老年人基本生活需要和多层次需求，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不断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效增进人民福祉。

3. 有利于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公平和谐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今后较长一段时期的基本国情，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规模大、速度快、高龄化、未富先老等鲜明特点。与快速演进的人口老龄化相比，我国应对这种变化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相对滞后，专业人才特别是护理人员短缺，政府、市场、社会力量携手应对老龄化的体制机制尚未形成，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水平还比较低，农村养老服务明显滞后，居家社区养老和优质普惠服务供给不足等，给我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带来隐患。发展银发经济，统筹养老事业和产业发展，特别是利用市场化手段，能够引导社会各界共同应对老龄化社会带来的挑战，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满意度，确保老年人能享受到更多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二）正确认识银发经济

银发经济的概念比较宽泛，目前尚无统一、准确的定义。从老龄化先行国家的发展历程看，各国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老龄化阶段，对银发经济的内涵要义、发展目标的界定也在不断发展。

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率先出现银发经济的说法（范宪伟，2022）。日本的“银发经济”概念是指为老年人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包括服务业和生产制造业两大部分，随着日本老龄化的不断加深，银发经济不再受年龄限制，整个日本的经济和产业都向不分年龄的“全时代”迈进（王皓田，2024）。2014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培育弹性经济》报告将银发经济定义为，专注于为老年人生产和提供产品及服务的行业或经济部门。^① 2015 年欧盟委员会提出，银发经济是与 50 岁以上人口有关的公共和消费支出所产生的所有经济活动。^②

我国学者也对银发经济给出了自己的定义。杨燕绥等（2017）提出，银发经济是在健康长寿和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下，组织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活动及其供应关系的总称。林宝（2024）认为，银发经济的界定是以“老年人”和“老龄阶段”两个关键词来限定其满足需求的特定对象，进而再指向满足这些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及相关经济活动。在我国不同时期出台的政策文件中，曾先后使用过老年服务业、养老服务业、养老产业、老龄产业、健康产业、康养产业、银发产业、银发经济等概念。2020 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发展银发经济”。这是中央首次将“发展银发经济”列入

^①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Fostering resilient economies: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local labour markets, http://www.oecd.org/cfe/leed/Fostering-Resilient-Economies_final_opt.pdf.

^②Silver Economy. Demographic change and economic opportunity, May 2017,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17175867_Silver_Economy_Demographic_Change_and_Economic_Opportunity.

国家战略安排。2021 年《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把培育银发经济作为五大任务之一。2024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将银发经济定义为“向老年人提供产品或服务，以及为老龄阶段做准备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和”。

要正确认识银发经济，就要科学把握其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每个人都会老，人会变老的自然属性和客观规律决定了发展银发经济的必然性，也是银发经济提出和发展的根本点与出发点。发展银发经济不仅仅是身体的健康管理和物质财富上的满足，更重要的还包括精神上的积极参与、尽可能延长创造价值、为社会做出贡献。银发经济的社会属性主要表现在民生性、普惠性和兜底性三方面。当前我国老龄化速度加快，养老问题属于典型的老百姓“急难愁盼”民生问题。银发经济作为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的深度融合，其普惠性是指要求实现基本养老服务的公平和可及性。兜底性是指在社会各方都不能提供有效供给与服务的情况下，政府需要发挥兜底保障作用，为服务对象提供最基本的保障性服务。银发经济的提出与发展是通过自力更生、社会帮扶和多种经济活动的合力，使老年群体得以体现价值、创造价值，从而为经济发展注入持续动能，成为推动全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三）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尽管国家高度重视发展银发经济，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演进，还存在不少问题与挑战。一是银发消费潜力尚未完全激活。银发市场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不强，服务和产品的成本居高不下，银发市场消费需求受到制约。二是养老保障服务体系建设滞后。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快、规模大，“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特点比较明显，全社会的养老保障和服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三是市场供需不匹配。部分养老服务供给不足，出现“有钱买不到服务”的现象；部分领域供大于求，同质化、低端化竞争加剧。四是银发产业链缺乏有效整合。银发经济龙头企业较少，大多为中小企业，以分散生产经营为主，缺乏协同发展；产品与服务单一，没有形成产业规模，难以形成聚集效应；产业链上下游合作水平不高。五是人才队伍建设有待加强。养老护理从业人员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此外，随着养老服务需求的日趋多样化和个性化，也对从业人员的技能和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现有养老护理人员普遍存在年龄偏大、专业化水平较低等问题。

二、银发经济的产业状况、发展趋势与潜在规模

银发经济具有面广、链长、业态多、潜力大等特点。养老产业作为银发经济的支撑和主体内容，是满足老年群体差异化需求的重要保障。

（一）银发经济的产业状况

根据国家统计局《养老产业统计分类（2020）》，本文重点聚焦养老金融、养老服务、老年用品、老年旅游、老年人力资源和老年医疗卫生等六大领域进行产业分析。

1. 养老金融

养老金融是满足居民在养老方面的金融需求而进行的各种金融活动的总称。养老金融又可分为养老金金融、养老服务金融和养老产业金融三大类。养老金金融是在养老金制度下开展的资金管理服务，旨在实现养老金的保值增值。当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以基本养老保险为基础，以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等为补充的多层次多支柱养老金融体系（见图 1）。

养老服务金融是除养老金制度以外的用于满足居民养老财富积累、老年消费等多元化需求的金融

服务活动。近年来，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加大对养老领域的支持力度，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为老年人提供丰富多样的服务供给，满足老年人在投资、消费、理财等方面的差异化需求。养老产业金融是运用各类金融工具为养老相关的实体产业提供投融资支持、助力养老产业发展的金融活动。

2. 养老服务

养老服务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养老服务业是满足老年人生活的各种服务需求总称，包括金融、旅游、健康医疗等在内的产业总和。狭义的养老服务业是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等的社会经济活动。主要有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等模式。居家养老是为居住在家的老年人提供必要的照顾和支持等社会化服务。居家养老已成为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基础，推动了居家养老服务市场的快速发展，居家养老服务由可替代性较强的一般性服务为主逐渐拓展到上门服务、户外服务、社区活动等多种形式。社区养老是为居住在社区内部或附近的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可分为上门服务和社区日间服务中心两种主要形式。此外，社区养老服务还有“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公租房社区的养老模式、“三位一体”社区养老服务模式等多种创新形式。机构养老是以专门的机构为养老地点，为老年人提供集中居住和照料护理服务的养老模式，机构类型包含福利院、养老院、托老所、老年公寓和临终关怀机构等。近年来，机构养老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截至 2023 年底，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 40.4 万个，较 2015 年增长近 2.5 倍。注册登记的养老机构 4.1 万个，较 2015 年增加 1.3 万个。养老床位合计 823 万张，较 2015 年增加 150.3 万张，其中养老机构的床位数为 517.2 万张，占总床位数的比重为 62.8%。^①

3. 老年用品

老年用品是一个多元化的行业，涵盖了为满足老年人日常生活、健康保健、康复辅助等方面的需求产品。主要包括生活辅具类用品、健康护理与康复器械类用品、适老家居类用品、娱乐健身类用品、保健品类用品。此外，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智能化老年用品逐渐兴起，如智能手表、智能摄像头、智能跌倒监测系统等。2019 年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老年用品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对老年用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方向性指引，强调要加快构建老年用品产业体系，不断满足老年人多层次的消费需求。同时提出了到 2025 年老年用品产业总体规模超过 5 万亿元的发展目标。

4. 老年旅游

全国各地依托本地文旅资源，并针对老年群体消费心理、行为习惯以及购买偏好等，不断丰富老年文旅产品供给。老年旅游市场朝着规范化、品质化方向加快发展，逐渐形成特色鲜明、布局合理的老年文旅产业体系。全国老龄委调查显示，2021 年中国老年人文旅消费超 7000 亿元，逐渐成为文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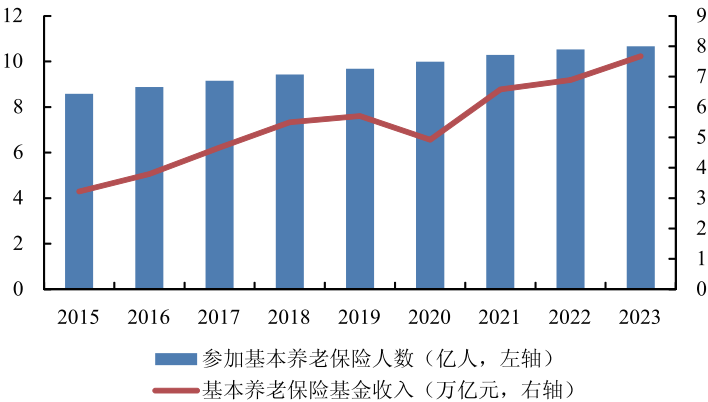


图 1 2015—2023 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①民政部、全国老龄办：《2023 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民政部网站，2024 年 10 月 11 日，<https://www.mca.gov.cn/n152/n165/c1662004999980001752/content.html>。

消费的生力军。^①

5. 老年人力资源

老年人力资源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指满足老年人不同需求并支撑养老产业发展的人才；另一类是指年龄在 60 岁及以上，身体健康状况允许，并具备一定劳动能力、经验、技能和知识，能够继续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为社会创造价值的老年人口群体，强调老年人自身的劳动能力和社会价值。从第一类老年人力资源看，我国形成了以职业教育为主体，应用型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层次相互衔接的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体系，养老服务人才素质能力稳步提升。据统计，全国开设老年服务与管理等相关高职专业点 915 个，在校生约 78 万人；中职专业点 1090 个，在校生约 80 万人。^② 从第二类老年人力资源看，一方面，我国老年人口人力资本水平不断上升。据统计，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2000 年的 4.03 年升至 2010 年的 5.89 年，随后进一步升至 2020 年的 7.1 年。^③ 另一方面，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水平持续提升，为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提供了基本保障。

6. 老年医疗卫生

老年医疗卫生是以满足老年人群体的生命与健康服务需求为目的而提供的专业性保障服务，涵盖预防、医疗、康复、护理、健康教育等多个方面。近年来，我国老年医疗卫生行业快速发展。截至 2023 年，有 1.35 亿老年人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接受健康服务，设有老年医学科的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达 6877 个，养老服务机构与医疗卫生机构签约合作超过 8.7 万对。^④

（二）银发经济的发展趋势分析

1. 银发经济保持快速发展

从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看，我国从轻度老龄化社会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仅用 22 年，明显快于世界平均水平，更是快于日本的 26 年。^⑤ 特别是 1962—1975 年婴儿潮出生人口的逐渐衰老，我国将由中度老龄化社会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在居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科技进步以及预期寿命延长等影响下，未来我国人口高龄化的趋势越发明显，80 岁及以上的高龄人群占比将快速提升。老年人口的进一步增加，对养老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不断扩大，银发经济的市场规模将持续上升并保持快速增长态势，为养老产业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2. 银发经济的发展更趋多元化、品质化

我国银发经济的发展正处于初级阶段，部分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行业发展不均衡、标准体系不健全以及服务规范化明显滞后等问题制约着银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未来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群体的消费需求逐渐多样化、个性化，对养老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将由“有没有”的生存型消费向“好不好”的改善型消费转变。供需两端同时发力，养老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结构进一步优化，供给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银发经济的高端化、品质化发展水平将迈上新台阶。

3. 银发经济的创新发展水平持续提升

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应用场景的拓展，科技创新在银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不仅为推进养老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利支撑，而且也将为老年人提供更多

^①袁莉：《壮大老年文旅 增进银发福祉》，《光明日报》，2024 年 3 月 26 日 02 版。
^②郭紫纯：《弹好人才“四重奏” 守护最美夕阳红》，《中国民政》，2024 年第 9 期，第 18～21 页。
^③谢倩芸：《中国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及变动趋势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6 期，第 95～106 页。
^④民政部、全国老龄办：《2023 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民政部网站，2024 年 10 月 11 日，<https://www.mca.gov.cn/n152/n165/c1662004999980001752/content.html>。
^⑤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整理而得。

的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智能养老机器人、智能护理床、智能家居等科技产品将大量涌现，从而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养老产业将与医疗、健康、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形成跨界合作、深度融合的发展态势，将催生出大量的商业模式创新。

4. 银发经济的对外开放水平日益深化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取消，服务业开放的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大。随着我国银发经济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外资的市场准入限制逐渐减少，外资企业来华发展的环境明显改善，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全球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越来越多的国家需要面对老龄化挑战，发展银发经济成为各国共同需要，围绕银发经济的贸易和投资将大幅增加，银发经济国际合作将进一步深化。

(三) 银发经济的潜在规模分析

1. 测算方法

利用组合预测方法对我国银发经济的潜在规模进行测算。组合预测模型对选定的模型进行加权处理，可以提高样本信息的利用效率，能够有效降低模型选择风险问题，所得预测结果一般也要优于单一模型。

设 $\{y_t\}$, $t = 1, 2, \dots, n$ 为观测值序列，对未来 L 个时刻值 y_{n+L} , $L = 1, 2, \dots, k$ ，利用 I 种模型获得预测值 $\hat{y}_{n+L}(i)$, $i = 1, 2, \dots, l$ 。然后根据各单一预测模型的预测效果确定相应的权重 w_i ，由此构成组合预测模型：

$$\hat{y}_{n+L} = \sum_{i=1}^I w_i \hat{y}_{n+L}(i)$$

其中， $\hat{y}_{n+L}$ 为未来 L 期的预测值， $\hat{y}_{n+L}(i)$ 为用第 i 种模型预测的未来 L 期的预测值， w_i 为第 i 种模型的权重且 $\sum_{i=1}^I w_i = 1$ 。

采用最优加权法对权重进行估计，根据最小二乘准则构造目标函数 Q ，在权重之和等于 1 的约束条件下使所构造的目标函数最小，从而求得组合模型的加权系数。设 t 时刻实际观测值为 y_t ，则第 i 种方法在 t 时刻的预测误差为 $e_{it} = y_t - \hat{y}_t(i)$ ，其中 $\hat{y}_t(i)$ 为第 i 种模型在第 t 期的预测值。组合预测误差 e_t 为

$$e_t = y_t - \hat{y}_t = y_t - \sum_{i=1}^I w_i \hat{y}_t(i) = \sum_{i=1}^I w_i (y_t - \hat{y}_t(i)) = \sum_{i=1}^I w_i e_{it} = [e_{1t}, e_{2t}, \dots, e_{It}] [w_1, w_2, \dots, w_I]^T$$

令 $W = [w_1, w_2, \dots, w_I]^T$, $E_i = [e_{i1}, e_{i2}, \dots, e_{in}]^T$ ，则组合预测模型的误差矩阵为 $e = [E_1, E_2, \dots, E_I]$ ，其平方和为 $E = e^T e$, $R = [1, 1, \dots, 1]^T$ 。要使目标函数 $Q = \sum_{t=1}^n (y_t - \hat{y}_t)^2$ 最小，则有

$$\min Q = W^T E W \quad \text{s. t.} \quad R^T W = 1$$

由拉格朗日乘数法得 $W = (R^T E^{-1} R)^{-1} E^{-1} R$ ，即为确定的权重。

2. 模型选择

选取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自变量，选取银发经济规模作为因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

$$y_t = \alpha + \beta_1 x_{1t} + \beta_2 x_{2t} + u_t$$

其中， y_t 为银发经济规模， x_{1t} 为人均 GDP， x_{2t} 为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针对自变量未来值的测

算，在增长核算模型的框架下对人均 GDP 和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的未来值进行预测。在基准情形下，2025 年、2030 年和 2035 年我国人均 GDP 分别为 10.22 万元、13.94 万元和 18.53 万元，预计我国将在 2026 年前后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025 年、2030 年和 2035 年我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 16.36%、19.96% 和 24.40%，预计我国将在 2030 年后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到 2035 年 65 岁及以上人口规模将达 3.34 亿人，较 2023 年增加 1.17 亿人。

在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我国银发经济潜在规模做预测时假定自变量前的系数保持不变，但是随着预测期的增加，自变量前的系数会发生改变，而且在做预测时还需掌握自变量的变化规律。如果对自变量的未来值推断错误，则这种错误会进一步传导到因变量的预测值上，从而导致预测结果出现偏误。同时考虑到银发经济规模具有生命周期特征，即会随着老年人口的规模先后经历缓慢增长、快速增长、规模达到顶峰以及逐步衰减的发展规律。因此，利用 Logistic 模型来刻画我国银发经济规模的发展历程并在此基础上做出预测。Logistic 模型的表达式为：

$$y_t = \frac{a}{1 + b_1 e^{-b_2 t}}$$

3. 测算结果

由于多元回归模型和 Logistic 模型均包含我国银发经济规模的不同信息，如果仅利用其中一个模型进行预测，则会丢失相应的信息，从而降低模型预测的精度。所以，进一步利用组合预测模型预测。基于组合预测模型，2025 年、2030 年和 2035 年我国银发经济规模分别为 9.91 万亿元、18.92 万亿元和 33.19 万亿元（见图 2）。银发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持续上升，2025 年、2030 年和 2035 年银发经济占 GDP 的比重分别为 6.9%、9.8% 和 13.1%，银发经济将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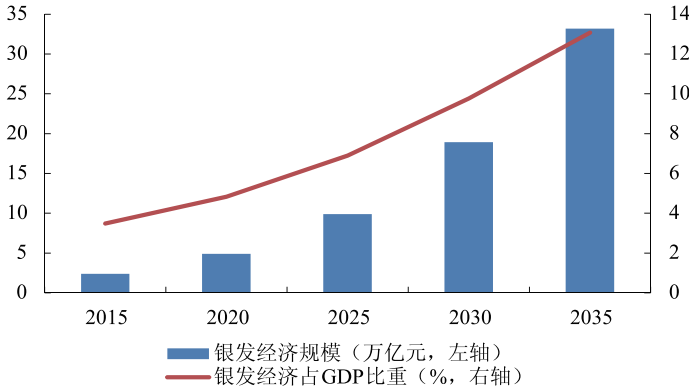


图 2 2015—2035 年我国银发经济潜在规模测算

三、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任务目标

立足我国国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努力推动银发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主要任务

1. 加大支持力度，优化政策制度环境

在我国银发经济发展过程中，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2024 年可以说是我国发展银发经济的元年。在发展初期，政府首先要为银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加强指导和规划引领，搭建和完善银发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及技术平台，强化监督管理和标准建设。坚持创新驱动，强调以科技创新促进银发产业升级，推动物联网、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与银发产业、银发经济融合发展。不断拓展银发经济发展的资源投入和合理配置，处理好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关系，在保持市场活力的同时，提升涉老服务和产品提供的数量和质量。

2. 重视民生属性，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重视养老的民生属性，聚焦广大人民群众关切的养老难题。积极引导物流企业、餐饮企业、外卖平台、物业服务、公益慈善组织等机构和市场主体，发展老年助餐、配送等服务。打破制度和体制障碍，支持推动养老机构面向社会开展老年助餐服务。坚持人民至上，鼓励和支持养老机构、家政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开展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努力开拓养老服务新模式、新业态，支持社区助浴点、流动助浴车、入户助浴等多种业态发展。培育发展各类专业助老陪护机构，支持与养老机构共享资源，拓展陪护应用场景。以社区为重点，发展社区便民服务。

3. 发展老年照护服务，提升老年健康水平

在我国开展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基础上，总结经验，适时在全国实施。坚持医养结合理念，推动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机构毗邻建设、资源共享。引入社会资本，加大养老机构建设与改造力度，提升对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照护服务能力。打通机构和制度障碍，建立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之间的服务转介衔接机制。尽快补齐老年照护短板，加快建设康复医院、护理院（中心、站）、安宁疗护机构，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康复护理、健康管理等能力建设，鼓励拓展医养结合服务，推动建设老年友善医疗机构。高度重视农村养老问题，充分利用农村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等，采用委托经营等方式优化养老服务，积极探索“公司（社会组织）+农户+合作社”经营模式，积极发展乡村旅居式养老服务等农村特色养老产业。

4. 推动产业集聚，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等有产业基础的区域，规划布局约 10 个集聚发展、融合发展、高水平发展的银发经济产业园。依托自贸区、自贸港、各类开发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高水平改革开放平台，开展先行先试，推进银发经济领域跨区域、国际性合作。

5. 满足多样化需求，推动“养老+”产业融合发展

开发应用适老化产品和服务，包括开发功能性老年服饰、鞋帽等产品，发展智能轮椅、移位机、洗浴机、康复护理床等生活照护产品，推动助听器、矫形器、拐杖、假肢等传统功能代偿类康复辅助器具升级，开展居家适老化改造等。推动“养老+金融”战略，鼓励金融机构以多种形式积极探索和发展养老金融业务，开展养老财务规划、资金管理等服务。实施“养老+旅游”战略，探索老年旅游发展新模式新业态，推出一批老年旅游发展典型案例，组建全国性的旅居养老产业合作平台，培育旅居养老目的地，开展旅居养老推介活动。

6. 推动创新发展，拓展康养新业态模式

实施智慧养老，积极探索新技术新产品的养老应用场景，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智能设备（如移动终端、可穿戴设备、服务机器人等）在居家、社区和养老机构等扩大应用。结合春节、重阳节等中华传统节日以及“敬老月”等特色活动，引导电商平台、大型商超等商业主体举办主题购物节，培育一批特色养老活动品牌，扩大养老产品消费。统筹政务和社会数据资源，促进银发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建立银发经济领域数据有序开放和合理利用机制，加强国家层面养老相关数据共享。

7.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有效支撑银发经济发展

加大银发经济人才培养力度，支持和引导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和各类社会培训机构，结合自身优势和社会需求增设银发经济相关专业，适当扩大老年学、健康服务、药学、养老服务与管理、护理等专业招生规模。鼓励多种模式开展养老护理等职业技能等级培训及评价，支持校企合作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二）发展目标

到2030年，银发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包括：第一，银发经济规模达到19万亿元左右。第二，妥善解决一批养老“急难愁盼”难题。老年助餐、居家助老、社区便民、老年照护、农村养老等一批养老难题得到妥善解决。第三，建成一批银发经济园区。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有产业基础的区域，规划布局约10个高水平银发经济产业园区。第四，培育一批银发经济龙头企业。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引领、示范、带动作用，鼓励和引导国有企业结合主责主业，积极发展银发产业，拓展银发经济相关业务，重点培育10家银发经济领域龙头企业。第五，打造一批知名养老服务品牌。依托中国品牌日、全国“质量月”、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等知名活动，打造一批银发经济自主品牌。第六，研发制造推广一批银发经济优质产品。加大技术研发，保证产品生产质量，利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平台展示推介一批银发经济前沿技术和产品服务。第七，实施一批科技创新项目。围绕康复辅助器具、智慧健康养老等重点领域，谋划一批前瞻性、战略性科技攻关项目。第八，银发经济产业体系初步建立。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供应链深度融合的银发产业生态体系初步形成。第九，提升银发经济行业组织效能。成立银发经济领域社会组织，支持企业、科研院所、行业协会等组建一批产业合作平台或联合体。第十，打造一批银发经济标准。在养老服务、老年用品、文旅服务、适老化改造、智能技术应用等领域打造一批行业标准，规范形成银发经济产品和服务消费指南。

四、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全面深化改革，着眼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努力推动银发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完善配套政策体系

明确公共服务和产业发展的边界，形成以政府为引导、以企业为主体、以社会参与为补充的政策支持体系。《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是首部专门针对银发经济的政策文件。未来，要进一步细化银发经济相关政策，逐步发布细分行业的发展政策，对银发产业的业态分类、重点领域等做出战略性指导，完善行业的政策法规体系。政府应牵头贯彻制定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强化数据标准规范，建立统一的养老服务标准体系，进一步形成全国一体化的数字养老服务体系。完善国民统计和信息披露，考虑到银发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及其作为重要的国计民生产业，需要进一步细分、完善产业分类和统计指标体系。建立健全评估机制，增强对养老机构的监管，加强信息披露、定级评价、风险分类等激励性管理方法，促进机构和服务管理水平的提高。及时发布披露银发经济发展信息和细分领域发展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促进措施，以促进社会各个领域广泛关注和参与银发产业发展。加强产业政策协调，鉴于养老产业是综合性服务体系，涉及金融服务、护理服务、医疗服务等多个产业，彼此之间重合较多，需强化信息共享和综合协调，以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加强区域政策协调，在国家、省、市不同层级，以及不同地区做好要素投入的优化配置，形成合力，避免重复建设，协同推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各地试点的基础上，以建立独立险种、制度覆盖全民、政策规范统一、契合我国国情为目标，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切实减轻我国大量失能人员护理服务费用负担。

（二）精准施策，加大政府支持力度

银发经济兼具经济和民生特性，离不开政府的科学引导和大力支持。要提高政策的精确导向和实际操作效果，特别是在财税政策上实现紧密配合，发挥政府资金的杠杆和引导作用，吸引社会资本积极参与银发经济建设。借助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为银发经济领域内的优质项目提供资金支持。通过政府采购、财政投入、土地用房供应等政策，以及税费优惠和投融资支持等方式，为养老服务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切实支持。对关键环节实施财政补贴和购买服务税收减免（如“二免三减半”政策）等扶持措施。对利润微薄的银发经济服务关键环节进行财政补贴，例如社区养老设施建设、养老从业人员培训和基础设施改造维修等。利用中央财政支持的科技项目（包括专项项目和基金等形式），为银发经济领域的科研活动提供支持，提升自主研发的核心竞争力。优化并拓展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重点支持新建养老服务设施融入信息化管理系统及推广智能辅助设备的应用，盘活富余公共服务设施，改造利用农村学校乡镇卫生院等。对参与银发经济的行业协会、公益组织、基金会等社会组织提供税收减免，推动养老志愿服务机制不断完善，激发社会参与银发产业的热情。

（三）深化供给侧改革，加大有效供给

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积极探索银发经济供给新模式，鼓励产品和服务创新，努力提供多样化、精细化、标准化的服务和产品。围绕居家养老和社区建设，推动养老服务业充分发展，形成居家、社区、机构和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拓宽服务范围，增加代办代购、医疗陪护、老年大学、信息平台等服务，融入社区志愿者等功能。以公办养老机构作为保障底线，鼓励社会力量和组织兴办老年护理、临终关怀等性质的医疗服务机构，并鼓励民营服务机构参与。推进老年旅游、老年康养、老年娱乐等新型银发产业发展，完善包括养老设施、专业用品、健康教育、预防保健、疾病诊疗、康复护理、长期照护等高品质服务体系，形成养老服务品牌和完善的老龄产业链，丰富银发经济供给。提高公共资源使用效率。对于闲置的幼儿园、学校等公共设施进行适老化改造，或者改为老年大学等老年教育服务空间。条件允许情况下，在老年人集聚的养老服务设施区域设置小型医疗站点，配备基本医疗设备和药品。推动建立保险、福利和救助相结合的长期照护保障产品，积极发展第三支柱的养老保险产品，通过税收优惠和增加养老金融产品等方式，吸引更多资金进入第三支柱。增加欠发达和农村地区养老服务供给，完善日常帮扶措施。加强国有经济在普惠养老方面的布局和支持，鼓励地方国有企业积极参与养老基础设施建设。

（四）拓展升级产业链，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释放银发经济产业政策潜能，激发市场活力，打造充分竞争、充满活力的银发产业新生态。因地制宜，规划建设高水平银发经济示范区，推动银发经济实现集聚发展、规模发展。培育和支持银发经济产业链中具有带动作用的龙头企业，努力打造上下游互为补充，产业链协同发展的产业集群，支持产业融合、并购重组、协同发展。鼓励银发企业集团化运营，支持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企业融合经营，打造具有全球知名度的本土银发产业品牌。支持金融赋能银发产业，综合运用金融工具助力银发经济发展，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为银发经济发展提供融资、风险管控等服务，支持地方政府设立银发产业基金，提供资金支持。强化技术创新，针对性降低老年用品关键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的门槛，鼓励国家级、省级或者市级技术中心和实验室等各级研发机构，联合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共同设立实验室，研制开发新型老年人用品，增强养老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养老服务领域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加快构建覆盖银发经济全产业链的智慧养老产业体系。发展线上银发经济业态，包括远程医疗照护、在线教育、在线诊疗、亲情关怀和紧急救助等便捷式服务。基于大数据、互联网、

物联网和区块链等先进技术，搭建一体化智能健康数字养老服务平台，提供养老信息采集和资源协调配置服务。实施“养老+”战略，与中医药、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体育产业等跨界融合发展。充分利用各地独特的气候、自然及生态资源，落地银发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新路径。充分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机遇，重点推动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的开发和应用，大力开展老年友好型智能家居、智能设备的制造生产。

（五）创新人才培养使用机制，激发人力资源红利

随着人口老龄化，银发经济对养老服务、医疗保健、休闲医疗等相关行业的劳动力需求也快速增长，不仅需要高端的产业人才，也需要护理等基础劳动力。因此，需要建立多层次、广覆盖的养老人才体系。从教育端开始，提高人力供给的专业性，做好人力供给需求端的匹配。科学测算养老服务人员需求，将培养目标和计划纳入各级各类教育体系，并科学设定老年学、药学、养老服务与管理、健康服务与护理等专业的招生人数，以确保其合理性。鼓励并指导高校和职业院校，基于自身的独特优势和社会实际需求，增设与银发经济密切相关的学科专业。在课程设置方面，增加老年医学科、康复、老年心理咨询等学科设置，加大相关专业高校与养老机构的合作，推动老年护理等专业人才规模化成长。全面鼓励从事康复理疗、保健、营养、心理咨询、护理等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进入银发经济相关行业。积极推动养老护理等领域的职业技能培训与评定工作，并倡导校企合作，共同打造产教融合的实践培训基地。

探索适合老年人灵活就业的模式，支持鼓励老龄人力资源开发。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健康医疗水平的大幅提高，我国居民的平均预期寿命持续增加。2022 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7.93 岁^①，老龄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重要性日益凸显。特别是当前我国处于 60~65 岁的低龄老年人占比较大，且其中大部分人员健康状况良好，其经验、能力和精力完全可以适应部分工作岗位。支持老年人再就业不仅有利于增加老年人的自身经济收入，缓解家庭的养老压力，减轻社会负担和国家财政压力，还能帮助老年人实现老有所为，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退休后的失落感，保持身心健康。要逐步完善老年人就业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增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完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规范养老从业资格认证体系，加强老年人力资源管理。整合改造闲置的教育机构和现有设施，大力增建老年大学，为老年人提供再学习、再教育的场所和设施。积极鼓励老年人参与文明建设、公益活动、志愿服务以及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多方面的事业。

参考文献：

1. 范宪伟：《银发经济发展的趋势特征、问题及对策建议》，《中国国情国力》，2022 年第 8 期。
2. 王皓田：《银发经济：新内涵、新要求、新举措》，《产权导刊》，2024 年第 4 期。
3. 杨燕绥、胡乃军、陈诚诚：《人口老龄化与银色经济发展》，《中国国情国力》，2017 年第 4 期。
4. 林宝：《发展银发经济满足多样化养老需求》，《人民论坛》，2024 年第 13 期。
5. 黄石松、胡清：《发展银发经济的战略设计、焦点难点及路径优化》，《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 年第 2 期。

责任编辑：李蕊

^①数据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以“走出去”引领 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战略

陈长缨

摘要：新时代我国开放优势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开放优势要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必须要制定正确的开放战略。当前，从需求、供给、制度和开放等角度考察，我国已具备了参与更高层次国际分工的有利条件。从世界主要大国特别是追赶型国家对外开放的成功经验看，参与国际分工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贸易为主、投资为主和产业链为主。因此，我国在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战略也需要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及时调整，由过去贸易引领开放的战略，转向以境外投资引领开放的新战略。这既是顺应国内要素禀赋升级的客观需要，也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外部变化的必然要求。新时代境外投资将形成新格局，在重点推动面向发展中国家境外投资的同时，也要促进与发达国家境外投资转型。为此，要针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特点，制定不同的境外投资政策安排。

关键词：新时代 对外开放战略 开放优势 走出去

作者简介：陈长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一、开放优势是对外开放战略的基础

（一）比较优势和开放优势的概念

当一个国家生产某种产品比另一个国家生产该产品的成本更低时，则该国在这种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是国际经济学非常重要的概念，也是国际分工合作的基础。国际分工合作理论认为，一国应该专注于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生产或生产环节；而当各国都专注于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生产，并相互交换各自比较优势的产品，则会形成高效的国际分工关系，各国生产效率和消费者福利都能达到最大化。

我国的开放型经济优势，是与国际经济学中比较优势有关但具自身特色的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开放型经济优势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由我国资源要素等开放基本条件所决定的，在某些商品、服务、产业或在其他开放经济方面表现的国际竞争力。从微观表现看，开放优势除表现为商品、服务、产业等以价格为基础的竞争力，还表现在质量、性能等方面。从宏观表现看，开放优势表现在全球生产布局、全球资源配置、国际规则影响力等方面。从开放优势形成原因看，它是由一国开放的基本条件所决定的，如要素禀赋等，也与市场规模、应用场景、制度体制等因素有关。从开放优势变化看，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开放优势是动态渐次变化的，随着新优势的出现，一些原有的优势不复存在甚至

变为劣势。

在现实的开放经济中，比较优势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交换的基础。从经验看，一国若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对外开放，通常能取得较好效果，实现产业发展、经济增长、就业增加、福利提升等；若大多数国家都能发挥比较优势，全球分工高效，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也能顺利推进。反之，如果一国没有发挥比较优势甚至是逆比较优势，则不但不能获得开放利益，而且会丧失发展机遇。

（二）正确的开放战略才能充分发挥开放优势

将潜在的比较优势转换为现实的比较优势，关键在于正确的对外开放战略及其政策组合。对外开放战略是一国以自身条件、要素禀赋等开放优势为基础，综合考虑当时的国内外环境，所制定的关于该国对外开放的总体安排。对外开放战略是对外开放的顶层设计，需要回答是否开放、怎样开放、开放什么、对谁开放、开放目标等一系列关于开放的重大问题。开放战略确定后，需要一系列的开放政策和措施落实战略，构成开放的政策体系。由于一国的自身优势和内外环境变化，开放战略需要动态调整。例如，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出口导向”开放战略，主要是抓住经济全球化和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重大国际机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促进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进口不具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并通过开放提高国内积累率实现工业化。在“出口导向”战略确定后，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服务战略的政策组合。例如，制定加工贸易政策，鼓励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积极引入外资和先进技术设备，承接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工序转移；实行汇率双轨制，低估人民币汇率；设立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和经济开发区等开放平台；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融入全球市场等。

还要看到，一国的开放战略是动态调整的，既不应超前也不应滞后于现阶段开放优势的变化。超前是指选择了未来才可能具备的开放优势的开放战略，将大多数资源配置到未来优势领域，而不注重发挥现阶段的开放优势。如 20 世纪中期拉美国家实行“进口替代”战略时，放弃了劳动密集比较优势而选择了资本密集比较优势，因而没有取得开放收益。滞后是指比较优势变化后，没有及时放弃利用过去的比较优势的开放战略，仍支持已失去的比较优势的外向型产业。这不但不利于发挥新的优势，而且也保持不住过去的优势，最终会丧失比较利益和开放优势。

二、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新优势发生了重要变化

（一）新时代我国开放优势条件加快升级

开放资源条件是开放优势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放资源条件不断向中高端方向升级，特别是最近十余年进入经济发展新时代新阶段后，我国开放资源条件变化更为明显，传统优势条件和新优势条件相互叠加，具备更高水平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这要求我国及时调整开放战略，充分发挥新的开放潜力优势，形成对外开放新优势。

狭义的开放优势主要指由生产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形成的比较优势。新时代我国生产要素禀赋变化主要体现在，技术、人才等中高端要素相对于中低端要素禀赋丰度上升，导致我国在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环节和服务的比较优势增加。从 2010 年到 2023 年间，我国主要生产要素变化情况表明（表 1），增长最快的是技术（以专利授权量衡量），其次是资本（以资本形成衡量），再次是人才（以大学毕业生数量衡量）；相比之下，土地供应增长较慢（以城市建设用地面积衡量），而劳动力规模还出现了下降。显然，过去十余年我国中高端生产要素增长明显增加，不但为国内转变经济增长方

式、提高科技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可能，而且也提升了我国的比较优势。

表 1 2010 年和 2023 年我国主要生产要素变化情况（现价）

		资本	人才	技术	劳动力	土地
	GDP (万亿元)	资本形成 (万亿元)	大学毕业生 (万人)	发明专利 授权 (万项)	劳动力 (亿人)	城市建设用地 面积 (平方公里)
2010 年	41.2	19.2	575	13.5	7.84	39758
2023 年	126.1	53.1	1047	92.1	7.69	56075 (2018 年数据)
2023 年是 2010 年的倍数	3.06	2.77	1.82	6.82	0.98	1.4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我国广义的开放优势变化更为显著，可以分为需求侧、供给侧、开放侧、制度侧。

从需求侧看，一是我国是全球最大和结构升级最快的市场之一，对全球贸易进口以及市场寻求型直接投资都有很大的吸引力。超大规模市场也是我国参与和影响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筹码。二是新技术等应用场景丰富。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差异巨大，消费结构、习惯和模式有很大不同，传统模式对新模式阻碍较小。因此新技术、新商业模式等在我国有广阔丰富的应用场景，在新一轮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中成为关键优势，吸引全球科技资源、开展全球科技创新合作、发展高新战略产业的能力显著增强。近年来，高铁、新能源汽车、智能驾驶、机器人、移动支付等新技术新模式，受益于我国广泛的应用场景而得以迅速发展。

从供给侧看，一是我国具备完整的工业体系，有过去 40 多年大规模制造积累的生产技术、生产管理等经验。在生产要素和比较优势升级后，这些经验不但有助于出口结构升级，而且也有利于境外投资和技术出口。二是我国的教育和科技能力持续提升，2023 年我国全社会研发强度达到 2.65%，已接近发达经济体 3% 的水平。近年来，我国发表的科技热点论文数也超越美国而位居世界第一。考虑到我国人力资源费用较低，我国实际的创新优势更大，有利于国内研发机构“走出去”参与全球研发创新。三是我国地区发展差异大，区域之间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有条件形成内部分工，成为经济内循环和发展韧性的基础。例如，东部沿海地区由于综合成本升高而导致劳动密集型优势逐渐失去后，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转移到成本较低的中西部地区。

从制度侧看，一是我国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相互结合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成功发展的基本制度保障。在发展战略制定和实施方面，我国有一套完整的机制保障，实施效果显著。二是扩大开放是我国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加大开放力度、丰富完善开放措施，并探索符合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开放制度安排。例如，在 21 世纪初，我国为吸引外资加快国内工业化进程，采取了“高关税 + 鼓励外资”“瀑布式关税结构”等政策组合。当前，我国已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在坚持体制特色的基础上，分阶段分区域对标发达国家更高水平的经贸规则和制度。近年来，在逆全球化不断升温的背景下，我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使我国具备发挥新开放优势的制度前提。

从开放侧看，我国持续扩大开放为提高国际分工地位打下良好的基础。一是我国全球经济影响力日益增大。截至 2023 年，我国连续 7 年成为全球货物贸易最大的国家，连续 12 年保持境外直接投资全球前 3 位；我国还连续多年是全球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部分年度成为全球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更重要的是，我国对外贸易和双向投资规模扩大及结构升级，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和资本流动中的地位和影响力逐渐增强，对国际经贸规则的话语权也不断增加。这不但大大增强了其他

国家与我国深化经贸合作的吸引力，而且其他国家若与我国经贸“脱钩断链”也面临很高的成本。二是共建“一带一路”取得重大进展。“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余年来，我国与共建国家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方面积极推进，以东盟、中亚、中东欧等方向为重点，“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建设成效显著，部分共建国家的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水平明显提升，破除了制约这些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关键因素，为我国未来深化与共建国家经贸合作、企业加快“走出去”、拓展全球生产网络奠定了重要基础。三是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上升。随着我国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升级，我国技术、管理等中高端要素不断积累，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逐渐提升，越来越多的产品由本国生产转向境外生产，我国的跨国公司也开始涌现。2015年以后，我国境外投资规模整体上超过利用外资规模（见图1），逐步进入了全球生产布局的新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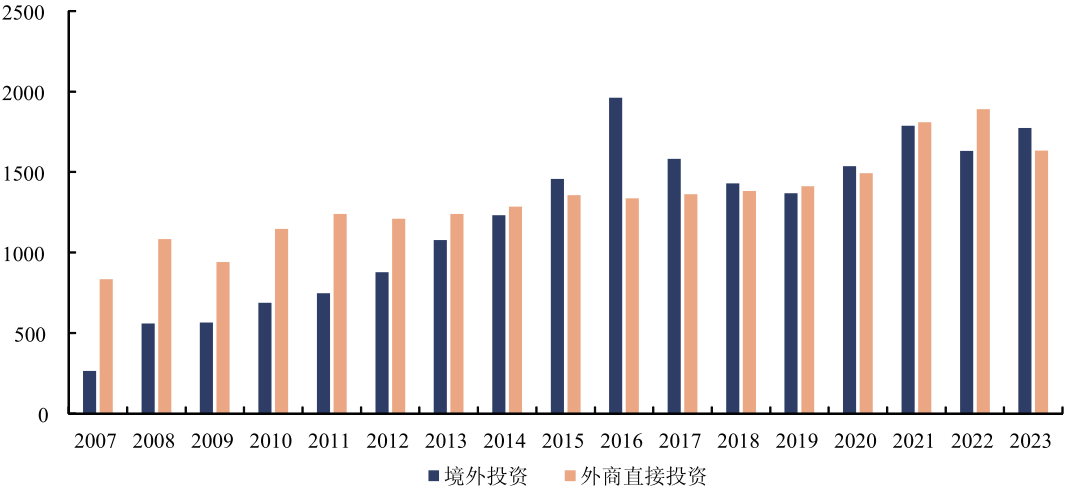


图1 2007—2023年我国双向直接投资比较（亿美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二）开放优势的变化要求我国开放战略调整升级

1. 大国参与国际分工一般经历三个阶段

从英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主要大国包括追赶型国家成功的开放经验看，大多渐次经历了以贸易为主、以投资为主、以产业价值链为主参与全球分工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是开放优势不断升级、全球分工位势不断跃升的过程。

在以贸易为主的阶段，一国利用本国要素生产制造并出口，表现为货物贸易迅速增长及全球占比较高。其中，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早期阶段，缺乏资本、技术等高端要素，比较优势主要体现为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在这个时期，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利用外资，承接产业转移并发展“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本国的劳动力、资源等在本国境内通过出口方式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但这些发展中国家位于全球分工体系的低端，是国际规则、国际分工、国际价格的接受者。

在以对外投资为主的阶段，一国开始在境外投资生产制造、布局全球生产网络，表现为企业境外投资加快，本国的跨国公司大量涌现。在这个阶段，一国将本国的资本、技术等优势要素与境外东道国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相结合，在境外生产制造并向全球出口，既降低了跨国公司的生产成本，跨国公司也获得了更高的增值和利润。境外投资将一国制造过程扩展到境外，不但要求企业具有相对于东道国的资金、技术等中高端要素，而且也要求企业有较强的国际化经营能力，开始在全球更广的范围内配置资源，是比贸易方式更高端的参与国际分工的形式。

在以产业链为主的阶段，一国跨国公司大量出现后，一些位于头部的跨国公司既很少在本国生产及开展直接贸易，也很少在海外投资组织生产，而是通过对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的掌控力，以制造外包或境外采购等方式，将制造链条分解到其他国家，组织全球化生产，其产品在全球范围内销售。美国苹果公司就是这类企业的典型代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都不能准确刻画这类国际分工的模式。这些跨国公司优势集中在高端服务业，既包括与创新有关的研发服务业，也包括品牌管理、销售渠道建设、供应链管理以及融资、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构建了本国企业主导的、全球布局完整的生态系统。这些跨国公司对全球生产组织、物流运输、融资安排、价格确定、利润分配等重要环节，具有重要影响力甚至是决定权，位于全球产业链最高端，也是国际贸易链条中增值和利润最高的部分。这些跨国公司的形成，背后需要国家综合实力予以支撑，包括科技实力、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全球经贸规则影响力等。一国在这个阶段，对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更高，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最高级。目前只有美国等少数国家具备依靠产业链主导国际分工的能力。

以上国际分工的三个阶段，与国际环境变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过程密切相关。在上一轮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方面在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很多原计划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始向市场导向的发展模式转型，加快经济开放，全球贸易和投资壁垒下降，以 WTO 为代表的贸易多边主义盛行；另一方面，以信息和通讯技术、航运技术为代表的科技进步，降低了通讯和航运成本，使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国际分工越来越精细化，各国更好发挥比较优势，国际分工效率提升，出现了更高层次的国际分工模式。

2. “走出去”应成为新时代我国开放新战略的重要引领

我国新时代具备新开放优势，需要制定新的对外开放战略，以推动我国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参与更高层次的国际分工。按照对外开放理论和大国对外开放经验，现阶段我国整体上应该由过去以贸易为主的开放阶段，进入到以境外投资为主的新开放阶段，也就是境外投资应成为新时代我国开放新战略的重要引领。

新时代境外投资引领的对外开放有一些基本特征。一是从对外贸易和投资关系看，在一段时间内，境外投资增速不但高于利用外资增速，而且也会高于对外贸易增速，境外投资和全球生产布局成为我国对外开放最突出的特征。二是从合作对象看，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对外合作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将形成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并重的开放合作格局。但两类合作模式不同，前者是基于相似要素禀赋的水平分工关系，后者是基于差异要素禀赋的垂直分工关系。三是从开放区域看，东部沿海地区出口结构升级，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的产品和服务出口比重提高，而劳动资源密集型出口产业加快向外转移，企业境外投资加速，全球化经营的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其中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一线国际化城市，集聚全球要素、服务全球市场的能力持续提升，打造国际经济枢纽，开始具备以产业链为主参与国际分工的条件。相比之下，广大中西部地区承接我国东部地区的劳动资源密集型出口产业，贸易发展仍是这些地区对外开放的主要特征。四是从全球分工看，我国开始在境外主动利用其他国家资源，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提升，构建以我国为中心的全球生产销售网络，对全球经贸规则也有越来越强的影响力，国际分工位势加快迈向中高端。

三、内外部环境变化要求我国加快“走出去”进程

当前，以加快“走出去”引领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既是顺应国内要素禀赋升级的客观需要，也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外部变化的必然要求。

（一）国际环境变化

第一，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趋势逐渐显现，发展中国家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重点。历史上全球出现过几轮大规模产业转移，美国、德国、日本、韩国、中国等相继成为前几轮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并带动了这些经济体的开放发展。前几轮产业转移也是境外投资加速的过程，那些具备境外投资优势且抓住产业转移机遇的国家，在全球产业布局方面占据先机，开放能级，对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国际分工地位都上了一个新台阶。近年来，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趋势开始显现，这次产业转移由政治、经济、科技等多重因素造成，转移的原因、过程和特征比前几轮产业转移更为复杂。近年来，国际格局对比持续变化，南方国家加速崛起，以越南、印度为代表的东南亚、南亚板块成为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板块。这些国家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叠加市场规模优势，加之鼓励外资流入的政策，已成为新一轮承接全球产业转移的主要地区，我国向这些国家境外投资和产业转移的速度也逐渐加快。美国等西方国家出于争夺未来产业制高点、应对制造业空心化、维护产业安全等考虑，近年来也加大产业政策力度促进制造业回流，例如美国通过芯片法案对在美国投资芯片的制造业企业给予高额补贴。显然，新一轮国际制造业转移呈现出主要大国竞相吸引外资的新特征。我国企业应顺应全球产业转移变化趋势，加快境外投资进程。

第二，大国博弈加剧、我国与发达国家竞争加剧，造成我国出口增长的空间有限。长期以来，贸易是我国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最重要方式。但近年来，我国开放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贸易规模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为中低速增长。一方面，自2018年开始，美国对我国贸易战、科技战、规则战等不断升级，并与西方国家构建遏华联盟，对我国采取“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等政策组合，扰乱我国的全球供应链，增加在华生产制造风险，打压经济信心和预期，对我国出口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供应链较长、对美西方零部件依赖较高的电子信息、通讯等产品所受影响更大，导致我国出口升级空间被压缩。近年来，部分在华跨国公司采取“中国+1”战略，原有产能开始从我国外迁。另一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和产业竞争性增强、互补性减弱，我国出口升级对发达国家传统优势产业造成冲击，导致一些发达国家也加强对我国贸易限制。在出口受到抑制的情况下，我国需要转变参与国际分工合作方式，而境外投资替代出口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方式。

第三，全球经济日益分化为两套分工体系，我国推动的国际分工体系正在稳步推进。在经济逆全球化和大国博弈等大背景下，很多国家和企业将安全优先取代效率优先目标，导致过去高效运作的全球一体化国际分工体系，日益演变为低效运作的两套国际分工体系，即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分工体系和以我国推动的分工体系。这两套分工体系有可能长期存在并相互竞争。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分工体系是基于“共同价值观”，主要由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组成，以反映这些国家经济利益的国际经贸规则为基础形成的。该分工体系主导者具有技术、网络、供应链等中高端要素优势，在全球分工地位较高，但“小圈子”排他性、特别是“去中国化”特征明显，正在构建以友岸、近岸、回岸制造为特征的分工体系。另一方面，由我国积极推动的国际分工体系正在形成。这是由广大发展中国家组成，以符合发展中国家发展阶段要求和承受能力的经贸规则为基础，能充分发挥各国优势，符合全球化方向且开放包容的国际分工体系。在该分工体系中，我国具有资金、技术和规模等优势，在分工合作中具有关键作用。境外投资是我国推动国际分工体系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不但能够形成由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产业链紧密分工的跨国生产网络，而且还能更好带动发展中国家本地经济发展。

第四，新一轮科技革命使生产小型化成为可能，加快推动境外投资。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演进，一些新技术开始应用，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等不断涌现，出现了生产的本地化碎

片化趋势。例如，智能化自动化设备和技术使生产制造小型化快速化成为可能，可以根据消费者需求灵活生产；随着越来越多的贸易平台出现，小规模生产者具有直接出口渠道。这些变化将可能引发全球生产制造和产业链供应链布局的调整，一些原来在全球大规模分工体系下被边缘化的国家，有条件承接以本土化生产和销售为目标的产业转移，也为我国境外投资创造出新的机遇。

（二）国内形势变化

第一，国内要素禀赋向上升级变化，使我国具备加快“走出去”的基本条件。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境外投资的基础来源于投资国的所有权等优势，即投资国具有东道国短缺的技术、管理、资金等。随着我国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升级和打造全球制造基地积累的经验，我国在技术、管理、供应链管理、营销渠道、品牌建设等方面，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优势越来越明显，我国企业也具备在全球直接投资市场上，与欧美跨国公司相互竞争并取得竞争优势的潜力。

第二，国内过去积累的开放优势，通过“走出去”才能得到巩固和提升。在国内劳动力等综合成本上升后，我国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减少，相关产业出口逐渐下降。但若我国出口优势企业将产能转移到境外，可以将资金、技术、管理等优势和东道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跨境结合，提升对境外资源配置能力，使我国企业重新在东道国获得新的竞争优势。因此，境外投资是保持和强化我国开放优势的重要选择。

第三，我国储蓄率较高，可通过加快境外投资促进宏观经济稳定。长期以来，受消费动力不足等因素影响，我国储蓄率一直较高，通常以扩大国内投资或促进出口的方式保持短期宏观经济稳定。但扩大国内投资会增加产能，容易加剧未来宏观经济不平衡；扩大出口则容易引发更多的经贸摩擦。并且这两种弥补总需求不足缺口的方式，还会导致国内企业竞争“内卷”加剧，国内生产价格和出口价格指数近年来已连续走低。相比之下，通过境外投资方式，可将一部分国内储蓄转化为境外投资，有助于将国内产能转化为我国企业有控制权的境外产能，将直接出口转化为我国境外企业的间接出口，同时境外投资还会拉动一部分我国设备、零部件等出口。因此，境外投资也是稳定宏观经济的一种重要方式。

（三）现阶段我国“走出去”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一，发展中国家投资环境普遍较差，各类投资风险很高。包括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投资和营商环境较差，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不愿涉足的地区。这些国家普遍存在市场体系发育滞后、法律法规不健全不透明、行政体系效率低下、贪腐问题严重，以及基础设施不完善、劳动者素质偏低、产业基础薄弱、产业准入明暗限制多、资本外汇受管制等问题；还有的国家面临政治动荡、宗教民族等矛盾激化、暴恐安全事件频发等更为严重的问题。这些对我国境外投资和后续经营都造成很大阻碍。但也要看到，一些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国家，近年来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和产业园区建设初见成效，投资的硬环境已明显改善，可以作为我国境外投资的优先选择。

第二，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遏制不断深化，我国对发达国家境外投资面临新的国家安全风险。发达国家是我国境外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与发达国家水平分工的重要形式。但近年来，部分国家对我国的遏制战略延伸到投资领域，美国和一些盟友以安全等为由，对我国投资进行限制，加大安全审查力度和范围，特别是限制对其高科技、研发等的投资，导致我国对美国等国家的很多投资目标无法实现。即便是已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投资的我国企业，近年来遭遇频繁检查等现象也日益增多，干扰并打击了我国境外企业的正常经营和信心。未来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我国企业，不排除被限制经营、停业甚至被迫被并购等的可能性。

第三，随着我国的技术不断进步，境外投资面临先进技术外溢的风险。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高端装备等一些产业的技术已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对我国这些优势产业不但不限制甚至鼓励对其投资，以期获得先进技术来缩小与我国产业发展差距。我国企业也希望通过境外投资进入东道国市场，以及联合东道国企业共同开展研发和高端制造等。但这些产业对发达国家投资，由于后者技术水平相近，学习模仿能力较强，有可能利用中资企业获取掌握先进、关键、核心技术，存在技术外溢的可能性，因此是我国境外投资需要防范的重点。但也要看到，我国企业普遍对防范技术外溢高度重视，可通过主动限制关键技术转移等方式防范相关风险，加之发达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相对完善，因此境外投资的技术外溢风险整体可控。

四、新阶段塑造境外投资的新格局

（一）重点推动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境外投资

我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和产业互补性越来越强，发展中国家希望利用外资加快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带动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加之我国共建“一带一路”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应成为我国制造业境外投资的重点地区，这是未来我国与发展中国家垂直分工关系的重要体现。

从投资目的看，我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大致可分为成本降低型、市场寻求型和资源获得型三类。一是成本降低型境外投资，是指利用发展中国家丰富的劳动力以及土地、矿产、能源等资源优势，将原来在我国境内生产制造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或生产环节，转移到境外综合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生产，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升我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二是市场寻求型境外投资，是指以进入东道国和相关市场为目的的境外投资，包括为规避东道国较高的贸易壁垒、以投资替代贸易的境外投资，也包括利用东道国原产地规则形成的低税率出口优势的境外投资。近年来，后者已成为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的主要考虑因素之一，也就是向具有自贸协定等低关税待遇的国家投资。在满足东道国当地含量基础上，将产业链最后若干加工环节转移到东道国并获得东道国的原产地认证，再以较低关税税率出口到与东道国有自贸协定的其他成员方，或利用东道国最不发达国家地位出口到给予其普惠低税率甚至是零关税的第三国。实际上，我国多数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境外投资，往往兼具考虑了成本和市场两个因素。三是资源寻求型境外投资，是指我国以获取发展中国家油气、矿产等能源资源为目的的境外投资。与能源资源进口不同，这类境外投资通常可获得东道国矿产资源的勘探权、开采权，投资环节更长，并且常与境外工程承包、工程设备出口等结合在一起。这类投资除了考虑境外能源资源成本价格优势外，更多考虑了能源资源安全因素，如弥补国内供给不足、保证国内供应安全等。

从投资具体国家选择看，整体上应优先布局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特别是交通区位便利、基础设施较好、政治基本稳定、与我国关系较好、营商环境优良的国家、城市和园区。其中，对成本降低型投资，重点选择劳动力丰富并有一定素质的国家；对市场寻求型投资，重点选择人口较多、市场规模大、自贸协定多或可享受其他低出口关税的国家；对资源寻求型投资，重点选择能源资源丰富的国家。还要看到，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境外投资整体环境较差，在国别筛选时，可优先选择发达国家投资较多，以及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国家。

从投资方式看，以制造业绿地投资为主。这种方式是在东道国投资新建工厂、新设立生产基地，一般还会向东道国出口先进设备，派出技术和管理人员，在一段时期内，还要向东道国出口零部件和配套产品，从而为东道国带来资本、技术、管理能力乃至销售渠道等。我国企业在境外投资中起到主

导作用，调动发展中国家本地要素资源参与我国跨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我国不但对境外投资企业有很强影响力，而且对跨国产业链供应链也有较强控制力和配置资源能力，从而构建起以我国为中心、由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组成的全球分工网络。同时，我国具有熟悉发展中国家市场需求、劳动管理、生产组织、成本控制、时间控制等优势，将原有出口竞争优势延伸到境外投资市场。

对发展中国家投资是我国参与国际分工新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和产业竞争性减弱、互补性逐渐增强的大背景下，未来我国与发展中国家将形成垂直分工模式，即基于差异化较大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分工，也就是在我国生产一些中高端通常是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或环节，在发展中国家生产中低端通常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或环节。这种分工通常需要将投资和贸易方式相结合。例如，在服装、箱包、鞋帽、五金、体育用品等产业链较短的产业，我国企业在境外投资设厂后，将大多数生产环节转移到东道国完成，产品在东道国销售或出口到其他国家，我国与东道国形成垂直一体化分工关系；在电子、通讯、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链较长的产业，我国企业在境外投资设厂后，只转移中低端零部件生产、组装等东道国具有优势的部分环节，国内保留关键核心零部件生产，并带来较多的中间品贸易，双方形成垂直专业化分工或工序分工关系。

（二）推动与发达国家境外投资转型

从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看，虽然发达国家之间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相近，但他们之间的贸易额和直接投资额占全球比例很高。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统计，2022 年全球直接投资流入存量 44.3 万亿美元，其中发达经济体流入存量 29.1 万亿美元，占比高达 65.7%。其原因是发达国家间形成了基于相似比较优势的大量产业内、产品内的贸易和投资，它们之间的产业链创新链深度扭抱缠绕捆绑在一起。例如，在光刻机、大飞机等高度复杂产业链较长的产业中，发达国家之间精细分工合作，每个国家生产最具比较优势的若干环节。随着新形势下我国开放优势变化，我国与发达国家由原来的产业互补关系逐渐演变为竞争关系，双方经贸合作关系也应随之调整升级。在直接投资方面，双方应形成类似目前发达国家间相互大量投资的关系，这也是未来双方水平分工的重要内容。

我国对发达国家境外投资大致分为几种类型。一是先进资源寻求型，即获得东道国先进的技术、人才、专利等，以及利用这些资源在东道国开展高端制造、获取研发成果等。这类投资有助于提升我国企业的技术和创新水平，补齐我国企业产业链创新链的关键环节，提升我国跨国公司整体竞争力。二是贴近市场生产型。发达国家进口壁垒普遍较低，原则上不需要以投资替代出口。但在发达国家投资，尤其是在人口较多、市场较大的国家设厂，可以及时满足东道国消费者的本地化需求。三是共同合作型，在境外设立研发技术中心、高端制造中心等，派出人员与东道国联合开展国际化研发和高端制造，能够更好结合双方优势，取得一批全球领先的研发成果和制造品。此外，对发达国家的投资还包括在东道国设立商务代表处等类型，用于促进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商品、服务和技术贸易交流等。

发达国家资本充裕，他们之间的直接投资以并购现有企业为主。发达国家之间并购投资交叉持股，形成了各国贸易投资和产业链相互高度依赖的格局。我国对发达国家境外投资也以并购方式为主，如并购现有制造企业、研发机构等。整体看，发达国家投资和营商环境普遍较好，法律制度完备、政策透明可预期、行政效率高、执法公平，加之劳动力素质高、基础设施完善等，是他们能够大规模吸引外资的基础条件。

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国际上大力推动“去中国化”，为双方包括相互投资在内的经贸合作增添了很多人为障碍。例如，美国针对我国的投资安全审查及被否决的投资项目明显增加；对在美国的中资企业设立了追溯机制；通过长臂管辖，将对我国企业的投资审查和限制延伸到美国企业拥有股

份的第三国。此外，美国对我国还由单向投资限制转向双向投资限制，即将美国企业和个人对华投资也列入审查范围。一些欧盟国家也跟随美国步伐，谋划在关键基础设施、敏感产业和战略产业等领域加强对我国投资的安全审查。以上种种措施，严重影响了我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和正常的经贸关系。但也要看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境外投资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对我国投资限制集中在关键基础设施、高技术、信息通信和有国资背景的企业等；但另一方面在无关安全和关键核心领域的我国投资，并没有限制措施，甚至希望我国投资能带来制造业回流、扩大中低端就业乃至在当地技术外溢等。例如，2024 年美欧在对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加征关税的同时，一些国家表示欢迎我国新能源汽车在本国投资设厂，试图通过这种贸易投资组合将我国产能、技术等转移到发达国家。

五、新阶段支持我国境外投资的若干建议

（一）将国民总收入作为衡量新阶段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参考指标

国民总收入（GNI）和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国民经济统计概念。前者是按国民原则统计的一国经济增加值，我国境外企业创造的权益增加值计入 GNI，但在华外资企业的增加值不计入 GNI；后者是按国土原则统计的一国经济增加值，在华外资企业的增加值被计入 GDP，但我国境外投资企业在东道国创造的增加值不计入 GDP。显然，GNI 较能充分反映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经营和全球经济布局的情况，也能反映我国企业在全球创造的财富。由于统计数据易获得等原因，目前各国普遍采用 GDP 作为衡量经济规模的主要指标。过去我国利用外资存量大于我国境外投资存量，因此 GDP 一直高于 GNI，但幅度有限，基本在 0.5% 以内。随着我国加快全球生产经营布局，GDP 已不能充分反映以上重要变化趋势，未来我国 GDP 规模和增速很可能低于 GNI。从日本情况看，虽然过去 30 多年 GDP 增长基本停滞，被称为“失去的 30 年”，但由于日本企业海外扩张加快，GNI 增长持续超过 GDP。据世界银行统计，2011—2022 年，日本名义 GDP 增长了 12.5%，而名义 GNI 增长了 16%。

因此，我国国民经济统计应适应新时期境外投资加快的变化趋势。一是在公布 GDP、GNI 两个数据的同时，增加 GNI 的引用率和使用率，特别是在一些涉外经济分析中，要结合国际收支平衡表，增加对 GNI 的使用、解释和分析。二是改进 GNI 统计方法，重点是加强对我国权益海外资产增加值的统计，以便比较完整地反映我国国民口径在全球创造的增加值。三是扩大对 GNI 和境外投资的宣传，说明 GNI 是反映我国企业国际化程度、对全球资源配置力、提升国际分工层级的重要指标。四是更重要的是树立 GNI 思维方式，不能将我国的海外资产简单看作国内财富的减少，而应视作国民财富的增加，从而更好适应我国开放新阶段的要求。

（二）加大我国对发展中国家“走出去”的支持力度

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境外投资的重点，但普遍存在基础设施能力不足、投资营商环境欠佳等问题，是“走出去”需要优先解决的课题。在发展中国家中，部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过十余年建设，其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明显改善，部分产业园区建成运营。这些国家承接我国产业转移、加速工业化现代化的条件初步具备，加之这些国家与我国合作意愿较强，且有“一带一路”合作机制保障，应成为我国“走出去”的优先方向。

第一，调整优化“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布局。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布局，一方面，要继续完善以我国为中心的互联互通交通网络，特别是与我国贸易投资和分工关系紧密的中南半岛、中亚、中东欧等方向，除扩大通道外，还要争取跨境铁路等标准对接，提高跨境运输效率。另一

方面，根据我国境外投资的发展需要，在重点投资国家和地区，谋划建设面向东道国和周边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包括连接东道国原材料供应地、生产制造基地、内销市场和出口市场的交通基础设施，形成有利于我国境外投资的基础设施网络。

第二，以加快境外投资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进入新阶段。考虑到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发展基础普遍较差的实际情况，共建“一带一路”战略应分阶段实施，大体要顺次经历基础设施、园区建设、招商引资、产业发展和扩大出口等阶段。目前基础设施和园区建设取得较大进展，但不少国家承接产业转移较慢，不但导致基础设施利用率不高、债务负担较重，而且也影响“一带一路”目标的实现和国际影响力。因此，当前共建“一带一路”应重点转向以产业转移、产业培育为主的新阶段。我国应继续发挥引导性作用，在综合条件较好的国家，依托境外合作园区加快境外投资，以民营企业和制造业为重点，将能发挥东道国优势的产业或环节对外转移，在境外形成生产制造和内外销能力，打造我国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

第三，与东道国共商共建有利于我国境外投资的软环境。我国可选择发展基础较好、政治社会稳定、与我国合作意愿强烈的国家合作，并与东道国共同来改善我国境外投资的软环境。例如，在共建“一带一路”有关协议或自贸协定谈判中纳入双向直接投资内容，或商签双边投资协定，争取东道国扩大我国对其投资的开放和市场准入程度，保护我国境外投资利益。再如，争取东道国制定既符合其发展阶段特征，也对我国境外投资有利的“边界后”规则，其中在劳工标准、环保标准等方面，不宜简单对标发达国家高标准规则，而在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公平竞争等方面，可适当参照发达国家高标准规则，以保护我国境外企业权益和提升东道国产业竞争力。又如，在尊重东道国意愿情况下，推广我国利用外资、制造业发展和促进出口的成功经验，开展加工贸易、设立保税区、汇率低估政策等。

（三）争取与发达国家逐渐形成新型境外投资关系

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将发生深刻变化，理论上双方不但相互投资的规模将继续扩张，而且投资方式应出现符合水平分工的结构性变化。但受国际大环境影响，当前我国对发达国家境外投资受到很大制约。为此，我国应坚持与发达国家双向投资不主动脱钩的思路，选择重点领域重点国家突破并形成示范效应，稳定和升级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第一，力争使欧洲作为对发达国家境外投资的突破口。大多数欧洲国家政治外交自主性较强，同时各国发展不平衡，对华经贸合作意愿各不相同，欧盟各国在外资安全审查制度上也有很大的独立性。中欧之间已接近达成高水平的投资协定，后因政治原因而搁置。2025 年美国特朗普上台后，美欧关系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我国需抓住有利时机，减轻地缘政治因素对中欧经贸关系的干扰，争取推动中欧签署投资协定，为欧洲对我国扩大投资开放和投资保护给予制度性保障。同时，选择与我国关系较好、合作潜力较大的欧盟国家，以我国具有优势、东道国引进意愿强烈的新能源汽车等作为突破口，在欧洲投资设厂、扩大生产和出口能力，尽快形成我国在欧洲投资的标志性项目，形成示范效应，推动其他发达国家转变对我国投资的态度。

第二，注重我国境外投资为发达国家带来的利益。发达国家对我国的境外投资，一方面希望带来制造业回归、增加就业、掌握先进技术、提高产业竞争力等正面影响，另一方面也特别关注其先进技术外溢、基础设施安全等风险。近年来，受美国对华价值观经贸影响，我国对发达国家境外投资的风险和不利影响被严重夸大。因此，我国应多考虑发达国家的关注点，放大对其投资的正面积极影响、缩小负面效应。例如，在对发达国家制造业投资时，应扩大对东道国配套零部件的采购，带动上下游

产业链发展，培育形成产业集群，促进制造业回流，扩大当地就业；同时允许非核心技术向东道国转移，为发达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提升其与我国深化合作的基础。而对发达国家认为风险较大的基础设施、敏感信息、关键技术等投资，可暂时搁置，在一段时间内不作为我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重点。

（四）建立符合新阶段我国境外投资的体制机制

体制机制和相应的政策是落实“走出去”战略的基本保障。在新阶段，我国应顺应对外开放新阶段的要求，树立以境外投资引领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的理念，支持我国企业稳妥有序“走出去”全球布局。

第一，加大对境外投资的支持力度。在政策方面，尊重企业境外投资的自主决策权，积极推动境外投资便利化，在金融和外汇管理方面加大对境外投资的支持力度。对符合发展方向的境外投资，例如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在境外园区建设、境外企业出口等方面给予一定鼓励。

第二，建立境外投资促进体系。我国境外投资起步时间不长，很多企业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如经济社会、法律体系、行政管理、金融结算、贸易管制、劳工雇佣等缺乏了解，是境外投资面临的主要障碍。为此，我国应瞄准重点投资的国家，建立完善境外投资促进体系。如支持“走出去”服务业发展，建立分国别的“走出去”服务中心，提供信息、法律、融资、贸易、运输等综合性服务，编制重点国家的投资信息指南；支持我国驻东道国使领馆提高为中资企业的服务能力，协调处理中资企业与当地政府和当地社会组织的关系；鼓励先期境外投资的中资企业成立商会、“走出去”联盟等，为后续投资企业提供帮助。

第三，完善境外投资评估风险防范机制。境外投资事关国家经济、产业、金融、供应链和能源资源等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近年来不少国家加强了境外投资的安全审查。在未来境外投资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我国有必要建立并完善境外投资安全审查评估和风险防范机制。例如，对境外投资涉及的产业核心技术转让、关系国家安全的设备零部件出口等加强审查，对企业集中“走出去”可能引发的资本快速流出和国际收支失衡风险进行评估及采取必要的限制措施等，以减少企业境外投资的风险。

参考文献：

1. 赵霄伟：《从 GDP 与 GNP 差额来看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中国经贸导刊（理论版）》，2018 年第 14 期。
2. 朱福林：《对外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内在逻辑、重点议题及战略抉择》，《财经问题研究》，2023 年第 12 期。
3. 张明、张哲：《高水平对外开放：历史成就、内外挑战及战略布局》，《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1 期。
4. 姚枝仲：《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财经智库》，2022 年第 6 期。
5. 卢进勇、王粉粉、程晓青：《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动因何在？》，《中国外资》，2024 年第 5 期。

责任编辑：谷 岳

世界经济温和增长 复苏前景不确定性上升

——2024 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及 2025 年展望

余秋梅 李婧婧 郝悦 朱祎 赵宇欣

摘要：2024 年，在多重风险因素影响下，世界经济保持温和复苏态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世界经济增速从 2023 年的 3.3% 小幅回落至 3.2%。从主要领域看，随着全球通胀放缓，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宽松，全球生产活动小幅改善，服务贸易较为活跃支撑国际贸易恢复，但受总体市场需求仍较为疲软拖累，制造业生产及货物贸易持续低迷，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整体回落。从主要经济体看，美国经济仍具韧性，欧元区和日本经济温和改善，主要新兴经济体经济延续复苏态势。展望 2025 年，宽松货币政策的延续将继续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有利环境，中美仍将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在地缘冲突、贸易保护主义、债务压力以及美国经济和货币政策摆动等风险继续扰动下，世界经济复苏前景仍不容乐观。

关键词：世界经济 经济预测 货币政策 复苏前景

作者简介：余秋梅，国家统计局国际中心主任；

李婧婧，国家统计局国际中心副处长；

郝悦，国家统计局国际中心统计师；

朱祎，国家统计局国际中心统计师；

赵宇欣，国家统计局国际中心八级职员。

2024 年，全球通胀压力明显缓解，服务贸易活跃支撑全球贸易总体好转，世界经济延续温和复苏态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估，2024 年世界经济增速为 3.2%，与 2023 年基本持平。但受总需求不足制约，加之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导致金融市场波动加大，经济增长动能仍然较弱。展望 2025 年，随着通胀继续放缓，主要经济体仍将处于降息通道，世界经济有望继续保持温和增长。但贸易限制措施增多、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债务高企以及美联储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金融的影响交织叠加，经济增长前景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IMF 预计，2025 年世界经济增速将持平于 3.3%，连续 4 年低于 2000—2019 年 3.7% 的平均增速。

一、世界经济主要领域运行情况

（一）从需求端看，全球贸易弱势恢复

2024 年，全球贸易呈现恢复态势，但受强紧缩货币政策滞后效应影响，叠加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贸易限制及制裁措施增多，复苏势头仍相对较弱。月度及先行指标显示货物贸易仍较低迷。据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数据，2024 年，全球货物贸易量较上年增长 1.7%，仍为 2020 年以来较低增速；1—7 月月度同比增速持续在 1% 左右徘徊，8 月以来增速略有加快。据标普数据，2024 年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新出口订单指数共 10 个月处于收缩区间，12 月份为 48.2%，较 4 月份的年内高点回落 2.3 个百分点。服务贸易支撑全球贸易总体改善。由于旅游业已基本恢复至新冠疫情前水平，全球服务贸易逐渐企稳，全球服务业 PMI 新出口订单指数全年处于扩张区间。从贸易额看，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24 年 12 月发布《全球贸易更新》报告预估，2024 年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额有望达到约 33 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较上年增长 3.3%；其中，货物贸易额增长 2.0%，服务贸易额增长 7.0%。从贸易量看，联合国 2025 年 1 月发布《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估，2024 年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量增长 3.4%；其中，货物贸易量增长 2.4%，仍处于新冠疫情以来较低水平，服务贸易量增长 6.4%，保持较快增速。全球投资活动有所回暖。由于多数经济体开启降息周期，全球利率中枢高位下行，带动投资温和增长。联合国报告预估，2024 年全球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 3.4%，结束此前连续 2 年的负增长。

（二）从供给端看，全球制造业活动仍显疲弱

供应链压力持续缓解。纽约联储数据显示，全球供应链压力指数维持低位。2024 年全球供应链压力指数为 -0.3，是 2016 年以来次低；其中，4 月份为 -0.9，是 2023 年 8 月以来次低。全球生产状况有所改善。2024 年，全球产出扩张速度有所加快，据标普数据，全球综合 PMI 产出指数延续波动回升态势，且全年处于扩张区间。其中，5 月份上升至 53.7%，为 2023 年 5 月以来最高水平；12 月份为 52.6%，处于 2022 年以来相对高位。制造业复苏动能不足。2024 年全球制造业 PMI 于 48.0% ~ 51.0% 波动；上半年整体略高于 50.0% 荣枯线，保持温和扩张；下半年降至荣枯线及以下，12 月份为 49.6%，较 5 月份 51.0% 的年内高点回落 1.4 个百分点。美国、日本制造业 PMI 自 7 月份以来均由荣转枯，欧元区收缩加剧。主要经济体工业生产表现疲弱。2024 年，美国工业生产下降 0.3%，较上年由正转负；欧元区和日本工业生产分别下降 3.0% 和 2.3%，降幅较上年分别扩大 1.3 个和 1.0 个百分点；墨西哥增长 0.2%，较上年回落 3.2 个百分点。服务业活动较为活跃。据标普数据，2024 年全球服务业 PMI 于 52.0% ~ 54.0% 波动，保持较快扩张；12 月份为 53.8%，较 1 月份的 52.3% 回升 1.5 个百分点，为近 7 个月最高。美国服务业 PMI 扩张逐渐加快，12 月份为 56.8%，创 2022 年 3 月以来新高；欧元区共 10 个月处于扩张区间，较上年有所好转。

（三）从金融市场看，国际金融市场情绪总体改善但脆弱性加大

2024 年，虽然全球通胀压力明显缓解，但在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地缘冲突、美国大选尤其是特朗普政策主张等因素影响下，市场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明显减弱，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全球股市波动上行，部分股指屡创新高。2024 年 12 月 31 日，明晟全球股票指数较上年末累计上涨

18.4%；其间 8 月 5 日“黑色星期一”全球股市暴跌、日韩股指熔断，此后恢复普涨，12 月 6 日再创历史最高收盘价。在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人工智能技术突破以及新一届政府政策预期等因素作用下，美国道琼斯指数、纳斯达克指数、标普 500 指数全年分别累计上涨 18.9%、28.6% 和 23.3%，于 12 月 16 日、12 月 4 日和 12 月 6 日达到历史最高收盘价。欧洲股市表现不一，德国法兰克福 DAX 指数全年累计上涨 18.8%，12 月 12 日为历史最高，英国富时 100 指数全年累计上涨 5.7%。由于日本企业管治改革、证券交易所推出的改革措施以及日元贬值等利好因素支撑，日经 225 股指全年累计上涨 19.2%，连续 2 年上涨。新兴市场股市表现分化，明晟新兴市场股指全年累计上涨 10.5%。债市收益率高位波动。2024 年，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较上年末累计上涨 70 个基点，处于 2007 年以来较高水平，4 月 25 日为 4.70%，达到 2023 年 11 月以来最高，12 月 31 日回落至 4.58%。德国、英国、日本的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全年分别累计上涨 37.0 个、62.7 个、46.4 个基点。美元指数呈“N”字型走高。2024 年，美元指数在 100.4 ~ 108.5 波动，处于 2003 年以来高位，12 月 31 日收于 108.4816，为 2022 年 11 月以来最高收盘价，较上年末上涨 7.0%。其他主要货币对美元普遍贬值，欧元、英镑汇率全年分别累计贬值 6.2% 和 1.7%。其中，欧元汇率 8 月 24 日收于 1.1193，英镑汇率 9 月 26 日收于 1.3415，分别为 2023 年 7 月、2022 年 2 月以来最低，四季度主要在美联储降息预期减弱和“特朗普交易”影响下大幅贬值；由于美日利差维持高位，强势美元背景下，日元全年累计贬值 10.3%，7 月 10 日收于 161.6770，为 1986 年 11 月以来最低。新兴经济体货币遭遇不同程度的抛售潮。阿根廷比索跌至历史最低，全年累计贬值 19.0%；韩元贬值 12.6%，为 2008 年以来最大贬值幅度；土耳其里拉、巴西雷亚尔全年分别贬值 16.5%、21.5%。

（四）从商品市场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整体下行

受全球工业和制造业生产复苏乏力、贸易增长动能不足影响，国际大宗商品需求较为疲软，导致价格承压下行。2024 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05.1（2010 年 = 100），较上年下跌 2.7%。其中，能源价格指数为 101.5，下跌 5.1%；非能源价格指数为 112.5，上涨 2.0%。能源价格先涨后跌。能源价格指数 1—4 月持续上涨，4 月份涨至 109.6，创 2023 年 10 月以来新高，此后震荡下行，9 月份跌至 95.4，随着美联储开启降息步伐，叠加欧元区、英国、加拿大等经济体货币政策持续放宽，国际能源价格逐步企稳，12 月份为 96.5，同比下跌 3.1%。非能源价格波动上涨。非能源价格指数 5 月份涨至 115.6，创 2022 年 8 月以来新高，此后持续在 109 ~ 117 区间震荡，12 月份涨至 117.0，同比上涨 8.5%。国际油价冲高回落。2024 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一揽子原油平均价格较上年下跌 3.7%。1—4 月，国际油价快速攀升，OPEC 一揽子油价由年初的 78.4 美元/桶升至 4 月 5 日的 91.1 美元/桶，创 2023 年 10 月 27 日以来新高。此后，受原油需求增长放缓、地缘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主要经济体降息预期推迟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震荡回调，9 月 11 日跌至 70.8 美元/桶，创 2022 年以来新低，四季度有所企稳，持续在 70 ~ 80 美元/桶震荡。

二、主要经济体经济运行情况

（一）美国经济仍具韧性

2024 年，美国通胀水平持续回落，劳动力市场紧张态势有所缓解，消费和投资活动较为活跃，支撑经济保持温和增长。展望 2025 年，若特朗普实行高关税和驱逐移民的政策组合，将抬高进口成本、

加剧劳动力短缺，再度抬升通胀风险，抑制消费增长，并进一步影响货币政策调整路径，加大政策不确定性，经济增长面临多重挑战。

1. 经济增长放缓。2024 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 29.2 万亿美元，增速为 2.8%，较上年回落 0.1 个百分点。分季度看，四个季度环比折年率增速分别为 1.6%、3.0%、3.1% 和 2.3%，呈现先升后降态势；同比增速分别为 2.9%、3.0%、2.7% 和 2.5%，下半年增长动能有所减弱。

个人和政府的消费和投资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项。2024 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增速较上年加快 0.3 个百分点至 2.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上年的 1.72 个百分点小幅提升至 1.87 个百分点，商品和服务消费分别拉动 0.51 个和 1.36 个百分点，是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私人投资增速较上年加快 3.9 个百分点至 4.0%，拉动经济增长 0.73 个百分点，其中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0.66 个百分点，私人存货变动拉动经济增长 0.07 个百分点；政府支出增速较上年回落 0.5 个百分点至 3.4%，拉动经济增长 0.57 个百分点；出口增长 3.2%，较上年加快 0.4 个百分点，进口增长 5.4%，较上年由负转正，贸易逆差有所扩大，净出口拖累经济增长 0.38 个百分点（见表 1）。

表 1 2022—2024 年美国年度及季度 GDP 构成对经济增长的拉动 单位：百分点

指标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4 年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2.5	2.9	2.8	1.6	3.0	3.1	2.3
个人消费支出	2.06	1.72	1.87	1.30	1.90	2.48	2.79
商品	-0.14	0.42	0.51	-0.25	0.63	1.18	1.27
服务	2.20	1.30	1.36	1.55	1.27	1.31	1.53
政府消费与投资	-0.20	0.66	0.57	0.30	0.52	0.86	0.49
私人投资	1.07	0.02	0.73	0.64	1.47	0.16	-1.05
净出口	-0.42	0.49	-0.38	-0.61	-0.90	-0.43	0.12
出口	0.82	0.31	0.35	0.21	0.12	1.01	-0.05
商品	0.45	0.17	0.16	-0.02	0.07	0.70	-0.34
服务	0.38	0.14	0.20	0.23	0.05	0.31	0.29
进口	-1.24	0.17	-0.74	-0.82	-1.01	-1.44	0.17
商品	-0.81	0.22	-0.53	-0.69	-0.90	-1.14	0.58
服务	-0.43	-0.05	-0.21	-0.13	-0.12	-0.29	-0.41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2. 工业生产低迷。2024 年，美国工业生产下降 0.3%，创 2020 年以来新低；制造业生产下降 0.4%，连续 2 年下降；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7.6%，较上年回落 1.4 个百分点，创 2020 年以来新低。从月度数据看，由于利率高企和需求不足，工业生产、制造业生产同比增速分别在 -1.0% ~ 1.0%、-2.0% ~ 0.5% 波动；产能利用率呈现先升后降态势，6 月份升至 78.2% 的年内高点，此后波动回落至 11 月份的 76.8%，为年内最低。

3. 消费市场保持活跃。2024 年，美国个人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速为 2.7%，较上年回落 2.3 个百分点；个人实际消费支出增速为 2.8%，较上年加快 0.3 个百分点，其中个人实际服务消费增速为 2.9%，是主要拉动项。零售总额为 8.55 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增速为 3.0%，较上年回落 0.4 个百分点。从月度数据来看，个人实际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速从 1 月份的 3.7% 波动回落至 12 月份的 2.2%，为年内最低；个人实际消费支出同比增速从 1 月份的最低点 1.9% 波动回升至 11 月份的最高

点 3.2%，12 月份小幅回落至 3.1%；零售额同比增速从 2 月份的最高点 6.3% 回落至 6 月份的最低点 -0.1%，而后波动回升，四季度趋于平稳增长，增速保持在 4%~5%。

4. 对外贸易较快增长，贸易逆差有所扩大。2024 年，美国进出口总额为 73016.0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增速为 5.4%，较上年由负转正。其中，出口额增长 3.9%，进口额增长 6.6%；全年贸易逆差为 9184.2 亿美元，较上年扩大 1335.3 亿美元，为有记录以来次高。

5. 通胀水平持续回落。2024 年，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上涨 2.9%，涨幅较上年回落 1.2 个百分点，连续 2 年回落。分项中，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继续回落，能源（-1.3%）连续 2 年下跌，食品（2.3%）涨幅较上年回落 3.5 个百分点，创 2019 年以来新低。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3.4%，涨幅回落 1.4 个百分点，创 2020 年以来新低。住宅（4.4%）、服装（0.7%）、娱乐（1.5%）涨幅分别回落 2.0 个、2.1 个和 2.5 个百分点。生产者价格指数（PPI）上涨 2.3%，涨幅较上年扩大 0.3 个百分点，仍为 2020 年以来次低。

6. 劳动力市场有所降温。2024 年，美国全年平均失业率为 4.0%，较上年提升 0.4 个百分点，为近 3 年来最高水平；新增非农就业总人数为 199.6 万人，增幅较上年收窄 59.8 万人，创 2020 年以来新低。职位空缺数由 1 月份的 874.8 万人降至 12 月份的 760.0 万人，薪资增长放缓，私人非农企业员工平均时薪同比增速由 1 月份的 4.3% 回落至 12 月份的 4.1%。

（二）欧元区经济温和改善

2024 年，在服务业活动保持活跃、通胀放缓以及下半年欧洲央行货币政策转向宽松支撑下，欧元区经济走出停滞，消费需求逐步回暖，市场信心有所增强，但受外部需求疲弱拖累，生产及对外贸易持续低迷，加之能源供给不稳定扰动，经济复苏力度仍相对较弱。展望 2025 年，在宽松货币政策下，内需旺盛将继续支撑经济温和增长，但在外部环境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内部增长动力有限，通胀反弹压力仍存的影响下，经济增长前景不容乐观。

1. 经济温和增长。2024 年，欧元区 GDP 增速为 0.7%，较上年加快 0.3 个百分点。因服务业活动保持旺盛，加之通胀逐步回落，欧洲央行放宽货币政策带动消费回暖，经济总体好于上年，但受外需转弱导致工业、贸易持续低迷拖累，复苏力度下半年有所减弱。分季度看，四个季度 GDP 环比增速分别为 0.3%、0.2%、0.4% 和 0.1%，同比增速为 0.4%、0.5%、0.9% 和 0.9%。主要成员国中，德国 GDP 增速为 -0.2%，连续 2 年负增长；法国、意大利 GDP 分别增长 1.1%、0.7%，均与上年持平。

2. 工业生产持续萎缩。2024 年，欧元区工业生产和制造业生产增速分别为 -3.0% 和 -3.2%，降幅较上年分别扩大 1.3 个和 2.0 个百分点，均为 2020 年以来最低。月度同比持续负增长，但下半年降幅有所收窄，由 1 月份的 -5.4%、-6.1% 收窄至 12 月份的 -2.0%、-2.4%。

3. 消费市场有所回暖。从零售量看，2024 年，欧元区商品零售量增长 1.0%，增速较上年由负转正。其中，食品饮料烟草增长 0.1%，结束此前连续 2 年的负增长；非食品（不含燃料）、汽车燃料分别增长 1.6%、1.0%，均较上年由负转正。从市场信心看，欧元区消费者信心指数由 1 月份的 -16.1 回升至 12 月份的 -14.5，其中 10 月份为 -12.5，是 2022 年 2 月以来最高。

4. 对外贸易依然低迷。2024 年，欧元区货物进出口总额为 55510 亿欧元，较上年下降 1.6%，连续 2 年负增长。其中，货物出口额为 28640 亿欧元，增长 0.6%，增速较上年由负转正；货物进口额为 26870 亿欧元，下降 3.7%，连续 2 年负增长；净出口额由上年的 574 亿欧元升至 1769 亿欧元，顺

差有所扩大。

5. 通胀涨幅明显回落。2024 年，欧元区 CPI 上涨 2.4%，涨幅较上年回落 3.0 个百分点，为近 4 年最低。其中，能源（-2.2%）连续 2 年下降，食品烟酒（2.9%）、非能源工业产品（0.8%）涨幅分别回落 8.0 个、4.2 个百分点，均降至 2020 年以来相对低位，但服务类产品（4.0%）涨幅为 2002 年有记录以来次高，仍较为坚挺；核心 CPI 上涨 2.8%，涨幅回落 2.1 个百分点，为近 3 年最低。受中间品和能源价格下降影响，PPI 下降 4.2%，降幅较上年扩大 2.2 个百分点，为 2009 年以来最大降幅。

6. 劳动力供给总体稳定。2024 年，欧元区平均失业率为 6.4%，较上年回落 0.2 个百分点，为有记录以来最低。全年平均失业人数为 1098.3 万人，减少 17.8 万人，为有记录以来最低。

（三）日本经济缓慢复苏

2024 年，得益于日元贬值，日本出口额创纪录最高，贸易逆差大幅收窄，由于物价高企和劳动力短缺，日本企业加快设备投资，但个人消费低迷，经济复苏步伐仍较为缓慢。展望 2025 年，日本有望通过改善个人收入和刺激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但仍面临外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走向分化，以及内部劳动力短缺、高债务等结构性问题制约。

1. 经济低速增长。2024 年，日本 GDP 增速为 0.1%，较上年大幅回落 1.4 个百分点。分季度看，四个季度 GDP 环比增速分别为 -0.5%、0.7%、0.4% 和 0.7%，同比增速为 -0.8%、-0.8%、0.6% 和 1.2%，呈现缓慢复苏的态势。从 GDP 构成看，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0.2 个百分点。分项中，私人企业设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0.2，为需求的主要拉动项；私人需求对经济的贡献为 0，其中私人消费、私人住宅投资均拖累 0.1 个百分点。政府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0.1 个百分点。由于日元贬值、进口能源价格回落，净出口拖累经济增长 0.1 个百分点（见表 2）。

表 2 2024 年日本 GDP 构成对经济增长的拉动 单位：百分点

指标	2024 年	2024 年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0.1	-0.5	0.7	0.4	0.7
国内需求	0.2	-0.2	1.1	0.5	-0.1
私人需求	0.0	-0.2	0.6	0.6	-0.1
私人消费	-0.1	-0.3	0.4	0.4	0.1
私人住宅投资	-0.1	-0.1	0.1	0.0	0.0
私人企业设备投资	0.2	-0.1	0.2	0.0	0.1
政府需求	0.1	-0.1	0.5	0.0	0.0
政府消费	0.2	0.0	0.2	0.0	0.1
政府投资	0.0	-0.1	0.3	-0.1	0.0
净出口	-0.1	-0.3	-0.3	-0.1	0.7
出口	0.2	-0.9	0.4	0.3	0.2
进口	-0.3	0.7	-0.7	-0.5	0.5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
注：季度数据为环比贡献。

2. 工业萎缩程度加深，服务业保持恢复态势。2024 年，日本工业生产下降 2.3%，降幅较上年扩大 1.0 个百分点，连续 3 年下降。从月度数据看，1 月份工业生产指数为 92.4（2020 年 = 100），为 2020 年 8 月以来最低，此后持续低位徘徊，全年平均为 101.5，是 2020 年以来最低。据标普数据，制造业 PMI 全年有 10 个月低于 50.0% 荣枯线；服务业 PMI 全年有 10 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其中 4 月份为 54.3%，是 2023 年 5 月以来最高。

3. 内需疲软，消费信心不足。由于物价高企，工资上涨有限，2024 年日本零售额增长 2.5%，增速较上年回落 3.1 个百分点，为近 3 年最低；受日本本土车企认证违规暂停生产影响，全年新车登记数下降 6.7%，较上年的 15.8% 由正转负，为近 4 年最大降幅。消费者信心指数低位波动，由 1 月份的 37.7 降至 12 月份的 35.9，为 2023 年 9 月以来次低。

4. 对外贸易有所好转。2024 年，日本货物贸易出口额增长 6.2%，增速较上年加快 3.5 个百分点；因能源进口价格大幅回落，进口额增长 1.8%，较上年的 -6.8% 由负转正；受进口额增速低于出口额、日元贬值影响，贸易逆差较上年收窄 41869 亿日元至 53352 亿日元，为近 3 年最小逆差。

5. 通胀压力持续。2024 年，日本 CPI 上涨 2.7%，涨幅较上年回落 0.5 个百分点，为 1991 年以来次高；日本米价长期居高不下推高整体物价水平，食品（4.3%）、能源（3.8%）、教育文化娱乐（5.4%）、家具及家庭用品（4.0%）等均大幅上涨。扣除生鲜食品的核心 CPI 上涨 2.5%，涨幅回落 0.6 个百分点，为 2014 年以来次高。PPI 上涨 2.3%，涨幅回落 2.0 个百分点。

6. 劳动力市场保持稳定。2024 年，日本失业率为 2.5%，较上年回落 0.1 个百分点，为近 5 年最低。高成本压力下企业招聘意愿有所减弱，全年平均有效求人倍率为 1.25 倍，较上年下降 0.06，为近 3 年首次下降。

（四）新兴及其他经济体经济持续复苏

2024 年，新兴及其他经济体经济延续复苏态势，生产活动保持扩张，对外贸易明显好转，通胀持续回落，劳动力市场仍具韧性。但由于市场对美欧降息预期反复，“特朗普交易”推动美元指数走高，新兴及其他经济体面临较大货币贬值压力和金融市场波动风险。展望 2025 年，随着主要经济体开启降息周期，全球货币政策延续宽松，新兴及其他经济体经济有望得到提振。但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仍存，美国加征关税限制贸易活动，通胀上行风险和贸易不确定性仍然较大，加之部分国家债务高企，新兴及其他经济体经济增长前景面临挑战。

1. 多数经济体经济增长加快。2024 年，越南 GDP 增速为 7.1%，较上年加快 2.1 个百分点；新加坡（4.4%）、中国台湾（4.6%）和韩国（2.0%）分别加快 2.6 个、3.5 个和 0.6 个百分点；菲律宾（5.6%）、印尼（5.0%）和俄罗斯（4.1%）与上年持平；南非（0.6%）和墨西哥（1.3%）较上年分别回落 0.1 个和 2.0 个百分点，均为近 4 年最低。2024 财年，印度 GDP 增速为 6.5%，较上一财年回落 2.7 个百分点，保持较快增速；2025 年 1 月 IMF 预估，2024 年，巴西 GDP 增速为 3.7%，较上年加快 0.5 个百分点（见表 3）。

2. 制造业扩张势头渐弱。2024 年上半年新兴及其他经济体制造业活跃度有所提升，下半年由于市场需求表现疲软，制造业厂商生产积极性下降，制造业扩张势头有所放缓。据标普数据，印度制造业 PMI 先升后降，全年处于 56.4% ~ 59.1% 区间，12 月份为 56.4%，较 6 月份相对高点回落 1.9 个百分点；墨西哥制造业 PMI 上半年处于扩张区间，7 月份以来由荣转枯，9 月份降至 47.3%，为 2022 年 1 月以来最低；越南制造业 PMI 上半年整体回升，6 月份和 7 月份升至 54.7%，为 2018 年 11 月以

来最高，12 月份降至 49.8%；俄罗斯扩张势头有所放缓，12 月份为 50.8%，较 3 月份 55.7% 的相对高点回落 4.9 个百分点；菲律宾和巴西分别位于 50.9% ~ 54.3% 和 50.4% ~ 55.9% 区间，保持温和扩张。

3. 对外贸易有所回暖。2024 年以来，随着全球货币政策转为宽松，国际贸易回暖，主要国家进出口总额实现正增长。2024 年，全球经济“金丝雀”韩国进出口总额较上年增长 3.2%，增速由负转正，其中出口额增长 8.1%，全年保持正增长；印度进出口总额增长 5.1%，其中出口额增长 2.9%，进口额增长 6.5%，增速均由负转正；越南进出口总额增长 15.2%，增速由负转正，其中出口额增长 14.2%，进口额增长 16.2%，全年均有 10 个月增速超 10%；印尼、巴西进出口总额分别增长 3.7%、3.3%，增速均由负转正。

4. 通胀涨幅继续回落。由于利率整体仍处于较高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投资和消费需求，加之供应链压力缓解，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回落，供给状况有所改善，主要经济体通胀继续回落。2024 年，韩国 CPI 上涨 2.3%，涨幅较上年回落 1.3 个百分点，8 月份以来持续低于央行 2% 的目标；印尼（2.3%）涨幅回落 1.1 个百分点，6 月份以来持续低于央行 1.5% ~ 3.5% 的目标区间中点；印度（4.9%）涨幅回落 0.8 个百分点，连续 2 年处于央行 2% ~ 6% 的目标区间；巴西、南非 CPI 均上涨 4.4%，涨幅分别回落 0.2 个、1.6 个百分点，均降至央行目标区间。

5. 劳动力市场仍具韧性。在经济复苏拉动下，新兴及其他经济就业形势继续好转，劳动力市场仍展现较强韧性。2024 年，巴西平均失业率为 6.9%，较上年回落 1.1 个百分点，为 2014 年以来最低水平；印度（8.0%）、印尼（4.9%）和墨西哥（2.7%）分别回落 0.1 个、0.5 个和 0.1 个百分点；韩国（2.8%）小幅回升 0.1 个百分点，仍处于历史相对低位。

表 3 2023—2024 年美欧日以外的其他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 单位：%

经济体	2023 年	2024 年	2024 年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新加坡	1.8	4.4	3.2	3.4	5.7	5.0
韩 国	1.4	2.0	3.3	2.3	1.5	1.2
中国香港	3.2	2.5	2.8	3.1	1.9	2.4
中国台湾	1.1	4.6	6.6	4.9	4.2	2.9
俄罗斯	4.1	4.1	5.4	4.1	3.1	2.7
墨西哥	3.2	1.2	1.5	2.2	1.7	0.5
巴 西	3.2	3.7	2.6	3.3	4.0	4.1
南 非	0.7	0.6	0.6	0.4	0.4	0.9
印 尼	5.0	5.0	5.1	5.1	5.0	5.0
越 南	5.0	7.1	6.0	7.3	7.4	7.6
印 度 ²	9.2	6.5	8.4	6.5	5.6	6.2

资料来源：IMF 和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注：1. 巴西 2024 年度和四季度增速以及俄罗斯四季度增速为 IMF 估计；2. 印度年度增速为财政年度数据。

三、不确定性上升，世界经济复苏前景仍不容乐观

（一）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

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保持宽松。随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主要经济体通胀涨幅继续回落，主要央行 2025 年将维持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美联储表示将根据通胀及经济走势谨慎决定政策利率调整时间；由于通胀总体可控，但经济表现低迷、部分成员国政局动荡，加之外部不确定性对经济可能造成冲击，市场预期欧洲央行将连续降息至 2025 年年中。此外，2025 年以来，澳大利亚、印度等经济体开启降息，加拿大、英国、墨西哥、南非等经济体继续降息。一方面，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有利于降低借贷和融资成本，刺激消费和投资，有助于全球贸易及投资活动复苏；另一方面，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空间将有所扩大，有助于促进其经济更快复苏。

中美将继续拉动世界经济增长。世界银行指出，在减税等扩张性财政政策支撑下，美国内需仍将保持旺盛，并拉动进口较快增长、刺激金融市场风险偏好上升，利好新兴市场国家。预计美国经济每增长 1 个百分点可能在 3 年内拉动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累计增长 2.9 个百分点。世界银行还指出，在中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加之一系列促消费、稳预期等政策举措落地见效，中国国内消费需求有望得到提振；此外，在支持性政策下房地产活动也将较预期更快企稳，这将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拉动生产及投资活动改善，中国经济的较快增长将继续给全球经济带来积极的溢出效应。预计中国经济每增长 1 个百分点将在 3 年内拉动全球经济累计增长 0.8 个百分点。

（二）拖累世界经济增长的消极因素

贸易限制措施阻碍贸易复苏步伐。世界银行报告显示，2024 年全球新增贸易限制措施是 2010—2019 年平均水平的 5 倍。2025 年，特朗普政府或将采取更大力度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给全球贸易复苏带来巨大挑战。贸易限制措施增加及可能引发的报复措施将破坏全球价值链，抬升全球商品价格，加剧通胀压力，并进一步影响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路径，加大世界经济下行风险。世界银行预计，2025 年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量增速为 3.1%，较 2024 年 6 月预测值下调 0.3 个百分点。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对供给扰动持续。2024 年，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共有 11 个月高于长期平均水平 100，12 月份为 136.2，保持在 2022 年 5 月以来高位。展望 2025 年，在乌克兰危机局势反复拉锯、中东地区局势尚不明朗的复杂态势下，全球地缘政治仍将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地缘风险及外溢可能仍然较大，地缘冲突将持续扰动国际能源、粮食、金属等重要商品供给，加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和供应链不稳定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金融市场风险。近期，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一方面，受通胀、就业等经济数据影响，美联储降息路径仍存较大不确定性。2025 年 2 月 18 日，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下次降息时点将从 1 月份预测的 2025 年 6 月推迟至 9 月，全年仅降息 1 次，幅度收窄至 25 个基点。同时，欧元区、日本等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将继续分化。另一方面，特朗普在贸易、移民、税收等政策上的主张及其实施效果不确定性仍存。在此背景下，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或将加大，其他经济体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或继续面临较大的货币贬值和资本流出压力。截至 2025 年 2 月 20 日，美元指数较 2024 年三季度末上涨 5.8%。非美货币贬值幅度加大，韩国韩元、马来西亚林吉特、南非兰特分别较 2024 年三季度末贬值 8.3%、6.9%、5.9%，巴西雷亚尔、墨西哥比索、

泰国泰铢、印度卢比贬值 3% ~4%。世界银行和 IMF 均表示，全球政策的高度不确定性可能会削弱投资者信心，抑制资金流动，导致融资环境恶化。

全球债务压力有增无减。据联合国数据，截至 2024 年 12 月，全球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重为 95.1%，较 2019 年上升 12.0 个百分点，较 2007 年上升 36.0 个百分点。未来，全球经济碎片化加深、贸易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大、金融市场风险不断积聚，全球债务脆弱性或将加剧，部分发展中经济体仍将面临较高的债务违约风险，制约经济体经济复苏进程，对世界经济及金融稳定构成挑战。据联合国数据，2024 年各国政府平均将 8.5% 的财政收入用于支付利息，高于 2019 年的 6.0%。利息支出在财政支出中占比提高，进而对支持经济发展与建设性支出产生挤出效应，削弱财政政策调控的韧性，拖累经济增长步伐。据世界银行数据，主权信用评级较低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通常面临较高的借款成本和沉重的债务负担，这些经济体 2025—2026 年经济平均增速仅为 2.9%，显著落后于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4.1% 的平均增速。

四、国际组织机构对世界经济的最新预判

世界经济将保持缓慢复苏。2024 年，世界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增长保持相对稳定，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回落及全球通胀的放缓有效缓解了地缘紧张局势带来的冲击，活跃的服务业活动以及下半年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宽松有效提振了市场信心，一定程度弥补了总需求不足对生产、贸易及投资造成的拖累。展望 2025 年，尽管在全球通胀有望继续放缓、货币环境延续宽松以及美国和中国保持较强增长拉动下，世界经济将延续复苏态势，但受地缘冲突频发、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以及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等风险影响，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加之世界经济尚未从前期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等冲击中完全恢复，世界经济或将面临长期的低增长。2025 年 1 月，IMF 预计 2025 年世界经济增速将较 2024 年加快 0.1 个百分点至 3.3%，2026 年将持平于 3.3%，低于 2000—2019 年 3.7% 的平均增速；世界银行预计 2025 年、2026 年世界经济增速均为 2.7%，低于历史平均增速；联合国预计 2025 年世界经济增速将持平于 2.8%，2026 年将增长 2.9%，低于新冠疫情前历史平均水平（见表 4）。

主要经济体延续分化走势。2025 年，由于金融环境转向宽松，潜在需求和劳动力市场仍较强劲，IMF 预计美国经济将增长 2.7%，较 2024 年 10 月预测值上调 0.5 个百分点。在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下，欧元区内需有望继续回暖并支撑经济复苏，但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打压市场情绪，制造业复苏不确定性加剧影响下，欧元区经济将增长 1.0%，较 2024 年 10 月预测值下调 0.2 个百分点。随着货币政策趋于正常化，加之雇员薪酬增长有望拉动消费需求，日本经济将增长 1.1%，与 2024 年 10 月预测值持平。在生产活动保持活跃，通胀放缓有利于消费继续增长支撑下，预计印度经济将增长 6.5%，与 2024 年 10 月预测值持平。

全球通胀有望继续放缓。随着能源价格预期下行、劳动力市场总体稳定，2025—2026 年全球通胀涨幅将进一步回落。IMF 预计，2025 年全球通胀涨幅将由 2024 年的 5.7% 回落至 4.2%，2026 年将进一步降至 3.5%，均较 2024 年 10 月份预测值下调 0.1 个百分点。其中，发达经济体通胀回落 0.5 个百分点至 2.1%，2026 年降至 2.0%；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回落 2.2 个百分点至 5.6%，2026 年降至 4.5%。但 IMF 指出，全球降通胀进程仍然艰难。一是多数经济体服务领域价格依然高企；二是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特朗普关税计划将推高进口价格，加大通胀反弹风险；三是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直接影响运价及大宗商品价格，加大进口国价格压力。

表 4 2023—2025 年世界经济主要指标及预测

指标	预测机构	2023 年	2024 年 估计值	2025 年 预测值	指标	预测机构	2023 年	2024 年 估计值	2025 年 预测值
经济增长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通货膨胀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 ¹	3.3	3.2	3.3		世界	6.7	5.7	4.2
	发达经济体	1.7	1.7	1.9		发达经济体	4.6	2.6	2.1
	美国	2.9	2.8	2.7		发展中经济体	8.1	7.8	5.6
	欧元区	0.4	0.8	1.0		英国共识公司			
	日本	1.5	-0.2	1.1		世界	5.6	3.8	2.9
	发展中经济体	4.4	4.2	4.2		美国	4.1	3.0	2.7
	中国	5.2	4.8	4.6		中国	0.2	0.2	0.6
	世界银行					欧元区	5.4	2.4	2.1
	世界	2.7	2.7	2.7		日本	3.3	2.7	2.6
	美国	2.9	2.8	2.3	货物贸易 量增速	世界贸易组织 ²			
	中国	5.2	4.9	4.5		世界	-1.1	2.7	3.0
	欧元区	0.4	0.7	1.0		出口 北美	3.7	2.1	2.9
	日本	1.5	0.0	1.2		中南美	2.3	4.6	-0.1
	印度 ⁴	8.2	6.5	6.7		欧洲	-2.6	-1.4	1.8
	英国共识公司					亚洲	0.3	7.4	4.7
	世界	2.7	2.6	2.6		进口 北美	-2.0	3.3	2.0
	美国	2.9	2.8	2.2		中南美	-4.5	5.6	1.7
	中国	5.2	5.0	4.5		欧洲	-5.0	-2.3	2.2
	欧元区	0.5	0.7	0.9		亚洲	-0.7	4.3	5.1
	日本	1.5	-0.1	1.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印度 ⁴	8.2	6.3	6.5		世界 ³	0.7	3.4	3.2

资料来源：世界贸易组织《全球贸易展望与统计》（2024 年 10 月）；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2025 年 1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25 年 1 月）；英国共识公司《国际经济调查与预测》（2025 年 2 月）。

注：1. 购买力平价法 GDP 加权汇总；2. 为世界贸易组织基准预测；3. 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4. 印度为财政年度数据。

参考文献：

1. UNCTAD. Global Trade Update, December 2024.
2.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 January 2025.
3. 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January 2025.
4.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25, January 2025.
5. WTO. Global Trade Outlook and Statistics, October 2024.
6. Consensus Forecasts. Survey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Forecasts, February 2025.

责任编辑：李蕊

2023—2024 年世界贸易组织 重要谈判进展及其趋势

东 艳 张 琳 郭若楠

摘要：本文利用文本分析与政策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系统梳理了 2023—2024 年世界贸易组织重要谈判的进展，谈判关注投资便利化、电子商务与数字贸易、渔业补贴、农业补贴、气候变化与贸易规则、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等关键议题。同时，结合各成员方的政策立场，探讨谈判进程中的主要分歧与博弈，旨在分析各项谈判进程对全球贸易体系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全球贸易治理面临逆全球化趋势、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地缘政治紧张等挑战的背景下，世界贸易组织在推动新兴议题方面的作用日益增强，特别是《投资便利化协定》和《电子商务协定》的签署标志着全球贸易规则在这两个领域的进一步完善。未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将更多关注新兴议题及其解决方案，应对全球经济和政治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挑战。

关键词：世界贸易组织 多边贸易体系 数字经济 环境可持续性 争端解决机制

作者简介：东 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张 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与世界经济》（英文刊）编辑；

郭若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引 言

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全球贸易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推动全球贸易谈判，促进贸易自由化；对贸易政策实施监督，减少政策不确定性；解决贸易争端，建立全球范围内的贸易规则，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合作等。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逆全球化趋势增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供应链在疫情冲击后加速重构；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了全球政治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WTO 也面临着一系列巨大挑战。2024 年是 WTO 成立 30 周年。在推动世界经济再全球化的进程中，如何重新赋能激发 WTO 改革的潜力，凝聚共识，推动谈判进程，是促进国际贸易进一步发展，增进各成员国人民的福祉，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以及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本文重点分析了 WTO 在 2023—2024 年的重要谈判进展，特别是投资便利化、电子商务与数字贸易、渔业补贴、争端解决机制改革以及农业等议题的谈判。这些谈判的进展如何影响全球贸易？成员国在谈判中的主要立场和观点是怎样的？未来的谈判趋势是什么？本文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一、WTO 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角色与新变化

（一）WTO 的传统角色

WTO 自 1995 年成立以来，极大推动了全球贸易的快速发展，全球贸易额增长了近 5 倍，2023 年全球货物贸易额约为 24 万亿美元，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总额达 30.4 万亿美元；推动了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实现经济的更快增长，帮助超过 15 亿人摆脱极端贫困。^① WTO 的多边贸易规则体系也逐步扩展到全球，促进了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减少了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不仅使国际贸易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成为二战后全球经济合作与治理的重要支柱之一。

第一，WTO 致力于通过谈判降低关税和消除非关税壁垒，促进成员国间的商品和服务自由流动。乌拉圭和多哈回合等多轮贸易谈判推动了全球贸易的自由化，降低了贸易壁垒，助力各国经济增长。第二，WTO 构建了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涵盖进出口关税、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投资等多个领域。同时，WTO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确保了贸易政策的透明、公平、可预测性。第三，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有效调解贸易纠纷，减少了单边主义和贸易摩擦升级的风险。第四，WTO 通过定期的贸易政策审议，监督成员国的贸易政策动向，确保其符合多边贸易体系的规定。并且 WTO 向成员国提供政策建议，帮助其在遵守规则的同时最大化自身利益，促进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第五，WTO 关注发展中国家发展特殊与差别待遇（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允许发展中国家在关税减让、实施时间和市场准入方面享受一定的灵活性，有助于促进其经济发展水平和竞争力的提升。

（二）全球经济环境中的新变化

面对新冠疫情冲击、供应链重组和地缘政治危机，WTO 多边贸易体系正处于关键十字路口。这些挑战不仅考验 WTO 的应变能力和改革成效，也对全球贸易体系的稳定与未来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一是新冠疫情冲击与供应链断裂。疫情期间，国际物流运输多次停滞，导致生产链条中断，医药、半导体等关键产品供应不足，给全球供应链和贸易流动带来了深远影响。这一冲击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使各国更加关注本国供应链的安全性，多个国家重新评估和调整供应链策略，强调“去全球化”或“区域化”以确保本国经济稳定。WTO 数据显示，2023 年全球商品贸易量萎缩了 1.2%。^② WTO 面临着如何在全球危机中更有效地协调供应链恢复的问题，以促进国际物流的稳定性和韧性。

二是区域化政策对 WTO 多边体制的“绊脚石”作用。供应链的区域化政策主要包括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提出了供应链重组和“友岸外包”的策略。美国等国家正在推动部分生产环节回流国内或转移至友好国家，以增强供应链的安全性和可控性。这种区域化和盟友化的供应链重组削弱了全球一体化的程度，WTO 多边贸易体系面临日益分裂的风险。此外，全球范围内的区域贸易协定（RTA）的数量显著增加，从 1990 年的 28 个增加到 2024 年的 615 个，生效的 RTA 数量达 373 个。^③ 这些协定不仅涵盖了传统的货物贸易，还扩展到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环保等多个领域，显示出深度化的趋势。特别是巨型自贸协定（FTA）的建立，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①WTO, WTO Annual Report 2024, p. 7 + 15,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_e/anrep_e/ar24_chap1_e.pdf.

②WTO, WTO Annual Report 2024, p. 16,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_e/anrep_e/ar24_chap1_e.pdf.

③详见 WTO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Database, 数据查询时间截至 2024 年 12 月, <https://rtais.wto.org/UI/PublicMaintainRTA-Home.aspx>.

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覆盖更多国家和地区，也令全球贸易规则更加复杂。这不仅增加了全球贸易的不确定性，也削弱了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和监督职能，使其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角色面临更大挑战。

三是地缘政治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上升。自 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以来，各国出于维护本国经济安全和减少供应链冲击的考虑，纷纷采取保护性措施，导致全球贸易壁垒增加。全球贸易预警（Global Trade Alert）数据显示，2018 年以来，保护主义和限制性贸易措施显著增加，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加速了这一趋势。全球贸易限制措施的数量大幅上升，尤其在涉及半导体、稀土等关键资源的行业，单边壁垒显著增加。2023 年 10 月至 2024 年 10 月，WTO 成员实施的 169 项新的贸易限制措施所涵盖的贸易额估计为 8877 亿美元，比 2022 年 10 月至 2023 年 10 月实施的限制措施所涵盖的贸易额（3371 亿美元）高出 5000 多亿美元。^① 同期，二十国集团（G20）经济体采取了 91 项新的货物贸易限制措施，贸易限制措施覆盖的贸易额估计为 8289 亿美元。^② 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单边壁垒增加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全球贸易体系的稳定性构成极大的挑战。

四是特朗普上台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冲击。特朗普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在其第一任期内，退出了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内的多边贸易协定；阻止了 WTO 上诉机构新成员的任命，导致该机构陷入瘫痪；实行“美国优先”，通过提高关税来激励国内生产和保护美国就业，违背了 WTO 支持自由贸易的宗旨。2025 年 2 月 1 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对所有自中国进口的商品在现有基础上加征 10% 的关税。此外，美国还宣称对来自墨西哥、加拿大两国的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必将对全球贸易格局产生深刻影响，或将对全球贸易体系造成颠覆性的冲击。

基于上述全球经济环境中的新变化，WTO 需要在供应链韧性、规则更新和多边协调等方面加强改革，以期能够在新的全球经济格局中保持其在国际贸易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三）应对新兴挑战的调整

全球经济政治形势面临巨大变革，也为 WTO 的新发展带来了机遇。WTO 在气候变化、数字贸易和可持续发展等新兴议题领域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些议题反映出国际贸易发展的新需求，WTO 也在不断调整角色以应对这些变化。

一是贸易政策与环保措施相结合。WTO 正在推进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在多边框架下的政策协调，探索制定全球统一的碳计量和报告标准；WTO 提议在多边框架下推动绿色产品的“零关税”或优惠关税政策，促进绿色和低碳产品的贸易，以加快全球绿色经济转型。通过降低清洁能源技术、可再生能源设备和环保产品的关税，为成员国提供更多绿色发展选择。WTO 还关注碳减排领域的融资和技术转让问题，促进公平获取绿色技术，推动在全球范围使用低碳技术，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推广。

二是数字技术与数字贸易。WTO 通过电子商务联合声明倡议（Joint Statement Initiative on E-commerce），就跨境数据流动、数据本地化要求、电子合同、电子签名等议题进行谈判。这些议题的规则有助于降低数字贸易的交易成本，促进开展国际电子商务活动，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WTO

^①WTO, Overview of Develop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ing Environment, November 20, 2024. p. 3, <https://d3ipxbzibstf0l.cloudfront.net/reports/62-report.pdf>.
^②资料来源：《WTO 报告显示，G20 贸易限制措施激增》，中国商务部 WTO/FTA 咨询网，2024 年 11 月 14 日，<http://chinawto.mofcom.gov.cn/article/ap/p/202411/20241103545529.shtml>。

鼓励成员国之间开展技术转让与合作，这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提高数字经济竞争力。WTO 通过提供培训和技术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数字基础设施，提升人力资本的数字技能，从而促进当地企业的创新和发展。WTO 强调数字化对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支持其在数字经济中找到新的市场机会。

三是农业与食品安全。WTO 鼓励发展可持续农业，如有机农业、可再生资源利用等，以支持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确保食品供应的长期安全；在面对全球供应链冲击时，WTO 通过促进各国合作，确保食品和农产品的供应链稳定，以减少对全球食品安全的影响。

WTO 正在向“包容性、多功能”的全球治理组织转型，并在新兴议题上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推动数字贸易的全球规则、重构韧性的全球供应链等。WTO 的包容性发展提倡让更多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化进程，向着更加公正、高效且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贸易体系迈进。

二、2023—2024 年 WTO 重要谈判进展

（一）投资便利化协定谈判进展

2023 年，WTO《投资便利化协定》（Investment Facilitation for Development Agreement）文本谈判成功结束，该协定旨在简化跨境投资程序，降低企业成本，特别是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好的经营环境，吸引外资和发展本国经济，推动全球投资自由化。2024 年 2 月 25 日，123 个 WTO 成员国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召开投资便利化专题部长会议，宣布正式达成《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定》。

该项协定的主要内容有：一是透明度要求。要求参与协定的成员国公布与投资相关的法律法规、资产许可、纳税证明等信息，并通过“单一窗口”提供上述信息，以增强信息披露的透明度，降低隐形风险。二是简化投资行政程序和便利化。要求成员国应以合理、客观和公正的方式实施各项措施，简化批准程序，及时处理投资申请，保持审批机关的独立性，并定期审查投资措施。三是特殊与差别待遇和普惠性。为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了特殊与差别待遇，包括延长执行日期、使用争端解决的宽限期等，以帮助这些国家提升履行协定的能力。四是促进可持续投资。要求实施负责任商业行为和反腐败措施，鼓励投资者和企业自愿将国际公认的负责任商业行为原则纳入其商业惯例及内部政策。这是 WTO 层面首个纳入负责任商业行为和反腐败条款的多边协定。

《投资便利化协定》是 WTO 在双边投资领域的首个协定，标志着全球投资规则制定的重要进展，为国际投资领域的现代化改革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模式。其重要意义在于：一是通过提高投资政策的透明度、简化投资行政程序、提供特殊与差别待遇以及促进可持续投资等一系列措施，创建一个更加稳定、可预测的全球投资环境，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二是该协定有利于弥合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减少国际经济中的不平等和不合理现象，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完善。协定谈判由发展中成员牵头，获得超过 2/3 的 WTO 成员支持。按照谈判结果，协定将为有需求的发展中成员提供相应优惠待遇、技术援助，帮助其提升履行协定能力，优化投资环境，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这将有助于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多机遇和支持。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投资便利化协定》的达成，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投资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中国在协定谈判中发挥了促谈、促和、促成的关键作用，是中国方案引领高标准国际规则构建的重要实践。

（二）电子商务和数字贸易规则谈判进展

自 2019 年 1 月启动电子商务谈判以来，WTO 成员国一直在积极推动相关规则的制定，以适应全

球数字化转型的趋势。2024 年 7 月 26 日，WTO 电子商务谈判达成了一个稳定的《电子商务协定》文本。该协定的文本分为 5 个部分，共包含 8 章，其中第二章到第六章是协定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促进电子商务，开放与电子商务，信任与电子商务，透明度、合作与发展，与电信相关的内容，以及各缔约方应履行的义务，共涵盖了无纸化交易、电子合同、电子签名、电子发票、垃圾邮件、线上消费者保护、网络安全、电子交易框架、开放政府数据、透明度、开放互联网接入、单一窗口和个人数据保护 13 个议题的内容。^① 截至 2024 年 6 月，共有 91 个 WTO 成员参与了电子商务谈判，涵盖全球贸易的 90% 以上，包括 38 个发达成员、47 个发展中成员和 6 个最不发达成员。^②

该协定取得的重要突破主要体现在电子传输免关税条款上，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最新文本对于“电子传输”做出了明确定义。文本规定，“任何缔约方不得对一方人员与另一方人员之间的电子传输征收关税”，并具体标明“电子传输是指使用任何电磁手段进行的传输，包括传输的内容”。这一定义明确了电子传输方式和电子传输内容都在免征关税范畴之内。另一方面，协定文本明确，“双方应在本协定生效后的第五年对本条进行审查，并在此后定期进行审查，以评估该项条款的影响，并确定是否应对本条进行修改”。这对是否永久对电子传输免征关税进行了折中处理，采取了更灵活的方式，争取最大的共识。

在核心的跨境数据流动、数据本地化、数字税、源代码披露和算法公开等敏感领域，各成员之间还存在很大分歧。以跨境数据流动为例，一直以来美国支持跨境数据流动基于商业利益导向的自由开放，但 2024 年 2 月 28 日，时任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关于防止受关注国家获取美国人大量敏感个人数据和美国政府相关数据的行政命令》，标志着美国更加强调国家安全与数据保护。美国跨境数据治理规则的立场产生了显著转变。欧盟对数据本地化要求持反对立场，同时提出 4 点主张：一是不应要求使用境内计算设施处理数据；二是不应要求数据在境内存储；三是不应禁止在其他成员境内存储或处理数据；四是不应将计算设施和数据存储的本地化作为允许跨境数据流动的前提。^③

分歧和差异体现出主要大国间的规则之争和在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中的主导权、话语权之争。发达成员侧重于打造开放的数字贸易环境，而发展中成员则更关注提高电子商务便利化水平，强调规则应该适应自身发展的需求。更加复杂的是，发达国家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发展中国家间在上述领域的立场也存在一定差异。所以，短期内在 WTO 框架下达成电子商务的全球性协定非常具有挑战性。

（三）渔业补贴谈判进展

2022 年 6 月，在 WTO 第十二届部长级会议（MC12）上达成的《渔业补贴协定》是 WTO 第一份主要旨在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协定，这也是 WTO 成立以来达成的第二个协定。协定的主要规则有：一是禁止补贴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IUU）的捕捞活动；二是禁止补贴涉及过度捕捞鱼类种群的捕捞活动；三是禁止补贴在无管制的公海区域进行的捕捞活动。根据《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渔业补贴协定》在超过 2/3 的 WTO 成员接受后正式生效。2023 年 6 月 27 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向 WTO 总干事伊维拉递交了中国对 WTO《渔业补贴协定》议定书的接受书，标志着中国

①详情参见 WTO 网站：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ecom_e/joint_statement_e.htm。
②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TO Joint Initiative on E-commerce State of Pla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2024 July, p. 2, <https://www.iisd.org/system/files/2024-07/wto-joint-initiative-e-commerce-state-of-play.pdf>;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规则量化分析报告》，2024 年第 7 期，第 4 页，<https://ciwto.uibe.edu.cn/docs/2024-09/f9e606e4de0d4a238e556706b36b6143.pdf>。
③王金波：《WTO 电子商务谈判与全球数字治理体系的完善》，《全球化》，2024 年第 3 期，第 71 页。

已经完成接受《渔业补贴协定》的国内法律程序。《渔业补贴协定》禁止有害的渔业补贴，各方所达成的协定是限制一些与鱼类种群长期破坏关系最直接的补贴，但是在取消导致过度捕捞和捕捞能力过剩等方面的补贴上，并未能达成共识。2023—2024 年，WTO 关于渔业补贴谈判的核心议题在于如何落实和进一步削减有害补贴，特别是限制过度捕捞。2018 年，全球渔业补贴约为 350 亿美元，其中 2/3 为扩能（capacity - enhancing）渔业补贴，约为 222 亿美元（Sumaila et al, 2019），各成员方在 MC12 上同意继续就未决问题进行谈判，以期在 MC13 会议上就进一步加强该协定的补充条款提出建议。不过，在 2024 年初举行的 MC13 上，各方未能完成第二轮谈判。

在 WTO 关于渔业补贴的谈判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实现全球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存在显著分歧，尤其是在削减 IUU 捕捞的补贴方面。这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渔业补贴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前者的补贴主要用于燃油、渔船建造等，而后者主要是对公共服务如基础设施、研发的直接转移。亚洲和非洲的渔业补贴以增强渔业捕捞能力为目的的扩能补贴为主，扩能补贴在上述地区渔业补贴总额中占比达 70% 以上，有益补贴占比则不足 25%。北美洲的有益补贴份额相对较高，2018 年北美洲渔业补贴总额中有益补贴占比达 58%。^①

许多发展中国家强调渔业是其重要的经济支柱和生计来源，因此在渔业补贴谈判中主张获得豁免或灵活性。其主要立场是：其一保护小规模 and 生计性渔业。发展中国家认为小规模渔业对其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此主张在减少补贴方面获得豁免，认为这种补贴对维持沿海社区的生计和就业至关重要，而且不会对全球渔业资源产生严重威胁。其二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的技术和财政支持，以增强其实施和监督 IUU 捕捞的能力。因此，他们要求在条约中加入明确的技术援助条款，以帮助这些国家履行协定中的义务。其三保持政策灵活性。发展中国家希望在设定和执行反 IUU 捕捞措施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以平衡环境可持续性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些国家尤其关注有针对性的补贴措施，以在不影响当地渔业的情况下实现环保目标。

与发展中国家立场不同，发达国家通常倡导严格限制或取消 IUU 捕捞活动的补贴，以实现全球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其主张主要包括：一是严格的补贴削减。发达国家认为，补贴加剧了全球渔业资源的过度开发，因此主张逐步取消助长过度捕捞的补贴，并要求所有成员加强对 IUU 捕捞的监管。二是环境可持续性承诺。许多发达国家在国际环境协定中有环保承诺，因此在 WTO 的渔业补贴谈判中积极推动禁止 IUU 捕捞活动的补贴，以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目标，特别是 SDG 14.6。^② 三是公平竞争的考量。发达国家关注如何在全球渔业市场中保持公平竞争，认为发展中国家享有的豁免导致市场不公平竞争，特别是在深海渔业捕捞领域。

（四）农业补贴与粮食安全谈判进展

农业是 WTO 谈判中最复杂且最具争议的领域之一。特别是随着全球粮食安全状况进一步恶化，发展中国家特别关注粮食安全和公共粮食储备问题。根据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统计数据，2023 年，全球约有 7.13 亿 ~ 7.57 亿人面临食物短缺，以中值计算（约 7.33 亿人），较 2019 年增加了约 1.52 亿人。非洲仍然是饥饿人口占比最高的区域（20.4%），其次是亚洲（8.1%）、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

^①Schuhbauer A., Skerritt D. J., Ebrahim N., Le Manach F. and Sumaila U. R. The Global Fisheries Subsidies Divide Between Small - and Large - Scale Fisheries, *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 Vol. 7, September, 2020.

^②SDG14.6 是《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关于海洋和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目标之一。其具体内容为：到 2020 年，禁止某些助长过剩产能和过度捕捞的渔业补贴，取消助长非法、未报告和不管制捕捞活动的补贴，避免出台新的这类补贴，同时承认给予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合理、有效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应是 WTO 渔业补贴谈判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区（6.2%），以及大洋洲（7.3%）。然而，亚洲仍占世界饥饿人口总数的 50% 以上，区域内饥饿人口数量约为 3.85 亿人。^① 2023 年，非洲有近 3 亿饥饿人口，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有 4000 万以上饥饿人口，大洋洲有 300 万以上饥饿人口。^② WTO 在 MC12 上围绕粮食安全再达成两项成果：《关于紧急应对粮食安全问题的部长宣言》提出农业委员会需制定专门的工作方案，充分考虑最不发达国家（LDCs）和净粮食进口发展中国家（NFIDCs）成员在应对严重粮食供给不稳定方面的需要，提高其在紧急情况下保障国内粮食安全的能力；《关于世界粮食计划署购粮免除出口禁止或限制的部长决定》承诺，不对世界粮食计划署人道主义粮食采购实施出口禁止或限制措施。

MC12 之后，WTO 农业委员会为落实部长宣言相关内容进行了全面讨论，最终在 2024 年 4 月例会上达成工作方案，通过了关于帮助 LDCs 和 NFIDCs 应对严重粮食不安全的报告。该报告为改善粮食安全提出了若干关键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额外粮食援助和技术支持。为减轻这些国家的粮食短缺压力，成员们同意采取灵活和快速的援助机制，确保粮食能够及时送达最需要的地区。此外，发达国家应加强对这些国家在农业生产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支持，帮助其提高粮食生产效率，从而减少对进口的依赖，增强其应对粮食不安全的能力。二是公共粮食储备制度。特别是在粮食危机期间，允许 LDCs 和 NFIDCs 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公共储备以避免对进口的过度依赖。这种政策灵活性能确保粮食供应不被中断。为提高储备的管理效率，报告建议发达国家提供管理和监督技术支持，帮助这些国家有效管理粮食库存，从而增强其粮食安全。三是粮食安全的贸易政策调整。通过灵活的关税政策和减少贸易扭曲的补贴来保障全球粮食市场的稳定，报告建议在特殊情况下暂时放宽 LDCs 和 NFIDCs 的关键粮食商品进口关税。为了应对出现的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和供应短缺，建议建立粮食危机应急机制，确保在市场异常波动时提供更有利的市场准入条件和资金支持，以减轻粮食危机的影响。四是加强国际合作。为提升应对粮食危机的能力，WTO 鼓励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国际组织的多方合作，包括信息共享和协调粮食出口政策，以整合资源和技术支持，共同解决粮食不安全问题。这种合作模式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和稳定的全球粮食供应链。

2023—2024 年 WTO 关于农业补贴削减谈判的关键在于，如何找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平衡，确保全球粮食供应链的稳定和公平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农业补贴类型、范围和政策灵活性，以及粮食安全方面存在分歧。在农业补贴类型、范围和政策灵活性方面，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通常更倾向于支持出口导向和商品型农业，旨在通过直接支付和其他形式的财政支持来维持其农业竞争力。基于其经济优势，发达国家大多希望通过削减全球贸易扭曲性补贴来实现公平的竞争环境，限制发展中国家的补贴豁免，保持全球市场的开放性。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补贴则大多用于支持小规模农户、提高农业自给率、保障粮食安全和稳定社会经济。因此，发展中国家要求保留对国内农业的支持，在农业补贴削减中获得一定的豁免，特别是在粮食安全、扶贫、气候适应等方面保持一定的政策灵活性，以继续扶持其农业部门发展。在粮食安全方面，发达国家主张应严格遵守削减补贴的约定，认为这将带来更加公平和开放的市场，减少贸易扭曲。发展中国家则指出，完全削减补贴会影响其本就脆弱的粮食安全。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粮食安全是其首要考量之一。许多发展中国家要求在粮食安全相关的补贴和库存制度上获得更多豁免，以确保在粮食危机时能够维持供应。

^①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24 年全球粮食和农业统计年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网站，2024 年，<https://openknowledge.fao.org/handle/20.500.14283/cd2971en>。
^②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等：《2024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网站，2024 年，<https://openknowledge.fao.org/handle/20.500.14283/cd1276zh>。

（五）气候变化与贸易规则谈判进展

当前全球面临的气候变化问题已经相当严峻，全球自记录开始以来的 10 个最热年份都发生在 2014 年之后，2023 年是其中最热的一年。^① 2023 年全球陆地和海洋表面温度比 20 世纪平均水平高出 1.19 摄氏度。气候变化导致极端热浪、致命干旱和野火的频率和强度增加。2022—2023 年，全球有 23 个国家宣布了干旱紧急状态。由于全球变暖，全球海冰的最大范围在过去 40 年中已经缩小。2023 年 11 月，海冰范围为 2390 万平方公里，比 1980 年减少了 13%。据预测，2030—2050 年，气候变化可能导致全球每年额外增加 25 万人死亡。^②

2023—2024 年，WTO 加强了关于气候变化的谈判，尤其是 CBAM 和绿色贸易议题。核心目标是在推动全球减排目标的同时，确保国际贸易的公平性与可持续发展。具体进展可以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 CBAM。WTO 各成员讨论了在全球碳减排背景下引入 CBAM 的可能性。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盟，推动 CBAM 以防止“碳泄漏”，即将高碳排放的生产转移到碳限制较松的地区。尽管如此，发展中国家对 CBAM 存在担忧，认为该机制增加其出口成本，削弱其国际竞争力。为此，成员们正探讨在实施 CBAM 的同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定的过渡支持，以减少其受影响的程度。二是绿色贸易政策的制定。在谈判中，WTO 成员进一步探讨了绿色技术产品的关税减免，以促进清洁能源技术和环保产品的跨国流动。例如，讨论的重点议题包括太阳能电池、风力涡轮机、节能设备等绿色产品的零关税待遇，从而促进清洁技术在全球的普及应用。此类政策建议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支持，特别是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三是贸易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各成员国在 2023—2024 年间对如何平衡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保护目标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绿色供应链”概念，意图在供应链各环节中降低碳排放，包括生产、运输、销售等，鼓励各国推动低碳标准，制定环保政策，从而提升整个供应链的可持续性。四是技术和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和绿色贸易议题上希望得到发达国家的技术及资金支持。WTO 讨论了绿色金融的合作议程，包括为低收入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提供清洁能源技术援助及融资方案，帮助其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取得进展。这些合作措施获得了一些成员国的积极响应，WTO 也正在酝酿相关的多边合作机制。

WTO 在推动全球减排目标的同时，为确保国际贸易的公平性与可持续发展也作出了持续努力。一是推动多边贸易规则的创新与发展。WTO 规则是国际贸易规则的基石。气候变化相关的国际贸易规则领域，已经被 WTO 归为国际贸易及其规则领域的重要议题。WTO 成员在国际经贸规则谈判、区域性贸易投资协定乃至国内经贸立法等多个层面，有可能取得气候变化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措施的明显进展。二是推进贸易与环境可持续性结构化讨论（TESSD）。TESSD 旨在补充贸易与环境委员会及其他相关的 WTO 委员会和机构的工作，建立一个根据可持续发展理念保护和维护环境的全球贸易体系。TESSD 覆盖多项议题，包括环境产品和服务的贸易、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内容，旨在识别贸易政策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及潜在协同作用。

当前 WTO 气候变化与贸易规则谈判面临的主要挑战，一是 CBAM 的公平性和合法性。CBAM 旨在对欧盟进口的某些商品征收额外的碳成本，以平衡欧盟境内外的碳成本。然而，这一机制引发了关于其与 WTO 规则一致性以及是否构成贸易保护主义的争议。发展中国家普遍对 CBAM 持质疑或强烈反对态度，认为这是发达国家单边主义的体现。二是碳排放成本的测度。碳排放成本的测度是欧美达成气候合作的主要技术难点，如何准确测算和比较不同国家的碳排放成本，是实施 CBAM 等碳关税措

^①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State of the Global Climate 2023, 2024. p. 3.

^②数据来源：美国国家冰雪数据中心（National Snow and Ice Data Center，简称 NSIDC），<https://nsidc.org/>。

施的关键。

在关于气候变化与贸易规则的谈判中，欧盟在推动绿色贸易规则上扮演了主导角色。欧盟推出 CBAM，并计划在 2026 年起对欧盟进口的水泥、电力、化肥、钢铁和铝征收“碳关税”。美国也在考虑推出自己的“碳边境税”，并与欧盟在实施“碳关税”上有一定共识。但是美国也提出了碳关税立法提案——FAIR 法案作为回应，体现了对欧盟强硬单边贸易政策的抵触。中国也在积极推动绿色贸易的发展，将继续践行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绿色发展合作，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提升绿色贸易发展水平。这些经济体努力推动绿色贸易规则，旨在通过改革国际贸易规则，促进实现全球减排目标，同时保护各自的经济利益并实现环境目标。

（六）争端解决机制改革谈判进展

自 2019 年 WTO 上诉机构陷入瘫痪以来，恢复其正常功能成为 2023—2024 年各成员国谈判的核心议题之一。美国对恢复上诉机构功能持抵制态度，主张对 WTO 争端解决机制进行根本性改革，以确保各成员国的政策灵活性和权利。美国认为，当前的 WTO 争端解决机制存在成本高、耗时长、参与门槛高等问题，需要进行改革以提高效率和公平性。面对美国的立场，其他 WTO 成员国也在积极寻求解决方案。一些成员国提出，可以通过更灵活的谈判模式来解决争端，例如允许各成员通过诸边谈判达成协议，并将其纳入 WTO 法律体系。此外，还应允许争端各方通过事前协商达成一致，不援用上诉程序，以破解当前的困境。

在潜在的替代性争端解决方案方面，WTO 成员国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根据《关于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DSU）第 25 条，一些成员国已经建立多方临时上诉仲裁机制（MPIA），作为上诉仲裁程序的临时替代方案。MPIA 的建立为 WTO 争端解决机制带来了一线生机，但因为其成员数量不足，且美国等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尚未加入，其效力的发挥受到了限制。在机制改革方向上，有建议提出，在现行争端解决机制框架内构建“认可并尊重可不选用上诉程序”的机制性安排。增加灵活性可以不触动美国核心关切，同时为其他成员提供有效的争端解决途径。这样的方案旨在保障及时解决争端，对现有规则的改动较小，较符合“所有成员都能使用的良好运作的争端解决机制”的要求。总体来看，WTO 争端解决机制改革面临着理念认知分歧、法律技术难题、议题关联复杂化以及时间限制等挑战。为了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经贸法治，各成员国需要增强谈判的灵活性，探索新的路径和方案，推动恢复 WTO 争端解决机制。

表 1 2023—2024 年 WTO 核心议题及谈判进展

议题	阶段性成果	主要内容	难点和焦点
投资便利化	《投资便利化协定》	提高投资政策的透明度；简化投资行政程序；提供特殊与差别待遇；促进可持续投资	从诸边向多边的推进；获得超过 2/3 的 WTO 成员支持才能生效通过
电子商务与数字贸易	《电子商务协定》	无纸化交易、电子合同、电子签名、电子发票、垃圾邮件、消费者保护、网络安全和电子交易框架等 13 个方面的内容	在跨境数据流动、数据本地化、数字税、源代码披露和算法公开等敏感领域存在很大分歧
渔业补贴	《渔业补贴协定》	禁止补贴 IUU 捕捞活动；禁止补贴涉及过度捕捞鱼类种群的捕捞活动；禁止补贴在无管制的公海区域所进行的捕捞活动	落实和进一步削减有害补贴，特别是限制过度捕捞

续表 1

议题	阶段性成果	主要内容	难点和焦点
农业补贴与粮食安全	《关于紧急应对粮食安全问题的部长宣言》；《关于世界粮食计划署购粮免除出口禁止或限制的部长决定》	额外粮食援助和技术支持；公共粮食储备制度；粮食安全的贸易政策调整；加强国际合作	弥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分歧，特别是农业补贴类型、范围和政策灵活性，以及粮食安全等方面
气候变化	未达成阶段性协定	CBAM；绿色贸易政策的制定；贸易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技术和资金支持	CBAM 的公平性和合法性；碳排放成本的测度
争端解决机制改革	未达成阶段性协定	建立 MPIA 作为替代方案	存在理念认知分歧、法律技术难题、议题关联复杂化、时间限制等难题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汇总而得。

三、WTO 谈判的未来趋势

（一）新兴议题的未来主导地位

气候变化、数字经济、数据主权等新兴议题正逐渐成为未来 WTO 谈判的核心内容。这些议题不仅关系到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涉及到国际贸易规则的重塑。具体来看，气候变化方面，随着全球对气候变化的关注日益增加，该议题正在成为国际贸易和规则领域的热点问题，相关的贸易规则也在逐步形成。CBAM 引发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始考虑国际贸易规则中气候变化问题的相关立法及政策。WTO 的《2022 年世界贸易报告》也强调了气候变化议题在国际贸易规划和规则制定领域的重要地位。气候变化相关的国际贸易新规则，可能会成为未来几年 WTO 成员间进行国际规则谈判、国内贸易立法等规则制定领域的新方向和新热点。数字经济方面，涉及的主要议题包括电子商务便利化、个人信息保护、数字产品待遇等。随着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全球数字治理领导权的争夺也日益激烈。在 WTO 框架下，成员方一方面需通过现有协定对数字贸易的应用加以澄清与拓展，另一方面通过电子商务诸边谈判试图对数字贸易便利化、数字产品市场准入、数据开放与跨境流动、信任与安全、跨领域合作等问题达成全新的协定与规则。数字经济国际协定还呈现专门化趋势，相关国家和地区单独就数字经济治理谈判并缔结的专项协定逐步增加，如《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数据主权方面，该议题在数字贸易规则中占据核心地位，涉及跨境数据流动、数据本地化、源代码和加密保护等关键议题。随着数据和信息的价值化、货币化和资产化，数据价值创造过程与商业运营模式日臻成熟，信息和数据资源成为数字平台创造价值并获取收入的主要来源。WTO 成员方在数据类、隐私和安全类规则方面尚存一定的分歧。数据主权的维护与数字贸易的开放性之间的平衡是当前 WTO 谈判中的一个挑战，同时也关系到国家数字主权的保护和数据价值的释放。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这些新兴议题的谈判态度及其未来走向也呈现出差异。发达国家通常在数字经济和环境保护方面持有更积极的态度，而发展中国家则更关注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会对一些限制性措施持保留态度。例如，发达国家更倾向于推动数据自由流动和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而发展中国家更关注确保其产业发展和市场准入。未来，WTO 谈判需要在这些新兴议题上找到平衡点，以确保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公平性。这需要各国在谈判中展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和合作精神，同时

也需要 WTO 作为一个平台，为这些复杂的议题提供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和规则制定框架。

（二）WTO 谈判的未来趋势

2023—2024 年，WTO 谈判在多个重要领域取得了进展，但也面临着一些未解决的问题。其中重要进展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电子商务谈判。2023 年 7 月，电子商务谈判联合召集人宣布在无纸化交易、电子合同、电子签名等条款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并希望年底前完成谈判。2024 年 7 月，WTO 达成《电子商务协定》文本，为数字贸易提供了平衡且包容的框架。二是投资便利化协定。WTO 2023 年完成了《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定》的文本谈判，这是 WTO 在投资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三是渔业补贴协定。WTO 2022 年达成《渔业补贴协定》，这是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支持。未解决的问题集中在争端解决机制和农业补贴谈判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各议题中的分歧是阻碍 WTO 谈判的重要因素。尽管各成员一直坚持就争端解决机制尤其是上诉机构正常运行的恢复问题进行磋商，但直至 2023 年 12 月，仍未能达成一致。农业谈判也仍然是 WTO 谈判中的一个难点，涉及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出口竞争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WTO 谈判的未来趋势表现为：一是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是最大难点和首要任务。由于美国的阻挠，WTO 上诉机构已经陷入瘫痪状态，这对 WTO 的正常运转构成了严重威胁。改革争端解决机制，恢复其功能，对于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至关重要。各成员需尽快就争端解决机制改革达成一致，解决上诉机构的法官遴选、任期、工作量、报酬等问题，并优化和规范审理程序和裁决标准。二是传统议题多边谈判的推进面临挑战，难度也相对较高。WTO 需要继续推进关于农业、服务业、渔业补贴等领域的多边谈判，同时要协调 RTA 与多边贸易体系的关系。随着 RTA 数量的增加，WTO 需要确保 RTA 的发展符合多边贸易体制纪律，避免其对 WTO 构成冲击，以及 WTO 与 RTA 之间的协调和监管的问题。三是新兴议题的谈判将占据主导地位。气候变化、数字经济、数据主权等新兴议题将继续成为 WTO 谈判的核心内容。这些议题不仅关系到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涉及到国际贸易规则的重塑。

未来全球经济与政治的变化将影响 WTO 多边谈判。首先，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对全球贸易和投资产生负面冲击，增加不确定性。其次，各成员国对全球经济进一步分化的担忧可能影响 WTO 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和谈判进程。最后，许多国家的债务增加将会限制其在贸易谈判中的灵活性。总体来看，WTO 谈判未来更加注重新兴议题的讨论与解决，同时也需要应对全球经济和政治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

参考文献：

1. WTO, Barbados, Dominica, Senegal, Uruguay Formally Accept Agreement on Fisheries Subsidies, WTO News, Feb. 14, 2024.
2. WTO, Agricultural Negotiations: Backgrounder, 2024.
3. WTO, Trade and Climate Change, 2024.
4. WTO, Annual Report 2022, 2022.
5. WTO, Agreement on Fisheries Subsidies, 2022.
6. Sumaila, U. R. , Roheim, C. C. , Khan, A. R. , Teh, L. C. L. , Watson, R. , Zeller, D. , and Pauly, D. Updated Estimates and Analysis of Global Fisheries Subsidies. Marine Policy, Vol. 109, 2019.

责任编辑：郭 霞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服务业扩张^{*}

——基于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分析

闫冰倩

摘要：针对服务业占比逐年提升这一特征事实，本文认为各产业之间并非此消彼长、相互割裂的关系，而是相互依赖、不断融合的关系。鉴于此，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分别从生产者维度和消费者维度构建产业增加值流向及来源的核算指标，提出产业融合的分解框架模型，并运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最新数据对中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服务业占比提升的驱动因素以及产业融合的态势和深度进行深入分析和结构分解。结果发现，中国 21 世纪以来的服务业扩张有很大部分是用于其他行业的生产中，这一特点与其他发达国家与地区呈现明显的不同；在中国单位制造业最终品中，本国服务业贡献的增加值占比不断上升，产业融合态势和深度增强，体现了中国制造业产品增加值由外国贡献部分越来越多地转为由本国贡献，以及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服务业增加值与其他行业部门融合的主渠道为国内生产链，贡献率接近 50%；同时由于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服务业增加值与其他行业融合的全球价值链渠道同样贡献较高。尽管中国制造业的服务业含量在近年来明显上升，但其绝对数值仍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中国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仍有与制造业深化融合的空间。

关键词：投入产出分析 产业融合 全球价值链 增加值核算 结构分解分析

作者简介：闫冰倩，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引 言

在全球价值链的相关研究中，文献多聚焦于制造业的价值链研究，而忽视了服务业的重要作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一些服务业具有不易贸易的属性，因此往往给人以只用于本地最终消费，而不用于生产的印象；第二，相比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不易于统计和理解。然而事实上，服务业不仅可用来直接贸易，还经常隐含在制造业最终品中被间接贸易，但后者并未能在传统的服务贸易统计中得以体现。因此，用传统的核算方法会大大低估服务业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重要作用。

类似地，针对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由 2000 年的 38.8% 迅速增长至

^{*}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我国区域真实能源利用率与减排路径研究”（项目号：71903195）部分研究成果。

2014 年的 46.3% 的这一现象，学界与政策界提出了“制造业空心化”的忧虑（卓贤，2016；魏后凯、王颂吉，2019）。然而本文认为，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是相互依赖、互为投入产出的关系，割裂地看服务业占比不利于认识和把握经济发展的全貌。本文聚焦于中国服务业的扩张，旨在回答如下两个问题：第一，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由 2000 年的 38.8% 迅速增长至 2014 年的 46.3%，该占比增加的原因是什么？各驱动因素的贡献如何？第二，中国近期涌现出不少产业融合的案例，那么近年来中国经济整体产业融合的态势如何，与其他国家相比，又处于哪一阶段？

本文将基于增加值视角进行分析，这一视角对解释 21 世纪以来中国服务业的增长尤为重要。21 世纪以来，交通运输成本和协调成本的降低，使得生产链更加易于分割，体现为最终品中服务业的贡献越来越大（Baldwin，2016），例如 Heuser 和 Matto（2017）发现约有 3/4 的服务业增加值贸易是隐含在其他产品中，而非服务业直接贸易。增加值视角相对于传统产出视角的优势在于，其可以衡量最终品中增加值的来源（来自于哪国和哪些行业）以及各国各行业增加值的去向。考察行业增加值的去向和最终品增加值的来源分别对应生产者（或向下游的）核算角度和消费者（或向上游的）核算角度，可以帮助我们分别回答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为什么升高以及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问题。

本文运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Dietzenbacher 等，2013；Timmer 等，2015）进行测算分析，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服务业与制造业是相互依赖的关系，不应割裂地对服务业占比变化进行分析或者以此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与此同时，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中同样蕴含着服务业的增加值贡献，因此降低对服务贸易的限制并扩大本国服务业的对外开放程度，有利于本国获得大幅依赖服务业的制造业行业的比较优势，并扩大其在全球价值链的份额。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提出

经济全球化有效提升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市场的参与程度，从而大大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服务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早在 19 世纪 20 年代，交通运输成本的降低，使得各国不再仅限于消费本国生产的货物，而是可以消费到远距离之外其他国家生产的产品，被 O’Rourke 和 Williamson（2002）称为全球化的“第一次拆分”（first unbundling）。而 21 世纪以来，信息通信技术（ICT）变革使得沟通协调成本不断降低，促进了生产链在国家间进一步分割，此时的产业链不再由单一国家完成，而是由多个国家协作完成，各个国家在产业链上从事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某个或者几个工序，这一现象被 Baldwin（2006）称为全球化的“第二次拆分”（second unbundling）。全球化的这些发展，催生了“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这一概念的诞生。全球价值链涵盖了产品从研发到最终到达消费者手中的一系列生产活动，通常包含设计、生产、营销、分配和售后等多个阶段（Gereffi 和 Fernandes - Stark，2011），尽管最终品由一个国家组装和出口，但其中同样隐含着多个其他国家的增加值贡献。

可以看出，全球化的第二次拆分不仅仅反映出制造行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同时也反映出服务业的发展演化。ICT 的发展使得制造业复杂的生产工序以低成本跨国协调成为可能；尤其近几十年的通信服务、运输服务以及金融服务的发展促进了全球生产链分割至世界各地，而服务业则像“粘合剂”一样将生产链的不同阶段粘合在一起。因此，服务业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Pandit 和 Casette，1989；Herrendorf 等，2014；夏杰长等，2007；程大中，2008；高传胜等，2008；李勇坚和夏杰长，2009；刘志彪，2011）。

然而，服务业这一作用并未在现实中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究其原因主要是现行的贸易核算原则

导致的。当前通行的贸易核算是以进出国家边界的贸易总额为原则进行核算，该核算方法在全球价值链的背景下存在两个缺点。第一，一个最终品可能用到无数个由不同国家生产的中间零部件，这些中间品的每一次跨境，都被计一次进口和出口，最终使得一个最终品的价值被重复计算，而无法分清各个国家真正贡献的价值；第二，正如上文所分析，制造品中隐含着服务业的贡献，仅从官方统计的服务业数据分析，将大大低估服务业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

而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正可以克服上述问题。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增加值贸易核算原则一方面能够解决中间品多次跨境被重复计算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将服务业增加值从制造业最终品中分解出来（Hummels 等，2001；Chen 等，2012；Los 等，2015；倪红福等，2018；Duan 和 Yan, 2021）。具体而言，增加值贸易是指由本国创造的而隐含在其他国家最终品中的增加值，因此即使两个国家或者部门没有直接的贸易往来，也有可能通过第三个国家或者部门而存在增加值贸易。由此可见，与传统的无法区分增加值来源的最终品核算原则不同，增加值贸易方法可将制造业最终品中来自服务业、制造业以及其他行业的增加值贡献区分开来。

综上所述，服务业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结合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不断上升的现象，提出本文的第一个研究问题，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上升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其增加值扩张主要是用于自身的扩张还是其他行业？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是否呈现一定的特点？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们将依据增加值贸易的核算方法，对各个国家的服务业增加值向下游追溯，考察服务业增加值的最终去向，得到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跨期变化的驱动原因。接下来，本文聚焦于制造业与服务业产业融合的话题，提出本文的第二个研究问题：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产业融合态势如何，与其他国家相比，处于哪一阶段？基于增加值贸易的思想，我们可以将一国单位制造业最终品的增加值来源向上游追溯，考察其价值的来源地区和行业，得到服务业与制造业产业融合程度及其跨期变动情况。由于中国等一些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腾飞是在全球化的“第二次拆分”时期，因此我们推断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在 21 世纪以来的服务业扩张有很大部分是用于其他行业的最终品中，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服务业扩张呈现明显不同。

二、研究方法 with 数据

表 1 是一个简化的世界投入产出示意表，其包含 n 个国家或地区，每个国家有 m 个行业。其中，行向表示对应行业产出的使用去向，包括中间投入使用（Z 区域）和最终使用（F 区域）；列向表示对应行业生产过程中的中间品投入（Z 区域）及初始投入（v 区域）关系。文章用上角标和下角标分别表示国家和行业，例如 Z^{rs} 是一个 $m \times m$ 矩阵，其任一元素 z_{ij}^{rs} 表示从 r 国 i 行业流向 s 国 j 行业的中间投入，其中 $i, j = 1, 2, \dots, m$ 。 f^s 是一个 $m \times 1$ 矩阵，其任一元素 f_i^s 表示 s 国对 r 国 i 行业产品最终需求。 v^r 是一个含 m 个元素的列向量，其元素 v_i^r 表示 r 国 i 行业的增加值。 x^r 是一个包含 m 个元素的列向量，其元素 x_i^r 表示 r 国 i 行业的产出。

若我们用 f^r 表示 r 国家的 $m \times 1$ 的最终品向量，不区分该产品的目的地（即是否用于本国消费还是出口到哪个国家），即 $f^r = \sum_s f^s$ ，那么表 1 的投入产出关系可以表达为如下模型：

$$\begin{bmatrix} Z^{11} & \cdots & Z^{1n} \\ \vdots & \ddots & \vdots \\ Z^{n1} & \cdots & Z^{nn} \end{bmatrix} \mathbf{1} + \begin{bmatrix} f^1 \\ \vdots \\ f^n \end{bmatrix} = \begin{bmatrix} x^1 \\ \vdots \\ x^n \end{bmatrix} \tag{1}$$

其中 $\mathbf{1}$ 表示相应维度的，元素均为 1 的求和列向量。

表 1 一个简化的 n 国 m 行业世界投入产出表

	中间使用 (每个国家 m 列)			最终使用 (每个国家 h 列)			总产出
	1		n	1		n	
国家 1, m 个行业	Z^{11}		Z^{1n}	f^{11}		f^{1n}	x^1
.....	$\vdots$	$\ddots$	$\vdots$	$\vdots$	$\ddots$	$\vdots$	$\vdots$
国家 n , m 个行业	Z^{n1}		Z^{nn}	f^{n1}		f^{nn}	x^n
增加值	$(v^1)'$		$(v^n)'$				
总产出	$(x^1)'$		$(x^n)'$				

定义投入系数矩阵为 $A = \begin{bmatrix} A^{11} & \cdots & A^{1n} \\ \vdots & \ddots & \vdots \\ A^{n1} & \cdots & A^{nn} \end{bmatrix}$, 其中 A^{rs} 为 r 国向 s 国的投入系数。 A^{rs} 可由如下公式

计算得到 $A^{rs} = Z^{rs}(\hat{x}_s)^{-1}$ 。那么求解公式 (1) 可以得到

$$\begin{bmatrix} x^1 \\ \vdots \\ x^n \end{bmatrix} = \left(\begin{bmatrix} I & \cdots & 0 \\ \vdots & \ddots & \vdots \\ 0 & \cdots & I \end{bmatrix} - \begin{bmatrix} A^{11} & \cdots & A^{1n} \\ \vdots & \ddots & \vdots \\ A^{n1} & \cdots & A^{nn} \end{bmatrix} \right)^{-1} \begin{bmatrix} f^1 \\ \vdots \\ f^n \end{bmatrix} \tag{2}$$

用大矩阵形式可将公式 (2) 表示为 $x = (I - A)^{-1}f = Lf$, 其中 $L = (I - A)^{-1}$ 为列昂惕夫逆矩阵。其分块形式可表示为

$$L = \begin{bmatrix} L^{11} & \cdots & L^{1n} \\ \vdots & \ddots & \vdots \\ L^{n1} & \cdots & L^{nn} \end{bmatrix} \tag{3}$$

令 $\vartheta_j^r = v_j^r/x_j^r$ 为增加值系数向量, 则最终需求矩阵引致的各行业增加值可以根据 $v = (\hat{\vartheta})(I - A)^{-1}f = \hat{\vartheta}Lf$ 求解得到。当我们进一步将 f 矩阵对角化, 便得到国家行业层面的最终品生产所导致的国家行业层面的增加值创造:

$$\begin{bmatrix} B^{11} & \cdots & B^{1n} \\ \vdots & \ddots & \vdots \\ B^{n1} & \cdots & B^{nn} \end{bmatrix} = \begin{bmatrix} \hat{\vartheta}^1 & \cdots & 0 \\ \vdots & \ddots & \vdots \\ 0 & \cdots & \hat{\vartheta}^n \end{bmatrix} \begin{bmatrix} L^{11} & \cdots & L^{1n} \\ \vdots & \ddots & \vdots \\ L^{n1} & \cdots & L^{nn} \end{bmatrix} \begin{bmatrix} \hat{f}^1 & \cdots & 0 \\ \vdots & \ddots & \vdots \\ 0 & \cdots & \hat{f}^n \end{bmatrix} \tag{4}$$

B^{rs} 的任一元素 $b_{ij}^{rs} = \vartheta_i^r l_{ij}^{rs} f_j^s$ 表示 s 国 j 行业的最终产品生产所需要的 r 国 i 行业的增加值含量, 可以看出行向矩阵块所有元素的和等于对应国家的 GDP。也就是说, 为满足世界所有最终品生产, r 国所创造的增加值总量可以按照使用去向, 表示为对不同国家和行业最终品贡献的增加值之和, 即:

$$b^r = 1' \left(\sum_{s=1}^n B^{rs} \right) 1 = \sum_{s=1}^n \sum_{i=1}^m \sum_{j=1}^m b_{ij}^{rs} = \sum_{s=1}^n \sum_{i=1}^m \sum_{j=1}^m \vartheta_i^r l_{ij}^{rs} f_j^s \tag{5}$$

(一) 生产者视角的服务业扩张

我们有 $b^r = GDP^r$ 。进一步地, 从生产者角度 (或者向下游角度), 我们可以对 r 国 GDP 按照不同行业以及国内国外最终品进行拆分, 来回答“ r 国增加值去哪里”的问题。例如, r 国服务业行业所创造的用于本国制造业最终品的增加值可以通过将 B^{rr} 中行向服务业与列向制造业所对应的元素相加得到, 我们将该指标定义为 $VAP_{ser \rightarrow manuf}^{rr}$:

$$VAP_{ser \rightarrow manuf}^{rr} = \sum_{i \in ser} \sum_{j \in manuf} b_{ij}^{rr} = \sum_{i \in ser} \sum_{j \in manuf} \vartheta_i^r l_{ij}^{rr} f_j^r \tag{6}$$

类似地, r 国服务业行业所创造的用于本国最终服务的增加值可表示为 $VAP_{ser \rightarrow ser}^{rr} = \sum_{i \in ser} \sum_{j \in ser} b_{ij}^{rr} = \sum_{i \in ser} \sum_{j \in ser} \theta_i^{rr} l_{ij}^{rr} f_j^r$, 以及 r 国服务业行业所创造的用于本国其他行业^①最终品的增加值: $VAP_{ser \rightarrow other}^{rr} = \sum_{i \in ser} \sum_{j \in other} b_{ij}^{rr} = \sum_{i \in ser} \sum_{j \in other} \theta_i^{rr} l_{ij}^{rr} f_j^r$ 。同理, r 国服务业行业所创造的用于国外制造业最终品的增加值, 可以通过将所有最终品生产国家 s 的 B^{rs} 中行向服务业与列向制造业所对应的元素相加得到, 我们将该指标定义为 $VAP_{ser \rightarrow manif}^{rw}$:

$$VAP_{ser \rightarrow manif}^{rw} = \sum_{s \neq r} \sum_{i \in ser} \sum_{j \in manif} b_{ij}^{rs} = \sum_{s \neq r} \sum_{i \in ser} \sum_{j \in manif} \theta_i^{rs} l_{ij}^{rs} f_j^s \quad (7)$$

类似地, r 国服务业行业所创造的用于国外最终服务的增加值可表示为 $VAP_{ser \rightarrow ser}^{rw} = \sum_{s \neq r} \sum_{i \in ser} \sum_{j \in ser} b_{ij}^{rs} = \sum_{s \neq r} \sum_{i \in ser} \sum_{j \in ser} \theta_i^{rs} l_{ij}^{rs} f_j^s$, 以及 r 国服务业行业所创造的用于国外其他行业最终品的增加值: $VAP_{ser \rightarrow other}^{rw} = \sum_{s \neq r} \sum_{i \in ser} \sum_{j \in other} b_{ij}^{rs} = \sum_{s \neq r} \sum_{i \in ser} \sum_{j \in other} \theta_i^{rs} l_{ij}^{rs} f_j^s$ 。

为使得结果便于跨国跨期比较, 我们用 $VAP_{ser \rightarrow manif}^{rr}$ 除以 r 国 GDP 得到一个标准化的比率 PVA , 例如 $PVA_{ser \rightarrow manif}^{rr} = VAP_{ser \rightarrow manif}^{rr} / GDP^r$, 表示隐含在本国制造业产品中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本国 GDP 的比重。由于 r 国服务业增加值可表示为其使用去向的和, 即 r 国服务业增加值可表示为上述定义的六个指标之和: $VAP_{ser}^r = VAP_{ser \rightarrow manif}^{rr} + VAP_{ser \rightarrow ser}^{rr} + VAP_{ser \rightarrow other}^{rr} + VAP_{ser \rightarrow manif}^{rw} + VAP_{ser \rightarrow ser}^{rw} + VAP_{ser \rightarrow other}^{rw}$, 因此, 我们将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按照使用去向, 分解为六项因素:

$$\frac{VAP_{ser}^r}{GDP^r} = PVA_{ser}^r = PVA_{ser \rightarrow manif}^{rr} + PVA_{ser \rightarrow ser}^{rr} + PVA_{ser \rightarrow other}^{rr} + PVA_{ser \rightarrow manif}^{rw} + PVA_{ser \rightarrow ser}^{rw} + PVA_{ser \rightarrow other}^{rw} \quad (8)$$

通过对六项因素跨期变化的分析, 可以考察一国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变化的驱动因素。

(二) 消费者视角的产业融合

与此同时, B 矩阵中列项所有元素的和等于对应国家最终品的和。也就是说, s 国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可以按照增加值来源, 表示为不同国家和行业贡献的增加值之和, 即

$$b^{\cdot s} = u' \left(\sum_{r=1}^n B^{rs} \right) u = \sum_{r=1}^n \sum_{i=1}^m \sum_{j=1}^m b_{ij}^{rs} = \sum_{r=1}^n \sum_{i=1}^m \sum_{j=1}^m \theta_i^{rs} l_{ij}^{rs} f_j^s \quad (9)$$

我们有 $b^{\cdot s} = \sum_j f_j^s$ 。进一步地, 从消费者角度 (或者向上游角度), 我们可以对 s 国最终产品按照不同增加值来源进行分解, 来回答 “ s 国最终产品的增加值来自哪里” 的问题。例如, s 国制造业最终品中由本国服务业贡献的增加值可以通过将 B^{ss} 中行向服务业与列向制造业所对应的元素相加得到, 我们将该指标定义为 $VAC_{ser \rightarrow manif}^{ss}$:

$$VAC_{ser \rightarrow manif}^{ss} = \sum_{i \in ser} \sum_{j \in manif} b_{ij}^{ss} = \sum_{i \in ser} \sum_{j \in manif} \theta_i^{ss} l_{ij}^{ss} f_j^s \quad (10)$$

类似地, s 国制造业最终品中由本国制造业贡献的增加值可表示为 $VAC_{manif \rightarrow manif}^{ss} = \sum_{i \in manif} \sum_{j \in manif} b_{ij}^{ss} = \sum_{i \in manif} \sum_{j \in manif} \theta_i^{ss} l_{ij}^{ss} f_j^s$, 以及 s 国制造业最终品中由本国其他行业贡献的增加值: $VAC_{other \rightarrow manif}^{ss} = \sum_{i \in other} \sum_{j \in manif} b_{ij}^{ss} = \sum_{i \in other} \sum_{j \in manif} \theta_i^{ss} l_{ij}^{ss} f_j^s$ 。同理, s 国制造业最终品中由国外服务业贡献的增加值, 可以通过将所有增加值来源国家 r 的 B^{rs} 中行向服务业与列向制造业所对应的元素相加得到, 我们将该指标定义为 $VAC_{ser \rightarrow manif}^{ws}$:

$$VAC_{ser \rightarrow manif}^{ws} = \sum_{r \neq s} \sum_{i \in ser} \sum_{j \in manif} b_{ij}^{rs} = \sum_{r \neq s} \sum_{i \in ser} \sum_{j \in manif} \theta_i^{rs} l_{ij}^{rs} f_j^s \quad (11)$$

类似地, 我们可以表示出 s 国制造业最终品中由国外制造业以及其他行业贡献的增加值 $VAC_{manif \rightarrow manif}^{ws}$ 和 $VAC_{other \rightarrow manif}^{ws}$ 。为使得结果便于跨国跨期比较, 我们用 $VAC_{ser \rightarrow manif}^{ss}$ 除以 s 国制造业最终品总和得到一个标准化的比率 CVA , 例如 $CVA_{ser \rightarrow manif}^{ss} = VAC_{ser \rightarrow manif}^{ss} / \sum_{j \in manif} f_j^s$, 表示单位本国制造业产品中本国服务业

①其他行业包括农林牧渔业、煤炭采选业、电热力供应业、水处理及供应业、废物处理及管理 and 建筑业。

增加值的含量。由于 s 国制造业最终品总和可表示为其增加值来源的和，即 s 国制造业最终品可表示为上述定义的六个指标之和： $VAC_{manuf}^{s} = VAC_{ser \rightarrow manuf}^{ss} + VAC_{manuf \rightarrow manuf}^{ss} + VAC_{other \rightarrow manuf}^{ss} + VAC_{ser \rightarrow manuf}^{ws} + VAC_{manuf \rightarrow manuf}^{ws} + VAC_{other \rightarrow manuf}^{ws}$ ，因此，我们将单位制造业最终品增加值来源，分解为六项因素：

$$\frac{VAC_{manuf}^{s}}{\sum_{j \in manuf} f_j^s} = CVA_{manuf}^{s} = CVA_{ser \rightarrow manuf}^{ss} + CVA_{manuf \rightarrow manuf}^{ss} + CVA_{other \rightarrow manuf}^{ss} + CVA_{ser \rightarrow manuf}^{ws} + CVA_{manuf \rightarrow manuf}^{ws} + CVA_{other \rightarrow manuf}^{ws} \quad (12)$$

通过对一国制造业最终品增加值分解，可以考察产业融合的发展态势。

（三）服务业扩张与产业融合的结构分解

根据 Muradov (2016) 对列昂惕夫逆矩阵的分解，可以对本国生产最终品隐含的本国服务业增加值 (VAP^r) 或者单位本国制造业最终品隐含的本国服务业增加值 ($VAC_{ser \rightarrow manuf}^{ss}$) 等进行结构分解。

由于 $L = (I - A)^{-1}$ 和 $A = \hat{A} + \check{A}$,^① L 可以分解为：

$$L = (I - \hat{A} - \check{A})^{-1} = [I - \hat{A} - \check{A} (I - \hat{A})^{-1} (I - \hat{A})]^{-1} = (I - \hat{A})^{-1} (I - \check{A} (I - \hat{A})^{-1})^{-1}$$

记 $H = [I - \check{A} (I - \hat{A})^{-1}]^{-1}$, $K = (I - \hat{A})^{-1}$ ，且 K 一般称为局部逆矩阵，则上式变为： $L = KH$ 。显然可以得到： $L = KH = I + (K - I) + (H - I) + (K - I)(H - I)$ 。本文借鉴这一方法，^② 以本国生产最终品隐含的本国服务业增加值 (VAP^r) 为例，对产业融合的结构分解模型进行说明。

$$VAP^r = u_{ser}^{(r)} \hat{\Theta} (I - A)^{-1} f^{(r)} = u_{ser}^{(r)} \hat{\Theta} If^{(r)} + u_{ser}^{(r)} \hat{\Theta} (K - I) f^{(r)} + u_{ser}^{(r)} \hat{\Theta} (H - I) f^{(r)} + u_{ser}^{(r)} \hat{\Theta} (K - I)(H - I) f^{(r)} \quad (13)$$

以下讨论 (13) 式中四项分解项的经济含义：

1. $u_{ser}^{(r)} \hat{\Theta} If^{(r)}$ ，单位最终产品中的直接服务业增加值。最终产品最后生产阶段直接隐含的服务业增加值。服务业增加值直接传递到本国最终品，没有经历中间品生产阶段，没有跨境传递。我们将这部分定义为服务业增加值与其他行业的直接融合部分。

2. $u_{ser}^{(r)} \hat{\Theta} (K - I) f^{(r)}$ ，单位最终产品在国内生产过程中间接隐含的服务业增加值。本国的服务业增加值仅通过国内生产者的中间品传递到最终产品。在该传递过程中，仅经历国内中间品生产阶段，且至少传递一次中间品阶段，无跨境传递阶段。 $\hat{A}$ 是对角分块矩阵，只有同一国家的产品部门之间有中间投入联系，故 $\hat{A}$ 仅反映国内投入产出联系，即国内中间品生产阶段。我们将这部分定义为服务业增加值与其他行业仅通过国内生产链融合的部分。

3. $u_{ser}^{(r)} \hat{\Theta} (H - I) f^{(r)}$ ，最终品生产过程中从国外进口中间品，而这些进口的中间品隐含国内服务业增加值。服务业增加值传递过程中，需至少经历一次中间品生产阶段和一次跨境生产阶段。 $\check{A}$ 的对角块矩阵为 0，仅存在一国与另一国的中间投入产出联系，即跨境的国外生产阶段。我们将这部分定义为服务业增加值与其他行业通过简单全球价值链融合的部分。

4. $u_{ser}^{(r)} \hat{\Theta} (K - I)(H - I) f^{(r)}$ ，隐含国内服务业增加值的本国生产的中间品，出口到贸易伙伴国（直接或间接贸易伙伴国），贸易伙伴国用来生产最终品。这些服务业增加值传递到最终需求者，至少经历两次中间生产阶段和一次跨境生产阶段。本文将这部分定义为服务业增加值与其他行业通过复杂全球价值链融合的部分。

①这里本文做一规定， $\hat{\cdot}$ 表示取矩阵的对角的分块小矩阵， $\check{\cdot}$ 表示取矩阵非对角的分块小矩阵，且一般是按国家（地区）来划分。本文后续阐述中，除特别说明外，对于矩阵进行 $\hat{\cdot}$ 运算一般表示取分块对角矩阵，对于矩阵进行 $\check{\cdot}$ 运算一般表示取分块非对角矩阵。

②Muradov (2016) 在测算不同种类生产长度时，也应用这一分解方法。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扩张因素探究与国际比较

表 2 展示了世界前八大经济体（按照 2014 年各国 GDP 水平排序选取）的 PVA 的水平、构成及其跨期变化。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由 2000 年的 38.8% 上升至 2014 年的 45.9%，上升了 7.1 个百分点，在前八大经济体中上升幅度是最大的。服务业增加值可进一步拆分到不同生产地的最终品中。由表 2 可以看出，中国服务业增加值主要用于本国最终服务中，这部分占 GDP 比重由

表 2 2000 年和 2014 年世界前八大经济体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跨期变化及其去向解构

	本国			外国				
	制造业	服务业	其他行业	制造业	服务业	其他行业	增加值/GDP	最终品/GDP
巴西								
2000	7.2%	53.7%	2.2%	0.9%	0.9%	0.4%	65.3%	60.2%
2014	7.1%	55.5%	2.5%	1.0%	1.1%	0.6%	67.9%	61.6%
变化	0.0%	1.7%	0.3%	0.1%	0.2%	0.2%	2.5%	1.3%
中国								
2000	5.6%	25.1%	5.2%	1.1%	1.2%	0.6%	38.8%	37.0%
2014	7.2%	28.0%	7.0%	1.3%	1.5%	0.9%	45.9%	36.8%
变化	1.6%	2.9%	1.8%	0.2%	0.3%	0.3%	7.1%	-0.2%
德国								
2000	6.6%	52.8%	2.7%	2.3%	2.4%	1.0%	67.8%	59.0%
2014	5.9%	52.0%	2.2%	2.9%	3.9%	1.7%	68.5%	59.1%
变化	-0.7%	-0.8%	-0.5%	0.6%	1.5%	0.6%	0.7%	0.1%
法国								
2000	5.2%	59.1%	3.0%	2.6%	2.5%	1.1%	73.5%	66.2%
2014	3.3%	64.6%	2.9%	2.5%	3.6%	1.4%	78.3%	73.2%
变化	-1.9%	5.5%	-0.1%	-0.1%	1.1%	0.3%	4.8%	7.0%
英国								
2000	3.8%	58.3%	2.4%	2.1%	3.4%	1.0%	71.1%	68.8%
2014	1.8%	65.0%	2.1%	2.3%	5.3%	1.6%	78.0%	77.6%
变化	-2.0%	6.7%	-0.4%	0.2%	1.9%	0.6%	6.9%	8.8%
印度								
2000	6.7%	37.7%	3.6%	1.1%	1.5%	0.7%	51.3%	43.4%
2014	8.5%	41.3%	4.3%	1.1%	1.7%	0.9%	57.9%	46.6%
变化	1.8%	3.5%	0.7%	0.1%	0.3%	0.2%	6.6%	3.2%
日本								
2000	4.8%	55.6%	4.0%	0.9%	0.8%	0.5%	66.7%	63.5%
2014	3.4%	60.7%	3.3%	1.2%	1.2%	0.8%	70.7%	70.8%
变化	-1.4%	5.1%	-0.8%	0.3%	0.4%	0.3%	4.0%	7.4%
美国								
2000	4.0%	67.2%	2.4%	0.9%	1.1%	0.4%	76.1%	75.0%
2014	3.4%	69.7%	1.6%	1.0%	1.7%	0.7%	78.0%	78.4%
变化	-0.6%	2.5%	-0.8%	0.1%	0.6%	0.2%	2.0%	3.4%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2016 年版世界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到，选取了 2014 年 GDP 前八大经济体的结果展示。
注：首年（2000 年）和末年（2014 年）行对应的结果（第 2~7 列）为各个国家服务业增加值最终去向占该国 GDP 的比值，变化行表示末年与首年比值变化。增加值/GDP 比重列即前六列数值加总。

2000 年的 25.1% 上升至 2014 年的 28.0%，上升了 2.9 个百分点。而中国服务业增加值用于本国非服务业最终产品部分占 GDP 比重增长最多，达到 3.4 个百分点，其中用于本国制造业最终品部分占 GDP 比重上升 1.6 个百分点，用于其他行业最终品部分占 GDP 比重上升 1.8 个百分点。而具体到服务业细分行业，^① 服务业增加值到本国制造业最终品部分占 GDP 比重所增长的 1.6 个百分点中，81% 是由于金融服务业（+0.5%）、批发业（+0.5%）以及法律与会计服务业（+0.3%）的扩张；而服务业增加值到本国其他行业最终品部分占 GDP 比重所增长的 1.8 个百分点中，94% 是由于金融服务业（+0.8%）、其他科学与技术活动（+0.5%）、房地产业（+0.2%）和法律与会计服务业（+0.2%）。中国服务业增加值用于国外最终品部分占 GDP 比重同样均有所上升（尽管数值较小），其中对非服务业最终品占比增加 0.5%，对最终服务占比增加 0.3%。

回答第一个问题：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增加的驱动因素是什么？综上所述，中国服务业增加值的扩张绝大部分是由于本国非服务业拉动的，同时服务业增加值对其他行业上涨的贡献反映了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体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表 2 最后一列给出了最终服务占 GDP 的比重，与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相比，最后一列的数值都有所下降（而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和制造业最终品占 GDP 比重呈现相反的规律）。这再次表明服务业隐含在其他行业的增加值部分，要超过直接最终消费服务。

在前八大经济体中，发达经济体的服务业增加值用于本国制造业最终品部分占 GDP 比重均有所下降，其中德国、法国和英国由于在欧盟的优势，其服务业增加值用于国外最终品占 GDP 比重增长较其他国家更大。这些发达经济体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上升主要是由本国最终服务拉动的。印度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同中国类似，呈现了较大的增长，然而仔细观察其扩张的驱动因素，同中国呈现明显不同，反而与发达经济体类似，其扩张主要是由本国最终服务拉动的。

（二）制造业与服务业产业融合分析与国际比较

表 3 展示了前八大经济体制造业最终品增加值 CVA 的水平、构成及其跨期变化。结果表明，中国单位制造业最终品中，由本国制造业贡献的增加值份额占到 50% 左右，并且该份额在 2000 年到 2014 年呈现下降趋势，共下降了 5.8 个百分点；与此相反，中国单位制造业最终品由本国服务业和其他行业贡献的增加值占比明显上升，其中服务业贡献的增加值占比由 2000 年的 16.7% 增长至 2014 年的 21.9%，增长了 5.2 个百分点，在八大国家中的增幅是最大的。表明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产业融合呈现上升态势。具体到细分服务业^②当中，单位制造业最终品由本国服务业贡献的增加值占比增长部分，主要体现在金融服务业（+1.6%）、批发业（+1.4%）、法律与会计服务业（+0.9%）以及仓储及交通运输业（+0.6%）。总体而言，中国制造业价值链由本国贡献增加值占比呈现上升趋势，体现了中国制造业价值链由外国贡献部分越来越多地转为由本国贡献，以及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这与 Kee 和 Tang（2016）的发现一致。

中国单位制造业最终品由外国其他行业贡献的增加值占比同样有所提升（+1.7%），但其提升幅度不及外国制造业和服务业贡献的增加值占比的下降幅度（-2.8%）。因此，总体来看，外国贡献增加值占比在 2000 年到 2014 年呈现下降趋势，这一特点与其他经济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他七大经济体单位制造业最终品由外国贡献的增加值占比，在 2000 年到 2014 年均呈现上升的态势，平均增幅达到 6.6 个百分点；其中，日本占比上升幅度最大，达到 13.0%，其次是英国（8.1%），体现了世界主要经济体将产业外包的特点与趋势。

①详细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②详细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回答第二个问题：近年来中国经济整体产业融合的态势如何，与其他国家相比，又处于哪一阶段？可以通过观察单位制造业最终品由本国服务业所贡献的增加值占比及其变化，得到答案。从产业融合的变动趋势来看，如上文所述，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在 2000 年到 2014 年呈现不断融合的态势，单位制造业最终品由本国服务业贡献的增加值占比的上升幅度居前八大经济体之首。从产业融合的水平来看，2014 年中国单位制造业最终品由本国服务业贡献的增加值占比为 21.9%，意味着对于某一单位制造业最终品，超过 1/5 的增加值是由本国服务业贡献的。这一产业融合水平已经超过了英国、日本、德国和法国。

表 3 2000 年和 2014 年世界前八大经济体单位制造业最终品的增加值来源解构及其跨期变化

单位：%

		巴西			中国			德国			法国		
		2000	2014	变化	2000	2014	变化	2000	2014	变化	2000	2014	变化
本国	制造业	46.40	40.90	-5.50	51.70	45.80	-5.80	49.30	45.40	-3.90	42.50	39.60	-3.00
	服务业	26.50	29.40	2.90	16.70	21.90	5.20	23.40	21.30	-2.10	24.20	21.80	-2.40
	其他行业	13.60	12.50	-1.10	16.10	17.80	1.70	3.70	3.30	-0.40	6.20	5.90	-0.20
外国	制造业	5.70	6.60	0.90	7.70	5.30	-2.30	10.30	11.30	0.90	12.90	12.80	-0.20
	服务业	4.90	6.00	1.10	5.10	4.60	-0.50	9.20	12.60	3.40	9.10	12.90	3.80
	其他行业	3.00	4.60	1.60	2.80	4.50	1.70	4.00	6.10	2.10	5.10	7.00	1.90
	加总	100	100	0	100	100	0	100	100	0	100	100	0
		英国			印度			日本			美国		
		2000	2014	变化	2000	2014	变化	2000	2014	变化	2000	2014	变化
本国	制造业	51.40	47.20	-4.20	39.40	35.20	-4.20	60.40	53.50	-6.90	55.60	49.10	-6.50
	服务业	22.20	17.70	-4.40	22.60	27.50	4.90	24.00	19.30	-4.60	25.20	24.10	-1.10
	其他行业	5.90	6.40	0.50	20.80	15.10	-5.80	6.30	4.90	-1.40	6.60	9.90	3.40
外国	制造业	9.40	11.40	2.00	5.70	6.00	0.30	3.30	6.40	3.10	5.60	6.20	0.60
	服务业	7.80	10.80	3.00	5.90	6.20	0.30	3.20	6.60	3.40	4.10	5.30	1.20
	其他行业	3.30	6.50	3.10	5.50	10.00	4.50	2.80	9.20	6.40	2.80	5.30	2.40
	加总	100	100	0	100	100	0	100	100	0	100	100	0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2016 年版世界投入产出表计算而得，选取 2014 年 GDP 前八大经济体的结果展示。

注：首年（2000 年）和末年（2014 年）列对应的结果为各个国家单位制造业最终品中增加值来源构成，变化列表示末年与首年比值变化。

（三）细分制造业的产业融合分析

1. 总体情况

图 1 展示了 2014 年 19 个细分制造业的增加值来源构成。结果显示，石油加工及炼焦业、金属冶炼与压延业价值链中有较大部分是由其他行业增加值所贡献，主要是由于这两个行业较高的采掘业中间投入导致的；而除石油加工及炼焦业、金属冶炼与压延业外，其他细分制造业价值链均主要由制造业增加值贡献，且占比超过了 40%。从制造业与服务业产业融合的角度来看，除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外，其他细分制造业的价值链中由服务业贡献的增加值占比均在 30% 左右，其中机动车辆制造业最为突出，其价值链中由服务业贡献的增加值占比最高，达到了 33.5%；特别地，对于计算机、电子和光学制品业，电气设备制造业，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机动车辆制造业以及其他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这类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其价值链总体呈现制造业贡献的增加值占比较高而其他行业贡献的增加值占比明显较小的特性。鉴于机动车辆制造业有最高的服务业融合度以及产业链全球化程度，本文接下来对机

动车辆制造业进行更细致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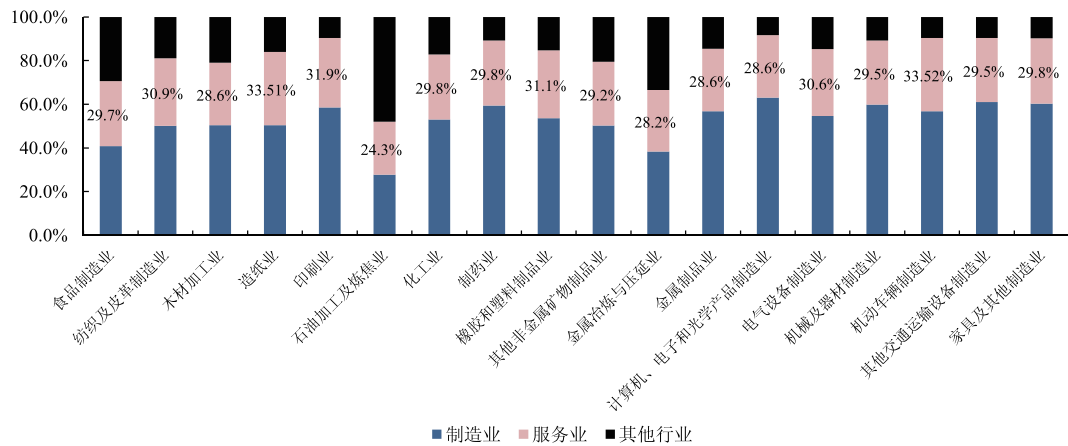


图 1 2014 年各细分制造业的增加值来源构成

数据来源：作者以各国各行业最终品在全球该行业最终品的比重为权重，加权计算而得。

2. 特定行业的深入分析——机动车辆制造业

表 4 展示了全球前四大经济体所有机动车辆制造业最终品的增加值来源构成。中国贡献的增加值份额明显增加，由 2000 年的 2.4% 上升至 2014 年的 21.7%；其中，来自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份额增长了 10.9%，来自中国服务业增加值份额增长了 6.2%。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增加值贡献份额都有所下降。中国在机动车辆制造行业收入份额的增加，一方面是由于对中国制造的机动车辆产品需求扩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通过提供零部件等方式）在机动车辆产品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不断深入。此外，根据表 4 结果计算可得，中国服务业扩张速度快于制造业扩张速度，分别增加了 10.3 倍和 7.3 倍。

具体到服务业细分行业，^① 中国 6.2% 的服务业增加值份额扩张中，批发业（1.9%）、金融服务业（1.0%）、内陆运输业（0.6%）、法律与会计服务（0.5%）、零售业（0.4%）和房地产业（0.3%）贡献最大。

表 4 2000 年和 2014 年全球前四大经济体机动车辆制造业最终品的增加值来源构成及跨期变化

单位：%

	美国			中国			日本			德国			加总
	制造业	服务业	其他行业	制造业	服务业	其他行业	制造业	服务业	其他行业	制造业	服务业	其他行业	
2000	18.3	8.3	0.9	1.5	0.6	0.3	11.4	4.4	0.6	7.2	3.8	0.3	57.5
2014	8.4	5.8	0.6	12.4	6.8	2.5	4.9	2.0	0.2	7.3	3.4	0.3	54.5
变化	-9.9	-2.5	-0.3	10.9	6.2	2.2	-6.5	-2.4	-0.4	0.1	-0.4	0.0	-3.0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2016 年版世界投入产出表计算而得，选取 2014 年 GDP 前四大经济体的结果展示。

（四）服务业扩张和产业融合的结构分解

进一步对服务业扩张和产业融合情况进行结构分解，将各国服务业增加值与其他行业部门的融合

^①详细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分解为四个部分（公式 13），即直接融合部分、仅通过国内生产链融合部分、通过简单全球价值链融合部分和通过复杂的全球价值链融合部分，得到世界前八大经济体的服务业产业融合分解结果（见表 5）。分析可知，第一，服务业增加值与本国行业部门的融合，主要是通过直接融合和国内生产链融

表 5 2014 年世界前八大经济体服务业增加值产业融合的分解结果 单位：%

融合渠道分解		本国			外国			总体
		制造业	服务业	其他行业	制造业	服务业	其他行业	
巴西								
1	直接	0	78.26	0	—	—	—	63.96
2	国内生产链	99.90	21.73	99.91	—	—	—	31.98
3	简单 GVC	0.02	0.00	0.02	18.67	37.83	23.92	1.12
4	复杂 GVC	0.08	0.01	0.07	81.33	62.17	76.08	2.93
中国								
1	直接	0	70.92	0	—	—	—	43.35
2	国内生产链	98.69	28.95	99.19	—	—	—	48.30
3	简单 GVC	0.34	0.04	0.26	26.00	37.15	30.89	2.64
4	复杂 GVC	0.97	0.09	0.56	74.00	62.85	69.11	5.71
德国								
1	直接	0	74.81	0	—	—	—	56.78
2	国内生产链	97.08	25.06	98.54	—	—	—	30.55
3	简单 GVC	0.69	0.04	0.38	26.07	41.48	30.72	4.28
4	复杂 GVC	2.24	0.09	1.09	73.93	58.52	69.28	8.38
法国								
1	直接	0	76.81	0	—	—	—	63.34
2	国内生产链	98.58	23.11	99.01	—	—	—	26.94
3	简单 GVC	0.52	0.04	0.38	35.17	49.15	40.63	4.17
4	复杂 GVC	0.90	0.05	0.61	64.83	50.85	59.37	5.55
英国								
1	直接	0	72.93	0	—	—	—	60.79
2	国内生产链	98.56	26.94	99.20	—	—	—	27.29
3	简单 GVC	0.73	0.07	0.42	48.53	59.98	52.36	6.65
4	复杂 GVC	0.71	0.05	0.37	51.47	40.02	47.64	5.27
印度								
1	直接	0	88.91	0	—	—	—	63.45
2	国内生产链	99.79	11.07	99.84	—	—	—	30.02
3	简单 GVC	0.11	0.01	0.08	38.50	60.53	46.68	3.30
4	复杂 GVC	0.10	0.01	0.08	61.50	39.47	53.32	3.23
日本								
1	直接	0	78.92	0	—	—	—	67.80
2	国内生产链	99.40	21.05	99.66	—	—	—	27.48
3	简单 GVC	0.18	0.01	0.12	24.82	40.93	30.91	1.52
4	复杂 GVC	0.42	0.02	0.21	75.18	59.07	69.09	3.19
美国								
1	直接	0	70.82	0	—	—	—	63.23
2	国内生产链	98.34	29.05	98.99	—	—	—	32.30
3	简单 GVC	0.51	0.05	0.32	41.51	54.46	46.84	2.17
4	复杂 GVC	1.14	0.08	0.69	58.49	45.54	53.16	2.30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2016 年版世界投入产出表计算而得，选取 2014 年 GDP 前八大经济体的结果展示。

注：该表将各国服务业增加值与其所在列对应的行业部门的融合分解为四个渠道，表中各元素表示各国服务业增加值通过其所在行对应的渠道，与其所在列对应行业部分的融合，对总融合的贡献度。对每个国家而言，各列的四个渠道贡献度之和为 100%。

合，而与外国行业部门的融合则是通过全球价值链产生的。其中，服务业增加值与国内其他行业部门的融合主要是通过国内生产链实现，而服务业与本国服务业的融合则有 70% ~ 80% 通过直接融合实现，剩余部分通过国内生产链实现。第二，就服务业与外国的行业部门融合分解来看，除英国和美国外，复杂全球价值链的贡献要高于简单全球价值链的贡献，是融合的主渠道。第三，总体来看（表 6 最后一列），除中国外，直接融合渠道是各国服务业增加值与其他行业部门融合的主渠道，贡献率达 60% 左右，而中国服务业增加值与其他行业部门融合的主渠道则为国内生产链，贡献率接近 50%。由于欧洲国家相互贸易往来紧密，德国、英国和法国服务业增加值与其他行业融合的全球价值链渠道（简单全球价值链和复杂全球价值链渠道之和）的贡献较高，达到 10% 以上；中国由于其“世界工厂”的地位，服务业增加值与其他行业融合的全球价值链渠道同样贡献较高，超过 8%。

四、结 论

结合服务业占比不断上升的典型事实，本文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分析了服务业占比不断上升的拉动因素以及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态势，并进行了国际比较。结果发现：第一，中国 21 世纪以来的服务业扩张，有很大部分用于其他行业的生产中，这一特点与其他发达国家及地区呈现明显的不同。第二，中国单位制造业最终品中，本国服务业贡献的增加值占比不断上升，产业融合态势增强，结果体现了中国制造业价值链由外国贡献部分越来越多地转为由本国贡献，以及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第三，在所有细分制造业中，机动车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程度最高，同时该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中，由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贡献的增加值部分在 2000—2014 年明显提高，中国的“世界工厂”作用明显。第四，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分工细化，中国不断承接生产环节，使得中国服务业与世界其他行业部门的融合深度不断拓展。第五，融合分解结果表明，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服务业增加值与其他行业部门融合的主渠道为国内生产链，贡献率接近 50%；同时因“世界工厂”地位，中国服务业增加值与其他行业融合的全球价值链渠道同样贡献较高，超过 8%。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应注重从产业间相互关联的视角认识产业结构变化，避免仅从“服务业占比”或“制造业占比”等单维指标片面得出“制造业空心化”“服务业过度发展，挤占实体经济空间”的结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行业生产部门并非孤立增长，而是彼此之间形成了更加紧密和复杂的联系。“服务深化”是其中重要表现之一，即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制造业不同生产环节的“润滑剂”，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制造业部门中隐含的服务业增加值含量呈现上升态势。第二，应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和现代农业的融合发展实践，能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尽管中国制造业的服务业含量近年来明显上升，但其绝对数值仍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说明中国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仍有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较大空间。第三，应以数字经济赋能，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深度融合制度。根据中国经济服务业产业融合分解可知，通过国内生产链融合是推动中国服务业增加值与其他行业融合的主要渠道。其中，数字技术的应用对于提升各行业部门的关联与协作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数字经济的助力，要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参考文献：

1. 卓贤：《应高度重视服务业比重过快上升所隐含的问题》，《中国发展观察》，2016 年第 3 期。
2. 魏后凯、王颂吉：《中国“过度去工业化”现象剖析与理论反思》，《中国工业经济》，2019 年第 1 期。
3. 夏杰长、刘奕、顾乃华：《制造业的服务化和服务业的知识化》，《国外社会科学》，2007 年第 4 期。
4. 程大中：《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水平、结构及影响——基于投入—产出法的国际比较研究》，《经济研究》，2008 年第 1 期。
5. 高传胜、汪德华、李善同：《经济服务化的世界趋势与中国悖论：基于 wdi 数据的现代实证研究》，《财贸经济》，2008 年第 3 期。
6. 李勇坚、夏杰长：《我国经济服务化的演变与判断——基于相关国际经验的分析》，《财贸经济》，2009 年第 11 期。
7. 刘志彪：《论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经济增长》，《中国经济问题》，2011 年第 1 期。
8. 倪红福、龔六堂、陈湘杰：《全球价值链中的关税成本效应分析——兼论中美贸易摩擦的价格效应和福利效应》，《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 年第 8 期。
9. Baldwin, R. E. The Great Converg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New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10. Heuser, C. , & Mattoo, A. Services Trade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8126).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17.
11. Dietzenbacher, E. , Los, B. , Stehrer, R. , Timmer, M. P. , de Vries, G. J.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 Input – Output Tables in the WIOD Project. Economic Systems Research, Vol. 25, No. 1, 2013.
12. Timmer, M. P. , Dietzenbacher, E. , Los, B. , Stehrer, R. , de Vries, G. J. An Illustrated User Guide to the World Input – Output Database: the Case of Global Automotive Produc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23, No. 3, 2015.
13. O’ Rourke, K. H. , & Williamson, J. G. When did globalization begin?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 No. 1, 2002.
14. Baldwin, R. E. Globalisation: The Great Unbundling (s). Economic Council of Finland, 2006.
15. Gereffi, G. , Fernandez – Stark, K. Global Value Chain Analysis: A Primer. Duke University, Durham, North Carolina, USA, 2011.
16. Pandit, K. , Casetti E. The Shifting Pattern of Sectoral Labor Allocation During the Development: Developed Versu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79, 1989.
17. Herrendorf, B. , Rogerson R. , Valentinyi A. Growth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Volume 2B, 2014.
19. Hummels, D. , Ishii J. , Yi K. 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54, 2001.
19. Chen, X. , Cheng L. K. , Fung K. C. , Lau L. J. , Sung Y. W. , Zhu K. , et al. Domestic Value Added and Employment Generated by Chinese Exports: A Quantitative Estimation.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23, No. 4, 2012.
20. Los B. , Timmer M. P. , de Vries G. J. How Global Are Global Value Chains? A New Approach to Measure International Fragmentation.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Vol. 55, No. 1, 2015.
21. Duan, Y. , Yan B. Has Processing Trade Made China’s Exports Cleaner? A Regional Level Analysis. Energy Economics, Vol. 96, 105150, 2021.
22. Muradov, K. Structure and Length of Value Chains. SSRN Working Paper, 2016.
23. Kee, H. , Tang, H. Domestic Value Added in Exports: Theory and Firm Evidence from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6, No. 6, 2016.

责任编辑：李 蕊

全球产业链重构： 回岸、近岸与友岸的趋势特点分析^{*}

李元琨 苏庆义

摘要：本文旨在量化评估以“回岸”“近岸”和“友岸”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全球产业链重构发展进程和特点趋势。结果表明，近年来在全球贸易中，近岸、友岸和回岸外包现象开始加速凸显。分经济体来看，美国最早出现显著的回流，新冠疫情后出现显著的近岸和友岸外包趋势；欧洲回岸趋势尚不明显，但政策端在持续加码促进回流，各国均不同程度加强近岸外包，友岸外包则存在分化现象；日韩尚无显著变化。分行业来看，回岸外包里高技术制造业占比最高，近岸和友岸外包则以低技术制造业为主。总体而言，近年来，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产业链回岸、近岸和友岸外包加快发展的趋势较为显著。本文认为，中国可采取协同发展、数字化转型、安全化发展和有序跨境布局等措施，应对新一轮全球产业链重构。

关键词：产业链重构 回岸外包 近岸外包 友岸外包

作者简介：李元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苏庆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当前，全球产业链正在经历新一轮深度重构，本轮重构以回岸（Reshoring）、近岸（Nearshoring）和友岸（Friend-shoring 或 Ally-shoring）外包为主要特点。其中，回岸亦称回流，指企业将在其他国家开展的经济活动转移回母国，是反向的离岸外包（Wiesmann 等，2017）。本文将通过测度对外贸易依赖度来反映全球和各国的回岸情况。^① 近岸外包是指企业将部分业务流程或服务外包给地理位置相对较近的国家或地区的供应商。本文将通过衡量接壤国家之间贸易占总贸易的比例来评估全球及各国的近岸外包趋势。友岸外包是指将生产活动或供应链转移至地缘政治友好的国家，以减少对不稳定地区或对手国家的依赖。本文将采用 Bailey 等（2017）的方法，使用 2018—2023 年的联合国投票记录来定义各国的政治立场距离，并测度各国与盟友国家贸易额占总贸易额的比例。

本轮产业链重构是由新冠疫情冲击、地缘政治风险和应对国内空心化等因素共同推动的。首先，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美国产业链供应链全球布局调整的机制、趋势与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4&ZD056）、国家社科基金学术团体专项项目“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对中国企业高质量创新的影响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4SGC062）的部分研究成果。

^① 对外贸易依赖度是指贸易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参与度。贸易依赖度越大，意味着回岸外包的比例越小；当贸易依赖度下降时，则表明回岸现象加剧。

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的制造业回岸，是应对过去几十年中产业空心化问题的重要举措。近年来，部分国家国内不平等加剧，政治极化引致的保护主义加速了这一趋势，也促使各国政府重新审视本土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和就业创造能力。其次，在新冠疫情期间，全球物流频繁中断，企业纷纷意识到生产地靠近市场的重要性，由此形成近岸外包趋势。最后，国际政治局势日趋复杂，各国开始注重供应链安全与韧性，各自出台友岸外包政策，将部分关键产业链迁移至政治盟友国家。本文旨在通过测算前文所述指标，对新一轮全球产业链重构进行量化评估。

一、全球和主要发达经济体回岸趋势

回岸的概念早在美国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已提出，新冠疫情之后，有关回岸的讨论再次成为热点。回岸主要发生在汽车、制药等中高端制造产业，服务业因需要与客户直接接触，回岸情况相对较少发生（Backer 等，2016）。企业的回岸决策受多种因素驱动，内部因素包括公司战略转型（Bettiol 等，2017）和纠正之前错误的离岸外包决策（Barbieri，2018）等；外部因素则包括东道国劳动力成本增加（Backer 等，2016）、物流和运输成本上升（Sauter，2016）、供应商生产技术水平不足（McIvor 和 Bals，2021）、母国本地偏好消费倾向（Robinson 和 Hsieh，2016）等。本文重点关注美国、日本、欧洲三地回岸的最新进展。

（一）全球范围短期大幅回流

自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全球贸易依赖度逐步上升（见图 1）。2008 年金融危机和随后的欧债危机导致全球化进程暂时减弱，此后大约 10 年时间，全球贸易依赖度有所下降。2020—2021 年，全球贸易依赖度有所上升，主要是由于新冠疫情全球对医疗物资和应急设备的需求激增，线上消费和电子商务迅速发展，以及各国为应对供应链中断而加速补库存。然而，随着新冠疫情影响逐渐减弱，各国对供应链安全的重视逐渐增强。2023 年，全球贸易依赖度出现显著下降，并且创下了比 2008 年金融危机更大的跌幅，反映了短期内全球产业链的大幅回流现象。

（二）主要发达经济体回流趋势

1. 美国长期回流趋势明显，集中在高端制造行业。美国的对外贸易依赖度自 1960 年以来整体呈现出持续上涨的趋势（见图 2），尤其是在 2000 年后加速上升，并在 2011 年达到峰值，接近 25%。2012 年后，其贸易依赖度逐步下降。2020 年，由于新冠疫情带来的短期物资需求激增，贸易依赖度出现了小幅回升。随着全球供应链的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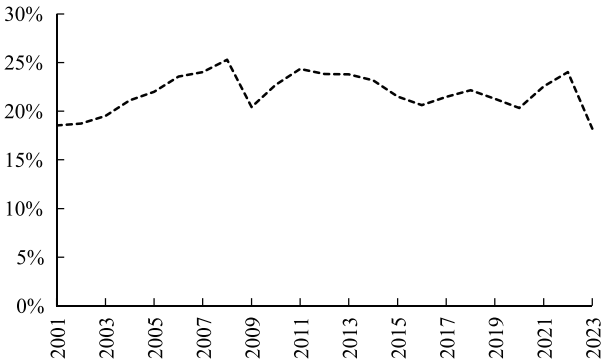


图 1 2001—2023 年全球贸易依赖度变化情况：
总贸易占全球 GDP 比例

数据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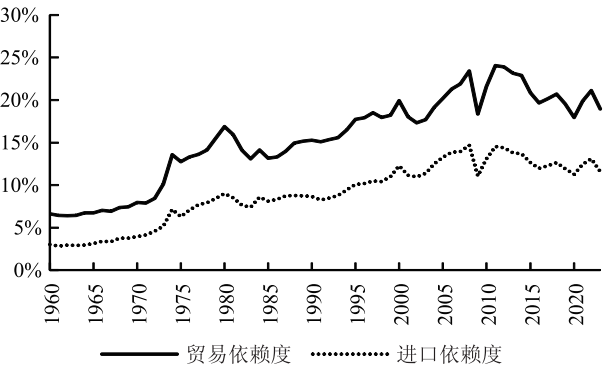


图 2 1960 年以来美国贸易依赖度及进口依赖度
数据来源：UN Comtrade。

步调整以及美国再次推进回流政策，其贸易依赖度再次下探。总体而言，除受新冠疫情影响，美国贸易依赖度自 2012 年后持续下降，显示出美国形成了长期的回流趋势。

总体而言，美国回流呈现以下几个显著特点。一是美企回流意愿有所上升。多项调查显示，近年来美国企业普遍具备较强的回流意愿，主要原因有接近客户或市场、政策激励、企业社会责任等。福布斯于 2023 年 4 月对 150 名美国制造业高管进行的调查显示，82% 的受访者表示已将部分生产转移回美国或正在进行此类回流，其中 35% 的企业已成功实现回流。^① 市场研究咨询机构 Censuwide 于 2023 年 12 月的调查指出，69% 的美国制造商已开始将供应链重新布局至美国境内，其中 94% 表示已成功实现部分或全部供应链的回流。^② 二是政府激励为最主要回流动因。根据回流倡议组织（Reshoring Initiative）的数据，企业在回流决策中最常提到的动因是政府政策激励，相关表述的出现频率是其他动因的两倍以上。尤其是 2012 年以来，美国出台诸多法案推动制造业回流，这些政策旨在通过税收抵免、能源补贴以及大规模物流基础设施投资，提升本土制造业竞争力。2015 年推出的“供应链创新计划”进一步为尖端制造业的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拜登政府执政后，推出了一系列更为系统和强有力的支持措施，如收紧“美国制造”标签的适用范围，通过“美国就业计划”促进能源技术企业回流，并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以及《通胀削减法案》进一步吸引海外资本在美国投资，增强供应链薄弱环节的回流。三是回流趋势有所加速。回流倡议组织收集的回流企业发布招聘岗位数量数据显示：2010—2018 年回流趋势比较平缓；在 2019 年后明显加速，4 年内实现了回流企业就业量翻倍；2023 年回流企业计划招聘 28.7 万人，虽较 2022 年的 34.4 万人的历史高点有所下降，但仍居高位（见图 3）。四是回流集中在高技术制造行业。根据回流倡议组织的数据，电气设备、器具及零件行业的回流最为显著，创造了超过 10.5 万个就业岗位；其次是电子产品行业，回流案例达到 295 起，带来约 7.7 万个就业岗位；塑料和橡胶制品行业回流案例较少，仅贡献了近 6000 个就业岗位。这些数据表明，高技术制造业是美国回流的主要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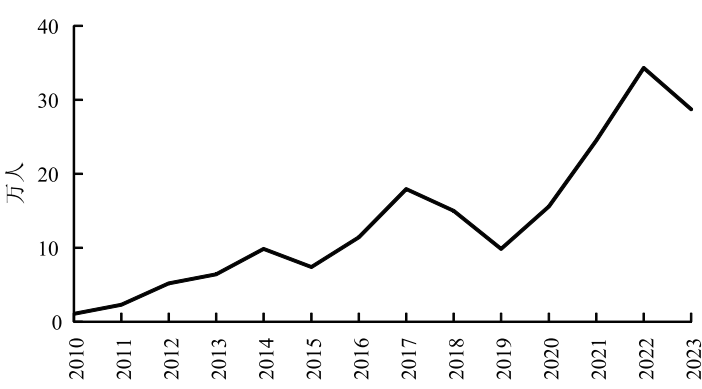


图 3 2010—2023 年美国回流企业招聘员工数量
数据来源：回流倡议组织。

2. 欧洲长期没有明显回流趋势，但政策端持续加码。从宏观数据来看，法国、德国和英国在过去几十年中，贸易依赖度和进口依赖度均保持了较为稳定的趋势，并在 2021 年前后达到了自 2012 年以来的最高点（见图 4）。虽然三国从 2021 年开始，均出现了短期的贸易依赖度下降，但由于其目前仍处于历史较高水平，难以判断其出现了显著的长期回流现象。因此，欧洲主要经济体还没有出现明显的长期回流趋势。从微观数据来看，欧洲近年来也没有大规模回流的现象。欧洲基金会的欧洲重组监测（ERM）收集了大型生产活动向欧盟回流的数据，2014 年欧盟共发生了 32 起企业回流，2017 年达

^①数据来源：福布斯调查，<https://investors.xometry.com/news-releases/news-release-details/american-manufacturing-resurgence-reshoring-accelerates/>。
^②数据来源：Medius，<https://www.medius.com/news/cid-BCE234516BD3FE66/us-manufacturers-plan-to-increase-reshoring-to-get-better-value-and-more-security/>。

到 74 起的峰值，随后逐渐回落，到 2023 年只记录了 4 起回流案例。^① 数据显示，欧盟回流主要发生在新冠疫情前的法国、英国、意大利企业。其中，从行业上看，制造业回流最多，占到 100 起，创造了 11040 个就业岗位；其次为信息通信业 11 起，创造了 2521 个就业岗位。从国家上看，法国回流次数最多，达到 39 起，创造了 2142 个就业岗位；其次为英国 27 起，创造了 5742 个就业岗位。

尽管欧洲的回流趋势尚不明显，但各国在政策上持续加码支持回流，未来回流可能加速。2013 年，欧洲议会通过的“工业复苏促进可持续欧洲”战略就将回流视为欧盟目标。欧盟政策主要集中在强化战略部门的投资和领导力，例如《欧洲芯片法案》计划在 2030 年前投资 110 亿欧元，旨在通过补贴和奖励措施推动半导体行业的回流与重建，以减少对外依赖。欧洲投资银行自 2010 年以来，已投入 10 亿欧元，并发起欧洲战略投资基金，支持电池等制造业的回流。法国通过“专项回流项目”促进回流，已批准 477 个项目，获得 8.46 亿欧元公共投资。^② 英国自 2012 年起推出多个计划，重点推动汽车等行业的回流，并在脱欧后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如 2023 年推出的“先进制造业计划”提供了 45 亿英镑资金，鼓励在英建设新制造业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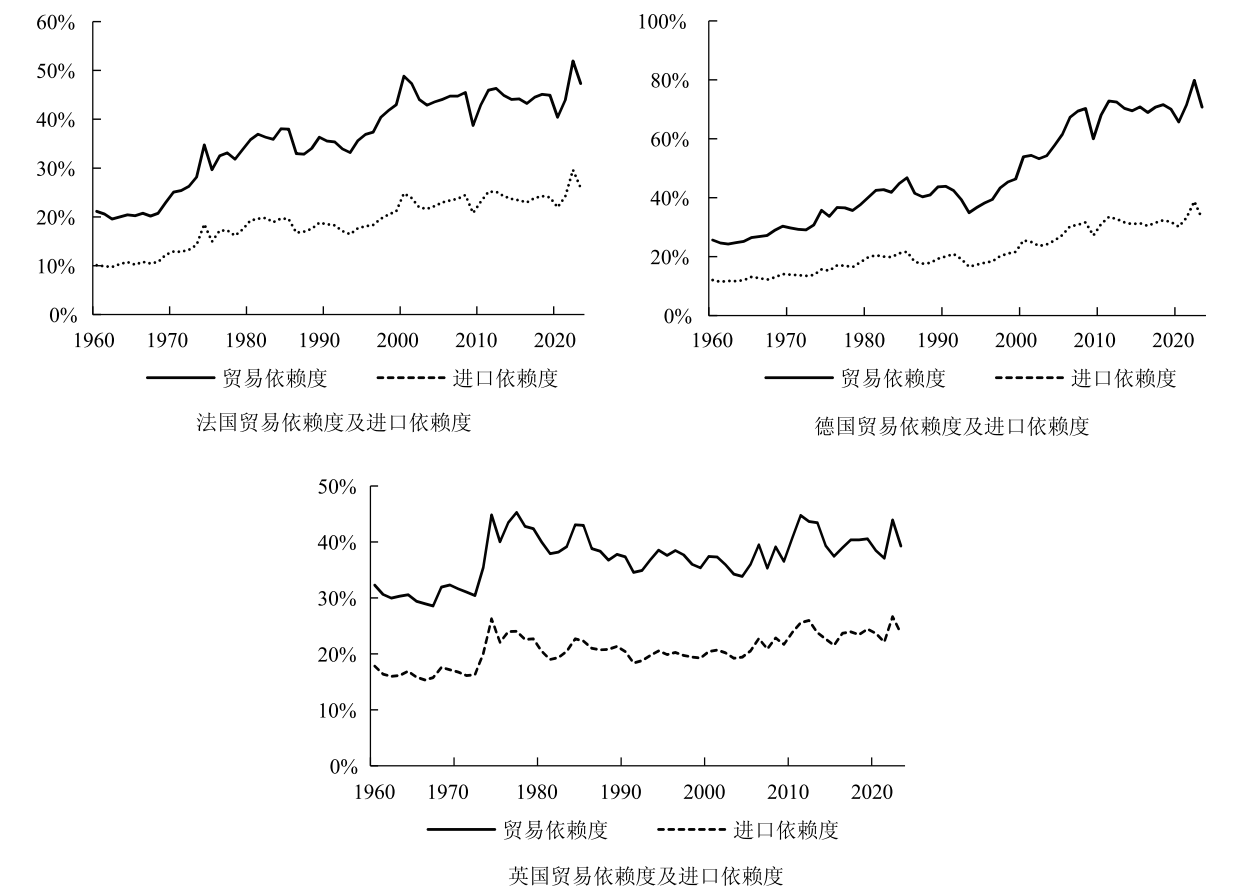


图 4 1960 年以来欧洲主要国家贸易依存度变化

数据来源：UN Comtrade。

①数据来源：欧洲基金会，<https://apps.eurofound.europa.eu/restructuring-events/types/Reshoring>。
②数据来源：法国财经部企业总局，<https://www.entreprises.gouv.fr/files/files/enjeux/france-relande/dp-relocaliser-72-laureats.pdf>。

3. 韩国和日本尚未出现明显回流迹象。韩国和日本的宏观数据表明，两国的贸易依赖度在过去几十年中均呈上升趋势（见图 5）。韩国的贸易依赖度自 1960 年以来持续上升，2000 年后加速，并在 2020 年后仍保持在 80% 的高位，显示其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日本的贸易依赖度则相对稳定，但自 2020 年起显著上升，接近 40%。这表明两国持续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并未存在显著回流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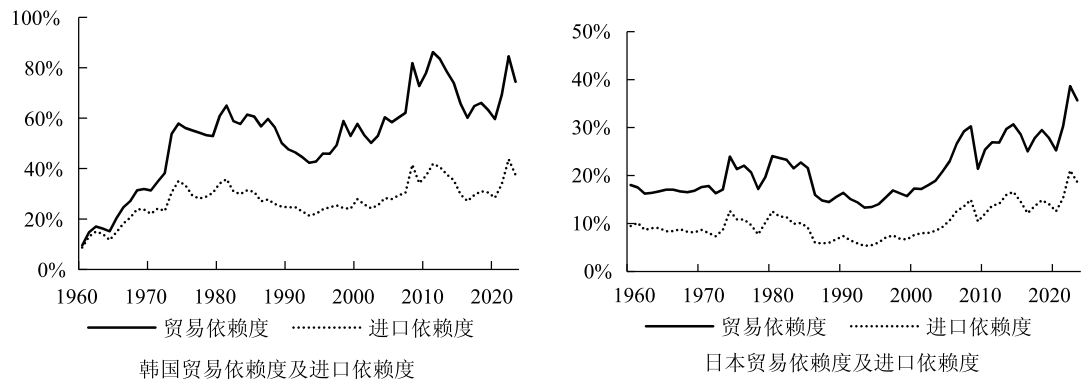


图 5 1960 年以来日韩贸易依赖度变化

数据来源：UN Comtrade。

二、全球和主要发达经济体近岸外包趋势

与离岸外包将业务转移至地理距离较远的国家或地区不同，近岸外包在多个方面具有显著优势。除了降低运输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外，近岸外包还能有效规避不确定性因素，特别是在供应链稳定性及及时响应能力方面。尽管离岸外包在劳动力成本方面具有较大优势，但近岸外包表明，成本并非企业进行外包时唯一的考量因素。近岸外包在地理距离上更接近，因此便于企业更好地管理外包合作伙伴，并增强供应链的灵活性。近岸外包虽然不会减少国际贸易总量，但会显著改变贸易伙伴的结构，推动与邻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减少与距离较远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近年来，美国和欧洲在近岸外包方面的倾向尤为显著，选择邻国或地理上较近的国家进行外包合作，以便保证其供应链的效率和稳定。日韩周边并无明显的近岸外包目的地，故暂不讨论。

（一）新冠疫情后全球近岸外包趋势愈加显著

2008—2020 年全球总体的非接壤贸易占比保持稳定（见图 6），但 2020 年后该比例开始下降，2023 年降至约 75.5%。与此相对，接壤贸易占比在 2008—2020 年同样保持稳定，但自 2020 年开始上升，并在 2022 年以来快速上升，2023 年提升至最高点 2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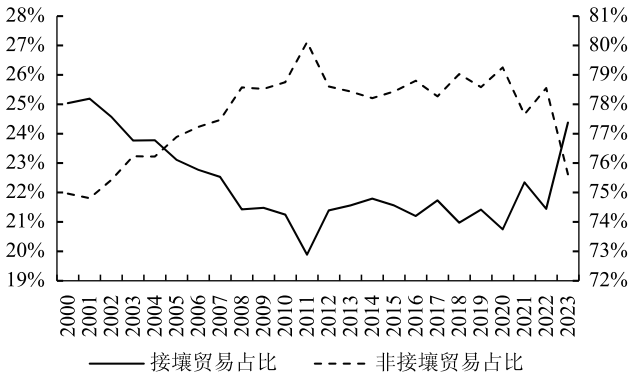


图 6 2000—2023 年全球接壤/非接壤贸易占比

数据来源：CEPII、UN Comtrade。

（二）美欧近岸外包趋势

1. 新冠疫情因素推动美国近岸外包。自 2000 年以来，美国与接壤国家的贸易占比呈下

降趋势，从 2000 年近 34% 降至 2009 年约 28.5%（见图 7）。但在 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后，这一比例开始回升，最高达到 31.4%。这显示出美国企业在疫情扩散和供应链紧缺影响下，逐步增加对邻近国家的依赖，符合近岸外包的特征。

美国近岸外包增长推动了墨西哥的贸易、投资和相关制造业发展。在贸易方面，2022—2023 年，美国对墨西哥的进口增速分别较上年增长了 18.1%、5.1%，累计增速约为 24.0%；美国对加拿大的进口增速分别为 22.4% 和 -4.4%，累计增长约 16.8%；美国对中国的进口增速分别为 6.6% 和 -22.2%，累计下降约 17.1%。2023 年，美国对墨西哥的进口占其进口总额的 15.1%，首次超过对中国的 14.1% 和对加拿大的 13.5%，使墨西哥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在投资方面，受美国与墨西哥贸易联系日趋紧密的影响，墨西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规模连续多年增长。2023 年，墨西哥吸引 FDI 达 361 亿美元，其中制造业 FDI 达 181 亿美元，主要流向汽车、电子和机械制造等关键产业。从行业角度来看，墨西哥低端制造业尤其受益于美国的近岸外包。2022 年 9 月—2023 年 7 月，墨西哥有 45% 的纺织和服装企业、33% 的石油化工企业、31% 的皮革制品企业因美国近岸外包实现了销售增长。^①

2. 欧洲各国不同程度地加强了近岸外包。法国与接壤国家的贸易占比自 2000 年以来一直持续下降（见图 8），但自 2020 年起，邻国贸易占比显著上升至 45% 左右。这表明新冠疫情后法国的近岸外包趋势显著。2000 年以来，德国与接壤国家的贸易占比一直在 37% 到 40% 间震荡，从 2009 年开始呈现总体下降趋势，到 2017 年开始波动上升。这也显示出近年来德国企业在逐渐增加与邻国的贸易联系。



图 8 2000 年以来欧盟主要国家近岸外包变化

数据来源：UN Comtrade。

①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 Prospects and hurdles; Mexican manufacturers on nearshoring horizon, September 18, 2023, <https://www.spglobal.com/marketintelligence/en/mi/research-analysis/prospects-and-hurdles-mexican-manufacturers-on-nearshoring-horizon.html>.

从目的地看，欧洲的近岸外包地主要集中在中东欧和北非国家。根据 FDI Intelligence 数据库，欧洲周边的 14 个国家^①被视为主要的近岸外包目的地。2020 年以来，这些国家的制造业 FDI 大幅上升，从 138 亿美元增至 2023 年的 525 亿美元，项目数量从 296 个增至 401 个，显示出近岸外包逐渐扩大的趋势。其中，匈牙利、波兰、埃及、摩洛哥和罗马尼亚的制造业 FDI 增长尤为显著。例如，匈牙利的制造业 FDI 从 2020—2021 年的 70.4 亿美元攀升至 2022—2023 年的 188 亿美元（见图 9）。从行业看，欧洲的近岸外包主要集中在 5 个核心行业，即电子设备制造、化工、汽车制造、金属制造和半导体。2022—2023 年，匈牙利、摩洛哥、埃及和波兰在这些行业中吸引了大量 FDI，得到了快速发展。从采购份额变化看，也反映出欧洲回岸和近岸外包的趋势。启迈（QIMA）^② 2024 年第一季度调查显示，欧洲企业正在逐步将采购重心从中国转移至本土或邻近国家，对中国的采购份额从 2020 年的 72% 降至 2024 年第一季度的 60%，而对欧洲及邻近国家的采购份额从 8% 增至 15%，对中东欧和北非地区的采购份额也从 20% 增至 25%。^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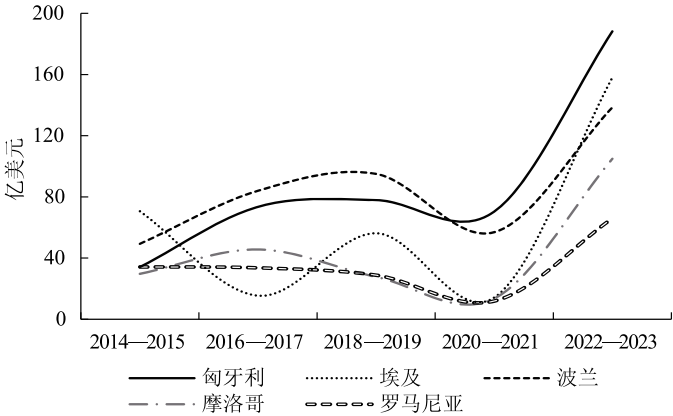


图 9 2014—2023 年欧洲主要近岸外包目的地吸收 FDI 情况
数据来源：Fdi Intelligence。

三、全球和主要发达经济体友岸外包趋势

友岸外包是指将生产活动或供应链转移至地缘政治友好且价值观相似的国家。2022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全球友岸外包趋势开始显著加速。时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同年明确提出友岸外包战略，意在减少美国在半导体、绿色能源和战略原材料等关键领域对竞争对手的依赖，并与其“盟国”加强经贸联系，避免供应链中断的风险。此后，各主要经济体在产业链布局中逐渐倾向于与政治立场接近的国家深度合作。

（一）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全球友岸外包趋势显著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据显示，2022 年至 2023 年第三季度，地缘政治近距离国家之间的贸易增加了 6.2%，地缘政治较远距离国家之间、地缘政治最远距离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分别下降了 4.4% 和 5.1%（见图 10）。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也显示，2022 年 50.2% 的 FDI 发生在地缘政治距离较近的国家之间，进一步证明地缘政治距离在本次产业链重构中的重要性。

根据麦肯锡的研究，2017—2023 年，美国、中国、德国和英国的对外贸易平均地缘政治距离分别

①包括匈牙利、波兰、埃及、摩洛哥、土耳其、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塞尔维亚、保加利亚、乌克兰、立陶宛、北马其顿、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
②QIMA 是一家全球领先的供应链质量控制和合规服务机构，成立于 2005 年，总部位于香港。通过其全球网络和在线平台，QIMA 可以对全球供应链进行实时监控和数据分析，帮助企业优化供应链管理，提升采购效率，并遵循各地的质量和法规标准。近年来，QIMA 也在供应链地缘政治变化趋势上进行了大量研究和调查，特别关注回岸和邻岸外包趋势，以提供企业全球采购行为变化的洞察。
③QIMA. QIMA 2024 Q2 Barometer, Apr 8, 2024, <https://www.qima.com/newsroom/news/news-q2-2024-barometer>.

下降了 10%、4%、6% 和 4%。^① 反映出这些国家更倾向于与地缘政治距离较近的国家开展贸易。进一步使用 2018—2023 年的联合国投票记录来测度各国的政治立场距离，图 11 展示了美国、法国、德国、英国、韩国、日本、菲律宾和越南 8 个国家，与其政治立场最近的前 10 个国家相互之间贸易占比的结果。整体趋势上看，2022 年以来，多数国家与政治立场接近国家间的贸易占比有所提升，但不同国家友岸贸易的趋势却略有差别。德国自 2000 年开始，友岸外包的占比就持续增长；美国、越南与友岸国家之间的进出口份额自 2020 年开始显著提升；英国、日本、法国友岸外包份额是在 2022 年才开始显著提升；菲律宾和韩国则没有表现出友岸外包增加趋势。

占比数据上看，政治立场在各国选择贸易伙伴过程中的重要性存在差异，发达国家更倾向与政治立场接近的国家开展贸易。2023 年，从进出口贸易总体份额上看，美国最热衷于与友岸国家贸易，占比达到 27.3%；英国友岸贸易占比 19.6%，日本占比 19.5%，法国占比 18.7%，德国占比 13.5%。但亚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与友岸国家间的贸易份额显著偏低，如越南占比 2.8%，菲律宾占比更是只有 1.1%。值得注意的是，韩国与友岸国家间的贸易占比也相对较低，仅 1.5%。

（二）美国友岸外包的重点国别分析

美国是最早正式提出友岸外包政策的国家，实施力度也最为积极。美国与政治立场最接近国家之间的贸易比例，远高于欧洲主要国家和亚洲新兴国家的相应比例。在美国友岸外包政策下，欧洲等国作为美国的长期盟友、东南亚等国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支点，与其经贸关系均发生了显著变化。

1. 东南亚已成为美国友岸外包的重点区域。美国对东南亚国家在地缘政治上具有更高的“友好度”，因而更倾向于将部分生产订单或投资流向该地区。近年来，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和投资整体保持增长态势。2014—2022 年，美国与东南亚国家间的贸易额与贸易占比持续增长（见图 12）。IMF 数据也显示，2023 年美国对东盟的 FDI 大幅增加，从 2022 年的 299.63 亿美元增长至 743.57 亿美元，增幅达到 148.2%。美国持续加大对东南亚的资本投入。随着美国“印太战略”不断推进，东南亚地区在美国友岸外包布局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有望进一步提升。

2. 欧洲与美国经贸关系进一步强化。欧洲同样是美国友岸外包布局的重要伙伴。相比东南亚，美国与欧洲在经济制度、法律框架和政治价值观上更为接近。因此在近年来，美欧贸易和投资合作更为紧密。2020 年以来，美国与欧盟的贸易总量和占比均快速增长，双边贸易总额从 2020 年的 6570 亿美元上升到 2023 年的 9590 亿美元，增幅达 42%（见图 13）。与此同时，欧盟在美国整体对外贸易中占比持续攀升。投资方面，美国对欧盟的 FDI 存量也从 2020 年的 2.38 万亿美元上升至 2023 年的 2.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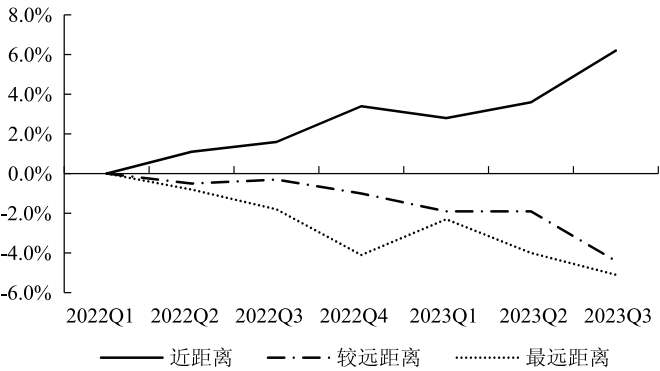


图 10 2022 年一季度以来不同地缘政治距离国家间
双边贸易的平均变化幅度

数据来源：UNCTAD。

^①数据来源：麦肯锡报告，https://www.mckinsey.com/spcontent/ bespoke/mckinsey - digital - quarterly/publications/176f9e04 - 531d - 44ca - 9781 - 5e6899ce4827/mckinsey_ quarterly_ q2_ 2024_ preview. pd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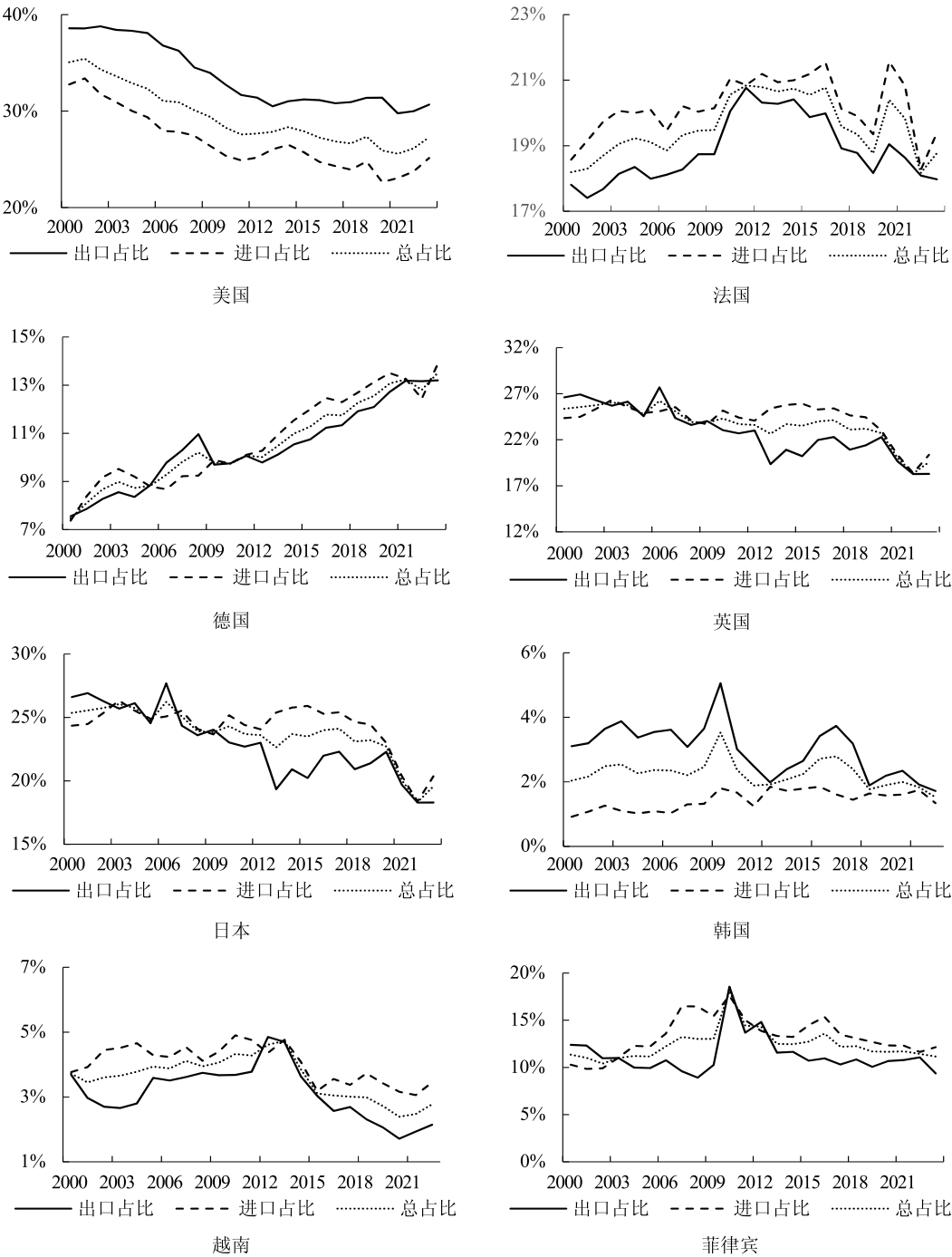


图 11 2000—2023 年主要经济体友岸外包情况变化

数据来源：UN Comtrade、联合国投票纪录。

万亿美元，增幅约为 8.4%；欧盟对美国的投资存量则由 2.1 万亿美元增至 2.42 万亿美元，增幅约为 15.2%。^① 这种高度的经贸捆绑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美国与欧洲以友岸方式强化供应链合作，减少对其他地区的依赖。

^①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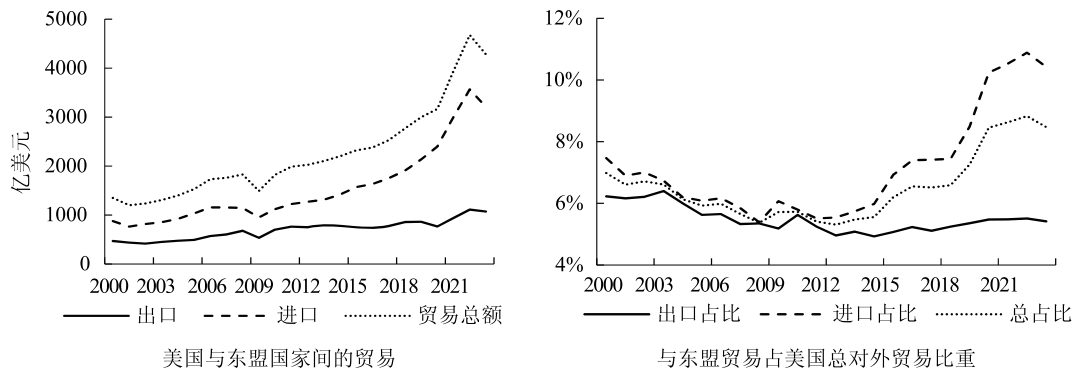


图 12 2000 年以来美国与东盟贸易变化

数据来源：UN Comtra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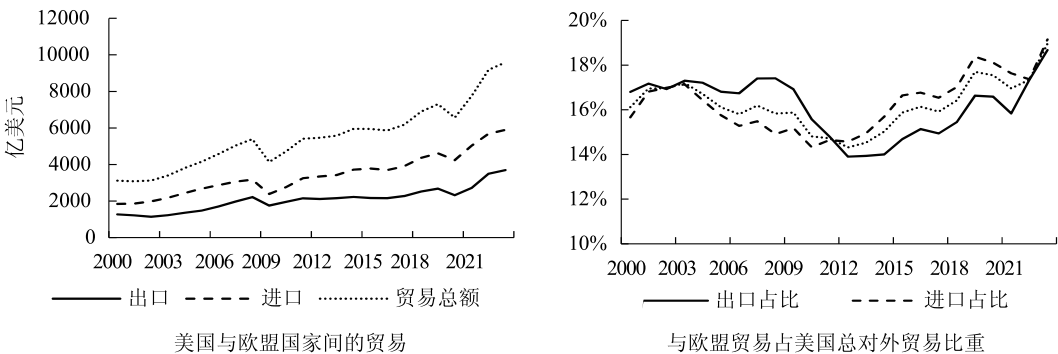


图 13 2000 年以来美国与欧盟贸易变化

数据来源：UN Comtrade，BEA。

四、启示与对策

全球产业链正在经历深刻重构，主要表现为回岸、近岸和友岸外包三大趋势。回岸方面，2023 年全球贸易依赖度出现显著下降，跌幅超过 2008 年金融危机时期，且尤其集中在电子、半导体等高端制造业领域。近岸外包方面，全球接壤贸易比例从 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快速上升，美国和欧洲在这一趋势中尤为明显，墨西哥、中东欧、北非国家成为主要受益者。友岸外包方面，自 2022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地缘政治或价值观相近的国家间贸易量整体增加了 6.2%。东南亚国家因在美国“印太战略”中处于关键地位，获得了显著的贸易和投资倾斜；欧盟与美国的经贸捆绑进一步强化。总体来看，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回岸、近岸和友岸外包，试图应对自身产业空心化问题和地缘政治风险，重新控制全球供应链布局。

随着回岸、近岸和友岸外包趋势不断加深，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日渐承受更大压力。其中，在半导体、电动汽车等高技术制造业领域回岸政策不断出台，大国之间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竞争日渐激烈。近岸和友岸外包趋势则使中国低附加值制造业和配套产业，面临墨西哥、越南等国家的竞争，并加深价值观差异对中国贸易与投资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中国亟需重新审视全球产业转移与供应链重构所带来的冲击，通过多重措施提升产业链韧性、巩固竞争优势。

第一，通过协同发展，加强中国全产业链优势。发达国家正通过回岸推动本土高技术产业回流，并利用近岸、友岸外包来优化其在全球的制造业布局。全球产业链竞争的核心在于生产能力的争夺，尤其是高技术领域的生产能力。当前，中国的最大优势在于拥有覆盖高端与低端环节的完整产业链。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之际，应当通过以下措施进一步夯实这一优势。一是推进创新发展，提升品牌与技术溢价。当前中国企业出海面临激烈竞争，企业应基于自身比较优势，加强专业化和精细化发展，形成独特的品牌定位。各地政府需避免同质化的恶性竞争，避免过多补贴使企业依赖低价策略过度竞争，应更多利用政策资金引导企业开展技术研发与效率提升。通过提升品牌价值与技术优势，实现溢价，从而稳固中国高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二是协同内需与外需，保住并发展生产能力。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生产制造能力是各国竞争的焦点。面对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必须以内需与外需协同支撑生产能力，内需的扩大直接影响生产能力的销量转化率，从而支撑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应鼓励外贸企业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将部分出口产品转为内销，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应对海外需求波动的同时，稳住国内制造业产能。三是加快配套产业和服务业转型升级，优化整体经济结构。发达国家大力推动近岸和友岸外包的核心目的是强化本土高端产业的配套能力与服务支持。相比之下，中国的优势在于全产业链内各个环节的协同发展。在新一轮全球化重构中，中国应对低端行业进行技术改造和绿色升级，同时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鼓励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以提升产业链整体效率和中国经济的综合竞争力。

第二，通过数字化发展，应对近岸外包。近岸外包的核心在于缩短产业链地理距离，增强供应链的响应速度与灵活性。在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可借助数字化手段重塑供应链优势，突破地理和政策限制，增强国际竞争力。一是构建全球数字化供应链平台，帮助实现供应链管理的高效、透明与协同，这也是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重要目标之一。中国可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构建全球化供应链平台，对全球供应链进行实时监测与动态改进，从而提高竞争优势。同时，数字化平台能更好地应对突发事件，通过模拟和预测技术，完善在风险状态下的库存与物流管理，确保供应链持续性与稳定性。二是强化全球“链主企业”的数字整合能力。鼓励中国具备国际影响力的“链主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发挥引领作用，通过创新技术与服务模式，开发先进的供应链管理软件和智能物流系统，并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优化产业链管理，带动整体供应链向智能化转型。三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数字贸易。中小企业是中国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外贸中最具活力的增长点。跨境电商的崛起，为中小企业进入海外市场提供了新的低门槛路径。应支持阿里巴巴国际站、拼多多海外版（Temu）、希音（Shein）等数字贸易平台的发展，同时引导中小企业融入数字贸易新模式发展，进一步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价值链中的地位。

第三，通过安全化发展，应对友岸外包。面对全球供应链因地缘政治与价值观分化而重组的趋势，中国需采取更为主动的策略，不仅要保障自身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还要积极参与并塑造全球供应链格局。一是协调“自主可控”与“国际合作”，构建多层次供应链安全体系。在坚持关键技术和重要原材料自主可控的同时，应与发达国家及其他友好国家展开多元化合作。一方面，与友好发展中国家合作保障供应链安全，确保关键进口原材料供应稳定；另一方面，加强与发达国家在贸易、金融与技术方面的联系，以获取前沿技术知识并深度融入全球贸易和创新网络。二是深化供应链治理，推动全球供应链安全标准与机制建设。友岸外包强调供应链的安全性可控性。为积极应对这一挑战，中国可与主要经济体合作，推动建立全球供应链安全标准和治理机制，共同建立一个透明、规范和可持续的供应链体系。

第四，引导产业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在回岸、近岸和友岸外包的合力作用下，中国企业的产业转移趋势愈加明显，例如部分生产环节向东南亚或墨西哥等地外迁。对此应保持客观理性，既要防范产业空心化的潜在风险，也要把握其中蕴含的国际合作新机遇。一是拓展中间品出口，提升全球链主地位。产业外迁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缩减最终产品的出口份额，但同时也可能增加中间品的出口。中国应把握这一机遇，加大中间产品的出口力度，提高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链主地位。二是引导企业有序跨境布局，绕开多重贸易壁垒。在复杂多变的全球贸易环境下，应加强对企业跨境布局的指导与支持，避免盲目扩张和跟风投资。通过科学规划产业分工，引导企业将生产线转移到具备成本优势与市场潜力的国家或地区，既能保持产业链的完整性与连续性，也能有效规避关税及非关税壁垒，降低整体贸易成本。三是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产能合作，共筑互利共赢的全球合作格局。中国可充分发挥在技术与产业方面的优势，加强与拉美、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在产能合作领域的协同，共同建设生产基地、产业园区等平台，推动技术输出和设备共享，助力当地工业化进程。与此同时，这也能为中国企业提供新的市场与合作机会，实现优势互补，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发展新生态。

参考文献：

1. 余振、崔洁：《后发经济体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弯道超车——历史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国际展望》，2024 年第 4 期。
2. Wiesmann, B., Snoei, J. R., Hilletoft, P., & Eriksson, D. Drivers and Barriers to Reshoring: A Literature Review on Offshoring in Reverse, *European Business Review*, 2017, vol. 29.
3. Bailey, M. A., Strezhnev, A., & Voeten, E.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17, vol. 61.
4. De Backer, K., et al. Reshoring: Myth or Reality? *OEC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Policy Papers*, 2016, No. 27.
5. Bettiol, M., Burlina, C., Chiarvesio, M., & Di Maria, E. From Delocalisation to Backshoring? Evidence from Italian Industrial Districts, *Investigaciones Regionales Journal of Regional Research*, 2017, vol. 39.
6. Barbieri, P., Ciabuschi, F., Fratocchi, L., & Vignoli, M. What Do We Know About Manufacturing Reshoring? *Journal of Global Operations and Strategic Sourcing*, 2018, vol. 11.
7. Sautter B. Futuring European industry: assessing the ManuFuture road towards EU re-industrializ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Futures Research*, 2016, 4 (1): 25.
8. McIvor, R., & Bals, L. A Multi-Theory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shoring Decisio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21, vol. 30.
9. Robinson, P. K., & Hsieh, L. Reshoring: A Strategic Renewal of Luxury Clothing Supply Chains, *Operational Management Research*, 2016, vol. 9.

责任编辑：李蕊

全球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模式”形成、发展和延展*

——基于民航基建的视角

孙慧娟

摘要：本文从民航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着手，探索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模式的形成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出海的过程。在民航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尤其是机场建设方面，中国发展初期得益于“引进来”基础上的自我创新；中国民航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发展成熟之后，其经验也逐步输出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本文认为，中国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引进来”“走出去”的历程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缩影，也是国际合作交流、共建“一带一路”的见证。本文提出，中国民航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强国际间合作交流，践行合作共赢的理念，反对附加条件和区别对待，积极承担国际责任。

关键词：基础设施建设 机场 民航基建 一带一路 中国模式

作者简介：孙慧娟，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前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开创性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着眼于各国人民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梦想，为世界提供了一项充满东方智慧的共同繁荣发展的方案，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共建国家的积极回应。同时，共建“一带一路”也极大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其中核心驱动的产业也迎来了丰收的季节。2013—2022年，中国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累计达2万亿美元，完成营业额累计达1.3万亿美元。^①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如此成功和富有特色，因此被国外专家认为提供了一种新模式或称“中国模式”。^②

近年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引起国内外学界较多关注，并产生了一些富有启发的研究成果。在国

* 本文为中国民航局安全能力项目“民航安全监管立法中的法律责任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中国政府网，2023年10月10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2310/content_6907994.htm。

② 资料来源：《美国专家：中国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新模式》，环球网，2023年2月7日，<https://3w.huanqiu.com/a/72d6dc/4Bba x1ZzTJ1>。

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中，Sidaway 和 Woon（2017）从地缘政治角度分析了中国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导的对外开放模式，在促进非洲等地区和国家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Rippa 和 Oakes（2023）认为，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基础设施建设，从根本上说是过去几十年国内基础设施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亦有研究全面梳理了中国在东道国参与的水坝、发电站、电信网络、桥梁和交通基础设施（铁路、公路、海港、机场）（Sun et al.，2017），认为中国作为非洲基础设施建设者和融资者，其参与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已经被关注颇久，却仍然被视为中国与非洲交往中最不被理解的部分之一（Eisenman and Shinn，2018），甚至借口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的速度、规模等因素而将中国模式歪曲为威权资本主义和新殖民主义（Lee，2017）。在国内学者相关研究中，对基础设施出海的研究多侧重于某个具体的领域，如对贸易的影响（刘帷韬等，2024）、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李玉娟、董子婧，2024）；也有研究对中美在非洲基础设施领域的关系进行评析（周瑾艳、周玉渊，2022）。

从上述现有国内外研究看，对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历程、发展模式及其意义等方面的探究甚少，同时也缺乏对具体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尤其是民航基建方面的深入研究和具体分析。本文通过研究中国民航基础设施建设，来探索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主导模式的形成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出海的发展历程。与其他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相比，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国际化、现代化、专业化和创新化等特点，中国机场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单一到综合、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全过程。早期阶段，在国外企业、技术专家等帮助下，中国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发展；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取得进展之后，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主导的出口模式，在非洲、东南亚等地区积极参与民航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和区域一体化，也加强了中国与当地的友好关系。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国模式”没有意识形态属性，是全球化合作共赢的典范，有力反击了对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出海”的污名化。

一、“引进来”：民航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模式”形成

航空枢纽是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系统的重要组成，是民航基础设施的核心节点，起引领带动作用。^①中国在机场建设方面起步较晚，最早的机场是 1910 年正式建成通航的北京南苑机场。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含港台）民用航空运输机场数量较少，只有 36 个，大多为军民合用机场（除“两航起义”使用的民航机场外），^②且多为小型机场，设备简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机场建设发生了巨大变化。1978 年民航机场数量增至 78 个；2023 年，中国境内运输机场（不含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259 个，年旅客吞吐量 1000 万人次（含）以上的运输机场有 38 个。^③同时，机场不仅是交通运输环节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成为提高人们生活品质、促进经济结构转变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与世界主要国家的机场建设相比，中国是这一领域的后起之秀。改革开放前，中国民航系统归属军队建制。1980 年脱离军队建制后，遵循“按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的要求，中国民用航空局逐步将机场运营责任转移至地方政府，国有航空公司也被分拆为若干实体。航空行业的生产力得到较好的

①民航组：《加快建设现代化民航基础设施体系》，交通运输部网站，2021 年 3 月 23 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3MDQwMDQ5NQ==&mid=2247537640&idx=1&sn=2e65957ac508d0cff65d5431b69ed404&scene=0。

②资料来源：《翼展长空搏云天——写在新中国民航成立 70 周年之际》，中国民用航空局网站，2019 年 11 月 2 日，http://www.caac.gov.cn/XWZX/MHYW/201911/t20191102_199311.html。

③中国民用航空局：《2023 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交通运输部网站，2024 年 5 月，<https://www.mot.gov.cn/tongjishuju/minhang/202406/P020240621367394142022.pdf>。

释放，修建新机场、引进新飞机、开辟新航线，全行业呈现勃勃生机。^① 具体到中国机场建设的实践看，中国从一开始就注重加强与国外的交流与合作，尤其是在经济技术方面的合作，对中国机场设施建设起到了重要的帮助作用。在机场建设方面，中国民航系统通过机场融资、技术合作、购置设备以及培养人才等多个方面来增进中外交流与合作，从而助力中国民用机场快速发展。

一是外资支持方面。外资对中国经济稳定增长有重要作用，能够注入大额资金，促进投资增长，促进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民航是一个高投入的行业，机场建设也是一个资金投入很大的领域，中国民航自开放以来一直注重外资的引入力度，可以说是在引进外资方面做的比较早的行业之一。1982 年科威特政府向中国提供优惠贷款用于建设厦门国际机场，自此以来，中国先后利用科威特、日本、法国、英国的政府贷款以及美国、日本的出口信贷，用于机场、空中交通管制设施、通信设施、消防设施的建设。这对缓解机场建设融资压力，加快机场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世界银行 2013 年向江西省上饶市三清山机场建设项目提供 5000 万美元贷款，用于绿色机场建设；^②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2023 年向云南省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以及绿色发展项目提供 5 亿美元专项贷款，这是国内第一个利用国际多边机构贷款的民航枢纽机场专业工程，^③ 为中国绿色机场建设、环境保护带来很大提升。

二是技术合作方面。中国民航领域一直欢迎外资企业参与中国机场建设工作。中国许多机场也是在外资企业支持下建成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海口美兰机场、南京新机场、上海浦东机场等是通过国际招标的形式由外资企业承担；同时，国内设计单位或工程咨询公司也与国外机场专业工程咨询公司合作，共同承担了深圳、澳门机场的可行性研究，以及三亚、沈阳、深圳、上海浦东等机场的航站楼设计。由法国巴黎机场公司主建筑师保罗·安德鲁主持设计的浦东国际机场航站楼，在 1999 年新中国 50 年上海经典建筑评选中获金奖。^④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建筑设计方案，则由法国巴黎机场工程公司、英国扎哈·哈迪德建筑所的方案为基础，同时融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中国民航机场建设集团公司联合体所提出的“二元式”布局概念，并采用双层出发车道边，是一套“设计、运营一体化”且博采众长的综合建筑方案。^⑤

三是购置设备方面。在民航机场建设和运营中，中国也不断从国外引入机场相关设备，对保障飞行安全、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提高相关技术水平起到了很大作用。这些设备涵盖了机场领域的方方面面，如旅客登机桥、特种车辆、自动扶梯、电梯、空调机、电视监控以及航班动态显示屏等设备。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多项基础设施是由外资企业提供的，如瑞士的 ABB 公司为大兴机场提供的水行业专用变频器 ACQ580，有独具特色的“睡眠增压”功能，可有效防止水泵长期低速运行，在提升能效的同时，延长泵的使用寿命，支持大兴机场的供水保障；^⑥ 迅达电梯凭借钢带曳引技术及先进的环保

①资料来源：《军民合一到政企分开 体制改革助推民航事业发展》，中国政府网，2008 年 12 月 4 日，https://www.gov.cn/gzdt/2008-12/04/content_1168523.htm。

②资料来源：《世界银行贷款助推中国绿色机场建设》，世界银行网站，2013 年 5 月 14 日，<https://www.shihang.org/zh/news/press-release/2013/05/13/china-world-bank-to-help-develop-green-airport-to-improve-connectivity-in-jiangxi-province>。

③王楠、熊逸、刀志楠：《全球已批准近 300 个项目 亚投行助力搭建“空中桥梁”》，百家号，2024 年 8 月 2 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06237242216632332&wfr=spider&for=pc>。

④资料来源：《翱翔的翅膀 浦东国际机场建成记》，澎湃新闻，2020 年 11 月 11 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023729。

⑤王若思：《封面故事 撷英咀华，大兴国际机场设计之路》，中国民航杂志网站，2019 年 7 月 8 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8501018183777428&wfr=spider&for=pc>。

⑥资料来源：《ABB 多项领先技术支持中国打造世界一流航空枢纽》，《电气应用》，2019 年第 10 期，第 2 页。

设计理念，为大兴机场提供了 172 台 Schindler 5500 AP 电梯和 62 台 Schindler 9500 自动人行道。

四是人才培训和交流方面。中国一直重视民航领域的国际交流，多次邀请外国专家来华讲课，开展包括机场在内的多项交流。也有部分外国专家加入国内民航机场任职，早在 2008 年，丹麦籍的贡纳尔·莫勒自愿加盟美兰机场，被美兰机场聘为董事长助理，^① 直接参与中国机场的管理工作。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民航组织和国际机场理事会机场管理专业人员认证方案（AMPAP），加强对机场人力资本的投资，夯实专业人才支撑。同时，也多次派员赴国外进行机场在内的考察学习，提高机场建设水平。如参加美中航空合作项目（ACP），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and 法国国立民航大学（ENAC）合作举办中法航空学院等。通过培训交流，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运作模式，对于国内机场的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升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民航作为国际化程度较高的领域，不断深化和拓展国际合作领域，有助于在基础设施、能力建设、标准制定、发展规划等方面推动中国民航，尤其是机场建设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中国机场建设发展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到欧美国家技术、资金、设备和服务在中国扩展的过程，机场基础设施的发展也成为中国融入全球经济，深化国际合作的一个触角。与此同时，中国机场基础设施建设在博采众长、持续实践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机场建设模式。中国机场建设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取得了显著成绩，机场网络初步形成、枢纽机场竞争力持续增强、战略作用愈发凸显、建设水平世界一流、安全水平全球领先、服务品质显著提升、治理体系日益完善、发展模式转型升级，涌现出一批引领世界水平的机场样板工程。中国机场事业全面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取得了跨越式的进步，^② 同时，也为中国民航基础设施建设“走出去”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走出去”：民航基础设施“中国模式”对外扩展

中国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不断学习国外先进的基础设施知识和标准，加快高质量发展，有效支撑了中国交通强国建设。此外，中国积极推动民航基础设施建设运营领域的国际合作，抓好国际合作引领窗口期，印发《海外航空货站建设运营指南》，指导企业更好“走出去”建设运营航空物流基础设施，为亚洲、非洲等地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加强民航能力建设提供有力支持。

（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下参与国外机场建设概况

机场是国家之间空中联通的主要基础设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余年来，中国企业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在民航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不断走深走实，积极参与投资、承建、改造国外的机场、航站楼等工程，建设并完成了一批重大项目，并助力全球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拥有了更多重要的航空枢纽，为实现国际地区间的互联互通作出了重要贡献。机场建设方面，在非洲，中国企业承建了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多哥、刚果（金）、肯尼亚、莫桑比克、南苏丹、尼日利亚、坦桑尼亚、乌干达、

^①资料来源：《美兰机场聘外国专家为董助》，国务院国资委网站，2008 年 3 月 21 日，<http://ysp.net.sasac.gov.cn/n2588025/n2588129/c2799624/content.html>。

^②资料来源：《全国民航机场工作会议召开 全力构建现代化民航机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中国政府网，2019 年 11 月 8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9-11/08/content_5450118.htm。

赞比亚等多个国家的机场建设项目。^① 其中，乌干达恩德培国际机场作为该国乃至东非地区的现代化标志性交通设施，其成功建成不仅较好地提升了乌干达的现代化交通运输水平，且极大地促进了乌干达的经济发展。^② 在亚洲，中国企业参与了孟加拉国希莱特奥斯玛尼国际机场、柬埔寨新金边国际机场、斯里兰卡班达拉奈克国际机场、泰国那拉提瓦机场、印度尼西亚 OBI 岛机场等项目。在美洲，中资企业参与了秘鲁库斯科新机场、多米尼克国际机场、尼加拉瓜蓬塔韦特国际机场等项目。^③ 基础设施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石，中国企业参与当地的民航基础设施建设，使得当地相关领域的基础设施得到显著提升，增加了当地就业机会，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为当地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中国民航基础设施建设“走出去”的主要方式

第一，统筹全局注重建设规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航基础设施建设从较低的水平上不断发展，取得了今天的成绩。在这一进程中，基于借鉴国际上先进做法和经验，中国亦逐渐总结出了符合自身实际的现代化、工业化和自主化的“中国模式”特征，并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专业人员和建设队伍。从理念上看，中国坚持建设平安机场、绿色机场、智慧机场、人文机场的“四型机场”要求，推动民航业整体高质量发展。从建设能力看，经过国内大型机场建设的经验积累，拥有了一流的民航机场建设队伍。从融资方式上看，注重社会和民间资本的参与，充分调动社会资本的力量。在上述条件共同支持下，中国在帮助国外建设民航机场的过程中，追求富足、安全、平等、环保的理念，也注重从整体上考虑机场建设对城市环境的利用和开发，最大程度提高出行和运输效率。

第二，发挥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经验打造海外精品。中国根据自身经验，无论是国外的“大基建”建设，还是“小而美”工程，都通过丰富的建设实践形成了一批批经典项目。如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承建埃塞俄比亚博莱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是博莱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项目的一部分，历时 4 年完成。由于完成质量高，东道国继续邀请中国参与其二期、三期扩建工程项目，助力博莱国际机场成为非洲航空运输中心。柬埔寨暹粒吴哥国际机场由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牵头投资，云南建投集团组织建设，云南航产投集团全面负责运营，是中资企业在海外以建设—经营—转让（BOT）模式实施的第一座国际机场。目前已顺利完工并通过竣工验收。据悉，新机场启用后，暹粒国际机场将正式关闭，所有客运和货运航班将转移至暹粒吴哥国际机场。这对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增加居民就业机会，更好保护吴哥古迹以及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援建的巴基斯坦瓜达尔新国际机场项目，克服当地环境气候条件复杂，土壤湿陷性、溶陷性特征明显的不利条件，已于 2025 年 1 月正式投入运营，必将有力促进巴基斯坦和地区各国经济贸易发展。^④

第三，通过专业培训和人才教育提供持续支持。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中国在持续推进民航基础设施“走出去”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对东道国技术能力的提升和专业人才的培养。如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新国际机场项目中，中国为即将到该新机场工作的巴方高层管理者进行岗前培训，使巴方跟中方

①季晓莉、王健生、成静：《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向新兴领域拓展》，《中国战略新兴产业》，2024 年第 28 期，第 61 页。
②宋微、张永晴：《交通建设为中非共同未来铺坦途》，中国商务新闻网，2024 年 4 月 19 日，https://www.comnews.cn/m/content/2024-04/19/content_39639.html。
③中国民用航空局国际合作服务中心：《一带一路 2023 年中资企业民航领域海外项目进展报告（上）》，2024 年 1 月 3 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lwODY1MjM3OA==&mid=2247503839&idx=1&sn=fad45d345ad211e8c343037ebbf7637&chksm=977d5eeaa0ad7fe22e1b2d3a672eed040dbded81d1517c023800e8b5f2514d3ad8f86598b43&scene=27。
④闫锡明、刘慧、程是颜：《机场建设，促进地区互联互通》，百家号，2023 年 10 月 8 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9164509155269260&wfr=spider&for=pc>。

援建单位和主管部门进行深入对接，了解中方项目设计的理念、学习中方机场管理的先进经验，为新机场的投入运营做好人才储备和相关准备工作。^① 2017 年 9 月，中国举办的机场运行管理专业水平的跨国培训项目，吸引了中亚地区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家以及蒙古国参加，在参与国际培训和交流中贡献中国民航智慧。^②

三、民航基建“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比较分析

从中国民航基建发展成熟的历程可以看出，机场作为行业内最早接触国外的领域之一，外国学者所言的“中国模式”，是在自立更生的基础之上，不断吸取借鉴国外先进成果和经验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在发展初期，国外在资金支持、机场规划、机场设计中的审美、对国内大规模公众飞行需求的满足等方面给予了较多帮助；在与诸多国家的交往合作中，中国结合自身实际，取其精华，并将其融合创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设施建设模式。伴随着中国民航基建领域的成熟，又将中国先进的经验输出至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从民航基建发展沿革的脉络看，中国民航基建“走出去”，某种程度而言并非是简单地向外输出了中国本土独有的基建成果，而是将国际先进经验、中国自主创新的融合产品输出至国外。尽管国外民航基建引入到中国与中国民航基建“走出去”两者有共同点，但也有实质性的差异。正如 Roskam（2015）所指出，中国将基础设施项目定位为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团结的证明，与西方的剥削性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

（一）共同点

民航基础设施是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欧洲国家、美国、日本等国家在中国民航基础设施中起到的作用，抑或中国在非洲、东南亚等地区参与民航基础设施建设，从技术层面而言，都是将相关建设规范、工艺和标准在世界范围进行了跨区域传播，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基础设施的进步和完善，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为相应的国家和地区带来了更为多元化的交通，乃至社会发展机遇。

（二）差异性：与美国的比较

中国海外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和建设，如 Roskam 所说是国家间团结的证明，这与西方国家主要出于经济利益上的考量有着本质区别，集中体现在政策方面的差异性。中国参与国外的民航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也是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生动写照。因而在具体的民航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中，具有无任何附加政治条件、重落地、可持续性较强等特点。反观美国则多是有明显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意图。^③ 如重庆江北机场获批后许多外资工程公司愿意承建，美国最大的建筑公司柏克特公司报价 5 亿美元（时值人民币 50 亿元），后来中国

①资料来源：《巴基斯坦瓜达尔新国际机场项目培训班在海口举办》，海南省商务厅网站，2024 年 7 月 1 日，<https://dofcom.hainan.gov.cn/dofcom/xctp/202407/d247a785fd9c44d9b7644cf4ddc53894.shtml>。

②黎晓明、张培、任金钰：《首都机场中亚培训项目：为中亚地区贡献中国民航智慧》，中国民航网，2017 年 12 月 5 日，http://www.caacnews.com.cn/1/5/201712/t20171205_1235829_wap.html。

③周瑾艳、周玉渊：《从互补到竞争：中美在非洲基础设施领域的关系评析》，《国际展望》，2023 年第 6 期，第 49 页。

自行建设花费 3.79 亿元，仅相当于柏克特公司报价的 7%。^① 美国在地区、行业的投资领域侧重点与中国有较大差异。从地域偏好而言，美国投资集中在欧洲、拉丁美洲及加拿大等地区和国家，这与其对市场环境的要求、贸易成本高低以及地理距离和文化纽带上的关联等有较大关系。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投资有限，仅有中国和印度吸收了较多的美国资本，直接投资的主要领域为制造业、信息产业、批发贸易以及科技服务业，^② 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占比较少。

中国和美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也有较大的区别。美国在非洲主要关注能源领域的投资。尤其是交通领域的港口建设方面，美国通过“军事基地链”来服务于自身国家战略需要，将港口等交通设施的开发政治化。^③ 中国则在非洲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入了大量资金，并逐渐从建设者转变为投资者和运营者。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以当地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为目标，而不是为了短期利益，这使得中国能够支持施工周期长，但对非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④

四、结 语

基础设施建设出海已成为各国海外投资的重要议题。从 20 世纪便开始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出海的日本和韩国也力推本国企业“出海”，日本和韩国分别在南亚和中亚等地区发力。如孟加拉国第一条城市铁路“达卡地铁”得到了日本政府的全力支援，项目总成本约 4400 亿日元（约合 200 亿元人民币），其中约 2600 亿日元由日本贷款支付。^⑤ 中国民航事业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民航基建亦是如此。中国民航基建发展、壮大、出海的过程，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缩影。中国民航基建的壮大得益于国外投资和技术支持，在自身创新和发展中不断成熟，同时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将自己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形成的优势用于助力非洲、东南亚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发展，形成了企业效益、社会效益和国际合作等多方共赢的局面。对此，有以下启示。

第一，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要促进其破解发展难题，应对挑战，和平发展，并肩负起相应的国际责任。中国大型机场建设可以看到国外投资、建设参与的身影；中国正在建设的桥梁、道路和港口等大型项目遍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国已经成为非洲最大的基础设施融资方和国际工程承包方。这些都成为标志性的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支持当地长期发展、合作共赢的重要见证。通过国家之间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互联互通，促进了技术交流、人才培养、产品设计等方面的传播，这本身就是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在出海浪潮中要坚持和平共处，不搞附加条件，并坚持长期主义。中国出海是基于当地需求，注重对基础设施的投入，通过技术推广、人才培养交流等方式激发当地内生发展动力和能力。要坚决避免西方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将价值观念、自由市场的标准和要求等强加于人的做法。尤其是

①陈之惠：《回忆重庆江北机场的修建历程》，政协重庆市渝北区委员会网站，2024 年 4 月 23 日，http://www.cqybx.gov.cn/web/article/1232275208290402304/web/content_1232275208290402304.html。

②盛思鑫：《中美在对外投资领域的差距》，《中国改革》，2017 年第 6 期，第 56 页。

③孙德刚：《中国港口外交的理论与实践》，《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 年第 5 期，第 6 页。

④资料来源：《中美在非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现状与竞争》，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网站，2024 年 3 月 18 日，<https://www.essra.org.cn/view-1000-5903.aspx>。

⑤李萌等：《政府鼓励企业出海，投资也有不同侧重，中日韩基建竞逐亚洲大市场》，百家号，2024 年 6 月 29 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03146908962893030&wfr=spider&for=pc>。

近年来各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自主管理国内事务意愿增强，希望政府保留对发展援助的自主权，不愿接受外国援助的附加条件。中国正是秉持了这样的做法，投资没有附加条件，设身处地考虑当地发展。这也是中国在非洲等地区受欢迎的重要原因，是对所谓“威权资本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有力反击。有调查显示，82%的尼日利亚受访者认为中国的投资让东道国受益；73%的肯尼亚受访者认为中国的投资对东道国是有益的。^①

第三，唯有国际之间加强合作才能共生共赢。在民航领域，中国的快速发展给各国带来很多良好的机遇。航空运输业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如航空运输需求的增加带来机队的增长，机队增长必然相应地要求新建或改建更多的机场，以满足航线、航班不断增加的需要。在这方面，满足机场建设需求的提供方，可以是任何有能力的国家。目前在非洲机场外国咨询、招标、资金和工程等各方面，中国不是唯一来源。国际社会也有必要在民航基建领域开展更多元的合作，包括融资、改造、扩建和建设机场，建立和扩展航空服务，以及培训航空专业人员，共同坚守长期合作，共绘未来蓝图。

参考文献：

1. 刘帷韬、秦一博、熊超、高琦：《“一带一路”背景下基础设施的贸易影响——基于“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分析》，《生产力研究》，2024 年第 9 期。

2. 李玉娟、董子婧：《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研究》，《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1 期。

3. 周瑾艳、周玉渊：《从互补到竞争：中美在非洲基础设施领域的关系评析》，《国际展望》，2023 年第 6 期。

4. Sidaway, J. D. and Woon, C. Y. Chinese Narratives on One Belt, One Road in Geopolitical and Imperial Contexts,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Vol. 69, No. 4, 2017.

5. Rippa, A. and Oakes, T. Infrastructural Thinking in China: A Research Agenda, *China Quarterly*, 255, 2023.

6. Sun, I. Y., Jayaram, K. and Kassiri, O. K. Dance of the Lions and Dragons: How are Africa and China Engaging, and how will the Partnership Evolve? McKinsey Consulting, June, 2017.

7. Eisenman, J., and Shinn, D. H. China’s Strategy in Africa. In Eisenman, J. and Heginbotham, E. (Eds.), *China Steps Out: Beijing’s Major Power Engagement with the Developing World*, 2018.

8. Lee, C. K. *The Specter of Global China: Politics, Labor,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Africa*,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017.

9. Roskam, C. Non – Aligned Architecture: China’s Designs on and in Ghana and Guinea, 1955 – 92, *Architectural History*, Vol. 58, 2015.

责任编辑：郭 霞

^①佚名：《美媒：中国对非投资合作远超美国》，百家号，2024 年 9 月 12 日，<https://baijiahao. baidu. com/s? id = 1809959705793189195&wfr = spider&for = pc>。

新质生产力与农业现代化

张秀青

摘要：新质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等特征，可强有力地推进农业现代化，推进路径主要包括科技驱动、要素融合、产业升级、组织革新等。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农业大国正在向农业强国迈进，但是仍有诸多亟待化解和攻克与挑战与困难。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是突破传统农业瓶颈、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结合当前农业发展的核心挑战与前沿趋势，本文从科技创新、数字赋能、产业升级、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 农业现代化 科技革命 产业升级

作者简介：张秀青，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正高级经济师。

一、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及发展环境

（一）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

2023年下半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省、黑龙江省、浙江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地考察调研时，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进行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阐述了“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仍是一种生产力（魏崇辉，2023），但加上“新质”这一定语，就突出了其与“旧质”传统生产力的差别。要深刻理解“新质”与“旧质”的不同，还要从历史维度展开来看。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技术的革新，生产力的三大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不断演变和升级，进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前进。先看劳动者，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具决定性的要素，传统劳动者从原始社会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原始部落成员，到农业社会从事耕作和畜牧的农民，再到工业社会大量的工厂工人，均以简单重复劳动为主。进入信息社会和后信息社会，“新质”劳动者则以知识和技能为核心，能够与智能工具协同从事复杂劳动，有效整合各类要素，提高生产效率。再看劳动资料，劳

动资料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迭代过程，其科技含量高低是区分生产力是否先进的显著标志。在原始社会，劳动资料是石器、木器等简单工具；在农业社会是青铜器、铁器、灌溉系统等工具和设施，在工业社会是机械化、电气化的设备工具和工厂设施；而信息社会的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劳动资料智能、高效、先进，科技含量高，充分体现了“新质”特征。最后看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的不断迭代升级，必然会带来劳动对象的扩围。从原始社会一路走来，人类的劳动对象从自然界的动植物、矿物，到开垦农田、种植粮食、手工制品、工业产品，再到生物工程、深空深海深地探测、大数据等，“上天入地”，从实体到虚拟，范围不断扩大。新质生产力是动态演进的，当更先进的生产力出现时，现时所谓“新质”也将成为“旧质”，归入传统生产力。

（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环境

新质生产力的产生不是偶然的，需要顺应时代潮流，形成有利的发展环境。

1.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科技创新型产品和服务已从蓄势待发步入群体迸发的阶段，新兴技术各个领域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合成生物学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已进入成长期，基因组学及其关联技术迅猛发展，新制造技术与新型材料研发持续取得重大突破，新产品新业态不断涌现，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和跨领域融合等成为新兴技术发展新趋势。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制造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技术等领域的颠覆性创新广泛渗透到各个产业领域，并带动以绿色化、智能化为特征的群体性重大技术变革（张秀青等，2024）。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带来全球生产力颠覆性变化，很多领域存在弯道超车的机会，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是历史性机遇。

2. 我国国内经济转型升级持续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已经实现，全面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已经开启。我国审时度势，提出并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定一系列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区域重大战略，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达到 135 万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接近 18%，较 2012 年提高了 6.5 个百分点，居世界第二位。我国经济正在经历从传统产业向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转变，并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的过程，为我国构建新增长引擎提供了战略窗口期。

3. 我国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经过多年积累，我国自主创新研发能力明显增强，在高铁、通信、卫星、新能源、新能源汽车、无人机、集成电路等领域实现了大量的技术创新，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2023 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约为 3.4 万亿元，是 2012 年的 3 倍，居世界第二位；研发投入强度为 2.65%，超过欧盟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的水平。^① 2000—2021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引进国外技术经费支出占技术获取和技术改造总支出的比重从 18% 降至 10%，从国内购买技术的费用支出则从 2% 增至 9.5%。^② 这说明我国的自主研发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不再依赖“引进吸收再创新”的老路。2000—2021 年，规模以上

^①数据来源：万得（Wind）数据库。

^②数据来源：相关年份《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工业企业的研发强度从 5.7% 提升至 7.7%，新产品销售收入年均增长 18.8%，新产品出口额年均增长 18.6%。^① 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4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我国创新指数综合排名在 130 多个经济体中位列第 11 位，较 2012 上升了 23 位，是 10 年来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2016 年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机器人等 36 个重点建设领域，在全国批复认定 26 家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

4. 我国人才红利正在形成

虽然我国面临出生人口持续下降的挑战，但人力资源丰富仍然是我国的突出优势，人口结构中高端人才比例呈现稳步增长趋势，“人才红利”正在形成。截至 2022 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提升至 10.9 年，高等教育学历人口规模突破 2.4 亿人大关；^② 我国按折合全时工作量计算的研发人员数已连续 11 年稳居世界第一，2000 年以来全时当量研究人员年均增速近 10%，2023 年达到 724 万人年。^③ 全国涌现出一批世界级顶尖科技人才。通过教育质量跃升有效激活了以知识技能为内核的新型人才红利潜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可持续的人力资本动能。随着人口数量驱动型经济增长动力逐渐减弱，我国将从人口规模红利向人口素质、人口质量的人才红利转变，这为构建新增长引擎提供了有力支撑。

5. 我国工业体系最为完备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国制造业总体规模持续提升，特别是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国内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增长引擎。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数据，我国拥有 41 个工业大类、207 个工业中类、666 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其中制造业规模已连续 13 年居世界首位，是全球范围的“制造大国”。在工业体系中，既有领先、追赶行业，也有转型行业；既有外向型行业，也有立足国内市场的行业。工业门类齐全、产业多样，可有效降低全产业同时受冲击的概率，提升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能力。

二、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的作用机制

（一）国内外农业现代化发展历程及特征

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发展的、动态的概念，是指农业部门凭借资源禀赋、创新要素及其组合，不断在生产效率、生态友好、民生改善等多方面追赶和保持世界农业先进水平的过程（何传启，2013）。

1. 国际农业现代化发展历程及特征

从全球看，世界农业现代化步伐已于 18 世纪中期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渐次由低级向高级迈进，截至目前大致经历了 4 个发展阶段：

一是初级机械化阶段（18 世纪中期到 19 世纪后期）。这个阶段的农业现代化以改良农业生产装备为主，比如机械播种机、收割机、打谷机等，虽然仍以人力或畜力为动力，但已经大幅解放了劳动力，提高了生产效率。另外，以四圃轮作为代表的轮作制度在技术和实践上都取得了重要进展，为畜

^①同①。
^②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23）》，中国统计出版社，2023 年。
^③国家统计局：《创新驱动发展成效显著 科技强国建设有力推进——新中国 75 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二》，国家统计局网站，2024 年 9 月 18 日，https://www.stats.gov.cn/sj/sjjd/202409/t20240918_1956553.html。

牧业和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是机械化和化学化阶段（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中期）。这个阶段的农业现代化已经开始借力工业革命成果，蒸汽机、内燃机广泛应用于农业机械，如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替代了人力和畜力，大幅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化肥（如哈伯—博世法合成氨）、农药（如滴滴涕）和除草剂大规模使用，显著提高了土地单产；集约出来的农业劳动力开始向城市、向工业领域转移，城镇化进程加快。

三是绿色革命和生物技术阶段（20 世纪中后期至 20 世纪末期）。这个阶段的农业现代化原动力来自科学育种技术改良作物品种，以墨西哥、印度、菲律宾等国家为中心推广高产作物品种和现代农业技术，亚洲、拉美地区国家的粮食自给率显著提升。农业与工业结合形成了系统化高产模式，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土壤退化、农药残留、地下水枯竭等问题日益恶化。

四是智慧农业和生态农业（20 世纪末至今）。这个阶段的农业现代化迈入更加成熟的阶段，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基础上，吸取前期教训，重点从两个方向深入推进：一是智慧农业。突出特点是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服务农业领域，如农业大数据、物联网、传感器、智能温室、植物工厂、无人机施肥监测、农业机器人等，大幅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和生产效率。二是生态农业。注重种养殖环节绿色环保以及农业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如有机农业、免耕种植、沼气发电等。

当然，在农业现代化既定演进的大方向下，由于资源禀赋、基本国情和发展目标不同，各国的农业现代化也是多种模式推进，主要可以分为 4 种类型：一是美国模式，由于土地资源丰富，以机械化为核心，通过大规模机械化作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日本模式，由于耕地资源稀缺，以生物技术提升单产，注重农业精细化与高附加值；三是西欧模式，以法国和荷兰为代表，同步推进机械化和生物技术，注重农业集约化与可持续发展；四是发展中国家路径，突出特点是传统农业与现代技术结合，整体处于追赶水平（陈明，2023）。

总的看，国际农业现代化进程是在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的助力下，从传统农业演进为现代农业的过程。虽然各国农业现代化的模式不同，所处阶段不同，但都离不开科技创新，这是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所在。

2. 国内农业现代化发展历程及特征

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大致可以分为 3 个阶段。

一是机械化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初，整个国家积贫积弱，实现农业现代化是摆在中央政府面前的艰巨任务。1954 年 9 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毛泽东同志提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周恩来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戴木才，2019），并于 1956 年写入党章通过的党章总纲中，“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农业现代化成为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石平洋，2020）。1959 年 4 月，毛泽东同志在《党内通信》中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1976 年 12 月 23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在这个阶段，我国农业机械以大型化为主，农机总动力得到大幅提升。

二是科学化阶段。改革开放之初，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就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进行了部署，首先提出，迫切需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来武装农业干部和技术人员，要组织全国科学技术力量研究解决农业现代化中的科学技术问题，切实地加强技术推广工作。我国农业现代化进入了以科学技术提升生产效

率的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集中力量突破了一大批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和弱项短板，为国民经济体系建设做好了科学技术的准备。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再次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必须深入贯彻科技创新驱动与教育优先发展的兴农方略，强调要通过强化农业科技攻关和全面提升农民综合素质两大核心路径，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三是中国式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彻底摒弃了以自然消耗为代价的农业发展模式，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为国家战略，智慧农业、数字农业与绿色农业共同构筑起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战略支撑体系。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首次系统提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战略，开创性地将农业现代化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框架。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此作出具体部署，明确构建“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可持续”的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优化发展路径，提出“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化农业建设方针。随着战略深化，2017年党的十九大将发展维度拓展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整体推进，确立“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全局性战略定位。至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系统规划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这一持续演进的政策体系，既体现了对农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也彰显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战略定力。实践表明，农业现代化作为系统性工程，需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绿色发展为导向，在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韧性的基础上，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方能稳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二）新质生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作用机制

根据国内外发展经验，农业现代化有其方向和规律性，是动态发展的，各国进程因动力机制不同而有快有慢。新质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等特征，可强有力地推进农业现代化。从实践来看，新质生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路径主要有科技驱动、要素融合、产业升级、组织革新等。

1. 科技驱动

从历史进程看，科技创新是社会发展的最关键力量，是第一生产力。蒸汽机、内燃机、发电机、计算机、人工智能（AI）等重大科技突破不断推动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以及更高文明的社会形态。世界农业现代化历程也是紧跟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脚步，踏着农机革命、化学革命、种子革命、绿色革命、基因革命等重大农业科技创新的步伐不断前进。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农业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力。新质生产力推动形成了一批新理论、新技术，造就了一批新工艺、新工具。例如，智能滴灌技术是利用互联网、物联网和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对滴灌区域的气象因子、土壤环境因子（土壤湿度、土壤温度、土壤电导率等）进行自动监测，将采集到的环境因子数据作为管控滴灌设备的依据，自动浇水，节约了劳动力，提高了水资源利用效率和农业经济效益。再如，垂直农场也是集多种现代高科技于一体的创新型农业生产系统，比如发光二极管（LED）植物生长灯、水培和气雾培系统、传感器和自动化系统、物联网、大数据分析、AI、机器人、生物育种等，在建筑物的多个楼层增加种植面积，以最大化土地利用效率并减少传统农业对环境的影响。这些创新都将推动农业现代化迈向高阶阶段。

2. 要素融合

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提升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是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也是农业现

代化的重要方面。纵观历史，原始社会的生产力相对简单，只有从事简单劳动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均来自于自然界，也谈不上要素的优化组合；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有了提升，农民运用铁质工具、灌溉系统在土地上开展种植、养殖活动，通过街头巷尾的“口口相传”交换信息，实现要素的优化组合；进入工业社会，农民和农业技术人员运用机器设备种植农作物，在工厂加工和生产农产品，在农民和农业技术人员身上附着了知识、技术和管理等非独立要素，在机械、厂房上附着了农业资本，通过银行、交易所等中介机构拓展信息传播，提高了全要素配置效率；在信息社会和后信息社会，主导要素演变为知识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技专业人员、智能农机，运用计算机网络、AI 系统等劳动资源，高效开发农业信息和智能化农业服务等，通过去中心化的数据流引导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实现农业生产力要素组合的叠加效应、协同效应和倍增效应，跃迁式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马晓河、杨祥雪，2024）。

3. 产业升级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以科技创新引领，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航空航天产业、海洋装备产业九大重点产业；^① 未来产业主要包括未来信息、未来制造、未来材料、未来健康、未来能源、未来空间等领域。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2024 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约占 GDP 的 13%。在这些新兴产业中，部分产业属于农业领域，比如智能农机、智能农业装备、生物农药、生物饲料、生物燃料、生物育种、绿色低碳装备等。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演化出一系列新兴农业产业，如农村电商、直播带货、智慧农业、智慧物流等，提升了农业效率和效益，拓展了农业的可能性边界。另外，新质生产力通过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改造提升传统农业产业，传统产业的发展也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应用场景。比如，利用微藻、免耕等新技术保护耕地；利用电子商务、跨境电商拓展农产品的销售半径；利用现代信息推广手段，离城市较远的农村也可以发展农业休闲观光、生态旅游、农耕文化体验等项目。农业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共生共长，形成多元化的农业新生态，全面带动农业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农业现代化。

4. 组织革新

新质生产力与现代农业的深度融合正在引发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方式的革新。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经营以小规模农户为主，生产效率低，抗风险能力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土地流转和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也是农村改革的基本方向。^② 随着家庭农场、合作社、涉农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逐步发展起来，我国土地规模经营面积也不断扩大。目前，全国家庭承包耕地的流转面积已超过家庭总承包面积的 1/3。随着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快速成长，凭借农机、无人机、农业大数据、物联网等农业新质生产力，实现以更少劳动力完成对更大面积农田环境的实时监控和智能调控，完成精准种植、自动化采收等作业，为农业生产托管、半托管等新型规模化经营模式发展助力。另外，随着高素质的新农人，如返乡大学生、新型职业农民、农业经纪人等越来越多，新质生产力工具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区块链溯源系统可以重塑“企业 + 农户”契约关系，农业云平台

^①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目录（2023）》中产业分类列举。

^②资料来源：《盘点习近平关于创新的 12 条“要论”》，央广网，2015 年 8 月 16 日，https://m.cnr.cn/news/20150816/t20150816_519552746.html。

整合 AI、新一代通信技术、大数据、云计算、北斗导航、物联网等技术，可以实现生产要素的跨区域弹性配置和产业链延伸。这些组织形态的智能化转型不仅能够重构传统农业经营组织方式，更可催生出“产研融合”型农业联合体等新型产业组织形态，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从而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三、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概况及面临的挑战

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已经取得重大进展，曾经落后的农业大国正向农业强国迈进。但是，在农业现代化继续推进的进程中，仍面临诸多亟待化解的挑战和困难。

（一）农产品生产能力显著增强，但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

我国以全球 9% 的耕地养活近 20% 人口，口粮自给率接近 100%，谷物自给率超 95%，成为全球粮食系统稳定器。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粮食产量连续多年保持在 6.5 亿吨以上的历史高位，2024 年又突破 7 亿吨，再创新高。其中，小麦总产量为 1.38 亿吨，近 5 年年均增长 1.0%；玉米总产量为 2.80 亿吨，近 5 年年均增长 2.1%；稻谷总产量 2.08 亿吨，近 5 年年均略降 0.2%；大豆总产量达到历史峰值并维持在 2000 万吨以上，近 5 年来年均增长 3.9%。在产需关系上，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估算，我国口粮产量略高于消费量，小麦每年的消费量约 1.2 亿~1.25 亿吨，稻谷每年消费量 2 亿吨左右，口粮供给充足、库存充裕。另外，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水果和蔬菜生产国、最大的猪肉生产和消费国、最大的水产品生产国，“两水一菜一叶”（水果、水产品、蔬菜和茶叶）是出口优势品类。

但是，由于畜牧养殖产业发展较快，饲料粮需求大，玉米和大豆缺口较大，品种结构性矛盾突出。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预测，到 2030 年，玉米的产需缺口将从近 3 年平均的 2000 万吨左右扩大到 3000 万吨左右，大豆的产需缺口有可能缩小，但绝大部分仍需要进口。同时，粮食生产的区域性结构矛盾也更加凸显。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 13 个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从建国之初的 63% 提高到目前的近 80%，粮食生产进一步向主产区集中。能够调出粮食的省份已经从 2003 年的 13 个减少至当前的 6 个，分别是河南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安徽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23）》的数据，2022 年，我国三种粮食现金收益为每亩 778.7 元，加上各种补贴每亩粮食年收益仅 1000 元左右，种粮农民收入微薄。粮食主产区的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除山东省、江苏省外，其余全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陷入“工业小省、税收薄省、财政穷省、经济弱省”的窘境。

（二）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升，但研发效能有待提升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重视农业科技创新，建立了学科分类齐全的农业公共科研体系。我国生物育种技术全球领先，主要农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自主选育品种面积达 95% 以上，蛋鸡、生猪、奶牛良种覆盖率均达 90% 以上（钱加荣等，2022）。袁隆平团队研发的第三代杂交水稻技术已输出到东南亚、非洲等几十个国家；通过基因编辑已经育成抗白粉病小麦、高油酸大豆等新品种；华系猪、京红蛋鸡等自主品种市场占有率超过 50%，打破国外垄断。细胞培养肉、合成淀粉等一大批高科技产品取得重大突破。中国主导制定了《智慧农业传感器网络》等多项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标

准。2023 年，全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63.2%（目标 2030 年达 70%），标志着我国农业发展方式已经发生根本转变。

尽管我国农业科技综合实力已跻身全球领先行列，但与发达国家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80% 的水平相比，仍存在显著差距。第六次国家技术预测调查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农业农村领域科技发展呈现梯次分布特征，实现同步发展的并跑技术占 39%，仍需追赶的跟跑技术高达 51%，而具备国际领先优势的前沿技术占比仅为 10%。我国农业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依然偏弱，基础研究相对薄弱，产学研、育繁推脱节，常常呈现出“研究热门、应用哑火”的现象，成果转化效率不高。科技推广环节十分薄弱，同质化竞争严重。

（三）农机装备和基础设施再上新台阶，但整体实力不强

经过多年积累，我国农机装备技术创新已经取得瞩目的成就，主要粮食作物全程作业装备体系基本建立，部分装备接近国际先进水平；针对棉花、番茄、甘蔗、花生、马铃薯等经济作物种收薄弱环节开发了一批装备，自主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智能信息大数据新技术得到升级，农业传感器、农业机器人及大数据、AI、信息技术的应用，推进了新一代智能农机装备性能提升、品种增加，并逐步融入智能农场、智能植物工厂、智能牧场、智能渔场、智能果园、农产品加工智能车间、农产品绿色智能供应链等（唐华俊，2020）。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农业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截至 2023 年底，全国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 10 亿亩，其中 13 个粮食主产省（区）累计建成面积约占全国的 70%。^① 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全覆盖，基本实现农村城市“同网同速”，这为信息获取、水肥种药精量施用、质量追溯及检测等技术的普及奠定了信息化设施基础。但是，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属于低水平的高机械化率，国产农机产品以中小型、中低端为主，大型农机装备和智能设备核心部件（如高端传感器、芯片）仍然依赖进口，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水平低，智慧农业起步晚，农产品冷链运输系统不完善。另外，各地已建高标准农田普遍存在着土地碎片化的情况，土地集中连片规模还不够；部分已建成的农田基础设施落后于实际发展需求，如机耕路偏窄、田间定位监测点密度过低等，造成了建设质量不达标的问题。

（四）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初步构建，但三产融合发展水平不高

近年来，我国农林牧渔总产值保持年均 6.4% 的增长速度，2022 年达到 15.6 万亿元，其中农业产值增速最高，达 8.5%；^② 农产品附加值不断提升，全国加工转化粮食已达 5.5 亿吨，近 3 年来年均增长 4.6%，粮食加工转化率达 83.3%，粮食加工转化能力稳步提高。^③ 粮油加工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3.08 万亿元，同比增长 6.1%。多个粮食主产省的粮油加工业总产值超过千亿元。随着新技术在农业领域的深入渗透和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成为拓展农业多功能性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22）》显示，目前，全国已形成超 3 万个涉农电商平台，构建起企业对企业（B2B）交易、网络零售等多模式协同发展的电商生态体系；2022 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 2.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3.6%。通过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

①郁琼源：《报告显示：全国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 10 亿亩》，中国政府网，2024 年 9 月 10 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9/content_6973512.htm。

②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③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等：《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年鉴（2023）》，中国农业出版社，2023 年。

目，截至 2022 年 7 月，已支持在 1489 个县建成 2600 余个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和物流配送中心。但是，我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初级阶段特征明显，农业多功能性开发不充分，休闲农业仍以初级观光形态为主，特色化、体验式项目占比较低。涉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4 万余家，^① 上市公司 200 余家，占规模以上企业数的比例仅为 0.5%，显著低于全国 1% 的平均水平。^② 大部分涉农企业小而散，综合竞争力不强，深加工产品占比不足，仓储冷链覆盖率较低，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农产品品牌明显偏少。电商运营缺乏特色，现有平台同质化严重，多功能综合服务水平较低。此外，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还面临设施农业和厂房建设用地指标不足，涉农企业信贷满足率低，数字农业技术人才缺口等制约。

（五）农业绿色发展形势向好，但生态环境欠账依然较多

近年来，我国农业克服了重大疫情和极端天气等不利因素的影响，统筹农业稳产保供与绿色发展，农业转型持续深化。根据 2022 年和 2023 年《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22 年，全国农业绿色发展指数 77.9，比 2015 年提高了 2.71；农业产地环境保护治理取得新进展，全国农用化肥施用量（折纯量）5079.2 万吨，较 2021 年减少 2.15%，连续 7 年持续下降；2021 年，农药使用量（折百量）为 24.83 万吨，其中微毒、低毒和中毒农药用量占比超过 99%；全国绿色质保体系加速构建，三大粮食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覆盖率达 42.4%，主要农作物绿色防控覆盖率提升至 46%，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 58.6%；全国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成效显著，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 86% 以上，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78%，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稳定在 97% 以上；我国优质农产品供给能力增强，截至 2023 年底，我国新增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认证产品 18221 个，完成 1351 个名特优新农产品登记认证；建成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约 1.77 亿亩，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8.5%。但是，生态退化和环境问题依然突出。例如，东北黑土区水土流失面积 21.87 万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 2.28 亿亩，超过全国耕地总面积的 1/10；黑土层平均厚度 30 厘米左右，比开垦之初减少约 40 厘米。^③ 据生态环境部公布的 2022 年数据，农业面源污染已超过城市生活、工业点源污染，成为地表水首位污染源。虽然我国化肥农药实现“双减”，但施用总量依然较大。地膜的不合理使用导致的耕地污染较为普遍。全球气候危机迫在眉睫。世界气象组织 2024 年 6 月发布的《全球年度至十年际气候最近通报（2024—2028）》中发出警报，未来 5 年全球年均气温较工业革命前（1850—1900 年）升幅突破 1.5℃ 的可能性达到 80%。这一关键数据标志着全球气温升幅正在逼近《巴黎协定》设定的气候安全防线，全球气候系统正面临重大风险。又据联合国相关机构统计，全球农业用地释放出的温室气体超过全球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14% ~ 30%，^④ 同样面临降碳减排的压力。

四、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农业现代化的政策建议

利用新质生产力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是突破传统农业瓶颈、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结合

①这里的涉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指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及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烟草制品业。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24）》。

②作者根据 CSMAR 数据库中涉农上市公司数据计算而得。

③李慧、张士英：《守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聚焦东北黑土地保护》，《光明日报》，2021 年 1 月 28 日，第 01 版。

④张纪兵：《实现“双碳目标”亟需关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百家号，2022 年 6 月 10 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5257162742201780&wfr=spider&for=pc>。

当前农业发展的核心挑战与前沿趋势，以下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系统性的政策建议。

（一）增强科技创新的核心驱动

按照“市场导向、产业牵引、技术驱动、利益共享”原则，整合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资源，搭建企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战略合作平台，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创新产学研相结合、“育繁推”协同的体制机制。加大涉农科技研发投入，设立农业科技专项基金，支持数字农业、基因农业等颠覆性技术研发，并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缩短从实验室到田间的周期。重点支持现代生物技术、重大新品种和产品创制，如耐盐碱、抗旱抗逆作物新品种选育，满足粮食安全和功能化消费需求。通过基因编辑、分子标记等技术提升育种效率，推动种业“卡脖子”技术攻关。加快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地和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农业科技园区、重大农业科技工程设施等平台建设。

（二）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设施农业、智慧农业，加快构建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植物动物微生物并举的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创新食品加工技术，生产新型食品，如植物基食品、发酵食品和功能食品；以科技为支撑，拓展食物来源，支持深海远海养殖，探索森林、草原、江河湖海等食物来源渠道。支持鼓励低蛋白饲料等产品研发，全方位拓展国内蛋白饲料替代品的供给来源，降低饲料中豆粕用量占比。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增强农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性，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保驾护航。

（三）推进智能装备与智慧农业

加大智能农机研发推广力度，逐步攻克农机的关键环节技术难题，突破大马力机耕深翻、水稻机插机抛、玉米籽粒收割、无人机撒药、甘蔗机械收割、山地丘陵适用小型机械等方面的技术瓶颈，研发适应性微型农业机器人，“以机适地”或“以地适机”，拓展机械化多场景应用（郭澄澄、安淑新，2025）。支持北斗智能监测终端及辅助驾驶系统集成应用，构建垂直领域的“农业大模型”，建设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谋划实施“天空地”一体化农业观测网络等重大项目。实施农林牧渔智慧赋能计划。以“需求导向、技术驱动、生态共赢”为核心，通过政策、技术、人才、资金的系统性投入，推进智慧农业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全域升级。完善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探索与作业量挂钩的补贴办法，地方要履行法定支出责任。优化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探索与作业量挂钩的补贴办法。

（四）加快基础设施的数字赋能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统筹土地整治、灌溉排水和田间道路系统，提升耕地质量与抗灾能力。有条件的地方配套建设农业物联网等新基础设施，增强粮食生产的智慧管控能力和防灾减灾能力，实现降本增效。完善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加快农村 5G 基站、光纤网络覆盖，建设县域农产品冷链物流中心和数字集配平台，破解“最后一公里”流通瓶颈。依托全国农业科教云平台，开发在线课程，普及智能设备操作、数据分析等技能。培育“数字新农人”，鼓励青年返乡创业，打造农村电商示范村。

（五）延伸农业产业链与价值链

建立和完善农产品加工设施，通过初加工和深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重点发展高附加值现代食

品、果蔬、花卉和立体农业。挖掘“土特产”优势，通过品牌化、标准化提升竞争力，推动地理标志产品与国际市场接轨。加强产业链纵向延伸与横向融合，推动建立“生产—加工—物流—营销”全链条体系；提升农业价值链，创新“电商+”融合发展模式，建设区域性综合服务平台，培育国家级农产品电商品牌集群，提升产品市场覆盖率和影响力。在优势产区建设农业产业园区或产业集群，集聚资源，形成规模效应。支持上下游企业的协作和资源共享，提高整体竞争力。发展农业信贷、农业保险等金融产品，降低产业链延伸的风险。实施龙头企业培育工程，支持农业龙头企业与合作社发展“公司+农户”“订单农业”模式，利用资本和技术优势带动小农户融入产业链。推广农机共享、托管服务等社会化服务，解决小农户生产效率低的问题。推动农业与旅游、文化、康养等产业的融合发展，开发农业观光、乡村旅游等新业态。

（六）推动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推进农业绿色转型，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继续推行农药化肥“双减”，实施废弃物资源化、生产清洁化、模式生态化，建立耕地质量监测网络。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恢复传统生态种植模式（如稻鱼共生系统），促进农业景观与生物多样性协同发展。根据区域资源禀赋，分类推进生态农业区（如山地林果）、集约化主产区（如平原粮食基地）和都市农业带，实现生产与生态平衡。试点农业碳汇交易机制，探索生态补偿政策。需适应性技术供给与新型农业保险探索并重，提升黑土地保护性利用技术采用率；进一步提高水资源节约水平和有效利用率。完善农业水利设施，构建智慧农业水网体系；提高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能力。

参考文献：

1. 魏崇辉：《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意涵、历史演进与实践路径》，《理论与改革》，2023年第6期。
2. 张秀青、王福强、冯伟波等：《积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新增长引擎》，《宏观经济管理》，2024年第8期。
3. 何传启：《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和基本经验》，《学习论坛》，2013年第5期。
4. 陈明：《世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三条道路”》，新浪财经头条，2023年6月16日。
5. 戴木才：《新中国70年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光明日报》，2019年10月18日。
6. 石平洋：《“四个现代化”是如何提出与发展的》，《学习时报》，2020年5月29日。
7. 马晓河、杨祥雪：《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农业经济问题》，2024年第4期。
8. 钱加荣、毛世平、林青宁：《农业强国光明谈——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布局，走好农业强国之路》，光明网，2022年11月21日。
9. 唐华俊：《智慧农业赋能农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农机科技推广》，2020年第6期。
10. 郭澄澄、安淑新：《我国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阶段特征、问题挑战与实施路径》，《农业经济》，2025年第1期。

责任编辑：郭霞

要素保障赋能经济大省挑大梁： 为何与何为^{*}

林炜炜 徐致远

摘要：2024 年下半年以来，中央部署一系列超常规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强化土地、能源、环境、数据等生产要素的保障，为经济大省加快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经济大省既在“量的合理增长”上走在前列、“质的有效提升”上示范引领，又在“服务国家战略”上主动担当。本文从经济提质增效、深化改革开放、产业创新发展、筑牢安全底线、保障民生就业五个方面展开，阐述经济大省为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当前，我国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经济大省面临国内外经济社会形势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受到土地、劳动力、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的制约，发展潜力还未充分释放出来。因此，本文建议围绕“四个聚焦”，提升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效益，进一步提高各类资源要素支撑能力，多措并举支持经济大省扛稳挑大梁重任。

关键词：要素保障 经济大省 高质量发展

作者简介：林炜炜，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徐致远，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二部副主任。

经济大省家底实、韧性强、潜力大，在全国经济发展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使其更好发挥带动和支柱作用。^① 202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鼓励其他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② 2025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苏省代表团审议时进一步强调经济大省要挑大梁，并深刻指出经济体量大，向前发展就需要更大的推动力。^③ 2025 年是“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之年，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要锚定“走在前、挑大梁”目标，进一步强化经济大省的要素保障，瞄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全力冲刺，为坚定扛稳经济大省挑大梁重任赢得战略主动。

^{*} 本文为 2024 年度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基础课题“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研究”以及案例课题“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导要素市场化配置实践案例研究”的阶段成果。

①资料来源：《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人民日报》，2024 年 9 月 27 日。

②资料来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4 年 12 月 13 日。

③资料来源：《习近平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经济大省要挑大梁为全国发展大局作贡献》，《人民日报》，2025 年 3 月 6 日。

一、经济大省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面对复杂的内外部环境，经济大省以当表率、做示范、走在前的果敢担当，在经济提质增效、深化改革开放、产业创新发展、筑牢安全底线、保障民生就业上强化担当，以高质量发展新成效为稳定全国经济社会作出突出贡献。

（一）夯实经济增长基本盘

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至关重要。经济大省经济总量大、财政状况较好，是国家经济大盘的核心支柱。

1. 从经济总量看，经济大省经济增速快、规模大，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2024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 134.9 万亿元，首次突破 130 万亿元，^① 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其中，广东省、江苏省、山东省、浙江省、四川省、河南省六省^②经济总量达到 59.56 万亿元（见图 1），占全国比重 44.15%，贡献了 45.62% 的全国经济增量。从经济增速看，2024 年我国经济增速为 5%，^③ 除了广东省之外，其他五省经济增速均快于全国平均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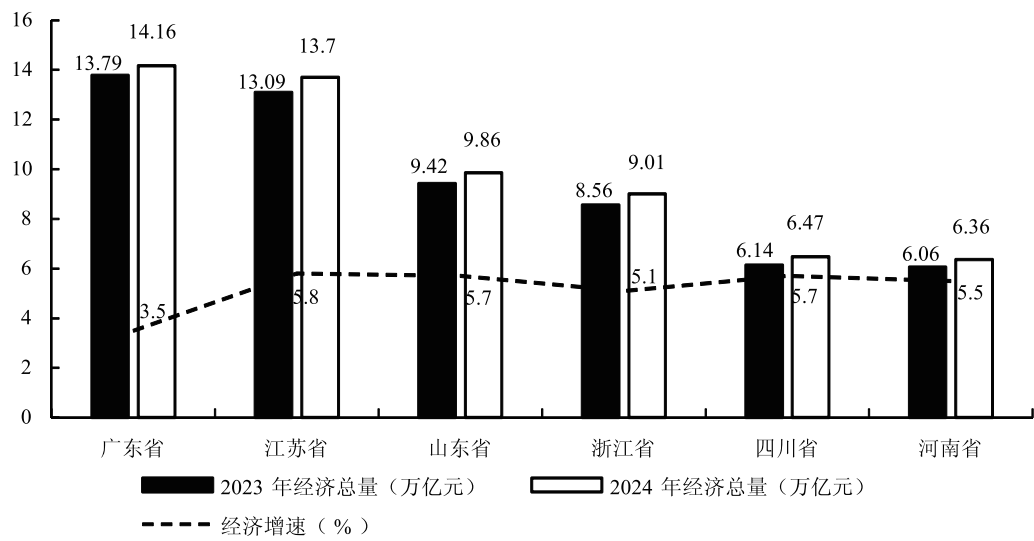


图 1 2023—2024 年经济大省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速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 从财政税收看，经济大省税收增长稳定，对全国税收贡献大

2024 年上文所述六省创造税收收入 3.58 万亿元，^④ 占全国地方级税收的 30.04%。广东省、江苏省制造业基础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税收增长稳定；山东省经济结构优化，绿色经济和新兴产业税收贡献增加；浙江省民营经济活跃，数字经济和服务业税收贡献显著；四川省经济增长较快，尤

①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2025 年 2 月 28 日。
②2022 年 8 月 16 日，经济大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在深圳召开，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河南省、四川省六省省长参会发言，因此本文所指的经济大省主要是这六省。
③同①。
④财政部：《2024 年财政收支情况》，财政部网站，2025 年 1 月 24 日。

其是成都市等中心城市对税收贡献较大；河南省经济规模较大，但产业结构以传统产业为主，税收增速相对平稳。另外，六省在地方对中央财政净上缴中贡献近 80%，有力支撑了国家财力和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

3. 从拉动消费看，经济大省消费市场活跃，增长潜力较大

2024 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48.79 万亿元，比 2023 年增长 3.5%；^① 其中，六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22.62 万亿元（见图 2），占全国 46.36%，比 2023 年增长 3.9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4 个百分点，有效拉动了全国消费总体水平。广东省、江苏省、四川省消费市场活跃，区域辐射带动作用明显；山东省消费结构持续优化，绿色消费和农村消费成为增长点；浙江省消费升级趋势明显，数字经济和新消费模式发展迅速；河南省品质类消费需求持续释放，增长潜力较大，市场空间广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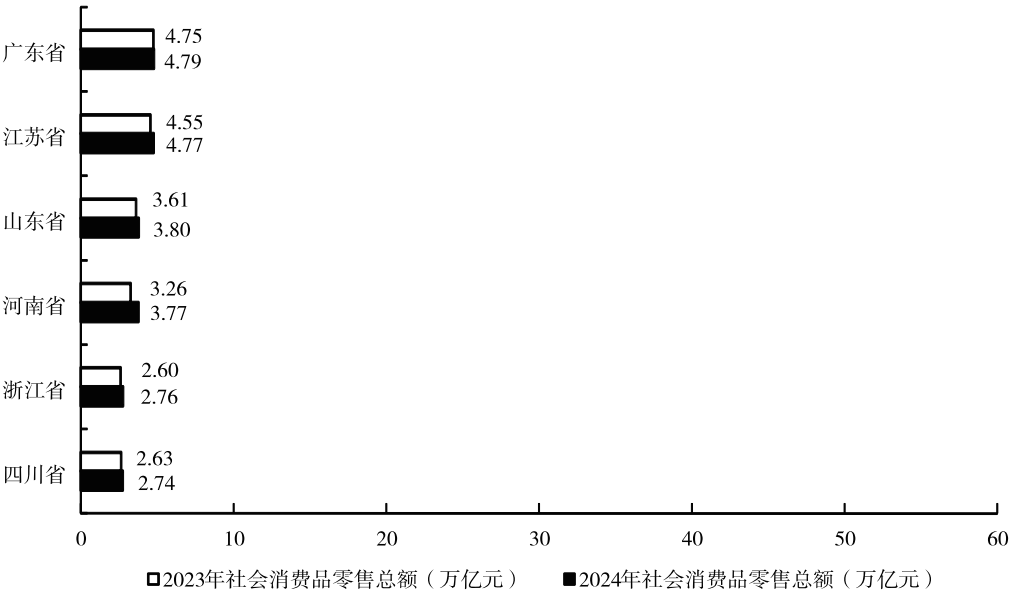


图 2 2023—2024 年经济大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二）勇当改革开放动力源

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经过长期实践找到的一条正确发展路径。经济大省积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激发和增强经济社会活力，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1. 在深化改革上，经济大省不断推进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大省积极承担国家改革任务，加强改革系统集成，充分释放改革效应，持续深化财税金融、国资国企、民营经济、农业农村等重点领域改革。持续完善“一网通办”“一件事一次办”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提升。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全国登记在册经营主体 1.88 亿户，^② 其中六省经营主体总量占比超过 40%，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的企业数量增长迅速。

①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2025 年 2 月 28 日。

②赵文君：《全国登记在册经营主体达 1.88 亿户》，中国政府网，2024 年 11 月 8 日。

2. 在扩大开放上，经济大省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2024 年我国进出口总值达到 43.85 万亿元，同比增长 5%，^① 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其中，六省进出口总值达 25.24 万亿元，占全国比重 57.56%（见图 3），广东省、江苏省和浙江省三省占全国比重高达 45.60%，有 4 个省份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024 年江苏省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占全国近 1/6，^② 广东省外贸总额连续 39 年稳居全国首位，^③ 经济大省对外开放支点作用凸显。经济大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提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规则利用率，广东自贸试验区累计形成制度创新成果 772 项，全国集中推广 43 项，占全国的 25%。^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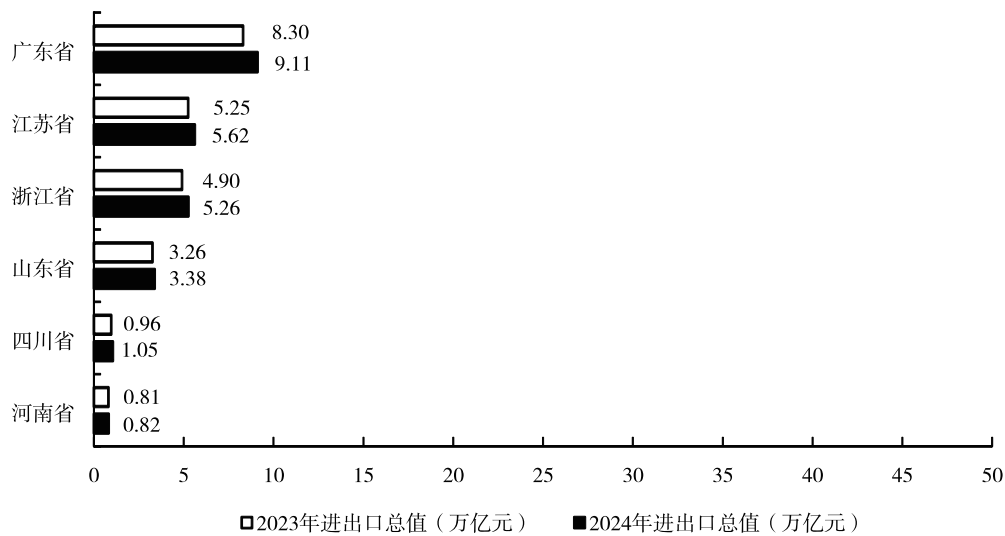


图 3 2023—2024 年经济大省进出口总值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三）打造产业创新增长极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推动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的关键力量。经济大省作为制造业大省、科技强省，是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策源地”。

1. 产业体系方面，经济大省产业门类齐全、产业配套能力强、产业集成优势明显，建立起相对完善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024 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 9.14 万亿元、49.21 万亿元、76.56 万亿元，占 GDP 比重分别为 6.8%、36.5%、56.7%。^⑤ 六省产业基础雄厚，四川省、河南省第一产业占比高于全国平均值，浙江省、广东省第三产业占比全国领先。江苏省、山东省、浙江省、广东省、河南省第二产业占比高于全国平均值，是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省。江苏省制造业集群化优势明显，服务业与工业深度融合；山东省工业新旧动能转换加速，服务业向高端化延伸；浙江省数字经济驱动第三产业持续壮大；广东省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河南省制造业承接东部转移，服务业依托交通枢纽崛

①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2025 年 2 月 28 日。

②许昆林：《2025 年江苏省政府工作报告》，江苏省人民政府网，2025 年 1 月 26 日。

③广东省人民政府：《2024 年工作回顾》，广东省人民政府网，2025 年 1 月 19 日。

④官方文清等：《聚焦广东两会——省商务厅：广东自贸试验区形成制度创新成果 772 项》，央广网，2025 年 1 月 16 日。

⑤同①。

起；四川省清洁能源优势突出，文旅产业和数字经济发展迅速。截至 2024 年底，六省共培育出 43 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占全国比重为 53.75%，^① 带动了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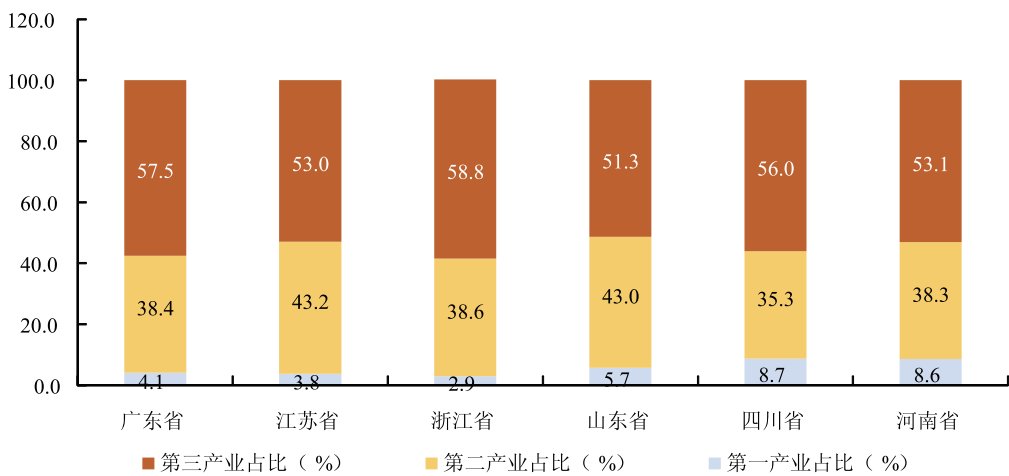


图 4 2024 年经济大省第一二三产业占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 科技创新方面，经济大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技术创新为经济稳增长提供强力支持

2024 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超 3.6 万亿元，^② 六省研发经费投入占全国 50% 以上，整体研发强度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广东省人工智能和 5G 通信、江苏省智能制造和新材料、浙江省数字经济、山东省 海洋科技、河南省农业科技、四川省航空航天等领域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六省积极打造具有全球竞 争力的创新生态，四川省新型显示面板出货量居全国第三，全球近 20% 的柔性屏为“四川造”；^③ 长 三角和珠三角在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领域形成全球竞争力，催生了华为麒麟芯片、 DeepSeek 人工智能模型等一系列标志性成果。

（四）筑牢经济安全压舱石

经济安全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人民福祉的根本保障。经济大省全力保障粮食、能源资源、重 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1. 从粮食安全看，经济大省严控耕地红线，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
- 河南省、山东省作为农业大省，粮食产量多年位居全国前三，江苏省、四川省粮食产量也在全国 前十。这四省是全国粮食核心产区。广东省、浙江省粮食因自给率较低而依赖外调，更加注重供应链 稳定、储备多元化和科技补短板。各省围绕产购储加销各个环节综合施策，增强粮食供给体系韧性， 保护种粮农民和粮食主产区积极性，健全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双向利益补偿机 制，不断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2. 从能源安全看，经济大省加强能源储备能力建设，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
- 河南省能源产量居全国前列，积极推进能源结构优化和绿色低碳转型。山东省、四川省能源高度 自给。山东省作为全国首个“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大力推动传统能源与新能源的转型升级，

^①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公布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计算而得。

^②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2025 年 2 月 28 日。

^③张守帅、吴忧、文露敏：《故事里的高质量发展四川 国新办新闻发布会四川专场问答透视》，四川在线，2024 年 5 月 27 日。

2024 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 1.15 亿千瓦；^① 四川省水能资源丰富，是全国水电第一大省，需着力加快开发川南地区页岩气，以新能源补充水电波动。广东省、浙江省、江苏省高度依赖外部能源输入，广东省依赖西电东送、进口液化天然气（LNG）、煤炭等外部输入，浙江省外电输入用电量约1/3，^② 江苏省高度依赖煤炭和外来电力。这三省都通过多元化供应和本地清洁能源，弥补能源短板，确保能源安全。

3. 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看，经济大省加快构建安全可控、开放多元、协同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广东省在电子信息、汽车制造、家电等核心产业加快全产业链布局。江苏省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高端装备等产业提高与海外市场的供应链协同能力。山东省以增强产业链创新能力为核心，以产业链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为重点，铸造、钣金等机床生产本地配套率高。浙江省、四川省侧重多元化与区域协作，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促进区域联动、协调发展。

（五）构建民生就业稳定器

民生就业是国家稳定与发展的核心要素，经济大省作为人口大省，通过吸引人才、提升劳动力素质、优化就业结构、完善社保和公共服务等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全国就业稳定、增进民生福祉作出重要贡献。

1. 人口结构方面，经济大省人口总量大，老龄化程度差异较大

2024 年六省人口总量近 5.62 亿人，占全国总人口近 40%，其中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近 1.17 亿人，占六省人口总数 22%（见图 5），占全国老年人口 37.7%。广东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位居全国第一，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 14.17%，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处于轻度老龄化社会；山东省、江苏省、浙江省、四川省、河南省五省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均超过 20%，已处于中度老龄化社会。广东省与其他经济大省在人口年龄结构上差异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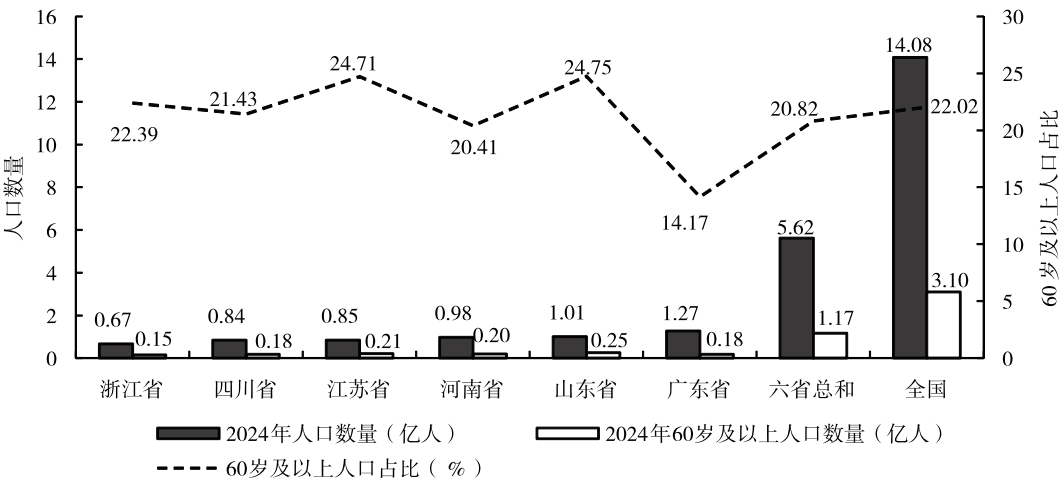


图 5 2024 年经济大省人口数量及老年人口占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①周乃翔：《2025 年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山东宣传网，2025 年 1 月 25 日。
②陈丽莎：《国网浙江电力着力纾解建设新型电力系统核心问题》，人民网，2022 年 4 月 18 日。

2. 社会保障方面，经济大省社会保险参保成效显著，努力实现“应保尽保”目标

通过政策优化和服务改进，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持续提升，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四省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高于 95%。^① 城乡居民和企业职工参保覆盖面进一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人员、农民工等群体成为参保扩面的重点。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参保率显著提高，区域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

3. 就业收入方面，经济大省也是用工大省，就业承载力强大

2024 年全国新增就业人数 1256 万人，^② 其中六省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755.57 万人，占比 60.16%。广东省城镇新增就业超 143.56 万人，位居全国第一，超出国家下达 110 万人的年度任务。^③ 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三省的高新技术产业、金融行业和外贸行业就业机会多，山东省、四川省、河南省三省的农业和制造业提供就业岗位多。2024 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 4.13 万元，^④ 其中浙江省、江苏省、广东省、山东省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居民幸福指数持续提升。

二、经济大省面临的国内外机遇和挑战

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要科学研判、准确把握当前发展面临的环境形势，抓住机遇、化危为机，为坚定扛稳经济大省挑大梁重任赢得战略主动。

（一）从机遇看，我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面临重要契机，国内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

国际方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在经济实力“西强东弱”大背景下，全球经济“东升西降”态势明显。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快速崛起，发展中经济体 GDP 占世界的比重越来越大。其中，我国 GDP 占发展中经济体比重超 40%，对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比重上升的贡献率近 70%，对世界经济、科技、文化、政治格局产生深刻影响。我国参与和推动的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合作机制等平台作用进一步增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引导及 RCEP 的实施，有力推动了南北半球经贸合作，将成为在日趋碎片化的格局中推动构建全球治理新秩序的关键力量。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汹涌澎湃，人工智能、物联网、生物技术、量子计算、类脑智能等核心技术相互渗透、交叉融合，重大颠覆性创新不断迸发。伴随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加快形成以及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加速，经济大省凭借区位优势、制造业基础优势和人力资源优势，将迎来全球供应链重组、全球产业梯度转移、区域经济合作、数字化转型和绿色经济的重要机遇。

国内方面，我国是超大规模经济体，产业结构齐全、产业配套能力强，供给和需求都能够支撑国内大循环，既有“量”上有大国经济的规模优势、市场优势、人才优势，也有“质”上有创新优势、制度优势、社会稳定优势。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将不断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效应会持续显现，为经济大省重塑经济增长系统性合力释放制度红利。新质生产力正在推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催生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战

①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 2024》计算而得。

②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2025 年 2 月 28 日。

③王伟中：《2025 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人民网，2025 年 1 月 19 日。

④同②。

战略性新兴产业，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不断涌现，为经济大省布局新产业抢占新赛道、赢得发展主动权带来有利环境。

（二）从挑战看，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仍将面临全球经济治理、外资外贸、产业链供应链，以及国内结构性、周期性、体制性的风险挑战

国际方面，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深刻演进，大国竞争和地缘风险共振，和平发展合作大势面临干扰，国际贸易投资合作面临挑战，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和难预料性明显增加，国际经贸、投资、生态、数字等领域或面临更多治理赤字。一是全球经济增长将有所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5年全球经济将放缓至3.2%，且直到2029年都将基本保持平稳，2029年预计增速为3.1%。^①二是稳外贸稳外资的难度明显增大。受国际贸易摩擦、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复杂因素交织影响，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全球加征关税，将沿着产业、贸易、投资等链条向经济大省传导。比如，广东省电子产品和机械设备、浙江省纺织品和服装、河南省农产品和机械设备以及江苏省、山东省、四川省的机电和化工产品等传统优势产品出口增速放缓。又如，六省外资流入受到国际贸易摩擦和地缘政治紧张的影响，部分外资企业调整了投资计划，有的制造业外资企业转移生产基地。三是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将面临更大挑战。美国或将推动科技产业、经贸投资、金融、人才等关键领域对华实质脱钩，可能涉及对我国科技领域制裁、国际科技合作受限、高科技人才交流受阻等多方面因素，导致我国利用外部资源开展科技创新难度加大，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受到影响。比如，广东省芯片、精密设备等关键零部件高度依赖进口，江苏省半导体设备、医药原料药对外依存度高，山东省高端化工材料、芯片等仍依赖进口，这些都容易受到国际技术封锁的影响。又如，河南省传统产业升级缓慢，高端装备核心部件依赖省外采购，粮食加工产业链附加值低，易受国际粮价波动传导；浙江省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弱，原材料价格波动影响轻工业利润，跨境电商依赖国际物流，地缘冲突可能造成供应链中断。

国内方面，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周期性、体制性问题仍然存在。一是内需不足问题比较突出。我国外需增长不确定因素增多、大幅上升空间受限，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作用将更加明显。近期高于GDP增速的指标（如工业增加值等）多集中于供给端，低于GDP增速的指标（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等）多集中于国内需求端，需求增长偏弱已成为影响经济大省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二是就业结构性矛盾和总量风险仍有扩大倾向。第一产业产值和就业人数不匹配问题尚未有效改善，就业岗位总量增长可能受限；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更多向第三产业涌入，就业质量和收入水平有所下降。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居民收入比虽缩小至2.34，^②但与发达国家低于2的水平相比差距依然较大。三是国内经济运行中的周期性风险仍然存在。部分行业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产能利用率相对较低，居民稳就业促增收压力加大，价格水平总体低位运行，市场信心仍待提振。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经历前期下行，目前仍处于调整筑底期，地方债务和财政运行压力明显，对经济大省稳定投资、促进消费造成一定冲击。四是一些长期积累的体制性问题有待破解。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仍需加力，要素流动不够顺畅，优质要素向高效率地区和行业集聚不够明显，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活力的激发。制度型开放顶层设计和试点试验有待加强，国内外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不够，制约了投资、贸易、金融、创新等重点领域开放合作质量，经济大省推动自主开放仍有较大空间。

^①后欽桐：《IMF：全球经济增长料将保持平稳，但下行风险变得更显著》，第一财经，2024年10月22日。
^②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2025年2月28日。

三、经济大省面临的主要要素制约

当前，经济大省的要素保障还存在短板，开展要素领域改革探索自主空间有限，关键领域突破性改革仍然面临不少体制机制障碍，有些点上改革措施难以形成系统性制度经验，要素领域协同配置有待加强，发展潜力还未充分释放出来。

（一）土地要素改革力度不大

经济大省土地资源稀缺、土地供需矛盾突出，普遍建设用地紧张。如浙江省人均耕地面积仅 0.34 亩，约为全国人均耕地的 24%，^① 耕地资源稀缺情况长期存在，因此存量建设用地盘活还需加大力度。另外，重大项目、重点产业落地受到城镇开发边界限制，特别是国家战略明确的互联互通交通用地大量挤占地方规划空间规模，导致一些地方城镇发展空间不足。如四川省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小，城镇开发边界增量空间规模不及江苏省、广东省、山东省的 50%。经济大省跨区域土地要素流动不够顺畅，深汕特别合作区、川渝高竹新区等合作开发区，在跨区域地块出让过程中存在要素配置标准不统一、土地出让合同签订和不动产登记规则不明确等问题。经济大省建设用地“增存挂钩”制度有待完善，如浙江省处置力度大的部分城市，因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基数小，获得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变少。

（二）劳动力结构性矛盾凸显

经济大省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供给分化加剧。我国老龄化程度正由中度转向重度，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占比持续下降。根据“七普”数据，广东省、浙江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分别位列第 1 位和第 3 位，人口总体上相对年轻，人口红利更容易转化为人才红利。山东省、江苏省作为制造业大省，迫切需要大量的劳动适龄人口，但是人口老龄化程度却最深，老年人口总量位居全国前两位。另外，人口老龄化也将影响劳动投入和总需求以及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特别是住房等与生命周期关系密切的投资消费。经济大省技能错配与产业升级需求矛盾加剧，产业升级对技能型劳动力的需求增速远超供给。作为制造业大省，山东省制造业投资增势保持稳健，2024 年第二产业投资增长达 14.9%，其中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5.9%，^② 但技能人才缺口达 10.9 万人，^③ 高端装备制造、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人才需求最多。浙江省和山东省的“双一流”高校数量仅有 3 所，非常缺乏算法开发、智能装备运维等中高端领域的数字人才。

（三）技术创新体系还需加力

经济大省关键领域“卡脖子”问题仍待突破，高端制造、基础软件等领域的对外依存度较高，工业软件市场被欧美企业垄断，广汽、美的等龙头企业每年支付国外工业仿真软件许可费数十亿元。技术“断链”风险仍然存在，我国汽车用芯片进口率超 90%，电动汽车中价值仅次于动力电池的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IGBT），98% 以上需要从国外进口，且价格是国外的 1.2 倍至 1.8 倍。^④ 经济大省研发投入强度领先全国，但是科研成果转化仍然存在产学研利益分配机制不够、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较

①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守护良田 惜土如金 西湖区耕地保护工作巡礼》，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门户网站，2023 年 6 月 21 日。

② 山东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山东调查总队：《2024 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解读》，山东省统计局网站，2025 年 1 月 20 日。

③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2024 年度重点人才岗位需求》，山东宣传网，2024 年 4 月 24 日。

④ 杨忠阳：《提升车用芯片自给能力刻不容缓》，《经济日报》，2020 年 12 月 13 日。

低等问题。高校专利转化率较低。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22 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2022 年我国发明专利实施率为 48.0%，而高校发明专利实施率为 16.9%，其中产业化率仅为 3.9%，^① 而美国高校专利转化率超过 50%。

（四）数据要素市场化仍然滞后

数据产权界定模糊引发“资源沉睡”。《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3 年）》显示，2023 年我国数据生产总量达 32.85ZB，同比增长 22.44%。^② 但是，由于数据确权制度和机制不够完善，导致经济大省数据开发和利用不充分，数据交易规模受限制。经济大省数据要素安全与流通存在“两难困境”。《关于完善数据流通安全治理 更好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的实施方案》明确了数据要素的保护、流通与监管等总体工作原则层面的问题，但是在数据要素的流通形式、流通市场准入等方面缺乏明确界定，导致参与主体对数据要素流通产生顾虑。经济大省数据要素布局建设影响“潜能释放”，虽然大力推进数据交易中心、技术园区、超算中心等机构设施建设，但存在定位不明、重复建设的问题。如川渝地区省市两级分别设立数据交易中心，竞争趋于同质化，并未充分考虑当地产业基础、专业人才储备、政府财政收入等实际情况。

四、多措并举支持经济大省扛稳挑大梁重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更好发挥其带动和支柱作用。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在要素保障、科技创新、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等方面制定支持政策。经济大省挑大梁既是使命，更是机遇。要通过政策创新与制度突破，增强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为经济大省加快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一）围绕“四个聚焦”，提升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和效益

1. 聚焦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进一步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

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实现要素充分自由流动，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内在要求。应以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为契机，提升经济大省的要素配置能力。一是强化改革授权。以改革试点为抓手，探索加大经济大省在要素市场化配置方面的试点授权力度。建立要素改革试点“事先承诺 + 中期评估”的激励约束机制。二是强化市场机制。理顺要素价格市场形成机制，减少政府对要素资源直接配置，特别是公共资源的行政性垄断，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畅通要素流动渠道。三是强化制度保障。做好各项改革举措和授权事项与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释的衔接，推动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破除要素流动壁垒，完善各类要素交易制度和技术规范，健全要素市场监管制度规则。

2. 聚焦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提升要素协同配置效率

经济大省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必须夯实要素新支撑，创新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要素配置机制。一是提升要素供给质量。进一步提高土地产出标准，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金融结构和经济结构匹配度，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强数据、知识等新型要素引入。二是加强要素融合。推进技术与资本等要素的紧密结合，实现“科技—产业—金融”的高水平循环，推动资

①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知识产权局 2022 年 12 月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网，2022 年 12 月 28 日。

②全国数据资源调查工作组：《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3 年）》，光明网，2024 年 5 月 24 日。

金链、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三是健全要素交易平台。按照市场化、专业化方向，打造各类要素交易平台，加快发展布局科学、辐射面广的新型交易平台，制定完善统一的交易规则和电子交易服务标准化系统，提高要素配置的效率和效益。

3. 聚焦服务重大优质项目建设，进一步强化土地、能耗、环境要素支撑

开展重大项目建设、拉动固定资产投资，是发挥经济大省挑大梁作用的重要抓手。为推动重大项目落地，需要进一步打破土地、能耗、环境等要素制约。一是加强要素省级统筹。指导经济大省进一步理顺项目落地能耗、土地、资金、环境容量等关键要素，促进要素安排与发展需求精准对接。强化土地、能耗等要素省级统筹，确保投资规模实现新跃升。二是推动土地差异化供给。研究制定与区域经济布局相协同的差异化用地政策，赋予省级政府更大用地自主权，强化用地审批与项目审批权限相互衔接。三是加强配额市场化配置。通过优化配额分配方法，完善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等市场化交易机制，将有限的指标动态配置给使用效率更高的主体。四是实行资金倾向性支持。加大对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的支持力度，扩大专项债使用范围，在项目申报、资金分配等方面给予更多自主权。

4. 聚焦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进一步吸引集聚国际先进要素

经济大省处在对外开放的前沿，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促进要素跨境流动，提高对全球先进要素的集聚能力，提升国际循环质量水平。一是以改革促开放。按照国家战略布局，部署重大改革试点，发挥经济大省的要素配置能力，积极引入国际先进人才、资本、技术要素。二是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产业政策、创新政策、竞争政策等与国际通行规则相协调，形成有利于要素高效顺畅流动的国际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三是加强配套保障。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完善外国高端人才认定标准、教育医疗保障，在世界范围内吸引顶尖科学团队“揭榜挂帅”。

（二）提高各类资源要素支撑能力，实现“六个突破”

1. 增加土地供给，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突破土地要素制约

多渠道增加经济大省土地供给，建立跨区域土地配置机制，完善跨省域指标交易制度，推广“飞地经济”模式，扩大农村集体土地的入市范围，打破经济大省用地的物理空间局限。另外，提高存量土地使用效率，探索“工业+研发+商服”复合用地模式，允许单一地块混合功能开发，提升单位土地产出效率；推行“标准地+承诺制”改革，明确亩均税收、能耗等指标，通过“带条件出让”实现精准供地；建立低效用地“体检—退出一置换”机制，实现“腾笼换鸟”。

2. 优化人口空间配置，提高劳动力质量，突破劳动力要素制约

加大“投资于人”力度，加强技能培训和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建立城镇教育、就业创业、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地人口挂钩机制。建立“重点产业用工需求预警平台”，实时监测经济大省制造业、服务业用工缺口，动态调整职业技能培训目录。推行省域间人才互认，实现社保、职称、职业资格跨省域无缝衔接。加快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和信息平台，推动建设人力资源市场标准体系。强化农民工权益保障，推动中西部经济大省与东部用工大省签订“劳务协作协议”，将工资支付、工伤保险纳入跨省联合监管。

3. 完善资本市场，创新金融工具，突破资本要素制约

加快发展债券市场和多层次股权市场，创新新三板市场股债结合型产品，推动打造“区域股权交易—新三板—科创板”全链条培育体系，丰富企业投融资工具。支持经济大省设立省级 Pre-REITs

基金盘活存量资产。推动资本向创造价值的优质企业流动，完善金融支持创新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开发与中小微企业需求相匹配的信用产品和多样性的科技金融产品，完善地方金融监管和风险管理体制，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

4.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激发创新活力，突破技术要素制约

支持经济大省建好用好先进技术应用推进中心和各类科技成果转化等创新平台，畅通产业体系、创新资源、资本要素、应用场景、制度政策等，围绕“原始创新—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应用”，实现全链条突破。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权、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健全职务科技成果产权制度，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大力支持各类科研机构和企业技术攻坚，做好配套服务，激发经营主体特别是民营经济的科技创新活力。完善技术交易市场，促进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

5. 完善数据产权制度，释放数据价值潜能，突破数据要素制约

支持在经济大省试点数据资源确权登记制度，推进数据要素确权、定价、流通、交易的标准化、市场化进程，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加快数据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管理的各个环节，促进数据资源的高效利用。构建分类分级的数据授权机制，促进公共数据跨部门、跨区域、跨行业的安全归集整合、有效流通和充分共享，优化经济治理基础数据库。在经济大省重点培育数据资源企业，做强数据技术企业，扶持数据服务企业，做优数据应用企业以及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企业。

6. 加强区域协作，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突破资源环境要素制约

支持经济大省加强与资源型地区全方位合作，在保障经济大省资源能源供给的同时，拉动资源型地区发展。加快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实施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深入推进资源环境要素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建设，助力改善环境质量、节约利用资源、推动技术进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

参考文献：

1. 林炜炜、景策：《新时代的粮食安全：理论指引、时代价值与战略路径》，《全球化》，2024年第1期。
2. 林炜炜：《新时代经济安全的基本内涵、生成逻辑和实施路径》，《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4年第6期。
3. 韩文秀：《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全球化》，2025年第1期。
4. 杨忠阳：《提升车用芯片自给能力刻不容缓》，《经济日报》，2020年12月13日。
5. 彭森：《要素市场化改革》，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24年。
6. 范欣：《新时代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内在逻辑、基本原则与制度保障》，《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年第1期。
7. 盖庆恩、高晶晶：《着力健全要素保障和优化配置体制机制：改革历程、现实挑战与实施路径》，《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8. 王璿：《数据交易场所的机制构建与法律保障——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为中心》，《江汉论坛》，2021年第9期。

责任编辑：谷 岳

数字经济赋能产业融合 催生新质生产力的机理、问题及对策^{*}

姜惠宸

摘要：数字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在为工业、农业、服务业发展赋能的同时，不断拓展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的空间，拓展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思路。本文在分析数字经济特征的基础上，从机理层面具体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如何赋能产业融合，并催生新质生产力成长。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当前发展数字经济赋能产业融合面临的“数字垄断”“数字孤岛”“数据确权”“数字鸿沟”“数实融合不充分”问题。提出为促进数字经济更好赋能产业融合，形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强大动力，要统筹数字经济发展和安全，促进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夯实数字经济发展根基，跨越“数字鸿沟”，赢得“数字红利”；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产业融合及新质生产力成长构筑坚实“数字底座”；加强对数字化转型试点试验的支持力度，促进数字化转型理念发展与传播；提升数字场景示范效应和应用水平，促进新质生产力集群性、规模化成长。

关键词：数字经济 产业融合 新质生产力 数字赋能

作者简介：姜惠宸，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高级经济师职业资格。

引 言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质生产力发展。继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概念后，习近平总书记 2024 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近年来，全球数字化浪潮汹涌，推动产业融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步伐加快，产业融合日益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鲜明主题，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数字经济发展日新月异，正在深刻改变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经济社会治理方式甚至资源配置格局，日益成为推动全球资源要素重组、产业体系乃至经济体系重构、供求关系乃至竞合机制重塑的主导力量；在为工业、农业、服务业发展赋能的同时，也在不断拓展着产业融合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选择空间，日益成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推动经济发展质

^{*} 本文为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研究”（21ZDA027）的阶段性成果。

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最积极力量。正如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指出，技术创新重塑了行业边界，甚至创造了全新的行业，并且也为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实现指数级增长的机遇（Porter, 2014）。不仅是企业，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类机构都在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

如何发展数字经济赋能产业融合并催生新质生产力成长，日益成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需重视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并将其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内容。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中关于数字经济的界定与此基本类似，但特别强调“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量”“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经济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具体包括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数据价值化等内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形成的数字科技创新，一方面，有助于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形成数字赋能的“智慧农业”“工业互联网”“文化+科技”等融合业态；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培育壮大“智能制造”“金融科技”等新兴产业和“先进计算”“人形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对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形成强劲支撑。

数字技术是通用目的型技术。数字经济赋能产业融合，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出发点。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本质是发展具有与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蒸汽机”“发电机”相当，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先进生产力。而数字化正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方向，以数字科技创新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对于促进生产力发展具有较高的潜力，极有可能在驱动生产力变革、形成新质生产力进程中发挥前瞻性引领性的作用。李强总理在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要“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制定支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联合国2023年11月发布的《工业发展报告2024》指出，先进的数字化能提升工业竞争力、创造市场新机遇、驱动未来创新。并且，数据要素在赋能工业甚至农业等各领域场景应用时发挥着重要的乘数效应。中国具有数据资源领域的显著优势，是构筑经济发展新优势的重要基础（刘烈宏，2024）。可见，通过前沿科技创新驱动、以数据要素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带动产业融合发展，是催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源泉。

一、数字经济赋能产业融合并催生新质生产力的机理

产业融合实质上就是由于技术创新、制度创新 and 市场需求变化，包括技术的集成重组和政府管制的放松，所形成的产业边界模糊化和产业发展一体化现象。产业融合不是原有产业的简单相加或并立发展，而是通过产业渗透、产业交叉、产业重组等方式，形成产业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互相融。产业融合往往伴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形成，带来产业发展、供求格局、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组织方式甚至空间形态的重塑和调整。随着产业融合的深化，原本相互独立的产业之间的分工，可能会转化为同一产业甚至同一企业内部的分工，引发产业边界的模糊化和产业间、企业间竞争合作关系的重新调整。产业融合的发展，降低产业运行成本和风险的需求，也会导致数字技术等通用技

术、通用资产的重要性迅速凸显。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往往是产业融合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内在动力。市场需求变化，往往是产业融合并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外部牵引力。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的努力，也是推动产业融合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生机制。

数字技术就是一种重要的通用目的型技术，数字资产也是一种重要的通用资产。通用技术、通用资产的作用凸显，助推产业融合深化和新质生产力形成。数字技术发展往往导致数字产品具有零边际成本特征和规模效应。数字经济的强网络效应、网络外部性和正反馈机制，容易推动数字化企业的价值增长出现指数级效应。鉴于数字产品固定成本高、边际成本低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数字产品的定价往往主要基于顾客价值而非生产成本。这不仅容易导致数字产品或服务差别定价的重要性迅速凸显，还容易导致服务个性化和个性化定制的重要性明显提升。因此，数字经济发展需要重视用户中心化、数据贯通化、生产柔性化，培育注意力经济（戚聿东、肖旭，2022），关注用户流量和用户体验。因而，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的数字经济发展，依托其强大的链接、匹配、融通、赋能、增值功能和需求发掘作用，可以对产业融合发展产生重要的催化、引领作用，甚至可以对产业融合发展产生重要的生态重构、生态赋能效应，促进新质生产力脱颖而出，甚至规模化成长。

数字技术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等特点，可以产生显著的替代效应、渗透效应和协同效应，显著降低搜寻成本、运输成本、追踪成本和确认成本（姜长云，2022），因而数字经济发展可以赋能产业融合并催生新质生产力成长是比较显见的。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2）认为，数字经济的本质是基于新技术应用的连接、联结和协同。其运行机制包括：在交易过程中，通过降低搜寻成本进而降低经济运行成本，导致原先受搜寻成本约束的经济活动得以释放，催生大量的新经济模式；在生产过程中，通过深化分工提高经济效率，为在生产端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在需求端满足更加多样化的消费或投资需求、在市场端提升企业集中度和竞争复杂度提供了便利。数字经济发展还导致经济形态重构和数字经济生态体系的形成。相对于传统的线下经济模式，数字经济的创新组织边界转向模糊化，创新资源由封闭式占有转向开放式共享，创新组织方式也由链条化转向网络化和“去中心化”，甚至创新合作方式也由之前的小范围强联系转向大范围弱联系。可见，数字经济发展引发的变化，也容易对接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需求，并催生新质生产力成长。王佳元（2022）、王佳元和张曼茵（2023）探讨了数字经济赋能产业深度融合的作用机制，将其概括为数据价值赋能、数字技术赋能、网络载体赋能；认为工业互联网赋能产业深度融合，主要是通过产业生态重构、数字融合增值等路径实现的。这些探讨有助于我们从不同层面更好地理解发展数字经济赋能产业深度融合，并催生新质生产力的机理。

发展数字经济赋能产业融合，往往带动产业发展的数字化转型，拓展或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路径。数字化作为信息化的升级版，支撑从信息化到数字化转变的是各种智能终端、中央信息处理功能，如人工智能（AI）、大数据、云计算等，以及互联网等底层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升级改造。从信息化改造到数字化转型的转变，主要体现为技术架构从信息技术到数字技术、需求特征从面对确定性需求到不确定性需求、核心诉求从提升效率到支撑创新、核心目标从以企业内部管理为主到以拓展客户运营为主、技术体系从封闭型向开放型的转变（陈雪频，2022），顺应了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托马斯·西贝尔（2021）提出，数字化转型正在形成巨大的网络效应，催生经济社会各领域一系列指数级的巨大变革。随着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AI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和融合，在推动技术范式快速迭代和平台全面网络化发展的同时，产业深度融合日益成为趋势。实际上，在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加持下，融合越来越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必要基础，甚至融合创造日益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主旋律；共生越来越成为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打造共生共赢的数字生态共同体越

来越成为时代的要求。因而，培育以融合和共生为特征的数字生态圈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数据在其中的关键作用进一步强化（戚聿东、肖旭，2022）。

二、数字经济赋能产业融合并催生新质生产力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一）现实或潜在的“数字垄断”“数字霸权”问题

在发展数字经济赋能产业融合并催生新质生产力的进程中，一些数字平台企业极易通过网络效应在市场中发展形成垄断地位甚至形成“数字霸权”，可能导致其他数字企业（尤其是中小微数字企业）难以打破平台企业制造的“数据壁垒”使其发展受限，甚至导致新质生产力成长受挫。依托平台企业开展产业融合的数字企业，可能因担忧其核心数据会被平台企业利用市场支配地位获取而丧失企业竞争优势，导致数字企业“不敢融合”“不愿融合”，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质生产力的健康发展。如何加强反垄断监管、遏制数字霸权，是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并催生新质生产力的关键。

Loertscher 和 Marx（2020）认为，“数字垄断”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垄断，是由数字企业在数据收集和处理方面具有的“规模报酬递增”特性而形成的，如亚马逊和谷歌都是“数字垄断”的典型代表。该项研究指出，当数字垄断企业的定价行为不受限制时，极端情况下生产者剩余将逐步增加至与社会总剩余相等，即此时消费者剩余为 0，数字垄断企业获取了全部的剩余。因此，需要引入价格调控等政策工具来实现生产者剩余与消费者剩余之间的平衡。李勇坚和夏杰长（2020）提出，数字平台企业通常具有数据优势和流量优势，并通过网络效应迅速扩张，在数字市场上形成“赢家通吃”的格局；并且，平台企业在市场中发挥着近乎于“基础设施”的作用，极易通过并购等方式实现持续性地强化其垄断地位，形成“双轮垄断”甚至“多轮垄断”，遏制创新，损害消费者福利。熊鸿儒和韩伟（2022）、Loertscher 和 Marx（2020）的研究都指出，对数字垄断企业的反垄断监管，针对的是数字垄断企业在数据收集与应用等方面的反竞争行为，要避免因过度监管导致企业降低开展数据分析投资的动力，要兼顾防止垄断无序扩张与避免对市场竞争机制的过度干预，释放可预期、明确的政策信号。有效推进数字时代的反垄断监管，新加坡发展金融科技的实践经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新加坡金管局秉承“有益监管”（Conducive Regulation）的理念，即政府监管机构要加深对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兴技术与全新商业模式的理解，认识到其可能对金融业带来的机遇；同时，也要确保金融系统稳定运行，对风险因素保持合理关注，让消费者权益得到保障（Menon，2017）。同理，反垄断监管应当在构建鼓励创新的生态环境与加强数字时代的新型垄断行为监管之间取得巧妙的平衡。

（二）制约跨领域数据要素资源聚合应用的“数据孤岛”问题

在数字经济时代，海量的数据要素资源广泛地分布在不同行业、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同一企业的不同部门之中。这些数据要素资源是数字经济赋能产业融合的重要“原材料”，也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滋养。然而，由于数据存放位置不同、数据标准不一等原因，形成了一座座彼此间相互隔离、难以联通的“数据孤岛”，导致数据要素的价值未能得到充分释放。具体而言，这种“数据孤岛”通常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物理层面的“数据孤岛”，指因数据存放于不同位置等原因形成的“孤岛”。如 A 企业的 B 部门和 C 部门分别存储了不同数据，但相关数据未能得到聚合而发挥其价值。二是逻辑层面的“数据孤岛”，指因部门间对数据的定义等存在差异而形成的“孤岛”，如 A 企业的 B 部门和 C 部门都采集了相同的数据，但由于不同部门对数据的定义存在差异，B 部门和 C 部门存储了不同的数据，当开展跨部门合作时可能出现“鸡同鸭讲”的情况，难以促进数据要素互联互通（朱宗

尧，2021)。

以数字经济推进产业融合并催生新质生产力，亟待打通“数据孤岛”，提升数据要素的开放共享水平，促进数据要素的有效聚合。正如 Wilder - James (2016) 指出，企业要想获得持续性竞争优势，既需要数字技术，也需要数据。并且，当企业在运用数字技术开展数据分析时，往往需要投入 80% 的精力用于获取并调整数据，使其适用于开展业务。“数据孤岛”的存在，将显著提高企业获取和准备数据的成本，加大新质生产力形成发展的成本和风险。

(三) 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形成的“数字鸿沟”问题

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数字经济”相伴相生的“数字鸿沟”问题逐渐得到关注。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 (NTIA, 1999) 从技术可获得性角度，将“数字鸿沟”定义为能够获得现代信息技术 (如电脑、互联网等) 与不能获得现代信息技术的群体之间产生的鸿沟。“数字鸿沟”通常表现在国家之间、区域之间 (如城乡之间)。例如，从电子政务发展指数的角度看，由于发展基础条件的差异性，全球五大洲存在显著的“数字鸿沟”现象 (姜惠宸，2021)。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内涵逐渐丰富，如体现为数字基础设施供给不均衡、群体对数字技能掌握能力差异形成的“数字接入鸿沟”“数字能力鸿沟”。

只有跨越“数字鸿沟”，才能形成产业融合进而促进新质生产力成长的“数字红利”。一方面，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确保不同地区都能有机会享受到“数字技术”的“红利”，跨越“数字接入鸿沟”；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加强数字人才培养，缩小不同人群在运用数字技术方面的能力差异，跨越“数字能力鸿沟”，为推进产业融合奠定人才基础。

(四) 促进数据要素流通使用和相关方权益保护面临的“数据确权”问题

海量数据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是数字经济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发展数字经济赋能产业融合并赋能新质生产力成长的前提。如何确定数据要素权属，始终是促进数据要素流通时不可避免的问题，也是对流通各方权益保护尤为关键的问题，不仅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也是实践层关注的焦点。

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生产要素，数据要素的流通过程通常涉及数据的提供、采集、加工、存储、使用、管理、维护等多个环节。并且，与传统生产要素 (如资本、土地) 相比，数据要素具有明显的可复制性、非竞争性、一定程度的非排他性，增加了数据确权的难度，导致数据资产权属模糊 (刘悦欣、夏杰长，2022)。戚聿东和刘欢欢 (2020) 认为，数据的所有权是数据确权领域争论的焦点。如果数据的所有权无法明确其归属，则数据的使用权和交易权就成了“空中楼阁”，数据收益权的实现更是无从谈起。并且，从不同角度分析数据的权属，可能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例如，个人用户的数据通过数字平台企业的聚合，形成了能够发挥数据要素价值的“大数据”，从这个角度看数据的产权 (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交易权) 似乎应属于平台。但是，如果没有许多个人用户生成数据并向数字平台企业贡献数据，则数字平台企业难以实现用数据实现价值创造，从这个角度看数据的产权似乎又应该属于或部分地属于个人用户。王建冬等 (2022) 指出，数据要素的复杂特性 (如可复制性、不确定性等) 导致数据确权难，数据供求双方难以实现有效对接。研究提出，可探索先明确数据的使用权和流通权的归属以提升数据流通效率，并结合“数据登记”等方式应对数据流通过程中权属模糊的问题。于施洋等 (2020) 指出，数据要素具有虚拟性的特点，与传统具有实物性特点的生产要素 (如土地) 相比，确权难度更大。并且，平台数据流通的过程涉及到多个主体，可能是个人用户数据与平台数据混合形成，此时数据的权属较为模糊，给数据确权带来更多挑战。《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提出，将数据按公共、企业、个

人数据分类，探索建立“分类分级确权授权制度”“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要“不断探索完善数据基础制度”。如何确定数据的权属，是值得持续研究的内容。

（五）推进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存在的“数实融合不充分”问题

数字化转型是全球趋势，在形成经济发展新优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23 年，中国数字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达到了 42.8%，规模达到了 53.9 万亿元。^① 以 5G、大数据、AI 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赋能产业融合发展，促进数据要素赋能千行百业，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从全球层面看，在推进数字化转型进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同时，一些领域尚存在“数实融合不充分”问题，相关场景创新示范效应和产业化应用水平亟待提升，数据要素价值未能得到充分释放，迫切需要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切实提升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根据 Mckinsey 在 2020 年和 2023 年对全球上千家来自各领域的机构 AI 应用情况的调研，2019 年和 2022 年分别有 48.1%、54.2% 的调研机构在至少 1 种业务活动中应用 AI。^② 从 AI 应用对机构各类型业务的平均影响看，尽管不同年度调研的机构数量存在差异，但每年都有较多机构发现 AI 应用有助于增收降本。如在 2019 年和 2022 年，66% 和 55% 的调研机构认为 AI 应用促进营收增长，44% 和 42% 的机构认为 AI 应用促进成本降低。进一步看，来自这些机构的反馈显示，现阶段全球层面 AI 应用仍具有较大的提升潜力。大部分机构仅实现了不到 5% 的营收增幅，实现 6% ~ 10% 营收增幅的并不多，而实现超过 10% 营收增幅的机构更是凤毛麟角，AI 应用对成本的影响也呈类似情况。对于反馈 AI 有助于促进营收增长或成本下降的调研机构而言，从对各类型业务的平均影响看，在 2019 年和 2022 年，54.55% 和 74.55% 的机构通过 AI 应用实现了不高于 5% 的营收增幅，56.82% 和 66.67% 的机构实现低于 10% 的成本降幅；以制造类业务为例，在 2019 年和 2022 年，60.56% 和 59.32% 的机构实现了不高于 5% 的营收增幅，53.85% 和 74.55% 的机构实现低于 10% 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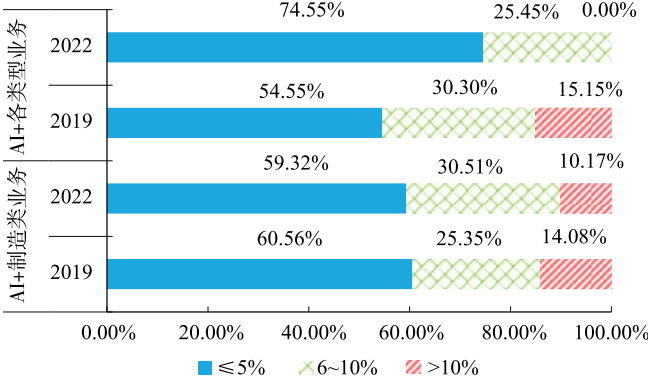


图 1 2019 年和 2022 年 AI 应用促进营业收入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Mckinsey 调研数据计算、绘制而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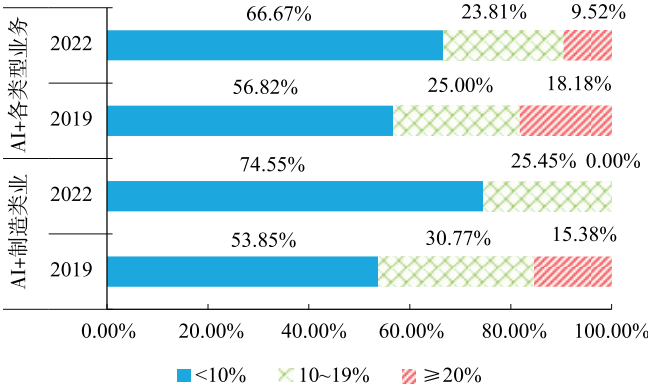


图 2 2019 年和 2022 年 AI 应用促进成本降低情况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Mckinsey 调研数据计算、绘制而得。

①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 年）》，中国信通院网站，2024 年 8 月。
②Mckinsey. The state of AI in 2020, Mckinsey, November 17, 2020, <https://www.mckinsey.com/capabilities/quantumblack/our-insights/global-survey-the-state-of-ai-in-2020>; Mckinsey. The state of AI in 2023, August 1, 2023, <https://www.mckinsey.com/capabilities/quantumblack/our-insights/the-state-of-ai-in-2023-generative-ais-breakout-year>.

本降幅。综上，从现阶段全球发展看，部分 AI 等数字技术赋能产业融合并催生新质生产力时，虽具有“创新主导”的特点，甚至以原创性、颠覆性技术的新技术驱动，但对现实生产力的带动作用并不显著，尚未形成达到“先进生产力质态”的新质生产力。并且，一些数字技术成果，虽以创新技术为支撑，但应用场景脱离实际，过度强调数字技术的新颖性，与实体经济需求存在较大缺口，形成新成果容易成为“空中楼阁”“不接地气”的现象；或缺乏有效的培育机制，造成创新成果示范推广难、产业化应用难，形成“无人问津”的局面。目前，以数字经济布局新质生产力发展，正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形成本国竞争优势的着力点。促进实体经济需求与数字技术创新供给匹配，确保数字技术创新成果“接地气”“易推广”，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要注重加强数字场景创新示范效应和提升产业化应用水平，更好促进数字经济赋能产业融合，以数据要素赋能形成新质生产力。

三、结论与建议

数字经济可以赋能产业融合，并催生新质生产力。在此过程中，能够凭借其具有的强网络效应、网络外部性和正反馈机制，有力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形成产业融合与数字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但与此同时，也容易面临数据流通过程中数据权属如何明确，如何促进海量数据要素形成的数据孤岛互联互通，如何提升对数字平台企业垄断行为（或更高层次的“数字霸权”问题）的反垄断监管能力，如何确保数据可信流通，如何跨越“数字鸿沟”赢得“数字红利”等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关于如何发展数字经济赋能产业融合，形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成长的强大动力，本文尝试提出以下主要建议。

（一）统筹数字经济发展和安全，促进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近年来，尤其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数字经济赋能产业融合并催生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日益凸显，数字经济在创造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就业形态方面取得诸多成绩（张军、姜惠宸，2020），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也为促进未来产业转型升级和跨界融合奠定了基础。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在数字经济赋能产业融合的同时，“数字垄断”“数据确权”等一系列新问题新情况也逐渐涌现，对促进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的要求。

面对数字经济时代的新挑战，要以政策为着力点，更好发挥有为政府作用。促进数字经济引领产业融合，需要实现促进数字科技创新与维护公平市场环境之间的平衡。建议探索以数据驱动促进反垄断监管创新，以大数据、AI 等新兴技术遏制“数字垄断”对市场公平竞争行为的影响。同时，构建“模块化”的数字经济监管架构，确保监管机构的监管模式能够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灵活调整。根据流通数据类型规模等因素，培育支持创新的良好市场制度环境。在此基础上，有序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对数据所有权、使用权、交易权、收益权归属做出明确的制度安排，激励多方主体形成良性互动的数据流通模式，坚持“加强监管+包容创新”双轮驱动，以高质量数据安全助力数字经济高水平赋能产业融合。

（二）夯实数字经济发展根基，跨越“数字鸿沟”，赢得“数字红利”

“数字红利”是指由数字投资带来的在经济增长、就业、服务方面的收益。具体而言，数字技术有助于政府为大众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数字技术能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数字技术还有助于企业提高生产率（WB，2016）。对于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新兴数字技术，要制定明晰的发展目标，以多维度的

政策支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促进数字技术更好发展（姜惠宸，2023）。要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有机融合，打造更具活力的数字经济生态。构建“政产学研金服用”七位一体的数字经济政策支持体系，探索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沙盒机制，进一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打通行业、企业、部门间“数字孤岛”，以更高水平数据开放共享促进产业跨界融合，创造更多“数字红利”。

（三）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产业融合及新质生产力成长构筑坚实“数字底座”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的基础工程，对产业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以及促进新质生产力成长，能够发挥重要的公共产品作用，有利于降低新质生产力运行成本和风险。例如，德国政府通过持续推进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弥合城乡间存在的“数字鸿沟”，为发现“数字红利”的潜在价值创造机遇。德国政府于2019年启动“移动通信战略”，设立约11亿欧元的“数字基础设施”特别投资基金，以补贴的方式支持农村地区移动通信站点的开发，确保这些对私营公司而言“经济上不可行”的农村地区也能获得与城市相同速度的移动通信网络（BMEL，2019）。要加强惠及农业农村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弥合数字鸿沟发挥积极作用，更好促进产业融合及新质生产力成长。

（四）加强对数字化转型试点试验的支持力度，促进数字化转型理念发展与传播

近年来，有关部委和地方政府结合推进产业融合，开展了各种数字化转型试点，对于推进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和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挥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促进了相关新质生产力的集群化成长。从德国经验看，推进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拓展农村地区发展的可能性边界，为数字惠及农业农村产业融合并培育新质生产力创造更多机会。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让距离遥远的农村与城市之间可实现快速通信，也为农村地区的发展创造了许多可能性（如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有望形成新职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世界银行预计，到2050年全球每个农场产生的数据点将达到410万个，^①海量的数据要素资源将为农民安排农业生产并保证合理盈利提供重要的参考。同时，数字技术在农业部门的广泛运用（如农业电子商务），也有助于促进农业部门的生产者销售产品、消费者购买产品时，选择以环境友好型模式生产的农作物以支持环境保护。因此，要在总结各地数字化转型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加大对试点试验方案的推广力度。鼓励结合试点试验，推进数字化转型理念的发展与传播，通过带动利益相关者提高数字素养，为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产业融合的赋能作用创造更多条件。

（五）提升数字场景示范效应和应用水平，促进新质生产力集群性、规模化成长

当前，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高度重视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数字科技创新带动产业融合，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培育未来产业，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例如，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AI发展。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广泛应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美国特朗普政府提出《美国将主导未来产业》，拜登政府制定《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日本政府围绕“社会5.0”未来愿景培育科技创新成果；德国政府启动“2030工业战略”等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新时代的科技革命相较以往具有显著差异，

^①WB. A Roadmap for Building the Digital Futur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March 16, 2021,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feature/2021/03/16/a-roadmap-for-building-the-digital-future-of-food-and-agriculture>.

前沿科技创新并非仅仅发生在特定国家或特定领域，AI 等数字技术的发展更呈现显著的“多点开花”特征，并且更加深刻、更加迅速地影响国家间力量格局变化。要以“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高校和科研院所协同创新的产学研合作机制，形成更多数字场景创新成果，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应用；举办“数字科技创新节”，增强数字场景创新示范效应，推进数字经济创新成果示范应用，促进数字赋能产业融合，形成和发展具有先进质态的新质生产力，促进新质生产力集群性、规模化成长。

参考文献：

1. 刘烈宏：《进一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加快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旗帜》，2024 年第 4 期。
2. 戚聿东、肖旭：《数字经济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年。
3. 姜长云：《发展数字经济引领带动农业转型和农村产业融合》，《经济纵横》，2022 年第 8 期。
4.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字经济概论：理论、实践与战略》，人民邮电出版社，2022 年。
5. 王佳元：《数字经济赋能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作用机制、问题挑战及政策建议》，《宏观经济研究》，2022 年第 5 期。
6. 王佳元、张曼茵：《工业互联网赋能产业深度融合研究——基于产业生态重构和数据融合增值的分析》，《经济纵横》，2023 年第 3 期。
7. 陈雪频：《一本书读懂数字化转型》，机械工业出版社，2022 年。
8. [美] 托马斯·西贝尔著，毕崇毅译：《认识数字化转型》，机械工业出版社，2021 年。
9. 李勇坚、夏杰长：《数字经济背景下超级平台双轮垄断的潜在风险与防范策略》，《改革》，2020 年第 8 期。
10. 熊鸿儒、韩伟：《全球数字经济反垄断的新动向及启示》，《改革》，2022 年第 7 期。
11. 朱宗尧：《政务图谱：框架逻辑及其理论阐释——基于上海“一网通办”的实践》，《电子政务》，2021 年第 4 期。
12. 姜惠宸：《中国电子政务跨越式发展的思考》，《中国发展观察》，2021 年第 6 期。
13. 刘悦欣、夏杰长：《数据资产价值创造、估值挑战与应对策略》，《江西社会科学》，2022 年第 3 期。
14. 戚聿东、刘欢欢：《数字经济下数据的生产要素属性及其市场化配置机制研究》，《经济纵横》，2020 年第 11 期。
15. 王建冬、于施洋、黄倩倩：《数据要素基础理论与制度体系总体设计探究》，《电子政务》，2022 年第 2 期。
16. 于施洋、王建冬、郭巧敏：《我国构建数据新型要素市场体系面临的挑战与对策》，《电子政务》，2020 年第 3 期。
17. 张军、姜惠宸：《从数字经济典型企业看新冠疫情影响及中长期应对》，《中国发展观察》，2020 年第 Z3 期。
18. 姜惠宸：《新加坡发展金融科技的实践与启示》，《科技智囊》，2023 年第 8 期。
19. Porter M. E., Heppelmann J. E., How Smart, Connected Products Are Transforming Companie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15, vol. 93.
20.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port 2024, November 2023.
21. Loertscher S., Marx L. M. Digital monopolies: Privacy protection or price regul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020, vol. 71.
22. Ravi Menon. Singapore FinTech Journey 2.0, MAS, 14 November 2017.
23. Wilder-James, E. Breaking Down Data Silo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6 December 2016.
24. NTIA. Falling through the Net: Defining the Digital Divide, Columbia University Website, July 1999.
25. WB.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6, January 2016.
26. BMEL. Universal broadband coverage – also in rural areas, 25 November 2019.

责任编辑：李蕊

· 产 业 发 展 ·

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形势及相关建议

蔡 杨 任荣荣

摘要：在政策支持引导、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驱动的协同作用下，现阶段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呈现出长期较快增长态势，对实现经济增长、加快技术创新、提升民生福祉，以及巩固我国的国际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应看到，现阶段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面临多方面掣肘与挑战：国际环境依旧复杂严峻，产业链供应链仍然存在较多关键薄弱环节，金融要素供给与产业发展需求之间的匹配性仍需提升等。为此，建议进一步完善高技术产业投资与创新环境，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优化投资结构，多措并举缓释外部风险冲击，以稳定投资信心、筑牢投资根基，有效扩大高技术产业投资规模，更好发挥高技术产业投资的引导带动作用，为扎实推进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有力保障。

关键词：高技术产业 投资形势 投资结构 技术创新

作者简介：蔡 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任荣荣，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室主任、研究员。

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迈向高质量发展。作为国民经济先导产业，高技术产业具有科技创新能力强、资源能源消耗小、产品附加值高、国际市场前景良好等特点，不仅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培育发展新动能、获取未来技术新优势的关键领域。2012—2023 年，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① 推动高技术产业呈现规模与效益同步提升、创新与发展同步推进的态势，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供重要支撑，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近年来，在新冠疫情冲击、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美西方持续打压我国经济的大环境下，高技术产业投资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对稳发展、稳投资、稳信心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

目前，社会各界对高技术产业投资已开展了诸多研究，相关文献主要围绕三条脉络展开。第一，探究高技术产业投资的基本形势与发展规律。应晓妮（2019、2021）指出中美博弈冲击下，我国对美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将长期趋冷，但美国实施的“小院高墙”式对抗策略叠加新冠疫情冲击反而激发了国内市场对高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新需求，推动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长期保持韧性。苏华等（2017）利用 1995—2014 年统计数据，发现总体上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呈快速发展趋势，且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投资的集聚程度相对更高。

第二，分析高技术产业投资的重要意义。宏观上，高技术产业投资是实现经济增长、推动就业扩张的重要驱动力，张钟文等（2017）基于统计和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发现在经济下行阶段高技术产业

^①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46.92%，对其他关联产业的生产与就业拉动效应同样明显。微观上，企业的研发创新投资是其提升市场竞争优势、获取超额利润的重要途径，如杜勇等（2014）利用 43 家高技术上市企业样本数据，发现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盈利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第三，探索扩大高技术产业投资的主要路径。当前，扩大高技术产业投资的路径是多维度、多主体、多渠道的。王春元和张子楠（2025）基于 2009—2018 年上市公司的数据发现，加速折旧政策与加计扣除政策不仅单独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研发投入，二者组合还能额外提升研发投入。周立波等（2024）指出应更好发挥民间资本在推动科技创新、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夏后学等（2019）发现优化营商环境能够有效调节寻租对企业不同创新活动的影响，有利于无寻租企业开展研发投入与创新。卢馨等（2013）发现我国高技术上市企业存在一定的融资约束，限制了企业开展高技术产业投资，且在缺少债务融资支持的情境下，企业的研发资金主要来源于内部现金流和股票融资。

总结来看，现有文献重点从“是什么”“为什么”以及“怎么办”三个维度探讨了高技术产业投资的现状、意义以及扩大高技术产业投资的基本路径，为本文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基于此，本文将重点分析当前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形势的最新表征，剖析其面临的主要挑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更好扩大高技术产业投资提供参考。

一、当前高技术产业投资形势及驱动因素

（一）高技术产业投资形势

随着科技创新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新质生产力发展扎实推进，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不断塑造。2024 年以来高技术产业投资保持较快增长，1—11 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8.8%，增速比全部投资高 5.5 个百分点（见图 1）。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8.2%、10.2%。高技术制造业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 35.4%、8.8%，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集成电路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敏感元件及传感器制造等高技术行业蓬勃发展；高技术服务业中，专业技术服务业、电子商务服务业、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27.9%、12.5%、11.5%、10.2%，^① 生产性服务业对高技术产业前端的赋能进一步加速。在投资端快速增长的带动下，1—11 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0%，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3.2 个百分点，为规上工业利润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凸显了发展韧性。11 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上升至 51.2，比 10 月份上升 1.1 个百分点。^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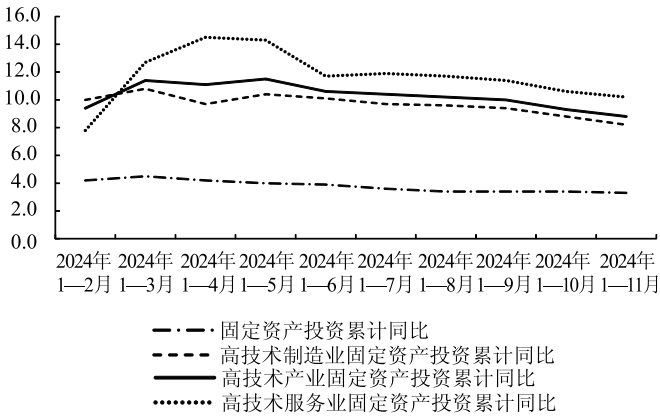


图 1 2024 年 1—11 月高技术行业固定资产投资
累计同比增速（单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②数据来源：同①。

（二）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的驱动因素

2024 年，全球格局加速演变，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下，全球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高技术产业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重点布局的战略领域，各国政府加快出台政策与举措，引导资本流向高技术产业。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保持较快增长，是政策支持引导、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驱动共同作用的结果。

1. 政策引领推动构建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引擎

政策导向是推动高技术产业投资快速增长的首要因素。2024 年以来，我国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利好高技术产业投资（见表 1）。1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7 个部门发布《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工信部联科〔2024〕12 号），明确提出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等加大投入，引导带动更多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4 月，中国人民银行联合科技部等部门设立 5000 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其中 1000 亿元额度专门用于支持初创期、成长期科技型中小企业首次贷款，激励金融机构更大力度投早、投小、投硬科技。^① 6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促进创业

表 1 2024 年高技术产业投资相关政策梳理

政策名称	出台部门	颁布时间	主要内容
《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7 个部门	2024 年 1 月	全面布局未来产业，推进未来制造、信息、材料、能源、空间和健康六大方向产业发展；加快技术创新和产业化，提升创新能力，促进成果转化；打造标志性产品；壮大产业主体，培育企业梯队，打造特色产业链，构建产业生态；丰富应用场景；优化产业支撑体系，加强标准引领与专利护航，同步构筑中试能力，建设专业人才队伍，强化新型基础设施等
《我国支持科技创新主要税费优惠政策指引》	财政部等相关部门	2024 年 3 月	涉及 50 多条主要科技创新税费优惠政策，涉及创业投资、研究与试验开发、成果转化、重点产业发展、全产业链等方面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管理暂行办法》	科技部、财政部	2024 年 3 月	对于突发、紧急的国家科技需求，建立快速设立专项的响应机制。加强关键节点考核，强化科技成果的“实战性”，加快形成现实生产力和产业竞争力
《关于资本市场服务科技企业高水平发展的十六项措施》	证监会	2024 年 4 月	进一步健全资本市场功能，优化资源配置，更大力度支持科技企业高水平发展。从上市融资、并购重组、债券发行、私募投资等全方位提出支持性举措，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促进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国务院办公厅	2024 年 6 月	培育多元化创业投资主体，支持专业性创业投资机构发展，发挥政府出资的创业投资基金作用，落实和完善国资创业投资管理制度；多渠道拓宽创业投资资金来源；加强创业投资政府引导和差异化监管，建立对接机制，实施专利产业化计划，落实税收优惠政策等；健全创业投资退出机制，拓宽退出渠道，优化退出政策；优化创业投资市场环境等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中共中央	2024 年 7 月	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部门官网的文件资料整理而得。

^①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设立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支持科技创新、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024 年 4 月 7 日。

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国办发〔2024〕31号），围绕创业投资“募投管退”全链条，进一步完善政策环境和管理制度，积极支持创业投资做大做强。7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要鼓励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政策从制度、资金等方面为高技术产业投资提供了有力支持和充分保障，同步引导更多资本参与高技术产业投资。

2. 技术创新持续提升高技术产业投资价值

技术创新是高技术产业投资快速增长的核心驱动。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前沿技术的不断发展，高技术产业正经历深刻变革。新兴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成本，还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和市场需求（Lee et al., 2019）。对于政府而言，技术创新意味着更多的竞争筹码与更大的博弈优势；对企业而言，技术创新意味着更大的市场份额与更高的经营利润；对于投资者而言，技术创新意味着更高的投资回报和更低的投资风险。与此同时，技术创新还将伴随着产业链上下游、区域内的知识溢出，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系统性、全局性影响，进一步带动与之关联的产业链、区域的投资增长。技术创新的多维效应叠加，使其成为刺激高技术产业投资的核心驱动。

3. 市场需求不断激发高技术产业投资活力

市场需求是高技术产业投资快速增长的内在动力。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各行各业、国内国外对高技术装备和智能化解决方案等个性化高技术产品及服务的需求日益迫切（何欢浪等，2023）。特别是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高技术产业凭借其科技创新能力强、资源能源消耗小、产品附加值高等优势，成为市场需求的热点，为高技术产业投资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此外，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也促进了消费者对高技术、高品质、个性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进一步激发了高技术产业投资的活力。

二、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的积极影响

（一）构筑经济增长新引擎

一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高技术产业投资的增长将引导资源从传统产业向高技术领域转移，促使产业结构实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让经济增长动力从依赖资源和劳动力、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更好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同时，高技术产业投资还将带动同一产业内细分领域专精化发展，“以点带面”形成更多的经济增长点。二是带动相关产业协同发展。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会产生显著的产业关联效应（张钟文等，2017），既能扩大对产业链上游原材料、零部件的需求，还能带动下游的应用与技术创新，最终由产业链的系统发展带动经济增长。三是促进生产效率提升。随着投资涌入，高技术产业能够引进更为前沿的生产技术与生产设备，大幅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品质量，直接扩大经济产出，为经济增长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撑。

（二）激发创新发展新活力

一是增加研发投入强度。伴随着高技术产业投资的增长，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研发投入强度进一步提升，开展更前沿、更深入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动力进一步激发，对于突破关键技术瓶颈、开拓新技术领域提供坚实的要素保障。二是吸引和培养高端人才。高技术产业投资的增长通常伴随着科研人员更高的薪酬待遇、更好的科研环境以及更加广阔的发展机会，既有利于吸引国内外顶尖的科技人才，亦有利于形成产业内人才内生培养机制，强化形成人才集聚效应，为技术创新持续输送高素质的

专业人才。三是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充足的投资可以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使得科研成果能够更快地走向产业化应用，有利于缩短技术创新周期，提高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效率。四是营造更好的创新生态。高技术产业投资的增长一方面可以加快创新企业间的有序竞争，“优胜劣汰”加快技术创新；另一方面也将推动创新主体间的相互合作，最终形成“竞争+合作”联动的创新生态，推动技术创新螺旋式上升发展。

（三）夯实社会民生新福祉

一是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高技术产业投资的增长带动了高技术产业规模的扩张，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钟坚、冯峥，2024）。与传统产业不同的是，这些就业岗位多具备高技能、高知识含量的特征，从业人员平均收入水平相对较高，推动社会整体就业质量提升。二是改善社会福利。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成果能够广泛应用于医疗、教育、环保等社会公共领域，如远程医疗技术的进步改善了医疗服务的可达性，新能源技术的应用有效助力环境改善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提升了社会福利水平（李宝琴，2021）。三是提升社会信息化水平。随着高技术产业投资的增加，数字信息技术在社会各个层面的渗透持续加快，推动了社会数字化转型，提高了社会整体的运行效率。

（四）巩固国际竞争新优势

一是增强核心技术竞争力。掌握核心技术是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关键，而加大高技术产业投资是国家能够在关键技术领域加大研发和产业化力度的重要手段。有效的投资能够保障技术的自我革新和持续创新，从而增强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话语权。二是培育跨国高技术企业。高技术产业投资的增长为高技术企业提供了拓展国际市场的资金和资源支持，有利于企业开展跨国经营活动。如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生产基地和销售网络等，加强全球资源整合，提升企业、产业链乃至国家的国际竞争实力。三是提升国际形象和影响力。一个国家高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既是其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的重点体现，也有利于促进包括联合研发、人才交流在内的国际创新合作，巩固和提升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与影响力。

三、高技术产业投资面临的主要挑战

当前，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面临来自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关键薄弱环节仍待攻克、融资端匹配性仍需提升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挑战。

（一）国际环境依然复杂严峻

1. 贸易摩擦影响不断深化

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深度调整，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高技术产业首当其冲地陷入了贸易摩擦的漩涡。一方面，贸易摩擦引发的高额关税显著增加了高技术产品的进出口成本，压降了产品利润，降低了潜在投资的预期回报率，导致不投资或是将资金转投至受贸易摩擦影响较小的其他产业，高技术产业投资规模下降，高技术产业的扩张与升级步伐放缓（解维敏等，2024）。另一方面，贸易摩擦带来的市场准入限制使得高技术产业的海外市场拓展受阻。某些西方国家通过设置严苛的贸易壁垒，如限制进口配额、实体清单等，阻止国外高技术产品进入本国市场，令高技术企业营收规模收缩，削弱了企业进一步投资扩大再生产的动力，加剧了投资者对高技术产业投资的谨慎观望态度。

2. 地缘政治风险频发

地缘政治局势的不稳定以及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盛行，给高技术产业投资营造了充满不确定性

的外部环境，其挑战主要体现在关键零部件供应和投资安全两大维度。从关键零部件供应看，由于高技术产业的全球分工协作特征明显，产品生产高度依赖跨国供应链体系。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导致高技术产业供应链受到严重冲击，关键零部件供给的不足或缺失对高技术企业势必造成较大的直接或间接损失。供应链脆弱性催生的投资风险将严重阻碍高技术产业投资的增长。从投资安全看，地缘政治因素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提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频繁调整对华政策、遏制国内高技术产业发展，即使国内高技术产业投资的政策环境积极有效，但国际资本在华投资时难免要考量外部政策的冲击，这对国内高技术产业引导利用外资、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挑战（葛顺奇等，2024）。

（二）关键薄弱环节仍待补强

1. 原始创新能力较弱影响投资前景

在全球高技术产业竞争格局中，原始创新是驱动产业持续发展与变革的核心动力。当前，我国基础研究的历史欠账较多，原始创新、重大技术创新能力较弱，对投资活动产生了多方面制约。从基础研究投入占比来看，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美国等发达国家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投入投入的比重可达 15% ~ 20%，而我国仅在 6% ~ 7%（李立国、李建龙，2024）。原始创新投入的不足导致了原始创新成果的相对匮乏，使得高技术产业投资在源头创新上缺乏足够的项目支撑。在新兴技术领域，国外凭借深厚的原始创新积累，吸引了大量风险投资和产业资本涌入，催生了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技术企业。而我国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上相对滞后，投资项目往往局限于对国外技术的跟进与应用拓展，难以在技术源头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投资回报的预期也大打折扣。

2. 关键核心技术困境影响投资预期

关键核心技术是高技术产业的“命门”所在，我国在芯片制造、高端光刻机等关键技术“卡脖子”领域短板仍旧相对突出。以半导体产业为例，国外巨头凭借掌握的先进芯片制造工艺，在全球高端芯片市场居于垄断地位，且部分西方国家通过技术封锁限制我国相关企业获取关键技术和设备，使得我国在该领域的投资面临较大风险和不确定性。一方面，企业为突破关键技术需要持续投入大规模资金进行技术研发与引进，但由于海外技术限制，技术引进路径受阻，研发难度和成本大幅增加，投资周期拉长且成功率难以保证；另一方面，即使国内企业在关键技术研发上取得突破，在推向市场过程中仍需面对国外成熟技术产品的挑战，投资回报的实现依然存在挑战。

3. 科技成果转化不畅影响投资积极性

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每年产出大量科研成果，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效率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差距。据统计，我国高校专利转化率仅为 3% 左右，远低于美国的 54%。^① 对于高技术产业投资而言，低转化效率意味着低投资效益。一方面，投资者从众多科研成果中筛选出具有产业化潜力项目的难度提升；另一方面，即便参与了投资，在成果转化过程中也可能因技术、市场、管理等多方面问题导致项目失败。在上述因素影响下，资本对科技成果转化类项目的态度普遍较为谨慎，导致资金更多流向已经过市场验证的成熟技术和商业模式，阻碍了投资效能的充分发挥。

4. 复合型人才供给有限加剧投资顾虑

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具备创新能力和实践经验的复合型人才，他们能够在技术研发、产品设计、市场推广和企业管理等多个环节发挥关键作用。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创新的复合型人才储备相对缺乏，且在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上仍旧存在优化空间。例如，美国高校注重跨学科教育和产学研合作，能够培养出大量适应高技术产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为其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

^①国家知识产权局：《2022 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2022 年 12 月 30 日。

才支撑；我国高校高技术产业学科设置相对单一、交叉学科数量较少，教学实践环节较为薄弱，导致毕业生的就业磨合期较长。从投资看，复合型人才供给的相对不足使得高技术企业在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方面面临一定瓶颈，加剧了经营风险，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技术产业投资的活跃度和规模扩张。

（三）融资端匹配性仍需优化

1. 间接融资体系仍存在困难堵点

高技术企业具备的无形资产占比较高、技术迭代快、未来收益不确定性大等特征，使得银行难以准确评估创新企业的信用风险和抵押物价值，导致其对高技术产业贷款投放较为谨慎。与国外相比，一些发达国家的银行通过与政府合作，建立了完善的风险分担机制。如德国的复兴信贷银行在政府的支持下，能够为高技术中小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并通过信用担保等方式降低银行的风险顾虑，从而提高对高技术产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此外，我国银行的信贷业务模式依然相对传统，在针对高技术产业的金融产品创新方面仍待加强，能够适应高技术产业不同发展阶段融资需求的多样化信贷产品依然较少，较难充分满足全生命周期下高技术产业的多样化融资需求。

2. 直接融资体系的关键作用仍未充分发挥

从资本市场的成熟度来看，与国外发达的资本市场相比，我国资本市场对高技术产业的风险定价和资源配置能力仍有待提高。我国的科创板、创业板等虽然为高技术企业开辟了专项融资渠道，但在上市标准、审核流程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优化空间，部分具有高成长潜力但尚未实现盈利的高技术企业仍难以顺利获得上市融资机会。另外，以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为代表的直接投资可以契合高技术产业投资的一系列需求，但当前股权投资市场发展面临宏观经济下行等多重因素冲击，导致市场持续承压。2024 年前三季度，我国私募股权市场仅有 1927 只基金完成募资，募资金额为 8136.5 亿元，同比分别下降 49.3%、22.0%^①（见图 2）。国资为股权投资主要资金来源，国资基金管理人占比超过 70%（蔡杨、李粉，2023）；风险管理与投资回报的矛盾导致信任危机与股权资金债权化趋势，考核与容错机制的不完善导致资本“耐心不足”；投资服务于有限合伙人（LP）而不是高技术企业的底层逻辑难以形成有效金融闭环等多重挑战，市场作用在短期内无法充分发挥，影响高技术产业投资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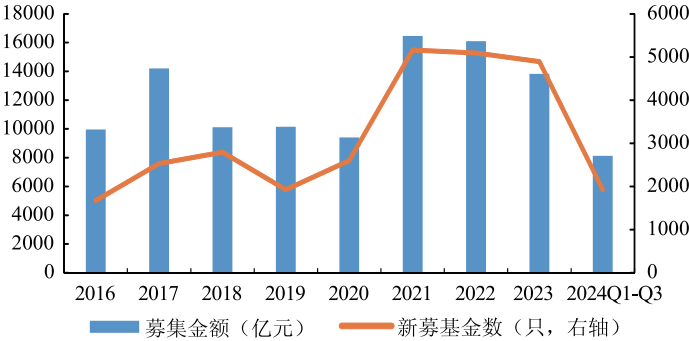


图 2 2016 年—2024 年前 3 季度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基金年度募集情况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清科数据库数据整理而得。

四、有效扩大高技术产业投资的政策建议

（一）全面优化高技术产业投资与创新环境，稳固投资信心根基

深化高技术产业投资体制机制改革，精简科技型企业投资审批流程，运用数字化手段优化审批环节，建立线上审批快速通道，确保审批时效大幅提升。不折不扣落实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通

^①作者根据清科数据库数据计算而得。

过详细的操作指南和专项培训，让企业精准享受降本红利。坚定不移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市场准入，明确各类高技术产业的准入标准与负面清单，全面排查并破除民间投资面临的各类隐性门槛，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强化社会信用机制建设，利用信用评级、联合惩戒等手段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加大知识产权保护与执法力度，提高侵权成本，为企业创新成果筑牢防护墙，激发其内生创新动力。

针对“卡脖子”技术以及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关键领域，加大创新投入力度，扩大政府专项投资基金的数量和规模，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精准投向关键技术研发项目。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联合攻关，推动我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高技术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搭建产业链融通创新平台，促进上中下游企业在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市场拓展等环节的深度合作与资源共享。强化产学研用结合的创新体系建设，鼓励高校和科研机构根据产业需求设置科研项目，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和应用。通过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基地，提供中试、产业化等配套服务，加速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的市场化进程，从而全方位构筑起高技术产业投资创新发展的繁荣生态。

（二）继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提升高技术产业投资引领带动作用

从政府与企业两端精准施策。一方面，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带动作用，积极采用“揭榜挂帅”等创新模式，提升政府资金使用效率。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前沿领域，精心谋划并实施一批重大项目，释放其牵引作用，有效带动社会资本的跟进，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另一方面，着力发展多元化、多层次的融资市场，丰富融资渠道和工具。进一步扩大养老金、社保基金试点创投基金的范围，制定详细的准入标准和风险防控措施，引导长期资本有序进入股权投资市场，为处于初创期的高技术企业提供耐心支持。持续完善科创板、北交所的制度设计，优化上市标准、交易规则和监管机制，降低企业上市融资的门槛和成本，增强市场的流动性和吸引力，为高技术企业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直接融资平台。逐步形成资金循环滚动支持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良性机制，全方位激发更多民间投资踊跃进入高技术产业领域，为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与活力。

（三）优化高技术产业投资结构，推动高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双擎驱动

从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两大关键领域精准发力，强化基础能力建设，拓展投资空间。对于高技术制造业而言，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投资力度，吸引多方参与，精准投向如芯片、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等关键领域的技术研发项目。全面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对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等薄弱环节进行系统梳理与评估。有针对性地投入资金用于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人才培养，在此过程中不断挖掘智能制造升级、绿色制造转型等更多具有潜力的投资增长点。

在高技术服务业方面，制定规范、透明、具有稳定预期的监管政策，明确平台经济各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加强数据安全、反垄断、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监管执法力度，同时建立包容审慎的监管机制，鼓励平台企业在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积极探索。持续加大对新型研发和转移转化领域的投资，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提供从技术评估、知识产权交易到中试孵化、产业化应用的全链条服务，吸引全球优质创新资源集聚。进一步强化对支撑重大工程建设和关键产业发展的高技术服务领域的投资，培育一批专业化、规模化的高技术服务企业，构建完善的产业服务生态体系，以强大的高技术服务业投资硬核支撑整个高技术产业的协同发展，实现高技术产业投资的提质增效。

（四）缓释化解外部风险冲击，筑牢高技术产业投资稳定根基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与地缘政治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扩大高技术产业投资需着眼于应对外部

风险，从贸易摩擦与地缘政治两个核心层面精准施策，强化产业抗风险韧性，推动高技术产业投资规模的持续扩大和质量的稳步提升。在应对贸易摩擦上，构建系统且高效的贸易风险缓冲与市场拓展促进机制，运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精准评估贸易摩擦影响，及时给予企业关税补贴、物流成本补贴等，确保企业资金流稳定，增强企业应对贸易摩擦的信心，进一步推动企业扩大高技术产业投资。大力扶持企业海外市场多元化布局，成立海外市场拓展服务联盟，整合商务、外交、金融等多方资源，为企业提供目标市场调研、海外营销渠道搭建、跨国商务洽谈协助等一站式服务，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度，提升全球市场份额，保障企业营收增长，从而吸引更多资本流入高技术产业，稳固投资根基。

在地缘政治风险化解上，着力打造供应链安全保障与投资环境优化体系。一方面，全力推动关键零部件供应链自主可控与多元化建设，绘制高技术产业关键零部件供应链图谱，精准识别供应短板与风险节点。通过政策引导与资金扶持，鼓励企业加大国内关键零部件研发与生产投入，培育本土优质供应商。支持企业开展国际供应链合作，在友好国家和地区建立生产基地或采购中心，实现供应链的分散布局，降低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供应中断风险，确保产业生产连续性，稳定投资者长期投资预期。另一方面，积极营造稳定透明的国际投资政策环境，加强与主要经济体的政策沟通与协调，消除国际资本对国内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建立国际投资法律保障服务平台，切实保障国际投资者合法权益，增强高技术产业投资吸引力，筑牢稳投资的底板，为扩大高技术产业投资规模创造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1. 应晓妮：《中国对美高技术投资长期趋冷》，《中国投资》，2019 年第 23 期。
2. 应晓妮：《提升高技术产业投资结构与新发格局内在需求适配度》，《宏观经济管理》，2021 年第 8 期。
3. 苏华、刘文君、刘升学：《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规律与差异研究》，《当代经济》，2017 年第 11 期。
4. 张钟文、叶银丹、许宪春：《高技术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的作用研究》，《统计研究》，2017 年第 7 期。
5. 杜勇、鄢波、陈建英：《研发投入对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 年第 2 期。
6. 王春元、张子楠：《税收优惠政策组合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科研管理》，2025 年第 1 期。
7. 周立波、姜宁朋、邢文等：《民间资本参与科技创新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科技与金融》，2024 年第 8 期。
8. 夏后学、谭清美、白俊红：《营商环境、企业寻租与市场创新——来自中国企业营商环境调查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19 年第 4 期。
9. 卢馨、郑阳飞、李建明：《融资约束对企业 R&D 投资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会计研究》，2013 年第 5 期。
10. 何欢浪、师艳敏、章韬：《国际市场出口需求与中国企业创新行为——基于企业专利数量和质量的经验研究》，《世界经济文汇》，2023 年第 3 期。
11. 钟坚、冯峥：《数字技术创新的就业效应：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现代经济探讨》，2024 年第 11 期。
12. 李宝琴：《科技创新对居民福利的影响研究》，《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 年第 9 期。
13. 解维敏、郭佳璐、张恒鑫：《中美贸易摩擦与企业研发投入》，《国际贸易问题》，2024 年第 4 期。
14. 葛顺奇、李三川、罗伟：《贸易脱钩、关税冲击与外商撤资》，《国际贸易问题》，2024 年第 3 期。
15. 李立国、李建龙：《优化资源布局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大学教育科学》，2024 年第 1 期。
16. 蔡杨、李粉：《创业投资市场面临的压力、成因与建议》，《中国投资（中英文）》，2023 年第 3 期。
17. Lee, J., Suh, T., Roy, D., Baucus, M., Emerg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The Ca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Journal of Open Innovation: Technology, Market, and Complexity, 2019, 5 (3), 44.

责任编辑：谷 岳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一、世界经济

表 1 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 = 100)

单位: %				
	2023 年	2024 年 估计值	2025 年 预测值	2026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2025 年 1 月)				
世 界	3.3	3.2	3.3	3.3
发达国家	1.7	1.7	1.9	1.8
美 国	2.9	2.8	2.7	2.1
欧元区	0.4	0.8	1.0	1.4
日 本	1.5	-0.2	1.1	0.8
发展中国家	4.4	4.2	4.2	4.3
中 国	5.2	4.8	4.6	4.5
印 度	8.2	6.5	6.5	6.5
俄罗斯	3.6	3.8	1.4	1.2
巴 西	3.2	3.7	2.2	2.2
南 非	0.7	0.8	1.5	1.6
世界银行 (WB, 2025 年 1 月)				
世 界	2.7	2.7	2.7	2.7
发达国家	1.7	1.7	1.7	1.8
美 国	2.9	2.8	2.3	2.0
欧元区	0.4	0.7	1.0	1.2
日 本	1.5	0.0	1.2	0.9
发展中国家	4.2	4.1	4.1	4.0
中 国	5.2	4.9	4.5	4.0
印 度	8.2	6.5	6.7	6.7
俄罗斯	3.6	3.4	1.6	1.1
巴 西	2.9	3.2	2.2	2.3
南 非	0.7	0.8	1.8	1.9
英国共识公司 (Consensus Forecasts, 2025 年 2 月)				
世 界	2.7	2.6	2.6	2.5
中 国	5.2	5.0	4.5	4.1
美 国	2.9	2.8	2.2	2.0
欧元区	0.5	0.7	0.9	1.2
日 本	1.5	-0.1	1.2	0.9
印 度	8.2	6.3	6.5	6.5
俄罗斯	3.6	3.8	1.7	1.3
巴 西	3.2	3.3	2.1	1.7
南 非	0.6	0.7	1.6	2.0

注: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 预测频率为季度。 (2) 世界银行按汇率法进行汇总, 预测频率为半年度。 (3) 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 预测频率为月度。 (4) 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

表 2 世界贸易量增长率(上年 = 100)

单位: %				
	2023 年	2024 年 估计值	2025 年 预测值	2026 年 预测值
世 界	0.7	3.4	3.2	3.3
发达国家	0.0	2.2	2.1	2.5
发展中国家	2.0	5.4	5.0	4.6

注: 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
资料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5 年 1 月预测。

表 3 消费者价格涨跌率(上年 = 100)

单位: %				
	2023 年	2024 年 估计值	2025 年 预测值	2026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2025 年 1 月)				
世 界	6.7	5.7	4.2	3.5
发达国家	4.6	2.6	2.1	2.0
发展中国家	8.1	7.8	5.6	4.5
英国共识公司 (Consensus Forecasts, 2025 年 2 月)				
世 界	5.6	3.8	2.9	2.6
美 国	4.1	3.0	2.7	2.6
欧元区	5.4	2.4	2.1	1.9
日 本	3.3	2.7	2.6	1.8
印 度	5.4	4.8	4.3	4.4

注: 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

表 4 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率

单位 : %

年份	月份	世 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2024 年		3.0	2.4	3.7
	1 月	3.4	3.1	3.9
	2 月	3.3	2.9	3.8
	3 月	3.2	2.7	3.7
	4 月	3.1	2.7	3.5
	5 月	3.1	2.7	3.8
	6 月	2.8	2.4	3.8
	7 月	2.9	2.5	4.1
	8 月	2.8	2.0	3.6
	9 月	2.5	1.7	3.3
	10 月	2.6	1.9	3.3
	11 月	2.7	2.1	3.5
	12 月	2.9	2.2	3.4
2025 年				
	1 月	3.3	2.6	4.2

资料来源 : 世界银行。

表 5 工业生产

年份	月份	工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率 (%)			JP 摩根全球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世界	发达 国家	发展中 国家	全球 PMI	产出 指数	新订单 指数
2024 年		1.9	-1.1	4.4			
	1 月	1.9	-2.0	4.9	50.0	50.3	49.8
	2 月	2.0	-2.1	5.4	50.3	51.2	50.4
	3 月	1.3	-1.5	3.5	50.6	51.9	50.9
	4 月	2.6	-1.4	5.9	50.3	51.4	50.4
	5 月	2.2	-1.1	4.7	51.0	52.8	51.2
	6 月	1.6	-1.3	4.0	50.8	52.3	50.7
	7 月	2.2	-0.5	4.3	49.7	50.2	48.8
	8 月	1.7	-0.3	3.2	49.6	50.0	48.9
	9 月	1.7	-0.9	3.7	48.7	49.2	47.2
	10 月	2.0	-0.4	3.8	49.4	50.1	48.7
	11 月	1.8	-1.0	4.1	50.0	50.4	50.2
	12 月	2.4	-0.7	4.9	49.6	49.2	49.5
2025 年							
	1 月				50.1	50.6	50.8

注 : (1) 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为经季节调整的数据。 (2) 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 50 预示着经济扩张期。

资料来源 : 世界银行和 S&P Global。

二、美国经济

表 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 (环比)

单位 : %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 总值	个人消费 支出	政府消费 支出和投资
2022 年		2.5	3.0	-1.1
	4 季度	3.4	1.2	5.4
2023 年		2.9	2.5	3.9
	1 季度	2.8	4.9	5.1
	2 季度	2.4	1.0	2.9
	3 季度	4.4	2.5	5.7
2024 年	4 季度	3.2	3.5	3.6
		2.8	2.8	3.4
	1 季度	1.6	1.9	1.8
	2 季度	3.0	2.8	3.1
	3 季度	3.1	3.7	5.1
	4 季度	2.3	4.2	2.9

表 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 (环比)

单位 : %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22 年		2.7	7.5	8.6
	4 季度	-1.9	-1.1	-4.5
2023 年		2.4	2.8	-1.2
	1 季度	3.1	2.0	-0.8
	2 季度	8.6	-4.8	-3.1
	3 季度	2.6	4.9	4.7
2024 年	4 季度	3.5	6.2	4.2
		3.7	3.2	5.4
	1 季度	6.5	1.9	6.1
	2 季度	2.3	1.0	7.6
	3 季度	2.1	9.6	10.7
	4 季度	-1.4	-0.5	-1.2

注 : 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折年率计算 (表 6、表 7)。

资料来源 :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表 6、表 7)。

表 8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 (同比)

单位 : %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22 年		2.5	3.0	-1.1
	4 季度	1.3	1.6	0.5
2023 年		2.9	2.5	3.9
	1 季度	2.3	2.6	2.6
	2 季度	2.8	2.2	3.7
	3 季度	3.2	2.4	4.8
2024 年	4 季度	3.2	3.0	4.3
		2.8	2.8	3.4
	1 季度	2.9	2.2	3.5
	2 季度	3.0	2.7	3.5
	3 季度	2.7	3.0	3.4
	4 季度	2.5	3.1	3.2

表 9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22 年		2.7	7.5	8.6
	4 季度	1.6	5.0	2.0
2023 年		2.4	2.8	-1.2
	1 季度	0.3	6.8	-1.3
	2 季度	1.9	2.4	-3.5
	3 季度	3.0	0.2	-1.0
	4 季度	4.4	2.0	1.2
2024 年		3.7	3.2	5.4
	1 季度	5.3	2.0	2.9
	2 季度	3.7	3.5	5.6
	3 季度	3.6	4.6	7.1
	4 季度	2.4	2.9	5.7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表 8、表 9)。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8、表 9)。

表 10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增长率		失业 率	非农雇员 人数环比 增加 (万人)
		环比 折年率	同比		
2024 年		2.2		4.0	199.6
	1 月			3.7	11.9
	2 月			3.9	22.2
	3 月	0.7	2.8	3.9	24.6
	4 月			3.9	11.8
	5 月			4.0	19.3
	6 月	2.1	2.4	4.1	8.7
	7 月			4.2	8.8
	8 月			4.2	7.1
	9 月	2.3	2.1	4.1	24.0
	10 月			4.1	4.4
	11 月			4.2	26.1
	12 月	1.2	1.6	4.1	30.7
2025 年					
	1 月			4.0	14.3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数据。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表 11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月份									
2023 年		30718		1.1		38567		-3.2	-7849
12 月		2599	1.3	2.9		3248	1.1	0.5	-649
2024 年		31916		3.9		41100		6.6	-9184
1 月		2592	-0.3	0.5		3261	0.4	-0.5	-669
2 月		2658	2.5	5.1		3352	2.8	3.6	-694
3 月		2608	-1.9	1.5		3293	-1.7	3.8	-685
4 月		2625	0.6	4.6		3385	2.8	4.6	-760
5 月		2610	-0.6	4.0		3377	-0.2	6.6	-767
6 月		2655	1.7	5.7		3396	0.5	7.5	-741
7 月		2673	0.7	5.3		3470	2.2	8.9	-797
8 月		2728	2.1	5.5		3440	-0.9	8.1	-712
9 月		2702	-1.0	3.3		3545	3.1	9.5	-843
10 月		2665	-1.4	2.2		3406	-3.9	4.8	-742
11 月		2736	2.7	6.6		3525	3.5	9.7	-789
12 月		2665	-2.6	2.5		3649	3.5	12.4	-984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月度数据为季节调整后的名义值,年度数据为实际值,因此月度累加不等于年度数。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普查局和美国经济分析局。

表 12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季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22 年		3358	3022	336
	3 季度	1200	444	755
	4 季度	447	437	10
2023 年		2712	3631	-919
	1 季度	1004	1053	-49
	2 季度	623	486	137
	3 季度	584	1203	-619
	4 季度	501	889	-389
2024 年				
	1 季度	610	1166	-556
	2 季度	939	297	642
	3 季度	681	648	33

注:流入和流出均为净值,包括投资和撤资。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三、欧元区经济

表 1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22 年		3.5	4.9	1.1
	4 季度	-0.1	-1.0	0.6
2023 年		0.4	0.6	1.5
	1 季度	0.0	0.2	0.3
	2 季度	0.1	0.5	0.3
	3 季度	0.0	0.3	0.8
	4 季度	0.0	0.0	0.7
2024 年		0.7		
	1 季度	0.3	0.3	0.1
	2 季度	0.2	0.0	1.1
	3 季度	0.4	0.7	0.6
	4 季度	0.1		

表 14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22 年		2.0	7.2	8.3
	3 季度	0.9	1.7	2.0
	4 季度	0.1	0.2	-0.3
2023 年		1.6	-0.7	-1.3
	1 季度	1.0	-0.7	-1.6
	2 季度	-0.3	-1.0	-0.1
	3 季度	0.1	-1.0	-1.6
	4 季度	1.4	0.3	0.2
2024 年				
	1 季度	-2.3	1.1	-0.3
	2 季度	-2.4	1.5	1.1
	3 季度	2.0	-1.5	0.2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3、表 14)。

表 15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失业 率	失业人数 (万人)
		环比	同比		
2023 年			-1.0	6.6	1117.9
	12 月	-0.3	-1.3	6.5	1109.6
2024 年				6.4	
	1 月			6.5	1117.5
	2 月			6.5	1120.2
	3 月	0.0	-0.9	6.5	1110.9
	4 月			6.4	1105.6
	5 月			6.5	1109.1
	6 月	0.0	-0.2	6.4	1109.3
	7 月			6.4	1099.3
	8 月			6.3	1087.0
	9 月	0.2	0.3	6.3	1085.1
	10 月			6.3	1079.7
	11 月			6.2	1073.4
	12 月	-0.1		6.3	1083.0

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所在季度数据。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和欧洲央行。

表 1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22 年		3.5	4.9	1.1
	4 季度	2.0	1.7	0.6
2023 年		0.4	0.6	1.5
	1 季度	1.4	1.4	0.8
	2 季度	0.6	0.7	1.2
	3 季度	0.0	-0.1	2.1
	4 季度	0.1	0.9	2.2
2024 年		0.7		
	1 季度	0.4	1.0	2.0
	2 季度	0.5	0.5	2.7
	3 季度	0.9	1.0	2.5
	4 季度	0.9		

表 1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22 年		2.0	7.2	8.3
	3 季度	3.5	7.9	10.0
	4 季度	0.3	4.9	3.8
2023 年		1.6	-0.7	-1.3
	1 季度	2.5	2.9	2.0
	2 季度	1.8	0.1	0.0
	3 季度	1.0	-2.6	-3.6
	4 季度	2.2	-2.5	-3.0
2024 年				
	1 季度	-1.1	-0.7	-1.7
	2 季度	-3.2	1.9	-0.6
	3 季度	-1.4	1.4	1.2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6、表 17)。

表 18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欧元

年份		环比	同比		环比	同比	出口额
	出口额	增长	增长	进口额	增长	增长	减进
月份		(%)	(%)		(%)	(%)	口额
2023 年	28479		-0.8	27905		-13.0	574
12 月	2197	-0.5	-8.1	2033	-0.2	-18.2	164
2024 年	28640		0.6	26870		-3.7	1769
1 月	2260	1.1	1.2	2148	-4.6	-16.2	112
2 月	2345	-0.4	0.7	2125	4.6	-7.6	220
3 月	2457	0.0	-9.1	2226	0.0	-11.7	231
4 月	2471	2.9	14.4	2332	2.2	2.4	140
5 月	2407	-3.2	-1.0	2278	-0.4	-6.4	129
6 月	2364	0.0	-6.6	2156	-2.2	-8.8	208
7 月	2504	0.3	9.1	2319	1.5	3.7	185
8 月	2161	0.2	-2.7	2137	1.8	-1.7	24
9 月	2367	-0.3	0.2	2244	-2.1	-1.0	123
10 月	2551	-1.3	2.4	2469	1.5	3.1	82
11 月	2486	3.4	-1.4	2326	0.7	-0.7	160
12 月	2265	-0.2	3.1	2110	-0.8	3.8	155

注:仅指货物贸易,不包括欧元区 20 国之间的贸易额。月度数据为经季节调整的名义值,年度数据为实际值,因此月度累加不等于年度数。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9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欧元

年度	月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23 年		-3637	-3286	-351
	12 月	-1618	-1863	245
2024 年		-1019	740	-1758
	1 月	-36	90	-127
	2 月	-41	478	-519
	3 月	401	714	-313
	4 月	-259	200	-459
	5 月	-450	-295	-156
	6 月	-339	-222	-117
	7 月	-119	144	-263
	8 月	-19	-96	77
	9 月	12	6	5
	10 月	77	119	-42
	11 月	15	68	-53
	12 月	-259	-467	208

注:(1)指欧元区 20 个成员国,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额。(2)流入和流出均为净值,包括投资和撤资。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

四、日本经济

表 20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 总值	个人最终 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2022 年		0.9	2.1	1.4
	4 季度	0.2	0.1	0.8
2023 年		1.5	0.8	-0.3
	1 季度	1.3	1.1	0.1
	2 季度	0.6	-0.7	-1.5
	3 季度	-0.9	-0.6	0.5
2024 年	4 季度	-0.1	-0.1	0.0
		0.1	-0.1	0.9
	1 季度	-0.5	-0.5	0.2
	2 季度	0.7	0.7	0.9
	3 季度	0.4	0.7	0.1
	4 季度	0.7	0.1	0.3

表 21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22 年		-0.6	5.5	8.3
	4 季度	-0.6	0.8	-0.2
2023 年		1.5	3.0	-1.5
	1 季度	1.9	-1.7	-1.8
	2 季度	-1.0	2.4	-4.1
	3 季度	-0.7	0.7	0.4
2024 年	4 季度	0.7	2.8	3.1
		0.3	1.0	1.3
	1 季度	-1.0	-4.1	-2.8
	2 季度	2.0	1.7	3.0
	3 季度	-0.2	1.5	2.0
	4 季度	0.3	1.1	-2.1

表 22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最终 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2022 年		0.9	2.1	1.4
	4 季度	0.3	0.9	1.8
2023 年		1.5	0.8	-0.3
	1 季度	2.4	3.3	1.3
	2 季度	1.7	0.5	-1.1
	3 季度	1.1	0.0	-0.2
2024 年	4 季度	0.8	-0.3	-1.0
		0.1	-0.1	0.9
	1 季度	-0.8	-1.8	-0.8
	2 季度	-0.8	-0.6	1.6
	3 季度	0.6	0.9	1.3
	4 季度	1.2	1.1	1.5

表 2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22 年		-0.6	5.5	8.3
	4 季度	0.3	7.8	10.5
2023 年		1.5	3.0	-1.5
	1 季度	3.2	1.9	4.0
	2 季度	2.1	3.5	-1.9
	3 季度	-0.4	2.4	-5.3
2024 年	4 季度	1.0	4.0	-2.4
		0.3	1.0	1.3
	1 季度	-2.1	1.4	-3.4
	2 季度	1.1	1.1	3.8
	3 季度	1.5	1.9	5.3
	4 季度	1.0	-0.2	0.0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表 20~表 23)。

表 24 劳动力市场

单位: %

年度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同比增长率	新增就业与申请 就业人数之比	失业率
2023 年		-1.7	1.31	2.6
	12 月	-1.2	1.27	2.5
2024 年			1.25	2.5
	1 月	-1.4	1.27	2.5
	2 月	-4.1	1.26	2.6
	3 月	-4.6	1.28	2.6
	4 月	-0.5	1.26	2.6
	5 月	-1.1	1.24	2.6
	6 月	-6.1	1.23	2.5
	7 月	2.3	1.24	2.6
	8 月	-4.6	1.23	2.5
	9 月	-0.7	1.24	2.4
	10 月	1.7	1.25	2.5
	11 月	-3.5	1.25	2.5
2025 年	12 月	-0.7	1.25	2.5
	1 月		1.26	2.5

注:(1)劳动生产率为 5 人及以上规模制造业企业。(2)求人倍率为实际就业岗位与申请就业人数之比。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和日本央行。

ABSTRACTS

(1) Analysis of the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in 2025

Huo Jianguo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external market environment in 2024 from the aspects of market structure, product structure, and market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China’s external market environment will present a complex and volatile situation in 2025. On the one hand, trade protectionism is difficult to fundamentally alleviate, and trade frictions are facing new contradictions; the trade of high – tech produc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be under pressure, and China’s high – tech product exports are still trapped in the short term; the export difficulties of labor – intensive products have intensified, and the growth potential of the southern market has been limited; factors such as the difficulty of fundamental reversal of the investment of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under the adjustment and transfer of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s will continue to put pressure on the external market environm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U. S. and European economies may enter a weak recovery stage, and market demand orders will increase slightly; China – US relations have entered a stage of strategic confrontation, and bilateral relations will be eased in stages; the export of new energy products is still facing opportunities, and the upgrading of export structure will continue to make efforts;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high – level opening – up, the investment of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in China will tend to stabilize; factors such as the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of the domestic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the stabilization of foreign exports will be conducive to the external market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is paper gives suggestions for stabilizing foreign trade at the macro policy level in China in 2025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of enterprises.

(2) Take multiple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ilver economy

Research Group of 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At present, China’s population is aging rapidly, the demand for old – age care is expanding sharply, and the silver economy has both old – age care and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and has huge potential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lver economy is a matter of “the most concerning, direct and realistic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Based on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ndition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 and boundary of the silver economy, and propos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lver economy has problems such as the demand is restrict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ld – age security service system is lagging behind, the market supply is insufficient, and the industrial chain is not integrated. According to the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of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six major fields: pension finance, pension services, elderly products, elderly tourism, elderly human resources and elderly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studies and judg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uses the combination forecasting method to estimate the potential scale of the silver economy. On the basis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calculation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asks and goals of the silver economy, as well as policy suggestions such as accelerating the completion of the supporting policy system, increasing government support and effective supply, expanding and upgrading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stimulating human resource dividends.

(3) “Going out” leads China’s opening – up strategy in the new era

Chen Changying

In the new era, the foundation of China’s opening up advantages has undergone major changes. In order to transform the advantages of openness into actua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t is necessary to formulate the right strategy of openness. At pres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emand, supply, system, and opening – up, China has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participating in a higher – level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Judging from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the world’s major powers, especially the catch – up countries, in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trade – oriented, investment – oriented, and industrial chains. Therefore, China’s strategy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in the new era also needs to be adjusted in a timely manner 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i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from the past strategy of trade – led opening – up to the new strategy of leading opening – up with overseas investment. This is not only to meet the objective needs of the upgrading of domestic factor endowments, but also to respond to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s of external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century – old changes. In the new era, overseas investment will form a new pattern, and while focusing on promoting overseas investment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overseas investment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To this end, it is necessary to formulate different policies and arrangements for overseas investment in light of the respe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4) Uncertainty about the outlook for a modest recovery in the world economy has risen——Analysis of the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in 2024 and outlook for 2025

Yu Qiumei , Li Jingjing , Hao Yue , Zhu Yi , Zhao Yuxin

In 2024,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ultiple risk factors, the world economy will maintain a moderate recovery momentum, and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the world economic growth rate will fall slightly to 3.2% from 3.3% in 2023.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jor areas, with the slowdown of global inflation, the monetary policy of major economies turned loose, global production activities improved slightly, and trade in services was more active to support the recove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but the

overall market demand was still relatively weak, manufacturing production and trade in goods continued to be sluggish, and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prices fell as a who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jor economies, the US economy remains resilient, the eurozone and Japan economies have improved modestly, and the major emerging economies have continued to recover. Looking ahead to 2025, the continuation of loose monetary policy will continue to provide a favorable environment for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and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be an important force driving world economic growth, but the prospects for world economic recovery are still not optimistic under the continued disruption of risks such as geopolitical conflicts, trade protectionism, debt pressure, and US economic and monetary policy swings.

(5) Progress and trends in important WTO negotiations in 2023 – 2024

Dong Yan , Zhang lin , Guo Ruona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progress of the important WTO negotiations in 2023 – 2024 using a combination of text analysis and policy analysis, focusing on key issues such as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e – commerce and digital trade, fishery subsidies, agricultural subsidies, climate change and trade rules, and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reform. At the same time, the main differences and games in the negotiation process are discuss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policy positions of the member countries, with the aim of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the negotiation proces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 The study finds tha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trade governance facing challenges such as de – globalization, rising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geopolitical tensions, the WTO i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emerging issues, especially the signing of the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for Development Agreement and the E – Commerce Agreement marks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global trade rules in these two areas. In the future, WTO negotiations will focus more on emerging issues and their solutions to meet the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changes in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

(6) Expansion of services from a global value chain perspective——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industries

Yan Bingqian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 proportion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ous industries is not one that trades off the other, but a relationship of interdependence and continuous integration. In view of th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value chain,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accounting indicators of industrial value – added flow and source from the producer dimension and the consumer dimension respectively, and proposes the depth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the decomposition framework model, and it also uses the latest data from the World Input – Output Database to conduct an in – depth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of the driving factors for the in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in China and the world’s major economies, as well as the trend and depth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a large part of the expansion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since the 21st century has been used in the production of other industries, which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China’s unit of manufacturing final goods, the proportion of added value contributed by the domestic service industry is rising, and the trend and depth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re increasing, which reflects the increasing shift of the added value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products from foreign contribution to domestic contribu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position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the results of fusion decomposition show that, unlike other countries, the main channel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he added value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with other industry sectors is the domestic production chain, with a contribution rate of nearly 50% ;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China’s status as the “world’s factory”, the added value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and the integration of other industries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channel also contribute more. Although the service content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recent years, its absolute value is still lower than the level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especially the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still has room for deepening integration with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7)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analysis of the trend characteristics of “backshore”, “nearshore” and “friendly shore”

Li Yuankun , Su Qingyi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quantitatively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 trend of the new round of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restructuring characterized by “backshore”, “nearshore” and “friendly sho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recent years, the phenomenon of “nearshore”, “friendly shore” and “backshore” outsourcing has begun to accelerate in global trade. In terms of economies, the United States was the first to see a significant reshoring, 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trend of “nearshore” and “friendly shore” outsourcing after the COVID – 19; the trend of European shore return has not been obvious for a long time, but the policy side has continued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people to promote reshoring, and all countries have strengthened “nearshore” to varying degrees, while there is a differentiation phenomenon in friendly offshore outsourcing;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trend in Japan and South Korea. In terms of industries, high – tech manufacturing accounts for the highest proportion of “backshore” outsourcing, while low – tech manufacturing is the main component of “nearshore” and “friendly shore”. Overall, in recent years, the US – led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has accelerated its development of “backshore”, “nearshore” and “friendly shore” outsourcing. This paper argues that China can take measures such a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ecure development, and orderly cross – border layout to cope with the new round of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restructuring.

(8) The “China model” of glob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has been formed, developed and extended——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 aviation infrastructure

Sun Huijuan

Starting from the unique and prominent field of civil aviati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ormation of China’s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model and the process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going to oversea, which fills the gaps and weaknesses of existing research in this field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also has certain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In the field of civil aviati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airport construction, China, as a rising star, benefited from self – innovation on the basis of foreign imports in the early stage of development; afte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ivil aviati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has matured, its experience has been exported to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process of “bringing in” and “going out” of China’s civil aviati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s

a microcosm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well as a witness to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and the “Belt and Road”.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China’s civil aviati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should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and practice the concept of win – win cooperation; opposition to conditionality and discrimination; actively assume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9)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Zhang Xiuqing

In line with the trend of a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23,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at domestic and abroad,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s constantly evolving with the help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an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technology, high efficiency, high quality, etc., which can strongly promot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promotion path mainly includ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riven, factor integration, industrial upgrading,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etc. At present, China’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ha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and a large agricultural country is moving towards an agricultural power,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that need to be resolved and overcome. The us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s the key path to break through the bottleneck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and achieve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Combined with the core challenges and frontier trends of current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igital empowerment,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green transformation.

(10) Factor guarantee empowers major economic provinces to be the mainstay: why and what

Lin Weiwei, Xu Zhiyuan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2024,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issued a series of unconventional counter – cyclical macro – control policies to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land, energy, environment, data and other factors, providing strong support for the acceleration of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in major economic provinces. The major economic provinces are not only at the forefront of “reasonable growth in quantity”, but also exemplary and leading in “effective improvement of quality”, and take the initiative in “serving the national strategy”. This paper expounds that major economic provinces have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from five aspects: improving economic quality and efficiency, deepening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dustri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building a solid safety bottom line, and ensuring people’s livelihood and employment. At present, China is in a period of coexistence of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and challenges, and the number of uncertain and unpredictable factors is increasing, and the major economic provinces are facing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ere are constraints on land, labor, technology, data and other factors, and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has not been fully released. It is suggested to focus on the “four focuses”,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efficiency of market – oriented allocation of factors, further improve the support capacity of various resource elements, and take multiple measures to support major economic provinces to shoulder the important task of stabilizing and taking the lead.

(11) The mechanism,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digital economy enabling industrial integration to generat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Jiang Huichen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while empow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griculture and service industries, it has continuously expanded the space for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with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modern agriculture, and expanded the idea of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can empower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promote the growth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rom the mechanism level. On this basis, the problems of “digital monopoly”, “digital island”, “data right confirmation”, “digital divide” and “insufficient integration of data and reality” fa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enabling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re discussed. It is proposed tha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igital economy to better empower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form a strong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high –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velop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t is necessary to coordinate the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cross the “digital divide”, and win the “digital divide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o build a solid “digital foundation” for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the growth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Strengthen support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ilot experiment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dissemination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oncepts; Improve the demonstration effect and application level of digital scenarios, and promote the cluster and large – scale growth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12) The investment situation of China’s high – tech industry and related suggestions

Cai Yang, Ren Rongrong

Under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policy support and guidanc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market demand, China’s investment in high – tech industries has shown a long – term rapid growth trend at this stag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chieving economic growth, accelera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and well – being, and consolidat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However, it should also be noted that at this stage, China’s investment in high – tech industries is facing many constraints and challenges;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s still complex and severe, there are still many key weak links in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supply chain, and the matching between the supply of financial factors and the demand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till needs to be improved. To this end, it is suggested to further improve the investment and innovation environment of high – tech industries, increase policy support, optimize the investment structure, and take multiple measures to alleviate the impact of external risks, so as to stabilize investment confidence, build a solid investment foundation, effectively expand the scale of investment in high – tech industries, and give better play to the guiding and leading role of high – tech industry investment, so as to provide a strong guarantee for solidly promoting China’s high – leve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lf – reliance and self – reliance.

Editor: Yang Yuge